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历史宝筏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美〕季家珍 著
杨可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214-07538-3



9 787214 075383 >

定价：31.00元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历史宝筏

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美」季家珍 著

杨

· 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美]季家珍著;杨可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0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7538-3

I. ①历… II. ①季… ②杨… III. ①妇女问题—研究—中国—20世纪 IV. ①D66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7985号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en Question in China by Joan Judg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8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 or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9-383

书 名 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著 者 [美]季家珍

译 者 杨 可

责任编辑 沈 亮

装帧设计 陈 黎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页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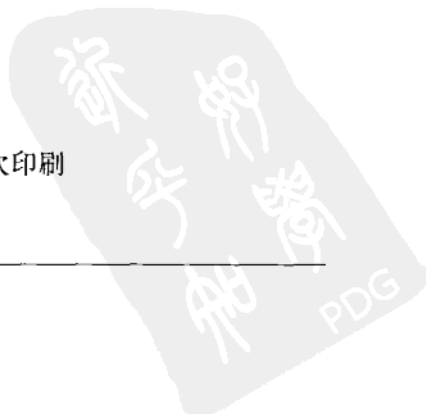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538-3

定 价 31.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强 李学勤
汪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洪银兴 钱乘旦 郭齐勇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任 谭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周斌 吴小平

成员 刘健屏 余江涛 金国华 顾华明 王瑞书 钱元元
周海歌 姜小青 黄小初 汪修荣 顾爱彬 刘锋
周兴安 吴迪 杨建平 吴源 胡明琇 章祖德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编 刘东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王保顶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译者的话

季家珍这部《历史宝筏》的英文版面世的时候，著名汉学家贺萧对作者的博学表示赞叹。在两年的翻译过程中，当我也随着回译文献的过程跑遍国图、上图、北大大图，一次次地与尘封的历史细节遭遇之后，才对作者学力之宏赡，组织材料之精巧有了深刻的了解。对译者而言，如何将丰富的历史材料一一还原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乐趣。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缩微文献阅览室、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北京大学图书馆民国旧报刊的工作人员在查阅史料上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特此致谢。没有这些原汁原味的史料，怕是没法还原那个吵吵嚷嚷、异彩纷呈的时代。

20世纪初，女性问题绝对是一个中心议题。妇女问题与民族国家问题纠合在一起，引发了数不清的讨论。作者根据人们看待这两个问题时的时间面向区分出了四种观点：“永恒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国家政治还是性别规范，过去才是永远的黄金法则；“改良主义者”稍微往前走了一步，愿意拥护20世纪初针对妇女的重要变革，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帝国晚期的贞节崇拜提出了批评；“古典现代主义者”认为近代历史不重要，作者发明的这个术语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时空观念——“古典”指的是继续认可中国古代典范，“现代”指的是和近代

历史决裂并拥抱现代西方世界;这个连续谱的另一端是“当下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未来才是规范,他们的眼光聚焦于激进的英雄主义。当然,这个框架只是理想类型式的分类,作者自己也非常谦逊地指出,20世纪初的社会现实无法被这些理论框架完全地涵括。不过,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最有力的冲击也许不是这些分类法,而是支撑这些脉络的一个个女性生命史的历史文本,它们呈现在这里的时候那么有血有肉,这么多年来却悄无声息,游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外,百年来历史的沉淀与剪裁让我们再重新面对这些材料时无法不感到令人汗颜的陌生与惊讶。而季家珍这本书便为改变今天国人的这种陌生做出了宝贵的努力,感谢她为我们重新打捞历史之筏。

能翻译这样真诚严肃的作品是一件幸事,但同时我也为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文充满张力、雅洁深远的韵味而感到忐忑。这里特别要感谢罗琳女士和刘东先生。罗琳女士丰富的翻译经验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让我受益良多,刘东先生不仅让我和这部书结了缘,还给初涉译事的我许多指点和鼓励。我也深知目前的译稿仍多有谬误与疏漏,还需方家不吝赐教指正。

杨可
2011年夏于北京



插图索引

- 图 1 有关“天下”的教材插图 5
- 图 2 缠足的妇女看着天足女子锻炼 11
- 图 3 中国最早留学东京的女生班级之一 11
- 图 4 对晚清女界风尚变迁的图示 12
- 图 5 花木兰 23
- 图 6 花木兰 23
- 图 7 李太夫人 26
- 图 8 骑脚踏车的妇女 26
- 图 9 曹大家(班昭) 29
- 图 10 孔璐华 29
- 图 11 曹大家 29
- 图 12 《劝读报》 30
- 图 13 桓氏 50
- 图 14 汪氏 55
- 图 15 贞女袁机 58
- 图 16 表彰贞节和孝顺的牌坊 61
- 图 17 现代精神征服自然 63
- 图 18 《义勇姜烈妇》 63
- 图 19 贞妇断手 68
- 图 20 无畏的女探险家射虎 74



- 图 21 《美国大教育家黎痕女士》 79
图 22 南丁格尔护理士兵 81
图 23 冒充女大学生的妓女 91
图 24 是学堂还是书场? 92
图 25 《大同世界之男女》 93
图 26 玛格丽特·富勒·奥索利 114
图 27 蔡琰 115
图 28 蔡文姬 119
图 29 女孩的体育锻炼 138
图 30 太任 144
图 31 孟子的母亲 146
图 32 孟母断机启圣 148
图 33 洪亮吉之母 152
图 34 欧阳修之母画地教子 153
图 35 《缙縈救父》 165
图 36 缙縈呈交上书 165
图 37 木兰骑马去从军 173
图 38 《花木兰第二》 174
图 39 《沈将军勇夺父尸》 180
图 40 提倡革命的罗兰夫人 192
图 41 王贞妇用指血写下遗言 206
图 42 王贞妇飞身跳下悬崖 206
图 43 男女爱国者 227
图 44 海外留学生朱敬仪 234
图 45 秋瑾早年小像 248
图 46 秋瑾身穿男式西服 248
图 47 秋瑾身穿中式男装 249
图 48 《鉴湖女侠秋瑾女士照》 249
图 49 男装女容的秋瑾 250
图 50 陈彦安婚礼照片 257
图 51 《国殇》表现女性楷模的陶塑 274



致 谢

这本书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日积月累的人情债实在是深重。

我最感谢的是东亚的同行们,没有他们帮我找到的珍贵材料,本书根本无从写起。他们包括北京大学的夏晓虹、从前在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周一川、京都大学的古川禎浩(Ishikawa Yoshihiro)和狭间直树(Hazama Naoki)、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游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宗震、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熊月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卢达(音)、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敏。还要特别感谢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蔡荣(音)帮我在南京找资料,还有宝拉·哈勒尔(Paula Harrell)也慷慨地跟我分享了她的私人珍藏的实藤文库的档案材料。

我也很感激欧美各地的图书馆员和同行们,他们指点我找到了许多重要的资料,特别是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的何义壮(Martin Heijdra)、哥伦比亚大学的弗卢格菲尔德(Greg Pflugfelder)、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何建业(音)。鲁道夫·瓦格纳和梅嘉乐(Barbara Mittler)让我得以使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绝佳的期刊收藏,他们热情的帮助使我受益良多。

通读初稿全文的友人和同事堪称楷模。胡纓读完了最初的草稿,帮我分析难懂的文本并考虑概念化的问题。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提的意见委婉而深刻,大大增强了这本书的可读性。大卫·福格尔(David Fogel)给了我热忱的帮助,他对明晰性的要求非常必要;贺萧(Gail Hershatler)以及出版社的另一位匿名审读者是理想的评论家:他们理解我研究的目标,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我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他们的评论对原稿的修改起了关键的作用。

其他人则针对各个不同章节的初稿给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他们在学术会议上和书籍出版过程中给予了重要的反馈意见,提醒我注意到各种相关资料。衷心感谢柯文(Paul Cohen)、艾尔曼(Benjamin Elman)、费约翰(John Fitzgerald)、何伟亚(James Hevia)、吕贝卡·卡尔(Rebecca Karl)、高彦颐(Dorothy Ko)、顾有信(Joachim Kurtz)、曼素恩(Susan Mann)、孟月(音)、钱南秀、魏爱莲(Ellen Widmer)、徐辉琪(音)和沙培德(Peter Zarrow)。钱南秀还好心地帮我解决了许多翻译问题。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也受益于各种奖助项目,这些奖助包括ACLS/SSRC的国际博士后奖学金、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Regents'青年教师奖学金、伯克哈特(Frederick Burkhardt)为新近取得终身教职的学者提供的驻校奖金、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博士后研究奖助。后两项奖金使我有幸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了两年访问学者,给我的研究增加了未曾想见到的维度。史语所的同事给我许多教益,其中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熊秉真(Hsiung Ping-chen)、胡纓、柯马丁(Martin Kern)、顾有信(Joachim Kurtz)、夏互辉(Hugh Shapiro)属于中国研究的领域,而碧宁(Carolyn Bynum)、凯瑟琳·加拉赫(Catherine Gallagher)、杰恩·葛斯坦(Jan Goldstein)、马丁·杰伊(Martin Jay)、小威廉·塞维尔(William Sewell, Jr.)等则是圈外的学者。达格玛·赫尔佐格(Dagmar Herzog)一直热心参与这个课题,给了我各种支持,还有一贯洞察力非凡的琼·斯科特(Joan Scott),他们对我的支

持不止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

在漫长的准备书稿和校改过程中,编辑穆里尔·贝尔(Muriel Bell)对我的书稿兴趣不减。我十分感激她的信心和鼓励。我也要感谢奥斯特(Kirsten Oster)、苏厄热斯(Joa Suarez),特别是凯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积极热情的回应。

最后,我最感激的是我的丈夫 Josh,作为我最亲密的同事和家里最挑剔的编辑,他给了我许许多多学术上的建议和支持。多年来他还无私地承担了做早饭的任务,年头长得我都不敢承认,他给了我所有作家母亲最最需要的一——时间。



年 表

公元前 1049—公元 221 年	周朝
公元前 221—公元 207 年	战国时期(公元前 479—公元 221 年)
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	秦朝
	汉朝
	西汉(公元前 206 年—公元 9 年)
	东汉(25—220 年)
220—589 年	六朝时期
	魏(220—265 年)
	晋(280—420 年)
	陈(557—589 年)
589—618 年	隋朝
618—907 年	唐朝
907—960 年	五代时期
960—1126 年	北宋
1127—1279 年	南宋
1260—1368 年	元朝
1368—1644 年	明朝
1644—1911 年	清朝
1912—1949 年	中华民国
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导 言

女性与时间性(temporality)

1898年的秋天,一个名叫李闰的女子被告知,她的丈夫谭嗣同因百日维新的失败而被正法。李曾经和谭一起为兴女学和废缠足而奔走。听到了丈夫的死讯后,李赶到了家乡所在的湖南省抚署,在中丞面前以匕首刎颈,为丈夫之死进行抗议。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撕开伤口,愤怒地呼喊丈夫的死刑执行官的姓名才断了气。最后入葬时,她银牙尽碎,拳头紧握,胸口还留着匕首的血印。

——《谭烈妇传》,1899

这段描述见于当时极有影响的报纸,作者接下来带着深切的同情考察了李闰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他强调李闰自己也编过一部历代烈女传,他在为李闰所作的传记中借用了这本传记集中的一个传记。^① 这就是明代的张夫人(Lady Zhang)(活跃于1550年)的故事,为了给进谏直言蒙

^① 根据这位作者的说法,李闰编辑的传记合集题为《历朝烈女传》。胡文楷(262)书中记载的是《历代烈女论》。

冤而死的丈夫杨继盛(忠愍,1516—1555)申冤,她在皇宫前面以短剑自刎。^①李氏的殉夫壮举与张夫人遥相呼应,也成为了传奇。她的传记见于20世纪初各种主要的文献,在后来的二手材料里也不断重复,^②还收录于迄今为止最综合的现代妇女史著作——小野和子(Ono Kazuko)的《革命世纪中的中国女性》(*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这本书在1989年出版了英文版。^③

不过,李闰故事最引人入胜的一点却在于它完全是杜撰出来的。李闰并非死于1898年,而是死于1925年。她并没有殉夫而死,而是将生命奉献给了女子教育。谭嗣同死后不久她就在湖南省东部设立了一所学校,一直干到27年后终老。

这个一分为二的李闰生平故事勾勒出了本书两条核心主线:历史的可靠性(authority)以及谈中国女性生活时政治的重要性。李闰传记的作者把李氏放入义烈女子谱系的办法,为谭嗣同和戊戌变法正名。他通过肯定李氏对婚姻的忠贞来证明谭嗣同对政治的忠诚,这里提出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臣与国、妇与夫之间的类比:谭嗣同为国而死,正如李氏为谭嗣同而死一样。李闰的双重版本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眼光,去深入了解这个政治驱动的过程是如何将历史时间中的女性转化为范式时间(paradigmatic time)中的典范的。这个故事也揭露了在诸如义烈女子这样的元时间(metatemporal)女性类型和这些类型试图容纳的当时那些女性的生活之间的断裂。

这里的叙述充满了20世纪初典型的性别悖论、对历史巧妙的应用,以及各种竞争性的国家意涵。那是一个开启中国现代性的关键时刻。“妇女问题”和历史问题对于理解此时的政治十分重要。本书勾画的正

① 杨继盛的故事请参看 Goodrich, 2: 第 1503—1505 页。关于杨继盛劝诫其妻不要自杀的内容请参看 Bossler。

② 《清议报》最初的传记在 1925 年的《清稗类钞》里也转载了,《李闰自刎殉夫》。易宗夔(315b—16a)的版本稍有不同。

③ Ono, 38.

是为这些政治主张提供支持的性别类型和历史想象。它考察女性、历史和国家的概念是互相如何编织缠绕在一起的,探查这些对于女性日常生活的想象有何影响。^① 本书的目标并非再度重申时代的复杂性,而是试图对它有所阐明。我们将追寻中国现代性复杂浪潮中的各种模式,探求其中的意涵。

中国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经常变形的概念。它穿过厚厚的史册,包罗万象,带着五花八门的修饰语。仅仅从最近的东亚研究的领域中列举几例就可看出,现代性可以是被抑制的、被质疑的、殖民的、竞争的、卫生的、失落的。鉴于这个主题中生造概念泛滥,经常充满了模棱两可的理论文献,我曾经决心绝不要在本书里使用“现代性”这个词汇。初稿里我的确是没采用,但在终稿里我改变了作法。主要是这个字眼——部分地由于它的可变性——能最充分地包涵那个对于理解 20 世纪初的中国至关重要的特殊过程。

我采用现代性来指称三个过程之间的互动:世俗化(secular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时间化(temporalization)。虽然这些标签在现代性这个领域中的各种广泛话语里交叠共鸣,但就中华晚期帝国时期以及本书所关注的时代背景来看,还是分别定义着不同的过程。首先,它们并非是单向的。儒家的和“进步的”价值观,本土和西方的观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都是互为定义的。既有的认识并非是固定的实体,可以轻易被后继的代替品替代或覆盖,这些认识是流动的起点,在与代替概念的互动中变形、重生。

最抽象地说,世俗化指的是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儒家礼教和“进

^① 我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6)的“历史的想象”(historical imaginary)的概念改成了“社会的想象”,它指的是 20 世纪初的中国对自己所身处和延续的历史进行想象的方式。

步的”西方文明概念的遭遇。^① 虽然儒家的礼教缺乏以神为中心的教义和教堂一类的组织,它的确也含有一定的准宗教成分。它是一种建立在古代文本和相关的宇宙观念之上的终极价值之源,指导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② 尽管如此,这些礼教更多地还是此世而非彼世的,它包含的真理是内在的而非超验的。^③ 在帝国晚期的礼教教材这样重要的位置上,这种社会性的嵌入得以展现——这也是本书分析的一个核心——即“女德制度”(regime of feminine virtue)^④。那些忠于这一套管理制度的女性仍遵循明清时期对于性别特质的古老规则的阐释,比如性别之间严格的隔离和“内”“外”空间之隔。坚持这些古老规则的女性也认为自己是恪守家庭、社会,乃至宇宙的秩序。

20 世纪初,这些性别规则以各种方式被坚持、重新诠释或是忽视。西方的传教、鸦片战争(1839—1842 年,1856 年)、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年)和日益增多的外交和学术交流已经扰乱了儒家独立自足而又交相关联的宇宙,并要求对政体、社会和女性气质等概念加以更世俗的语境

① 祛除神或者宗教并不是世俗化惟一的意义。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93-94)把激进的世俗主义定义为“在什么是世界根基的问题上的一次转向”,他认为这个词从词源上说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如何栖居于时间之中”——这一过程也与我在书中考察的东西互相共鸣。在中文里,“世俗化”这个词曾经用来指普遍联系的宇宙观的衰落以及明清时期的考据学对理学的“智力钳制”所形成的挑战。有关 John Henderson 和 Benjamin Elman 的著作,参见 Furth, *The Patriarch's*, 第 207 页。我认为这种钳制在 20 世纪初的社会和文化领域进一步松动了。

“礼教”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礼”(礼仪)和“教”(教育)。对这个概念深入的历史分析可参见蔡尚思。“文明”一词代表着新的、通常是源自西方的价值和思想,这个词可以说是收回来文字之债——它源自古代汉语,被现代日语所借用,后来在 20 世纪初又重新输入中国。参见 Masini, 第 204 页; Lydia H. Liu, 第 308—309 页。

② 蔡尚思,《序论》,第 1 页。Vincent Goossaert (309) 把“中国的基要主义”(Chinese fundamentalism)描述成“一个与礼仪、献身和救赎有关的独特的思想和行为范畴”。关于礼的主要功能,参见 Sivin, 第 24 页。普遍联系的宇宙观假定在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在儒家看来,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组成了互相关联的大千世界。在这个大千世界之上是天,它是和谐与平衡的力量。Arthur F. Wright, 也参见 Henderson。

③ Chen Chi-yun.

④ Goossaert(309)描述了中国的宗教生活史是如何嵌入于社会经济环境之中的。Shang Wei (14)提到了“双重礼仪”(dual ritual):一方面礼仪具有终极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它又是实现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手段。

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①用1906年的一本妇女教科书的话来说,对于“荒谬的”中国代表“天下”的观念必须加以驳斥;在约瑟夫·列文森著名的公式里,最终的政治共同体已经转变了,从“天下”变成了民族国家(见图1)^②。大清王朝(1644—1911年)在它的众多臣民眼中,是诸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汉族,是诸多民族中的一族;家族则是诸多可能的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与此同时,个人——包括男性和女性——正在不断地从他们曾经栖居的世界中脱离出来。对于女性来说,家庭不再只是她们作为女性的自我定义的惟一依据——女性曾经被理想化地看作是聚在一起看护和谐宇宙的人——现在被当作国家的人民来询唤,担当起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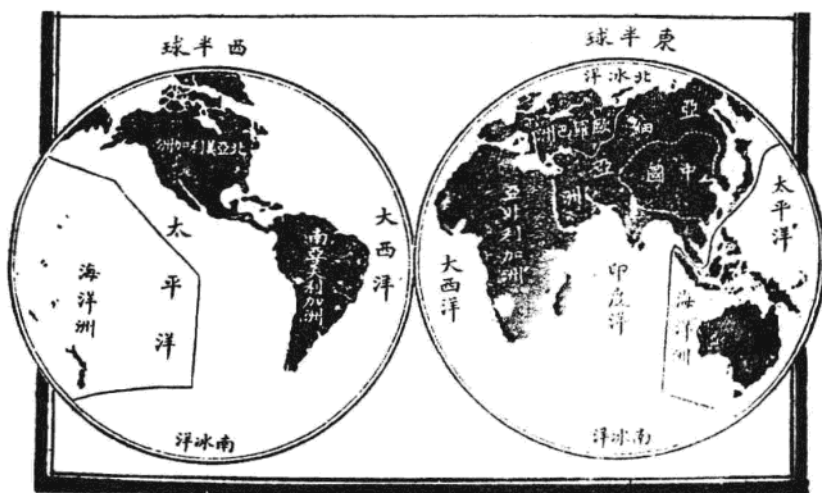


图1 帮助女学生打消“中国就是‘天下’”的“荒谬”观念的教材插图

资料来源:谢允燮,48b

20世纪初,对中国妇女影响最为深远、令她们脱离原有世界的世俗概念就是公共教育。^③是公共而非教育这个因素给女德制度带来了最大

① Hutters, *Bringing* 是写中国和“列强”之间如何遭遇的最新力作。

② 谢允燮,48b; Levenson,第98—104页。

③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和世俗化方式以多种方式发生关联。道观与佛寺被接管,用来当成新式学校。参见 Goossaert; Duara, *Rescuing*, 第3章。1906年清政府宣布,以前礼部在行政架构中的位置由新的学部(成立于一年以前)取代。

的威胁。根据支持这种制度的古老规则,性别分化是由男女有别的教育轨道来加以强化的。《礼记》的“内则”篇规定男孩应该十岁离开家去上学,而女孩应该呆在家里接受女教师的指导。^① 尽管家庭教育的内容在两千年来不断变迁,但直到 20 世纪初,推广正式妇女教育的运动才直接挑战了《礼记》里提出的制度模式。^②

这场运动不情愿的合作者和积极的推进者对女子教育所持的态度迥然不同。对有些人来说,其目的是恢复礼教原则,对其他人来说则是教育国民之母,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灌输革命观念。但是,即使是这场运动中比较世俗的教育观念也不一定就废弃了女德制度。比如说,那种认为女性通过做良妻贤母来克尽妇职、顺应天道的观念转变成了女性通过做英雄的母亲和忠诚的国民来贡献力量、忠于国家。看看新式世俗教科书和旧式礼教教材支持或者限制女学生的方式,这种认识的模糊化就更为明显。国家主义为女性热烈拥护的可能性创造了很多新条件,但这些条件也限制在定义明晰的国家的框架里。与此相反,坚守严格的儒家原则可以给她们挣来道德资本,而这是她们把自己建构为个体化的历史主体所必需的。

在对新世界模式的翻译中,也可以清晰地见到类似的融合。这个翻译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第二波过程。20 世纪初,引发了中国世俗变革的外来观念并没有替换掉中国既有的宇宙的观念,相反,当时思想开明、高瞻远瞩的中国人用他们关于宇宙的历史语汇翻译了这些观念。对我们来说,这种“主人”的中国历史语言比更现代的西方的“客人”的语言更难了解,毕竟后者是我们自己的“方言”。但是,了解中国人用来解码和阐释新的世俗观念的本土语言对于我们理解这些观念是如何被使用和吸收的非常重要。同样的,对调和西方观念这个具体的

① Legge, 译, *The Nei Tse*, 第 478—479 页。

② 关于宋代到清代之间妇女的知识水平,参见 Ebrey, *The Inner* (伊佩霞,《内闾》); Dorothy Ko, *Teachers*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Mann, *Precious* (曼素恩,《辘珍录》)。

微观过程加以把握也对我们从更抽象的宏观层次上了解意识框架的转译过程至为关键。

明治日本(1868—1912年)在调和西方观念以及开启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传入中国的西方政治、社会和性别理论主要都来自日译的欧美作品。举例来说,据估计1902—1904年间60%的中文版翻译书籍都是由日语译成中文的,而译自英语和法语的分别只占16%和3%。^① 这些书籍的翻译者一般都是住在东京或横滨的高度政治化的群体中的成员。他们中有清政府通缉的流亡者(包括谭嗣同的革命同仁)、政论家,其中当然也包括赴日留学的成千上万的男生和数以百计的女生。但是日本给这个群体的成员们提供的不仅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思想库,它还塑造了自己东亚式的国家和女性气质,这更映衬出中国的政治社会实践中的相对不足。最后,日本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标杆。中国赴日留学、旅游的男男女女都把自己的祖国和明治日本相比较,把这种进化的现在和古老的过去之间的历史之别勾画成中日之间的空间区隔。^②

正如这种对中日关系的勾画所暗示的那样,中国晚清时期(1890—1911年)的全球化和世俗化与新的时间化模式紧密相连。这些不连续的时代——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太平天国(1851—1864年)、义和团运动(1899—1900年)——打断了传统的时间观念,将中国推向民族自觉之路,引发了时间意识的转变。^③ 对中国的国家命运持不同意见的各色人等都尝试着通过重新在政治上运用“过去”来实现当下的变革。^④ 这个过去,原来也从未是连续的或者同质的,现在则变成了益发分化的异质性的文化资源,这给国家、女性开启而不是减少了更多的可能性。

① Xiong, *Degrees*, 第34页。

② 把时间关系勾画成空间关系在非西方社会和西方社会都很常见。例如,可参见 Felski, 14。

③ 在提到明清之间的转变时, Lynn Struve(4)写道,“不连续的时代(times)是一段段不连续的时间(time),在急切地利用(各种感知时间的资源)时也生动地揭示了它们”。参见 Jörn Rüsen(15)对时间概念改变时的关键时刻的讨论。

④ 参见 Osborne(200)对于不同的时间化的政治意义的讨论。

这样一来,中国的现代性就既不是和“传统”截然断裂的产物,也不是东西方零和博弈的结果——在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献里,东方西方已经成了被不断诟病的还原主义的二分概念,如果说还没有彻底被击败的话。^①取而代之的看法是,中国的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对千万种图象的三角测量的产物,既包括对中国过去,还包括数不胜数的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当时经日本中介的、被具象化为“西方”的世界列强。20世纪初向前看的中国男女通过翻译,将这些知识变成地方知识来加以传播。他们受西方观念的启发,在自己的历史中寻求新的意涵,提出了新的议程。他们将认知革新和重建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创造性地再生产旧识来产生新的知识。^②

这本书对历史变革的解读阐明了这种复杂的时间化的经历。本书通过阅读那些自觉“进步”的文本和那些人们并不乐意看作“新式”的实践行动考察了那些推动现代性的人们所鼓吹和压制的东西。^③本书通过逆向梳理各时代的作品,突出了一个由已有的复杂历史叙述形成的错综的话语网络,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不同的曲折人生故事。^④我们发现新的学校不一定就制造出新女性;即使在最严苛的批评者那里,那些被谴责为迂腐过时的教科书也仍然是意义生产的最重要的阵地。在一套烈女传的古籍珍本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关于情感的话语,它隐隐与后来对人类感情的反传统的讨论相唱和,虽然它们在历史背景和思想意识上

① 至少从 Benjamin Schwartz 1972 年发表的启发性的文章 *The Limits* 开始,我们一直在克服这些二元对立。有两本最新的研究清末民初的著作承认了这些二元对立的局限,但也继续使用它们,参见 Reed 和 Mittler, 以及讨论这两本书的一个评论文章: Judge, “The Power,” 236—238。

② 令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Susan Buck-Morss, 110)吃惊的是这个事实——“新的发明都是以回归历史的形式出现在近代历史中”。其他的理论家也有类似的观点。Peter Osborne(xii)认为现代性在生产新事物的同时也产生了旧的;Rita Felski(59)则说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性是想象未来,但想象过去也是它的补充部分;Charles Taylor(129)新的想象应该感谢旧日的想象。

③ 关于考察被现代性压抑的东西有多么重要可参见 Gross, 第 135 页。

④ 有关逆向梳理历史纹理概念,参见 Benjamin,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第 392 页。

有别。借助晚期帝国有关贞节烈女的政治，我们也逐渐理解了 20 世纪早期国家英雄主义的冲动。

女性和现代性

正如这些例子所展示的那样，所谓“女子问题”或“妇女问题”——也即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如何、或者是否重新定义女德、女才和女英雄主义——凝聚成为过去和现在、中国规则和西方实践、儒家礼教和新思想之间的张力。^①

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承认妇女、历史和现代性之间的关联非常重要。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曾经鼓励(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跳出对公、私空间区隔的检讨来考虑时间性和历史的不同表征。^② 丹尼斯·堪蒂尤迪(Deniz Kandiyoti)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在何种程度上“中东的现代性的话语不止是为与西方殖民者的遭遇所规制，也受制于社会变革以及与古代政治制度的不同关系”。^③ 坎康·散贾丽(Kumkum Sangari)和苏德西·韦德(Sudesh Vaid)告诫印度学者要更关注“过去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其他历史时期的(性别)意识的。”^④

女性处在现代性中的中心位置，这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共鸣。中国妇女问题不应当被当作普通朝代更替的一种模糊现象来理解，而应当被看成是中国自己独特的历史产物。整个 20 世纪早期，中国的那些尊重女

① “妇女问题”这个说法译自欧洲流行了数百年的英文短语“women question”，从 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被普遍使用。Wang Zheng, 第 3 页。不过，“女子问题”这个说法从晚清就开始流行了。例如，木兰同乡(导言后面将会论及)就声称，改良派在设计他们的政治议程时完全忽略了女子问题。

② Felski, 59.

③ Kandiyoti, *Afterwords*, 271 - 272.

④ Sangari 和 Vaid, 第 18 页。杜赞奇也注意到，在我们此处所讨论的时期稍晚一段时期，在中国的现代性里把中国妇女塑造成真实人物的是历史的表征而非空间的表征。Duara, *The Regime*, 第 300 页。

德制度的女子仍然是良妻贤母和礼教秩序的管理者,她们代表了社会神圣的核心。进一步说,她们的身体带着汉人文化价值观的印记;她们裹得小小的金莲是清朝皇帝也无法革除的文化符号;她们的贞操是所谓的血统、社会和宇宙稳定之源。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中国的政治和礼教秩序都被“列强”挑战的时候,体现这些秩序的女子规范就面临着更严格的审视。那些投身于中国救亡斗争的人们将妇女问题和当下迫在眉睫的政治和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将妇女当做民族改革的主体和目标放在中国社会日益世俗化的核心之中。

性别问题和民族国家的问题纠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妇女问题的独特之处。就西方民族国家而言,新的平等主义的思想史从政治领域逐步向社会领域渗透,早在遭遇父权之前几百年就得面对政治权力。^① 但在中国,整个西方的权利观念——从启蒙到19世纪晚期,从天赋人权的概念到政治和妇女权利的观念——都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一下子就输入进来。^② 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民族国家的现代观念提出百年之后开始讨论性别平等和妇女教育,而中国的改革者同时提出了民族复兴和妇女解放的问题。^③

妇女问题和民族革命缠绕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后果是,精英阶层的妇女比其他人更深地受到了晚清的现代化浪潮的影响。禁止缠足的政令——缠足迅速地从汉文化的标志变成了民族落后的标记——改变了妇女和她们自己的身体的关系(见图2)。从未有过的学习机会,无论是在国外——大部分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私立学校,以及创办自己的刊物的机会大大改变了性别化的内外领域的版图(见图3)。要求模仿外国社会实践的呼声挑战着既有的女子行为规范。1907年,帝国政府终于

① Taylor, 146-147.

② Mary Clabaugh Wright(60—62)在描述中国人的信仰时有相似的论点,他认为他们能“跃过其他国家的各个发展阶段”。

③ 细读法国、英国以及殖民地地区启蒙时期的主要文献可以发现,对女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挖掘还十分欠缺。Kerber, *The Republican*, 第42页。有关法国的内容参见 Ozouf, 第260—261页。



图2 一位缠足的妇女看着未曾缠足(天足)的女孩子在体育课上用哑铃锻炼

资料来源:许家惺,3b



图3 中国最早留学东京的女生班级之一

资料来源:《中国新女界杂志》1,(1907年2月5日)

也承认并试图规范这些发展,授权开办了一些招收女童和妇女的正式学校。正式批准妇女进入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这一历史创举打破了千百年来禁锢妇女和性别隔离的礼教规则(参见图4)。



图4 一个对晚清女界风尚变迁的图像总结点明了时代特性:缠足意味着过去,在公共场所阅读代表着现在,武装斗争象征着将来。

资料来源:《图画日报》12:9[1:141]

这个时期对妇女各种称呼可谓是变化多端、层出不穷且相互竞争,时代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情感变化之剧可见一斑。^① 这些称呼包括古已有之的那些称谓:“烈女”、“节妇”、“贞女”、“烈女节妇”以及“才女”,20世纪初这些称呼的规范力还在,但也在加速式微。在当时最著名的,也

^① 尽管 Tani Barlow (*The Question*) 对晚清和近代中国妇女这个单一的类别提出了质疑,但其中相互竞争的各个子类的范围揭示了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质以及妇女问题所牵扯的各种利益。

是最被推崇的——如果不说是清一色的崇拜的话——新的类别包括“女学生”，“国民之母”，还有说法不统一的“女英雄”、“女豪杰”、“女杰”。这些或新奇或老旧的词汇并非只是添加在晚清社会物质现实上的散漫建构，实际上这些词汇塑造了一个个女性的主体性，同时也被这些女性的主体性所塑造，女性们选择性地拥护或拒斥这些词汇，把自己构建为新的历史主体。一些 20 世纪初的妇女将自己的学术精力用于再生产烈女传，继承了“烈女”的遗产。另一些女性则积极推进妇女政治参与，扮演了女英雄的角色。

这些不同种类的称呼在两千年来的女性“传记”传统里灌注了历史的意涵和道德力量。^① 传记——包括女性的和男性的——在儒家文化传统里的功能不止是一种纪念的方式，也是一种自我技术。^② 个人不只是按礼节行事，也通过效法历代的典范来修养道德。^③ 第一本为女性而作的闺阁典范集就是刘向（公元前 79—公元前 8 年）在公元前 34 年编纂的《列女传》。随着这本选集在两千多年间被不断重编再版、流布四方，传记继续担当着女性道德感化的有力工具。

古代的传记中的叙述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工艺品。虽然刘向的《列女

① 英语的“biography”一词对应的是西方至少自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 46 年—公元 120 年)以来的一个传统，要把个体的生活完整地加以表现，但没有准确地反映中国的生平传略，或称列传的传统。这些短小的道德素描选择性地表现了个体一生中某些特殊事件的细节。我按照 Stephen W. Durrant(xix-xx)的译法，把列传译作“arrayed traditions”，因此，当指称的是女性的生平故事，也即列女传时，就译作“arrayed traditions of women”。Dennis Twitchett(25)和 Burton Watson(120-121)分别将列传翻译成“connected traditions”和“memoirs”。但是为了简洁起见，我在提到列女传的时候还是会用“biography”这个词，但想提请读者注意到这里的西方概念和中国不同。

② 作为(通过阅读传记)形成自我以及(通过写作传记)将自我塑造成知识客体的方法，我所说的“自我技术”与福柯所说的“自我的种种技术”有一致性，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在异教徒和早期基督徒的行为中)禁忌和自我的关系，而非典范和自我的关系。参见 Foucault, *Technologies*, 第 16—49 页。

③ Huang Chun-chieh, *Time*, 第 34 页; Arthur F. Wright, 第 9 页; Shang Wei, 第 17 页。司马迁的《史记》引入了褒奖善良、惩戒邪恶(“善善恶恶”)的观念，是中国第一部采用传记来突出历史道德教训的著作。参见 Shang Wei, 121。

传》取材于司马迁(公元前 145—公元前 86 年)的经典之作《史记》中的完整故事,其中的王朝历史在后世版本中得以保留,它的意义也通常随着引入新的类传记文本(parabiographical)因素而不断变化。这包括了字形的变化、新增加的注,或者更为重要的,新附的评论。^① 就像旧手稿(palimpsests)——一种“写过了好几次以至于以前擦掉的痕迹还依稀可辨”的文件——当一代代的后继者不断地将新的“超文本”(hypertexts)嫁接到现存的传记“次文本”(hypotexts)中时,历史的生命叙述就获得了新一层意义。^② 由此,后世的读者通过层层沉淀的意义和几个世纪的文本转型才真正遭遇了一个汉代的典范或者南北朝的女英雄。

虽然在写法上旧瓶装新酒(overwrite)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在 20 世纪初此风尤盛。这一时期无论是编者还是作者都放大了女子传记的道德目标,把它当作民族变革和新女性教育的工具。作为对当世方兴未艾的否定历史神圣性的风潮的一种回应,他们有意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阐释,以表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们借由传记的形式改变了过去的权威解释,抛开了语意的引申,宣传他们自己对于性别和历史变革的观念。

不断变换的地缘政治的现实催生了这些激进的再创作,也使得有些作者不只是对中国已有的知识库里的传记进行重新解释,还将他们的知识库加以扩充,把新的西方模式加进来。他们将有关欧美妇女的戏剧性的故事(dramatic tales)——包括圣女贞德(Joan of Arc, 1412—1431)、罗兰女士(Madame Roland, 1754—1793)和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都吸收到中国的经典中来,同时也改变了传记的基本功能和时代特性。他们把这种传记当作自我创造的技术,不再限于模仿,他们将读者/传记遭遇的重点从过去的自我牺牲模式转换成为

① 我把 Gérard Genette 的类文本(paratext)概念改造成了类传记文本(parabiography)。参见 Genette, *Paratext*。

② Genette, *Paratext*。

未来主体的自我建构。一个作者曾经用菩萨救赎的深情表述描述了外国传记的这种赋权的功能。他为一本介绍西方妇女生活的选集作序言时,鼓励年轻的中国妇女谨记这些故事,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这些“宝筏”将护送她们渡过湍流。^①

宝筏的形象是这本书最为重要的隐喻。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将要分析 20 世纪初的人们——从男性官员到妇女活动家——如何采用宝贵的历史之筏和历史传记来调整他们自己在朝代变迁和民族危机中的经验。尽管他们在和时代潮流协议的过程中都只能靠这个工具从遥远过去的宁静水面走到近代历史的漩涡之中,他们所划下的轨迹却各不相同。

对历史变化的一种新闻释

这些走向历史时间的不同通路并非对 20 世纪初的世界性危机的无心反应,而是人们为了服务于当下和将来的政治目的,从过去中重新加以采用的策略性的“时间类型”(chronotype)。^② 我辨析出了四种比较突出的反映这个时代的历史、政治和性别观念范围的时间类型。在这个连续谱的一端,“过去”象征着黄金法则,而在连续谱另一端,未来才是规范。一极是借古否今,而另一极未来的观念重塑了对过去的意识。

第一种“永恒主义”(eternalist)时间类型的支持者忠于古代规范,他们试图将妇女看作超越历史时间长河的宇宙秩序的承载者、家园的守护者。尽管如此,他们对女性的建构实际上还是对他们所处的历史时刻的直接反应。由于反对新传入的价值观并且越来越为文化危机感所困

^① 《世界十女杰》。按照佛教教义,宝筏比拟的是将人引渡到光明彼岸。参见 Fong, *Femail*, 第 20 页。

^② John Bender 和 David E. Wellbery(4)给时间类型下的定义是“(历史)时间获得时间或概念意义的模式或样式”。Huang Chun-chieh, *Time*, 第 20—21 页,他尝试讨论了作为时间范式的超时间(Supertime),它给时间加以装饰,形成了人类充满意义的锦绣图画——历史。但是他没有讨论给超时间命名的政治。

扰,他们积极投身于一场保护性的“永恒主义的努力”之中,将传统的女子规范当做没有时间、不可侵犯和不可变易的加以鼓吹。^①

第二种“改良主义”(meliorist)时间类型的支持者和永恒主义者有些共同之处:他们都承认基本的儒家礼教原则,一般都扬古抑今,对历史持有一种连续的观念,因此他们会颂扬自古典时期直到19世纪晚期的女性的儒家道德典范。^②改良主义者和永恒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愿意拥护20世纪初针对妇女的重要变革,比如设公立学校。但改良主义者和永恒主义者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包含了对晚期帝国女性贞节崇拜(cult of female chastity)的批评,这个问题为永恒主义者所忽略,即便那些比较激进的作者至少此后十年也都没有明确提过这一点。这些改良主义者的批评本身是历史连续谱的一部分,是三百年来礼教原则和人情如何共处的争论的一种延续。

支持第三种“古典现代”(archeomodern)时间类型的人和改良主义者、永恒主义者颂扬同样的中国古代妇女典范。他们和前述两类人不同的是他们对较晚近的历史的态度,他们还赞颂西方典范。改良主义者一直关注的是较近期的历史,他们一方面谴责过分的贞节崇拜,同时也颂扬明清两代的贤妇和才女。古典现代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认为近期历史不重要,也看不起明清的才女,觉得她们是中国文化退化的标志。虽然这种策略和以前的儒家改革者类似,都是利用“古代”的权威来谴责近期的历史继承,古典现代主义者和他们的先驱还是有所不同,他们不只是追溯古代中国的辉煌,也将弥补历史不足的希望诉诸西方的成就。^③

① Pierre Bourdieu(*Masculine*, 82-88)认为性别区隔是永恒化努力的产物,他谈到了性别区隔的结构和相应的原则。

② 我很感谢 William Sewell, Jr. 建议我用“改良主义”(meliorism)这个词来说明这股潮流。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改良主义”调和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断定如果人们努力的方向正确,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

③ 参见 Ryckmans, 第8—9页。今文经大家康有为(1858—1927)也同样宣称孔子是改制者。参见 Gray, 第189、198—203页。

因此,在他们重建的妇女传记知识库里,古典现代主义者就将那些不够称职的晚期帝国妇女留下的空白用大致同一时期的西方女英雄填满了。古典现代这个词汇代表的就是这种空间—时间方式:“古典”指的是继续认可中国古代典范,“现代”指的是同时和近代历史决裂并拥抱全球化的模式。^①

最后一种是“当下主义”(presentist)的信奉者,就像古典现代派一样,他们贬抑新东西,蔑视晚近的历史,同时也诉诸中国和西方的典范。但和古典现代派不同的是,他们按照自己关注的重点,以激进的笔触重写妇女的生活史(life narrative),并在其中灌注了极多的“现在时间”。^②他们力求推动一种新的、英雄的国家精神和新的“女英雄”的可能性。为了实现这个主旨,他们广泛采纳了各位英雄模范的生平故事,不论是中国的女勇士还是西方的女革命家或无政府主义者。在重新采纳中国的传记故事时,他们明显地倾向于勇武而非规范,挑战了中国向来只在一种情况下包括女人的长期做法——即使是女勇士——在历史记录里也只是因为她们突出的美德才得以被颂扬。他们将历史上的中国女英雄从妇德制度的循环女性时间中解放出来,鼓励女同胞们向西方女性一样遵从线性的、国家的和男性化的时间。^③

① Walter Benjamin(*Paris*[《巴黎:19世纪的首都》],第148页)描述了一个“古典现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的历史被当作不切实际的迂腐幻想,或是一些“被新的现实激活回到原初历史”的想象而受到排斥。于是来自过去的元素就“与新的混合起来,产生了(某个版本的)乌托邦”。Benjamin在*The Arcades Project*里发展了这个观点,他写道,“随着新事物一起出现的乌托邦的想象回到了原初的历史(ur-past)”;转引自Buck-Moss,第116页。Jacques Rancière(24—40)在讨论Benjamin的历史学思想时也曾用过“archeomodern”(写作archaeomodern)一词。

② Walter Benjamin讨论过历史如何不由带着时间顺序的、历史学家的同质时间来获得意义,而是由其信仰的当下(*Jetztzeit*)获得意义。Benjamin, *On the Concept*,第395页。

③ 循环的时间和线性的时间经常被当作自然的时间和文明的时间并置在一起。例如, Henry Lefebvre(231—232)曾写道,我们“知道(循环的时间刻度)在自然界有自己的起源或基础:它们与深刻宏大的生命节奏相关联。(线性的时间刻度)则与知识、理性、科技相关联;它与生命节奏和过程无关,而与经济、科技成长的过程有关”。Julia Kristeva(*Women's*)用性别的语言解释了这种并列,她比较了男性的、线性的历史时间和循环的、纪念碑式的女性时间性。

这四种时间类型都是根据它们在相互关联的妇女问题和国家问题上所处的位置来定义的。对于永恒主义者来说,因为需要加强国家的力量,女德的礼教原则一定要坚持下去。古典现代主义者和当下主义者都以新价值观来抨击强调女德的老朽观念。古典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才而不是德,以求推进爱国主义的女性教育,并以此打下实用的国家知识的根基。当下主义者蔑视他们所谓的过去跛脚的德行,试图以一种女英雄主义的新模式取而代之,以释放中国潜在的政治力量。简言之,永恒主义者的首要关注点是礼法的纯粹,改良主义者最关心的是有分寸的仪式主义,古典现代派关注的是心怀国家的才女,而当下主义者的眼光则聚焦于激进的英雄主义。

这些时间类型是理论建构,而不是 20 世纪初期社会现实的实际元素。历史的个体、文本和事件可能代表的是古典现代主义或改良主义的某些方面,但是它们从未被这些主义完全地涵括。^① 我没有忽视这个问题,而是在每一章的小结部分都包含了一个对照(counterpoint)来对此加以强调。这些在各章结尾部分介绍进来的历史人物或文本让我的叙述失去平衡,提醒读者我精心描绘出的标题不但不能包含这个丰富多彩的时期的全貌,也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妇女类型。这本书里讲到的人物不但经常公然反抗那个时代强加给他们的各种教条,他们也继续反抗着我们简洁的理论化过程。^②

尽管如此,这些时间类型还是很有启发意义。通过有意识的陌生化,这些类型突出了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承认的晚清政治地图中历史和性别的重要性。这些类型和人们更为熟悉的保守派、改良派和革命派等说法有着模糊的类比关系,但它们代表了文化和政治的倾向,这些倾向并未准确地对应于我们现在所认可的明确的政治派系——尽管这些派

^① David Schaberg(18)也曾写道,个人和事件“即使不曾被完全涵括”,仍可以代表普遍性。

^② 这个对照物突出了 Dipesh Chakrabarty(36—37)所谓的“断裂的历史”:把证据归入我们的分类框架并不容易,由此可知我们解释复杂历史的方法是有局限的。

系在 20 世纪初显然并没那么明确。

最重要的是,这些术语将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和历史趋向从一种隐含的由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进步主义连续谱里解放了出来。在中国现代性的复杂交织之中,这四种方式经常出人意料地联系在一起。改良主义者和当下主义者对女性主体性表达了最多的关切,而永恒主义者和古典现代主义者分别将女性物化为父权的工具和新的民族主义父权的工具。改良主义者和古典现代主义者都拥护女性作为母亲间接扮演政治角色,但改良主义者引发了更加充满赋权意味的母亲形象想象,她们是给长大成人的儿子提供忠告的先知,而古典现代主义者开启了给幼子道德指导的先声。古典现代主义者拥护新的世界性的典范人物,她们不为永恒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关注,但经常被用来确认中国的礼教原则而非推广新的价值观。只有改良主义者对晚期帝国贞节崇拜提出了反思和批评,古典现代主义者和当下主义者虽然也蔑视贞节的观念,但是未能对这种崇拜顽固的力量免疫。当时某杂志上刊出杜撰的李闰烈士故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一杂志是古典现代主义的一个代表。

把这四种时间化的模式并置在一起也凸显出了它们各自的拥护者试图驱逐和压制的内容。古典现代主义者和当下主义者写下了对晚期帝国才女的恶毒谴责,同时拒绝参与到晚期帝国的忠实奴仆所提出的复杂议题之中去。永恒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只是蜻蜓点水地提到了西方的挑战,尽管如此,这可是他们诉诸礼的纯洁性的潜在原因。和在妇女问题上公开宣称的东西一样,这些省略和排斥也揭示出了 20 世纪初的文化领域的丰富内容。

资料来源

在对 20 世纪初的文本做过相当广泛的阅读检视之后,这些沉默的

声音才变得渐渐清晰，将问题展现出来。有些文学类型说明了其他类型所忽视的妇女问题的某些侧面；某套材料中的省略可能是其他材料中突出的主题。所以说这个时期没有哪种材料可以充当权威指南。^①我并非只重视那些被当时和后世的学者标记为“新”的或“旧”的材料，而是尽量大范围地搜检一个 20 世纪初的读者可获得的各种综合材料。在各种观念迥异的文本中，我集中关注的是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即女性传记的变迁。这些文本的目标都是要推进女子教化，它包括了政府文件、教学材料、新式教科书、论辩文章、妇女刊物，及各种各样的中国或西方妇女的传记。

一般来说，这些不同的文本类型都对应着不同的时间类型。虽然有的文本包含了代表好些不同时间类型的材料，有的文本也跨越了不同的时间类型和文本类型，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给这些文献分类，而那些例外则常常可以说明这些分类标准。在这里我把这种分类法和各种不同文献来源的结构大致做个介绍，后文将会对这些文献作出详细的分析。

永恒主义者的材料强调了儒家礼教原则的重要性，谴责舶来的新的价值观。这些材料包括学部在女子教育方面的文件，比如 1907 年对女子小学和师范学校的规定。这个规定解释说，政府只有在被授权的机构清楚无疑地证明了新式教育不与古典原则相冲突才愿意批准执行新的教育政策。^②这个文件还进一步指出，新学校只有在不挑战为淑女们所尊奉的礼教规定的前提下才能传授新知识（“懿嫩之礼教”）。^③同更早期的妇女教育上疏一样，这些文件都推荐新学校使用两千年来所使用的儒家女教书做教科书，包括刘向的《列女传》和班昭（约

① Felski(26,209)建议采用一种多类型的方法，因为对于同一时期的同一文化，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讲述。

②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章程折》，第 666 页。

③ 《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第 658 页。

48—120)的《女诫》。^①

1908年,当时有一部名为《女小学》的教科书满足学部的要求。^②作者戴礼(活跃于1905年)是一位浙江玉环的贵族妇女,她将自己的文本放置在女教和礼教经典的谱系之中。她称自己的方法和中国最古老也最有影响的女教经典《女诫》的作者班昭类似,但具有更大的野心。班昭阐释了《礼记》和《周礼》与女子有关的段落的意义和重要性,戴礼则是收集各种早期文献,包括经书、传记和历史材料。^③

改良主义者们也给女性写教科书,但在礼教原则上不是那么教条,对西方的知识也不是那么反对。一位名为曾懿(1857—1917)的四川省华阳县贵族妇女1907年出版了《女学篇》。^④作为一位知名的诗人、受人尊敬的中医理论家和大夫,曾懿在《女学篇》里采用了一种自觉的温和的立场。她在自序结尾处指出,那些顽固的保守派会厌恶她的论述,改革派会嘲笑它,还有一些人会瞧不起它中庸的立场。她说,最后这种指责

① 一份1904年的文件呼吁开始编纂官方的教材,以便从以前的女教书中选择部分篇章,主要是《女诫》,还有蔡邕(伯喈,133—182)的《女训》,以及清代陈宏谋(1697—1771)收集编纂的早期女教书《教女遗传规》。这些教材还包括仍在继续使用的男童启蒙教材,比如《孝经》和《四书》。荣庆、张百熙、张之洞,第395—396页。教育部1907年系列章程的起草者建议还可以从更早期的女教书里寻找材料,除了《女诫》、《列女传》、《女训》和《教女遗规》之外,他们还列出了司马光(1019—1086)的《家范》以及明代编纂的《女四书》中的两种:《女孝经》、《内训》。他们还提到了陈宏谋在《教女遗规》里收录的两个文本(《内训》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不包括在内):吕坤(1536—1618)的《闺范》(1590)以及《温氏母训》。最后,这些章程还列出了三篇清代的文章:任启运(1670—1744)的《女教经传通纂》、蓝鼎元(1680—1733)的《女学》,以及章学诚(1738—1801)的《妇学》。《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第669页。

② 《女小学》被认定为女子师范学校普通德育课的教材,由学部的图书局售书处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据张静庐(《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236页)的记载,许多女子师范学校都采用了戴礼的教材。

③ 戴礼,《自序》,1a。戴礼也把她的《女小学》排在宋朝大儒朱熹(1130—1200)的《小学》和蓝鼎元的《女学》后面。戴礼写道,蓝鼎元的《女学》也模仿朱熹的《小学》,这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④ 曾懿出身于一个学者家庭,后来嫁给了她的表兄,江苏常州人袁幼安。袁幼安曾任湖南提法使。曾懿著有三卷《古欢室诗词集》(长沙,1907)以及《曾女士医学全书》6种。有关曾懿的生平和著作,参见胡文楷,第484页;Clara Wing-chung Ho,编,第288—289页。

会让她特别愉快。^①

但最有特点的改良主义的文献还是对刘向《列女传》的增补。^② 这些增补的故事既包括了大量的来自原来的《列女传》的传记,还有很多从较晚期的地方邸报、正史史书和文学作品等材料里撷取出来的传记故事。这些文本在已有两千年历史的典范人物长廊里添加了新的女性,在已有的经典知识库中添加新的评论,反映出改良主义者在历史的连续性中求变革的思想。

上述《列女传》的增广版如今传世的为数甚少,其中一种便是《绣像古今贤女传》。^③ 这部书由魏息园(名程博,字莲裳,活跃于1908年)编纂,这是一位诗人,也是跟清廷有着明显关联的变法者,这本书的九个章节包含了清代以前及清代的106个条目,按时间顺序排列。^④ 如同其他此类增广版《列女传》一样,每个章节都以刘向《列女传》中的一个或几个传记开篇,再以后世或当代的历史故事接续其后。这些传记包含了标准的类传记因素:每个传记都以评论结尾,还特别附有一幅这位著名女性的插图。尽管在增广传记这种体裁里的插图一般会采用动态的表现风格,魏息园还是选择以静态的美(美人或者百美)的模式来表现他的传

① 曾懿,《自序》,5b。

② Katherine Carlitz(*The Social*, 第126页)创造了“列女传增广”(Lienü zhuan expansion)这个词来称呼这种类型的作品。中文名称包括“续列女传”、“列女传增广”和“广列女传”等等。最初的增广文本之一是解晋(1369—1415)的《古今列女传》,而翻刻版本最多的是吕坤的《闺范》和王庚(活跃于1600年)的《绘图列女传》。《绘图列女传》初次刊刻于1600年代早期,1779年重新刊印。有关《闺范》的内容,参见 Handlin, 第13—38页。有关《绘图列女传》的内容,参见 Raphals, *Sharing*, 第116页; Carlitz, *The Social*。可能最后的增广文本是20世纪初刘开(1781—1821)的《广列女传》。

③ 由晚清女性编纂的增广版本大部分已失传,包括戴礼的老师萧道管(卒于1907年)编写的《列女传集注》(无出版者,[1892]1907年后),参见胡文楷,第594页;本书导言中提到的李闰也曾编写过一个列女传增广版,但也已失传。

④ 我们对魏息园了解有限,只知道他来自湖南的湘乡,曾在江苏省北部的宿迁担任收税的官员。汪振迭,第1页。在吴士鑑编辑的《清官词》中还曾收录了他的101首宫词(第22—41页)。他也积极支持1901年新政,尤其是法制改革。参见魏息园。我十分感谢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 Martin Heijdra,他搜寻到很多有关魏息园的珍贵文献,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有关于魏息园的更多内容,请参见 Judge(季家珍), *Exemplary*。

主。这种风格聚焦于女性的装扮和姿态,逐渐和帝国晚期的百美集相融合,而魏息园也从百美集中直接选取了他的插图(图5、图6)。^①



图5 《百美新咏图传》中的花木兰

资料来源:颜希源,第66页



图6 《绣像古今贤女传》中的花木兰

资料来源:魏息园,1.3

虽然《绣像古今贤女传》里独有的这种风格的插图和其他的美学因素使这本选集看起来只像是一本用于女性鉴赏的作品,但这种印象却也因其深远的道德意味给文本带来的生命力而大受挑战。^② 选集中最长的

① 魏息园参考了颜希源的《百美新咏图传》,这本盛清时期编成的集子刻画了各种优雅环境中的美人,包括女皇、宫女、文学才女和音乐才女、女神和神仙。从魏息园的号“息园”与“希源”发音和声调都相同就可以看出魏息园受惠于《百美新咏图传》。而且两本书明显有很多传记故事都是类似的。魏息园引自颜希源书中的木兰图原本收录于金古良的《无双谱》,这本清朝初年(1690年)作品收集的是表现中国历史人物的木刻版画。

② Carlitz(*The Social*, 第139—141页)称这些增广作品都是一种炫耀性消费的东西,或者是用于鉴赏女性的艺术作品。魏息园在选集中的每一个条目里都添加了新的类传记文本的元素:一首用以称赞这位著名人物的绝句,以及一幅貌似水墨画的插图(很有可能是石版画)。画中一般表现的是花草,魏息园自己给配上了诗。魏息园的书里文以载道的感觉也很明显。

一章是“贞节”(含 25 则传记),表现了对女性的道义和过分的贞节崇拜的沉重反思。在这个部分之前是“教子”、“事舅姑”等同样具有伦理重要性的章节。^①在这九章各自的序言、总序以及他给每则传记所做的评点中,魏息园表达了他的观点:在统合的道德宇宙中,女性扮演着重要、积极的角色。她们的仁慈是生命之源,她们的美德是天地之义的表现,她们贤明的教诲是政治秩序得以稳固的基础。^②

因为坚信女性之于社会和宇宙的重要性,魏息园在推动女性教育上十分积极。大概他编辑《绣像古今贤女传》也是为了给新学堂做教材使用:这本书在政府颁布有关女子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规定之后一年刊行,且由一家专出教材的出版商出版。^③在这部书中,魏息园多次赞美女子学校的价值,颂扬那些建立学堂的女性,强调必须要教育母亲,以便教育子女成才。^④1910年上海的一家名为《时报》的日报曾经给魏息园这本即将面世的书做过一则广告,称它是“无与伦比的女子学校教科书”,而《时报》当时是推广新式教科书的主要阵地之一。不过,这则广告后来还显示出,《列女传》的增广版在新式印刷的世界中已经逐渐衰落了。这则广告声称这部书最大的用途是可以作为课堂上的书法或者画画的描红本,而且现在正以半价销售。^⑤

尽管如此,《列女传》这一类型的文本还是见诸晚清发行的新式杂志。1909年在颇受欢迎的《图画日报》上名为《中外新列女传》的专栏就

① 按书中各部分所含的传记数量排序(从多到少),各部分名称分别是:教子(19则)、慈惠(14则)、孝父母(11则)、勤俭(11则)、相夫(10则)、事舅姑(8则)、友爱(8则)、和娣姒(4则)。

② 钱南秀协助我确认了这些序言和导言的文字,在此表示感谢。

③ 有关出版《绣像古今贤女传》的集成图书公司,请参见陆费伯鸿,第213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67页;张静庐,《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236页。

④ 魏息园,VI;VI:18;VI:16。

⑤ 《时报》(1910年10月1日)。广告里的书名为《绘图大版古今贤女传》,与魏息园的文本略有不同,但是“绘图大版”可能只是在形容,其他的描述都和魏息园的书名相符。但是根据这则广告记载,这本书是由文通书局刊刻的;有可能当时刊行这本书的书局不止一家。这则广告还列出了这一套八本每本的价格,但集成图书公司的版本则是九卷四本。

是一个突出的例子。^①大名鼎鼎的上海历史学家熊月之曾经论证了这种期刊的重要性,它提供了从建筑式样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细节等等确凿的材料,供我们触摸那个在历史档案中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②同样地,《中外新列女传》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丝性别意识的遗迹,而当时其他资料对此都保持沉默。虽然《图画日报》的编辑和当时其他的期刊出版者一样充满救国热忱和对“新”事物的迷恋,但还是选择表达他们改良主义者的坚定主张:近代历史也是可以挽救的,它可以作为中国妇女通向新时代的桥梁。^③

专栏标题中提到中外妇女可能反映出编者最初的企图,但实际上最终也没有为外国女性特别撰写文章。^④实际上,专栏颂扬的全部是晚明到清代的中國女性,包括著名学者和官员的夫人、母亲、女儿,也包括了那些在诸如明朝覆灭或太平天国运动等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中直接或(更多情况下)间接出场的女性行动者(见图7)。《图画日报》的记者也循刘向不新写只重编传记之旧例,自己并没有撰写晚期帝国生活时代的传记。^⑤很多文章都可以追溯到一个稍早的文本,一位19世纪晚期的官员、学者和历史掌故专家陈康祺(1840—1890)撰写的随笔。^⑥

在专栏标题中援引“列传”二字,以及编者在大量传记中所采用的原则都将这个系列置于刘向原来的《列女传》传统之中。但与此同时,《中外新列女传》也标志着对此传统语义和形式上的偏离。编者赋予了这些

① 《图画日报》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每天出版的日报,1909年8月开始发行,直到1910年8月,共404期。有关《图画日报》的内容,参见刘华庭;史和、姚福申和叶翠娣。

② 熊月之,《大众文化云蒸霞蔚》,第489、493页。

③ 关于《图画日报》对国民改造的评论,同上书,第490页。

④ 但《图画日报》并不反对介绍和宣传西方思想、产品和人物,也包括西方女性。比如,报纸的《世界名人历史图》这一专栏就曾经在113期到137期(1909年12月)上分23部分连载了罗兰夫人的传记。

⑤ 关于刘向引用《左传》、《国语》的人物传记的内容,请参见Zhou Yiqun,第39—42页。

⑥ 陈康祺,浙江省鄞县人,1871年中进士。他累官至刑部员外郎,任职十年之后因没有得到擢升(因此他的书名叫做《郎潜纪闻》)而辞官,要求被派往地方任职。参见晋石,第1页。如同晚清许多文人的随笔和文集一样,陈康祺的笔记记录了名人掌故、知己和家人的小故事。冯尔康,第397页。《图画日报》的记者采用的陈康祺《纪闻》很有可能是宣统(1908—1911)时期的版本,这个版本首次刊刻于1880年,清末民初时期广为流传。晋石,第3页。

著名女性一些个人自主性和主体性,并谴责坚持为贞节自我牺牲的“野蛮”原则。虽然这个系列形式上具有叙述的整体性,但是在这部生动活泼而并非完全和谐的图集里,每个连续的条目都是在独立的主题下出现的。这一页上是端庄的“新中国人”典范,下一页上就是标志着新文化的妇女(往往是高级妓女)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驰,在公共场合吸烟,戴着夸张的眼镜(参见图8)。



图7 李太夫人,《图画日报》的《中外新列女传》所刻画的典范人物,她以良好的胎教著称
资料来源:《李太夫人之胎教》



图8 《图画日报》中骑着脚踏车的妇女
资料来源:《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

文化节奏加速是古典现代派材料的标志性特征,其中包括了新式的女子教科书、各种各样的期刊出版物,以及西方女子的传记。这些材料定义了新式女子教育的文化领域,而这一领域远远超出了具体的教室和严格的教科书之限。这些材料的作者热情地拥抱西方思想,严厉地批评近代历史,经常把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女性楷模并列在一起大加褒扬。

给女童和妇女写的新式教科书是典型的古典现代类型的材料。这些材料出版于1904年,在印刷、发行、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于以前的妇女教科书。早一些的课本一般都是由私人书商刊印并只在地方发行,而这些20世纪初的教材是由新近建立起来的商业出版社印制,例如商务印书馆和文

明书局,且在全国各地由多家代理发行。^① 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非常清楚这种类型是新颖的,这些书籍的标题通常包含了“新”、“最新”等字眼以及 20 世纪初从日本传进中国的新语汇——“教科书”。^②

进阶式的结构是这些新式教科书与早期的道德说教教材最显而易见的区别。从班昭的《女诫》到戴礼的《女小学》,早期的道德说教教材都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去展现材料、展开训诫,而新式教科书各自针对不同的教育层级,一般来说是初小或高小。在这些分级教材里,词汇随着课文变难而逐渐积累增多。^③

这些教科书的另一特点,包括其中的内容和插图,都是创新性和延续性的结合,这说明即使是自觉的现代类型也是通过创造性地吸收利用历史知识来创造新内容。尽管教科书运用和宣传的是新的国家主义和性别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批带有意识形态的教材。正如旧式的启蒙读物《三字经》在灌输基本文字能力的同时也再生产了儒家的正统思想,新式的教科书也在教给学生基本读写技能的同时引介新的世界观。^④ 新式教科书也不是只传播新思想。一般来说,课文编写都是将民权、迷信、婚姻自由等主题和诸如事舅姑、顺从以及历史英雄人物结合在

① 谢允燮的《初等小学女子修身教科书》由上海的中国教育改良会出版,由文明书局、开明书局、新学书社、时钟书局、科学会社和官书局发行到全国各省。

② 《汉语大词典》没有指出“教科书”一词的词源(只给出了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的一个例子),这个词在 Federico Masini 和 Lydia Liu 的作品里也都没有分析。这个合成词很有可能是从日本输入中国的,日文的 Kyōkasho 一词自 1870 年初期开始流行,1890 年代广泛使用。最初它出现在 1872 年的明治教育改革法令《学制》(Gakusei)中(山住正己,第 781 页),在日英字典里首次出现是 1888 年(惣郷正明,第 109 页)。尽管“教科书”一词早在 1873 年就在中文报纸《申报》里出现了,但 1890 年代末中国出版的教科书都没有采用这个词,一般来说当时的教科书都叫做“课本”或“读本”。但随着 20 世纪初对教育改革的大力介绍和大量翻译的日本教科书进入中国,“教科书”就成了中国出的教学用书的通称。“教科书”这个标签一直适用于初等教育用书,而适用于高等学生的教材则保留了“读本”这个名称。根据张静庐在《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 227 页)中的记载,第一本在题名中包括“教科书”字样的书出版于 1902 年。有关翻译日本教科书的内容参见实藤专秀、谭汝谦和小川博;Abe,《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Reynolds,第 117—121 页。

③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667 页)讨论了分级如何成了所有新式教材的一个标志。

④ 成于宋代的《三字经》开篇就是充满了道德教育意义的孟母故事。参见王应麟,第 13 页。

一起的。新内容和传统内容的比例各种教科书不同,但总的来说价值观都是在混合中更偏于新式。一部名为《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的混合式教科书作者声称,他的课文选自两本古代的妇女教材:班昭的《女诫》和蔡邕(133—182)的《女训》,同时选入的还有“东西方各国妇女道德书”的摘录。^① 尽管全书中关于节操的章节比其他任何主题都更多(总共 10 章),这本书还包括了反映“爱国”、“尚武”和“体育”等主题的课文。^②

教科书中的插图也是类似的融合的产物。新式教科书的插图一般都是针对某一课而作的,这与班昭的《女诫》不同,倒有点类似于刘向《列女传》的增广版。受托为新式教科书或是画刊配插图的画家采用了较新的平版印刷来表现当时令人惊奇的新内容,如上图中骑脚踏车的妇女。^③ 而同时这些画家也继续用传统的木刻技法来插画,用以前常见的元素来表现熟悉的人物和事件。^④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几乎同一幅图画既被一本德育教材用来表现班昭,也在《中外新列女传》中用来表现清代才女孔璐华(经楼,活跃于 1800 年)。这些插图直接共享的一个来源就是吴友如的《古今百美图》里的班昭画像。^⑤ 虽然在教科书中的细节和图画都比吴友如原书要粗糙,但图画的版面设计、主要的道具以及女子书房中那种幽暗的光线都几乎一模一样(参见图 9、图 10、图 11)。

在绘图本混合教科书之外,古典现代派的材料还包括各种期刊杂志。新式教育和这些新的印刷产品——从维新派的日报到海外学生和妇女的刊物——关系密切,相互支持。

① 许家惺,《例言》,1a。

② 许家惺。

③ 我们的晚清印刷文化知识存在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我们不知道为教科书配图的作者是谁。教科书的序言一般都不提及这些插图作者,而现今的研究者也没有去关注这个问题。例如,王建军对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交代,但没有提到这些插图。

④ Carlitz(*The Social*, 第 120、127 页)探讨了对明代木刻版画既有元素的使用。

⑤ 参见吴友如。吴友如是中国第一本画刊、创刊于 1884 年的《点石斋画报》的主绘。他的《古今百美图》首先登载于自己创办的画刊《飞影阁画报》(1890—1893),并于 1908 年在其过世后以《吴友如画报》为题结集出版。



图9 曹大家(班昭)

资料来源:谢允燮,46a



图10 孔璐华

资料来源:《阮夫人湛深经史》



图11 曹大家

资料来源:吴友如,2:1,18

妇女问题和女子教育问题在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刊物中首先被理论化。这个主题上奠基性的作品是梁启超(1873—1929)的《论女学》,这是他影响深远的《变法通议》(1896—1897)中之一部。在这篇专题论文中,梁启超提出了四大理由来论证妇女教育是强国的关键因素。^①

妇女和国家问题之间的这种关联通过直接受梁启超论文启发的新式教科书和杂志之间的象征性联系继续下来。商务出版社不止刊印当时最有影响的教科书,也刊行包括《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详尽介绍和推广这些教科书的杂志。商务出版社还跟上海一家读者众多的《东方日报》有个合约——在其第一页上为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做广告。^②《东方日报》的副刊《妇女时报》则专为女子教科书做广告。

一方面杂志在推销教科书,教科书也鼓励年轻妇女通过读报来学习“阅世”。^③一本初等小学修身教材勉励年轻学生阅读报章,以免与世隔

① 梁启超,《论女学》,第869—870页。从1896年到1897年,《变法通议》分期在《时务报》上连载。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还包括学校、科举、社会研究、教师培训、幼儿园、翻译、满汉关系、银行等等内容。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关于这篇文章在梁启超的作品中的位置,请参见Tang,第3页。

② Judge, *Print*(季家珍,《印刷与政治》),44。

③ 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堂》,第880页)强调了女学生学习“阅世”的重要性。



图 12 《劝读报》

资料来源:谢允燮,43

绝,进而增进对外面的世界的了解(参见图 12)。^① 在一本老年妇女读物中有题为《论阅报之益》的一章,重申了梁启超的著名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的观点并对其做了详细的阐发。^②

若谈到女子教育领域中最不可缺少的女子杂志,还是专门的妇女杂志。杂志的编者假定女学生是最为热心的读者,发表文章鼓励中国推行女子教育,报道最新的国际妇女知识的进展,刊登中国、日本有关学校的实用信息(图 3 就选自一本这样的杂志。)有的杂志甚至直接摘录女子教科书的内容。例如《女子世界》就刊登了颇有影响的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的序言,^③同时,妇女刊物的记者、女子教科书的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队伍有着明显的重叠。蒋维乔(1873—1958 年)为《女子世界》写稿,她也执笔写作了商务印书馆最早的女子教科书,并在上海第一批私立女校之一“爱国女学校”任教。^④ 在日本的一位女留学生孙清如(活跃于 1907 年)编写了一本女子师范学校教科书并于 1909 年由学部审查通过,她也为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新女界杂

① 谢允燮,43b。

② 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8:13a—14b;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根据这篇课文,报纸每天的花费很低,但可以让年轻妇女开阔眼界,了解新的理论和国际国内的政治走势。

③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

④ 蒋维乔在 1902 年之前曾经在日本留过学。民国期间他在教育界担任过很多职务。有关他的简介,参见王建军,第 116 页。

志》写稿。^①

虽然很多杂志都是古典现代派表达其女子教育主张的平台,但杂志也不全是古典现代派的。比如《图画日报》就在《近日沪上新闻》旁开设了改良主义者的专栏《中外新列女传》,其他新媒体的内容也很丰富多样。例如《东方时报》、《顺天时报》、《大公报》、《申报》等日报为最新教科书印制广告,也发表妇女问题论战文章,还刊登官方对殉夫的贞节烈女的旌表文章。

妇女杂志中有一小部分属于改良派,包括创刊于1898年的中国人自己最早的妇女杂志《女学报》。该杂志的主编、女诗人和学者薛绍徽(1866—1911)在报上发表文章驳斥古典现代派对传统型才女的批判。^②这些杂志还包括与清廷关系非同一般的北京的妇女杂志《北京女报》,^③其他大力促进妇女教育的杂志更倾向于当下主义而非古典现代主义,其中包括由陈撷芬(1883—1923)主编的《女学报》。1903年陈撷芬和她的父亲,江苏报纸《苏报》主编陈范(1860—1913)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流亡到日本之后,这份杂志变得越来越激进。^④此类杂志还有《女子世界》,专门刊登激进文章和当下主义的妇女英烈传。^⑤

① 孙清如的教科书名为《女子师范讲义》。参见《学部审定孙女士呈书》。这位来自湖南省的孙女士的小传见于她文章前面的序言;参见孙清如。她也为《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撰写了文章。

② 《女学报》自1898年10月创刊起共发行了12期。有关主编薛绍徽反对梁启超批判才女的内容,参见 Nanxiu Qian(钱南秀), *Revitalizing*, 第425—426页。

③ 《北京女报》是日报,创刊于1905年8月20日,至少发行到了1909年1月15日。它的目标读者不只是新式学校的女学生——在北方没有南方那么多——而且还包括家庭主妇、政府官员、商人、学者以及普通老百姓。有关这份报纸最权威的文献见姜纬堂、刘宁元,第35—72页。

④ 《女学报》本来是随《江苏》一起发行的,在“苏报案”发之后,《江苏》被查封停办,陈撷芬和父亲避走日本。匡珊吉;Beahan, 第389—390页。关于陈撷芬的《女学报》和1898年的《女学报》造成的混淆,参见 Nanxiu Qian(钱南秀), *The Mother*。

⑤ 《女子世界》1904年由一位男性——丁初我——在上海创办,但包括秋瑾在内的女性也参与其编辑工作并为它撰稿。桑兵,第264页;徐玉珍;Beahan, 第395—398页。Beahan误以为丁初我是女性。

西方妇女传记集常常是古典主义的,但不限于此。一个改良主义的孤例是1906年出版的《外国列女传》,这本书由薛绍徽和她的丈夫陈寿彭(1857—?)翻译编辑,内容博大精深。但似乎这本书并未成为其他此一时期有关西方妇女的资料源头,甚至没有被引用过。^①

这与影响深远的《世界十二女杰》形成了鲜明对比。像大多此一时期的西方妇女传记一样,《世界十二女杰》这部选集也译自日文版本,梁启超著名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也包括在内。^②《世界十二女杰》所依据的版本是1902年2月东京出版的岩崎徂堂和三上寄风的同名著作,一年后赵必振(活跃于1903年)将它翻译成中文。^③

晚清时期一大批有影响的教材中所呈现的西方妇女都以赵必振的《世界十二女杰》为蓝本,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所收录的10个西方女杰传记中有8个传记也来源于此,《女子新读本》初版于1904年夏,到第二年底已经印刷了五次。^④其两卷本中第一本记载了18个中国历史上的典范,而第二本则是《世界十二女杰》的删节版。杨千里的书中收录的传记又为另一部《最新妇女国文读本》中关于西方妇女的五章中的三章提供了原始资料,这一读本于1908年在福州出版。^⑤赵必振的译本还是

① 钱南秀《清季女作家薛绍徽及其〈外国列女传〉》,“Borrowing Foreign Mirrors”专门对薛绍徽此书做了细致精彩的分析。

②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梁启超的文本所依据的日本文献是1893年12月至1894年2月期间连载于《家庭杂志》(*Katei Zasshi*, 1892年9月—1898年8月)上的罗兰夫人传记。参见松尾洋二,第265—278页。尽管很多中文传记所依据的日本传记原文都是在明治时期的刊物上发表的,另有一些传记则发表在整本的传记著作中。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目录列出了229种明治时期有关女性的整本传记著作,其中至少有41种是写西方妇女的;参见国立国会图书馆,1:第83—99页。在这41种里面有不少成了晚清传记的原始文献。

③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 *Sekai*;《世界十二女杰》。赵必振来自湖南武陵,他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树立自己高产翻译家的名声的。他由日语译成中文的作品还包括一些论述社会主义的作品。参见 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第13—14页。

④ 杨千里来自江苏省东南部的震泽(今吴江县)。根据张静庐的记载(《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228页),尽管最后印在《女子新读本》上的初版日期是1904年,但该书实际上出版于1902年。

⑤ 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第7、9、10卷。

一首同名的歌曲《世界十二女杰》的源头，此歌曲收录在商务印书馆 1907 年出版的一本流行歌谱中。^① 这样，一本日本文集就成了中国晚清时期广泛流行的外国女杰故事的起点，并为古典现代主义质疑中国妇女传统角色提供了关键的动力。

当下主义者对规范性的女性角色提出了更为彻底的质疑。他们将女德斥为国家的残障，鼓励激进的甚至是暴力的女子英雄主义。他们在前面提到的《女学报》、《女子世界》以及《中国新女界杂志》等妇女杂志上发表当下主义观点的文章，确立自己的立场。《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 年每月都在东京出版，几乎全是由一个早稻田大学医学系的女生燕斌（生于 1870 年）单枪匹马地运作着。该杂志推崇激进的政治见解并提出了原始女权主义(proto-feminist)的议题，由于它鼓励妇女搞暗杀，后来被迫关闭。^② 一个作者自称是传奇女勇士花木兰（约公元 500 年）的女同乡，她警告读者，不能让对政治的关注掩盖“重大的女子问题”——这差不多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这个说法。^③

所有的当下主义的妇女杂志都包含了中国妇女的历史传记——一般来说是像花木兰一样的女勇士——也包括一般由日文翻译过来的近代西方妇女故事。《中国新女界杂志》上刊登的七个欧美妇女传记都是直接译自日本人根本正的《欧米女子立身传》，常常附有解释性的中文注解。

当下主义者还编纂中国和西方女英雄的长篇故事集。许定一（约 1888—1909）是留日学生，在其所作的《祖国女界伟人传》中将 39 位以学识、武功和爱国主义著称的中国历史妇女再度激进地符号化。^④ 西方妇女传记的编者也强调了同样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十女杰》，不

① 叶中冷，第 52—58 页。

② Liu Mei Ching，第 299 页。

③ 木兰同乡，第 30 页。

④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许定一来自湖南善化，自号咀雪庐主人、咀雪子。在东京期间他曾在清华（补习）学校学习。房兆楹，第 35 页。

具名的作者声称他直接受到了赵必振《世界十二女杰》的启发。^①但《十杰》基调和内容明显地偏离了《十二杰》，显示出当下主义者和古典现代派之间的立场差异。《十二杰》颂扬由家庭角色延伸而来的自决意识和国家责任，而《十杰》则赞颂对自由的热爱，鼓励积极投身无法以亲情调和的血腥的政治斗争。

全书结构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反映了四种时间类型的拥护者各自的核心主题：永恒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注重美德，古典现代者关注才能，而当下主义者看重英雄主义。每个部分都涵盖了四种时间类型对某一核心问题的关注，无论这一核心问题是贞节、母性气质还是政治暴力。但是，由于每种时间类型往往是在与另一类型进行充满张力的对比时其特点才最鲜明，一般来说各个部分和章节突出的是两种历史方法之间的矛盾，这最能说明问题。第一部分强调了永恒主义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紧张，以及两个派别对待历史的不同方法，第二部分突出古典现代派和改良派路径的差异；第三部分比较的是当下主义者与古典现代派。第一部分主要关注的是女性的美德，第二部分关注女性才能，第三部分讨论英雄主义。

但是这些界限分明的区分主要是为了阐释方便而已。这三个部分是相互紧密交织的。女德制度是每部分都不可缺少的。第一部分要在这个制度下考察在私领域中的女德和新的女性公共角色之间的张力。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探究这个制度和才女、女英雄主义的概念之间的矛盾关系。女子的才能是所有三个部分共有的话题，在新式女性教育中得到各种关注。女英雄主义的观念——从贞节到国家，到为革命牺牲——整本书中都在引用。这些主题的重叠提醒我们，在不同部分中所讨论的

^①《世界十女杰》，《序》，第1页。

事件、个人和世俗的观念都在同一历史时刻并存，这一时期的文化生产力和它在政治和思想观念上的不稳定同样引人注目。

以下各个章节将从这个复杂历史时刻中找出一些模式，为读者提供一艘——如果不是宝贵的——但至少是能用的木筏，助他们渡过 20 世纪之初中国妇女问题的历史蹊径、文化迷宫和复杂的政治漩涡。



第一部分

女德制度

1909年，一位出身良家的已订婚的女学生和闺中好友一起参加了中秋节的节日庆祝活动。按照福建当地的风俗，中秋节这两个节日之夜男男女女可以自由交游，她的行为并无不妥。但是，这位女学生未婚夫的一个朋友在街上看到了她，并给她的未婚夫写信状告她的行为“秽褻”。未婚夫被激怒了，立刻写了一封休书，解除了婚约。当晚，这位被陷害的年轻女子愤愤不平，她写下三首为自己辩护的绝笔诗后便上吊自尽了。

在前两首诗中她写道：

圭章碧玉本无瑕，谁道闺中大节差？
纵有摩肩人栽道，岂无携手女同车？
方夸夫婿通三略，讵料微躯丧一花。
寄与同时诸姊妹，埋头从此掩窗纱！

才度芳春十七余，投缯决绝几踌躇。

母兮圣善空生我，夫也无良忍弃予。
此时捐躯轻似蚁，当年比翼愿同雎。
黄泉惨作无家鬼，断送夫君一纸书。

——《女学生投缳》

这一悲剧揭示了 20 世纪之初“女德制度”的顽固力量：那些混淆了女子举止得体与不当的界限、逾越内外之别的女子，继续因其规制而死。此外，这一事件还凸显出女学生形象作为一种新式的公共的妇女对这种制度构成了威胁。

这位福建女学生涉嫌违背的两种具体女性行为方式给女德制度做出了定义：为夫家效劳，并且衣着、言语和行为举止要低调谦恭。在晚期帝国社会中，如同古代中国性别原则所指出的一样，婚姻构成了女性的人格，女性的自我定义中夫家是惟一合法的活动范围。女性只包含于儒家的五伦之一伦——夫妇之伦中。她们在礼仪活动中的位置是由其婚姻状况决定的，而礼仪活动中妻子的义务最重。^① 献身于婚姻的极端表现就是寡妇或已订婚的年轻女子自杀殉夫，后者是帝国晚期的一个特有现象，从古代直到 16 世纪都并不多见，在 20 世纪初仍然充满争议。而对于女性如何行动得宜则较少争议，这是女德制度的第二个核心原则。无论是作为贞洁的寡妇、恩爱的配偶还是忠实的未婚妻，人们都期望她举止谦逊，行为符合自己的性别身份。这一理想观念的要旨——在闺阁之中的人身隔离——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执行

① 根据《仪礼》的记载，寡妇应为死去的丈夫戴孝三年，而为父亲戴孝只需一年。参见 Chang So-an, *Murder*, 第 10 页。女性在死后由其夫家而非娘家进行祭奠，她的牌位也放在其夫家。参见 Mann, *Precious*, 第 54 页。在女教书中妻子的角色也具有优先性。如同 Sherry Mou (31) 所强调的那样，《列女传》中的 104 个核心传记里只有 1 个刻画了在传记写作之前或写作时仍未出嫁的少女（《列女传》，6:15）。班昭的《女诫》也是以婚姻是所有女性的天命为前提的。

起来都是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它依然是晚清时期强有力的道德准则，福建学生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基于谦逊和忠诚这两大支柱，末代王朝的女德制度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这是正统的女性行为规范的依据。这不是由官方法规来规定的——上吊自杀的女学生并没有因为违犯成文法而获罪——相反，是这些非正规的、由历史和社会所形成的女性行为准则让女学生感到令人绝望的束缚。^①同时，该制度还规定贞节是惟一可接受的女性表现自我的方式：这位年轻女子要救赎自己就只能在语言和身体上捍卫自身的荣誉。这种内在价值观和外在规范的结合使得该制度的力量得以持续下去。

但是，由于礼法的神圣性受到新引进的“进步”价值观的挑战，晚清时期成了该制度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女诗人徐自华(1873—1925)对类似上述福建女学生事件的两名女学生自杀事件表示叹惋，并对在文明进步之时“野蛮的”诽谤竟能迫使青年妇女自杀表示震惊。^②但正是由于这种“文明进步”，“野蛮”的手段被认为越来越有必要。在永恒主义派的女德制度维护者们看来，公共妇女教育是对婚姻的威胁，且有损女性的高雅。将女性永恒的美德和害人的新式妇女教育并置在一起来看，他们认为，福建女学生和徐女士所哀悼的年轻女子就读的新式学校正是道德状况江河日下的主要根源。

女子教育这一新的公共现象和历史悠久的女性贞节行

① 这些规矩相当于 Susan Mann[曼素恩](*Widows*, 第 49 页)所描写的“由关于贞节的精英叙述所形塑的社区闲话”和 Rey Chow 所指的“社会监督系统”。

② 徐自华，第 137—138 页。徐所哀悼的这两位女性是广东省的吴其德和浙江省嘉善的蒋韞华，在遭受诽谤时都在上海上学。吴吞食鸦片自尽，蒋则服毒自杀。十分感谢胡纓提醒我注意这个文献。

为——女德制度的反面与核心——是四种时间类型的拥护者确定其立场的关键问题。永恒主义者痛斥新式教育，坚持严格的性别隔离，认为寡妇守贞是妇女获得公共认同的惟一形式。改良派大力支持该制度的原则，但公开批评寡妇殉夫而死，并尝试接受妇女在教育中的公共角色。古典现代派一般都忽略贞节问题，而是继续坚持这一制度的核心原则——效劳与谦逊，只是转换了问题的落脚点。他们不再将效劳的对象限制在夫家，而是通过夫家与国家联系起来。当下主义者极力排斥这一制度，将守贞看作是古老的愚蠢行为，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女性教育制度来鼓励直接为国家效劳的英雄行动，并不需通过家庭义务来联系和中介，也不必为性别规范所束缚。

第一部分的两章关注的是两种对立而有争议的女性形象：守贞的妇女和公共的妇女，并考证对女德制度的不同解释。第一章探讨了对女性为夫家做牺牲的两种典型行为，即寡妇守贞和未婚守贞的反应。第二章考察的是对公共的妇女的反应，而所谓公共的妇女既包含西方女英雄这一新的文化类别，也包括挑战女德制度的身体和道德界限的中国女学生这一新的社会类别。



第一章 贞女节妇：是神圣可嘉还是误入歧途

“所有的人都好生恶死，为什么当贞女们自残自刎时却引不起任何人的关注呢？所有的人都喜好与人接触而避免孤立，为什么贞女们把自己和社会隔绝起来呢？那些遵循贞操和纯洁戒律的人们，为了崇高的规则，放弃了正确的原则。”

——《守贞说》，1903

正如这段诗文的作者愤怒地指责的那样，女性的贞节是早期中文文献中最受称赞的女性品德之一。必须从一而终的说法最初见于《礼记》，后来在班昭的《女诫》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刘向的《列女传》中，节妇和贞女都受到尊崇。^① 但是，明清之前这个贞节的理想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狂热崇拜的基础。^② 从16世纪起，性的纯洁成为了女德制度的必要条

① 《列女传》里面称颂的贞女包括陶婴——守贞的寡妇（列女传，4：13；张敬，第159—160页）；杞良妻——殉夫的贞妇（列女传，4：8；张敬，第147—148页）；卫宣夫人——忠诚的侍女（列女传，4：3；张敬，第135—136页）。

② “Cult of Chasity”这个术语在中文中没有对应的词，但这一用法来自于民国时期的刘纪华和董家遵等学者，他们强调这些与贞节有关的实践宗教性的一面。后来周婉窈等学者也持此观点。但卢苇著反对这种观点（Weijing Lu, *True, Introduction* [卢苇著，《矢志不渝》，《导言》]），称这损害了女性的主体性。也请参见 Theiss, *Disgraceful*, 第13页。

件,自残成了守贞之志的标志,而自杀则成了反抗个人受辱和文化污染的最后壁垒。

女性在婚内的忠贞在晚期帝国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表现。忠贞的妻子意味着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差异,保持了父系血统的纯洁,维持着家内的秩序。明清两代精密的政府奖励系统极力动员和控制她们戏剧性的克己举动,她们被尊为道德典范和明清价值观的代表。最后,从崇拜一词的潜在意涵来说,保持性纯洁的女子有着一种超自然的类宗教特性。据说她们能祛除或招致自然灾害,在地方乃至帝国的庙宇中都是膜拜的对象。^①

最近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贞节崇拜的认识,特别是 17、18 世纪。^② 但我们对于 19 世纪晚期的贞节的含义了解得还不够。清代学者普遍认为,自 19 世纪中期以后,因为这种贞节崇拜被官僚体制规范化,意识上冲淡了,且日益民主化,贞节就渐渐丧失了活力。但这一看法几乎仅是基于对国家政策的分析以及对贞节崇拜的追溯性评价。^③ 对晚清文献做更仔细的爬梳肯定会带给我们更多关于贞节的丰富知识,它不仅是文化现象,也是社会的价值观。

这些材料说明,女性的性纯洁构成了更为神圣的文化元素,在 20 世纪初新的世界挑战面前必须选择予以接纳、捍卫还是抛弃。^④ 四种时间类型的代表对过去和未来的观点具有竞争性,无论是赞颂贞女还是贬斥贞女,他们都积极地参与了这一形象构建。只有细读各种文献,才能窥见他们观点的全貌。这就需要仔细研究明代以来就主要讨论妇女贞操

① 关于庙宇的讨论可参见 Theiss, *Disgraceful*, 31 - 33。

② Theiss, *Managing*; Theiss, *Disgraceful*; Weijing Lu, *True*; Ropp, Zamperini, and Zurndorfer; Sommer; 张寿安,《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的现代转化》; T'ien Ju-k'ang; Elliott。

③ 例如,Theiss(*Disgraceful*)聚焦于国家政策, Mann(*Widows*, 50 - 51)采用了 1930 年代的文章和方志。

④ 根据罗苏文(第 150 页)的说法,在晚清时期贞节仍是“妇女道德最神圣的基础”。

问题的传记资料，包括近代诸如女子教科书、主流报纸和流行杂志等新式出版物。还需要对比历史和当代的贞节模范，考察过去的典范人物如何被当做现代妇女的模范来学习或者贬损。

永恒主义者认为贞节是一种神圣的价值。他们力图将贞节作为新式妇女教育的基础，以维护贞节的社会意义并减轻公共女子教育带来的威胁。改良主义者也坚持妻子忠贞的神圣性。只有他们从内部的角度评论了贞节崇拜，质疑其更为极端的表现形式在礼法和社会上的合理性，这是300年来的辩论的一种延续。古典现代派要么完全忽视贞节行为，要么略去其复杂性。少数赞美贞节榜样的教科书也收录了西方婚姻自由观内容，并不顾及这种并置所带来的脱节。当下主义者进一步走向了世俗化。他们尖锐地宣称，传记中所有贞节榜样都“毫无价值”，并语带讥讽地指出，烈女们的牺牲是徒劳无益的。

这些观点的多样性确证了一点，晚清时代贞节理想仍有多层的社会意涵。各种文献材料中表现出来的道德逻辑表面上的脱节反映的是内在的所有文化进程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很容易被对某种行为“兴”“衰”的追溯所掩盖。在20世纪初，寡妇守贞既不是全天下都嗤之以鼻的历史遗迹，也不是全民拥护的未来价值。它是当前的一个因素而已。

贞节：女子社会资本的惟一来源

永恒主义者虽认为公共女子教育会破坏社会和道德的稳定，却也无力阻止，但是，他们试图把新式教育与关于女德的宇宙观和女性的守贞行为捆在一起，以支撑女德制度。他们的教科书、教育法规，以及纪念教育女杰的做法都彰显了这一立场。

戴礼的《女小学》节选自礼法经典，强调了永恒主义者的观点：正是

女德确保了天地和谐无碍。在开篇的章节中,戴礼引用了《易经》:“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① 他还引述 18 世纪早期颇有影响的蓝鼎元的《女学》作为自己的范本,主张女德是天下稳定的本源(“天下之正”)。女德是家风良好的基础,而良家是正确的社会风习的基础,正确的社会风习是天下稳定的源泉。^②

永恒主义者把女子的贞节当做充斥于整个宇宙的女德的最高形式和女子社会资本的惟一标准。根据高级官员荣庆(1854—1912)、张百熙(1847—1907)和张之洞(1837—1909)的观点,只有那些能坚持女德制度的根本原则——贞洁和谦逊——的妇女,才能得到公共教育的信赖。1904 年的一份章程大概是清代最早的关于女子学校官方正式文件,其作者张百熙、张之洞和荣庆根据《礼记》的规定,认为女子教育必须归入家庭教育。^③ 按照 1904 年普通教育改革的规定,在家庭以外给任何年轻女子讲课仅限于培训幼儿保姆,因为她们得去指导学龄前幼童。^④ 张百熙、张之洞和荣庆并未提倡建立新的幼儿教师培育机构,而是建议这些师范学校可以移到省、州、县三级原有的社会组织之中。他们特别提倡说,可以把晚期帝国女德制度的重要支柱机构——敬节堂或恤嫠堂作为早期的培训学校的场所。^⑤ 官员们相信,在这些场所,离群索居的节妇们能保持不为他们的教师培训所腐蚀。^⑥

虽然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广泛实施,但在该章程发布前后还是有一些节妇之家成了幼教培训中心。1904 年张之洞自己就在武昌成立了一

① 戴礼,1a。“天”作为“天地”的代称,是最常见的用于指称宇宙的概念。Sivin,5n1。

② 戴礼,1a。

③ 荣庆、张百熙、张之洞。

④ Cong, 第 52 页。

⑤ 守贞节妇之家有包括如恤嫠会、清洁堂、贞洁堂、敬节堂、广仁堂等各种名称,其建立的目的是保护那些仍可婚配生育的节妇不受贪婪的亲属或地方恶霸欺凌。这些机构在 18 世纪末已经存在,但其数量在清朝末年却一度激增。参见 Leung。1904 年的《纪要》也建议将抚育孤儿的育婴堂用作同样的目的。

⑥ 荣庆、张百熙、张之洞,第 394 页。

个敬节学堂，招收了大约 100 名守贞寡妇入学。^①

永恒主义者进而坚持认为，那些为女子教育作出了卓越奉献的女子也只能表彰她们贞洁的品格，而非教育上的贡献。从惠兴这个著名案例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惠兴是满洲的旗人，终生都献给了女子教育，但政府只认可她守贞寡妇的身份。^②

1904 年 10 月惠兴在杭州设立了贞文女学校。她的解释是，作为学校的名字，“贞”表示贞节和纯洁，“文”标志开明进步之希望。学校开学那天她在讲台上发表演说，宣称教育的发展是中国国家强盛之关键。然后她用一把刀切下了上臂一块肉。伤口大量出血，台下观众都惊呆了，但惠兴冷静地说：“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从此日推日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若这女学，半途停废，我必定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一年后学校失去财政支持，惠兴于 1905 年 12 月服毒自杀，时年 36 岁。^③

当地官员立即想到要纪念惠兴。杭州驻防将军瑞兴深受感动，他认为惠兴“为满汉巾幗中所仅见”。惠兴去世之后第九天，他向礼部上书，为惠兴请了一个四字牌匾：“义烈可风”。^④几个月后，1906 年 4 月，瑞兴和浙江省巡抚以及杭州校尉将军一起上书，申请朝廷对惠兴予以旌表。^⑤

但这温和的要求依然使永恒主义派的高级官员感到了威胁。当有

① 在这个敬节学堂中日本妇女担任培训老师。参见张之洞。

② 惠兴的传记载于《清史稿》。赵尔巽，46：509，14082。研究妇女史的中国学者也曾分析过她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夏晓虹的《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近来 Rhoads 等美国研究满人的学者也分析过这一故事。

③ 《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

④ 《八旗协领公呈》，转引自夏晓虹的《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第 235 页。

⑤ 这篇悼文在《北京女报》（1906 年 7 月 9 日）的“女界新闻”中重新刊印。对德行予以政府旌表的系统可以追溯到汉朝，在 17 世纪早期以前已常规化，并且其对象日益集中于守贞的妇女。Elvin，第 307—316 页；Weijing Lu, *True*，第 76 页（这一文献在注释中所出现的页码都是原稿中的页码）；赵凤喈，第 118 页；Theiss, *Disgraceful*，第 25 页。清朝所颁的旌表超越了以前所有的朝代，且明显倾向于女性，性别不平衡非常突出。Weijing Lu, *True*，第 79 页。

关瑞兴的上书呈上来的时候,清廷仍然不愿意支持公众女子教育,也不愿意表彰为这一事业牺牲的女子。学部官员回复上书时称,由于贞文女子学校最近要以“惠兴女子学校”的名义重新开办,该机构本身就有纪念其创始人的意义。^①

但有关官员也不愿完全无视瑞兴申请官方旌表的举动所代表的公众同情,他们继续解释道,通过调查,他们发现惠兴的一生不仅具有进步的新观念,而且是贞洁的一生。自从曾任驻军军官的丈夫去世后她就开始守寡,到自杀之前一共守贞 15 年。^② 礼部官员的结论是,惠兴在此基础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皇帝也很快批准对她加以旌表。^③

《清史稿》中惠兴一节的作者循着清廷的意见,突出了她的贞节。书中强调她早年守寡,并赞扬她割股侍奉生病的婆婆。^④ 而这样一位引人注目的献身女子教育的旗人女子,在杭州、上海、北京、天津和东京被称为“中国过去六千年最杰出的女子”,却只能作为一个节妇和尽职的媳妇进入官方正史记载。^⑤

一个内部的批评

20 世纪初,改良主义者关注那些人们长期实践的行为当下命运如何,他们对女子贞节问题的探讨比其他任何派别都深入。永恒主义者视

① 该校建立于 1905 年 12 月,即惠兴去世的当月。回应这一吁请的是学部而不是礼部,在官僚体制中后者正是前者要取代的目标。

② 惠兴的丈夫可能叫做“积善”(音)(包括《清史稿》在内的大多数文献如此记载)或者“吉止”(《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1450),是一名生员。各种文献记载在惠兴究竟几岁开始守寡这一点上也有分歧。根据《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1450)和《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士为女学殉身节略》,她丈夫去世时她 19 岁,但根据教育部官方文件(转引自夏晓虹,《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惠兴时年 20 岁。

③ 《学部礼部》,转引自夏晓虹,《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

④ 赵尔巽,46:509,14082。这一条目中没有继续写到惠兴为学校殉身,而是称她被追颁了“贞心毅力”的称号。

⑤ 引自《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

贞节为无与伦比的美好德行，当下主义者谴责它是一种害人的祸端，古典现代派则忽视其复杂性，而在各种文献中可以看到，改良主义者仔细地处理了这个问题的诸多方面。这些文献材料包括传记集、墓志铭、正史和方志，这些材料照例总是称颂这些贞洁的行为；文献材料还包括新的印刷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流行的画报和妇女杂志。

在这些不同的材料中，改良派发起了一个对贞节崇拜的内部批判。他们研究了守贞行为的历史和当前实践的复杂性，并未在原则上对此断然谴责或表示容忍。他们并没有用单一的时代视角来考察女性殉夫，而是将此一问题和贞节崇拜一起放置在 300 年来的历史辩论之中。

贞节的理想

虽然对过分的贞节崇拜持批判态度，改良派并没有非议贞节本身的价值。魏息园的《绣像古今贤女传》就很明显，在书中讨论的各种主题里，贞节主题得到了持续的关注。魏息园的评论详细阐述了女子贞节的各种丰富的形态和文化价值，他还感叹在这个问题上世风日下。

在“贞节”这一章的序言中，魏息园援引《礼记》，声称贞洁的品德是人类的一种品行，就像“天地严凝之气”，是一种“天地之义气”。^① 魏解释说，在这一章中记载的 25 名妇女的正直美德，延续着人类和宇宙间亘古以来的联系。^②

在这些贞节典范中，有一位齐烈妇，她在未婚夫生病后仍然忠实于他。即使未来的婆婆劝她解除婚约，这位女子仍固守着从一而终的信念。未婚夫去世后，她承担了孝顺媳妇的角色，操持家务奉养公婆。在公婆去世之后，她也自杀身亡。^③

① 这段话摘自《礼记》中的《乡饮酒义》，Legge, *Li Chi*, 2: 第 437 页。

② 魏息园, IX。

③ 同上书, 第 20 页。

传说贞女具有超自然的力量,齐烈妇的牺牲也引发了两个奇迹。^①第一个据说发生在乾隆皇帝(1736年—1796年在位)一次南巡时,看到了她在老家江苏省宝应县的幻影。深为感动的乾隆为她建了祠堂。数百年后,一群无赖之徒在祠堂狎妓狂饮,正在他们寻欢作乐时,一阵狂风袭来杀死了这群无赖:上天会惩罚那些对贞节烈妇不敬的人。^②

魏息园认为,性的纯洁不但使贞女与天地相通,也使人类得以区别于野兽。他称赞陶婴,这位最初载于《列女传》的守贞寡妇在丈夫死后终身不再嫁,认真抚育子女。魏息园说,与“燕雀朝失偶而夕成配”不一样,陶婴是人类崇高道德原则的典范。^③

他书中另一位不凡的女性也取材于《列女传》,这就是范杞梁的妻子。魏息园感叹当代妇女缺乏从前的典范人物那种坚定。^④当范杞梁在战斗中丧生,他的妻子怀着深挚的感情,用隆重的礼仪哀悼他。她拒绝了齐庄公公开哭祭的提议,悲痛地抱着丈夫的尸体深情恸哭,她的眼泪竟冲垮了身后的长城。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和依赖,之后她选择了自杀。^⑤

魏息园在评论中抱怨,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寡妇或守节或死义,但她们所表现的忠贞很大程度上只是例行公事的敷衍,对改进社会没有多大作用。只有像范杞梁的妻子那样表现出真正的忠诚,才有影响社会风尚的力量。魏引用诗人庾开府(即庾信,513—581)的诗强调了这一点。在这首诗中,诗人赞美传说中的舜帝夫人们在舜帝死后投湘江自尽。如同杞梁妻的眼泪哭倒了长城一样,夫人们的眼泪永远留在了湘江

① 关于贞洁的品行所具有的超自然的表现有很多更早的例子。《晋书》中的例子可参见 Mou, 第 102 页;元杂剧《窦娥冤》中的例子可参见 Liu Jung-en。有关贞节和美德所带来超自然力的论述可参见 Weijing Lu, *True*, 109-110。

② 魏息园, IX. 20。魏息园还用了其他几个例子以说明保持性纯洁的女子和宇宙之关联(IV. I; IX. 13)。

③ 同上书, IX. 4。

④ 同上书, I。魏息园在同书中发出了相同的批评, VI. 1。

⑤ 同上书, IX. 1。

边的斑竹上。^①

魏息园不仅为他的同时代人，还给历史人物也根据古代典范树立了高标准。元代李中义的妻子刘夫人在晚期帝国的文献中受到广泛赞扬，在 1353 年大饥荒期间，当饥饿的蒙古士兵要把李中义煮熟吃掉时，她自愿替代丈夫。但是，在魏息园记录的故事版本中，刘夫人在牺牲自己之前提供了家中储存的粮食。魏息园认为这一举动削弱了她牺牲的价值。他坚持认为，忠实的官员、正直的学者或贞洁的妻子之牺牲都不能是妥协的产物。^②

寡妇自杀和自残

尽管魏息园给贞节典范设的标准很高，他和其他改良派人物却拒绝颂扬“殉夫之节妇”。（魏赞美杞梁妻不是因为她的自杀而是因为她悲恸的感情。）他们在称赞妻子忠贞和谴责寡妇自杀之间独辟蹊径，当他们努力建立一个道德上合理并对社会具有建设性的女性贞节观时，这条小径却被满清皇帝一再越过。^③ 改良派常常附和康熙皇帝的上谕，声称那些在丈夫死后自杀的妇女是“轻生”，是逃避守寡生活的困难和责任。^④ 因而魏息园颂扬敢于面对生活难题的陶婴，《北京女报》也对这样做的当代寡妇送上了赞美。^⑤

改良派谴责寡妇殉夫，也指责妇女自残以逃避再婚压力的行为。这种自残行为使妇女失去吸引力并从礼法上说“不完整”，这曾在《列女传》

① 魏息园，这种竹子被人们称作“湘妃竹”。

② 同上书，第 17 页。

③ 尽管清朝早期的统治者延续了明代表彰守贞寡妇的做法，他们却更加不愿意去颂扬殉夫的烈女。1688 年康熙皇帝正式禁止寡妇自杀，雍正则颁布了更多的圣谕来支持这一政策。但这些命令却基本上是无效的。Weijing Lu, True, 第 74 页，第 80 页；Theiss, *Managing*, 第 74 页。清朝皇帝反对寡妇守贞常常是出于种族的考虑而非哲学上的原因。Eliott, 第 42—47 页，第 53 页。

④ 关于康熙 1688 年的圣谕请参看 Elvin, 第 322 页。

⑤ 《论刘阎两节妇》。

中有记载。^①到了明朝这种做法才变得日益普遍,达到了血腥的顶峰。虽然在清代自残的悲剧行为通常被更加普通的自损行为取代,但20世纪初的文本提醒我们,这些事例并没有完全消失。^②

魏息园反对以任何理由毁伤身体,无论是司法刑讯、孝顺的极端表现——割股、剜心或者为贞节而毁容。^③在刘长卿的妻子桓氏和曹文叔妻子夏侯氏这两位汉朝妇女典范的传记中,他谴责了守贞寡妇的自残行为。



图 13 桓氏割耳之前优雅地举刀

资料来源:魏息园,IX. 5

魏息园的书里引用了《后汉书》中桓氏的传记原文,记载了她为了保全贞节割掉耳朵,得到了社会的尊敬的故事。然而魏息园对她的行为加以谴责,他引述了孟子对道德驱使下的过度行为的批评:“有求全之毁”。^④魏息园对自我暴力行为的反感进一步表现在他对插图的选择上。晚明时期的《绘图列女传》插图中桓氏耳朵鲜血如注,一直流淌到桌上,而魏息园选择描画自残行为实施之前桓氏优雅地举起刀子的时刻(参见图13)。^⑤夏侯夫人的丈夫去世后,家人再三催她结婚,她首先割掉了头发,然后是双耳,最后是鼻子。虽然在贞

① 梁寡妇(《列女传》,4:14,张敬,第160—162页)割掉鼻子来抵御再婚的压力。一个身体残损的女人不能带着“不完整”的身体去祭祀祖先。Fong, *Signifying*, 第106页。

② Weijing Lu, *True*, 199—200.

③ 魏息园对于司法刑讯的观点请参看魏息园;对于极端的孝道的表现,参看魏息园,IV. 6。其他的改良主义者也批评了割股的行为。参看《割肉医夫》。

④ 魏息园,IX. 5. Legge, *The Works*, 311(Bk. 4, pt. 1, Ch. 21).

⑤ 魏息园,IX. 5.

节崇拜盛行时她被誉为文明价值的典范，但魏息园称，这种观点只会使这最坏的欺骗永远持续下去。^①

魏息园书中记述了一位唐朝人卫敬瑜的妻子王氏，在这一条目中他非常直接地谴责了夏侯氏家人那种强迫妇女再婚的行为。^② 卫敬瑜死后，王氏的娘家父母和公婆都坚持让她再婚，于是她割掉了耳朵以示反抗，然后她在丈夫坟上种了一棵树以示坚定的决心。一对鸟儿在树上结巢，后来两只中死了一只，另一只在第二年春天独自飞了回来。在魏息园看来，比起那些迫使少妇再觅第二个伴侣的人来说，这些在中国文学里标志着真挚浪漫情感的“爱情鸟”道德水平更高。^③

魏息园认为无论是孝顺的儿媳给公婆吃自己的肉还是贞洁的寡妇割掉自己的耳朵鼻子的自残行为都违背了中庸之道。但他也对这种道德冲动驱使下的行动表示理解，并欢迎她们用更适度的表达方式。比如用血而不是肉或器官给病弱的长辈，或对于再婚的劝告置之不理，而不是为了避免再婚而永远地损毁容貌。^④ 他称赞赵子乙年青的寡妇王夫人以“蓬垢”来“全贞”。他解释道，那些幸而美貌但不幸守寡的女子，必须找到一种非暴力的方式来掩藏她们的美。^⑤

贞女

改良主义者对贞节最剧烈的批评是针对忠实于未婚夫的贞女，这些已聘的少女发誓终身对她们死去的、疯癫的或者生病的聘夫保持贞洁。在明代，这群女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几乎史无前例的社会类别，并成了

① 魏息园，IX. 6。有关宋濂(1310—1381)对于夏侯氏的赞美，请参见 Weijing Lu, *True*, 第 200 页。

② 卫敬瑜的妻子在唐代文献《太平广记》中曾被提到过，270 卷，《妇人》。

③ 魏息园，IX. 12。这一真爱的理想最早出现在 5 世纪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里。也见 Birrel。

④ 魏息园，IV. 6。

⑤ 同上书，IX. 14。魏息园在其评论中重述了一位品貌双全的李寡妇的故事，由于她常常做被逼成婚的恶梦，她不得不剪掉头发，以垢面示人。

一个令人焦虑的社会问题。^① 她们既是晚期帝国女德制度原则的崇高典范,同时因其暗含的任情而成了最令人伤心的符号。从明代直到民国早期,她们作为最完美地体现了“义”和个人牺牲的女性,继续处在贞节等级系统的最上层。贞女不同于守贞寡妇,后者为与她们分享了情感和身体之爱的丈夫保守贞操,而贞女则在体验浪漫爱情或建立婚姻关系以前就接受了性垄断,从一而终。如果将节妇的角色比喻为绝对服从于主上的忠臣,那么贞女的行为可算是终身顺服于一位从未侍奉过的主人。^②

贞女这个有争议的角色让儒家学者从 16 世纪一直辩论到 20 世纪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时期辩论的词汇的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讨论不再局限于学者论文、文人笔记和传记选编等常规领域,而在诸如小报、画报等新式传媒中普遍展开。此外,过去 300 年争论的是与人的情感有关的礼法实践,而 20 世纪初的讨论则更关注和礼法有关的人的情感。这种对人的感情的强调预示了在下一个十年贞节崇拜将会受到绝对批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既没有参考西方的价值观,也没有成为五四反贞节运动的先声。

在更早的辩论中,贞节崇拜的卫道者通常不强调人的感情的重要性,而是将争议集中在礼法的技术细节上:究竟经过订婚、成婚仪式中的哪个阶段,一个有婚约的少女才变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妻子? 他们常常依据《礼记》中关于丧礼的章节“曾子问”来确立自己的立场。他们争辩说,只要知道少女哀悼未婚夫的程度,就能确定她在什么阶段被视为完成了结婚。^③

贞节崇拜的批评者多强调贞女行为中的真实情感而不是礼法的细

① 处女守贞的做法可以上溯到《列女传》(《列女传》,4:3;张敬,第 135—136 页),但直到南宋时期它才为官方所鼓励,到明代才发展成为惊人的狂热崇拜。关于明清两代处女守贞的事例可以参见 Weijing Lu, *True; Theiss, Managing*, 第 60 页,第 29—30 页。

② Weijing Lu, *True*, 157; Sommer, 69.

③ Legge, *Li Chi*, 1:311—342。关于《曾子问》的运用,可参见 Chang So-an, *Murder*, 17—20。

枝末节。^① 例如，17世纪早期的马之德写道，未婚少女为一个她们从未有机会发展爱情的男人自杀，这种行为不仅有违礼法，而且违背了人的情感。^② 清朝中期的俞正燮（1775—1840）是一位直言反对贞节崇拜和缠足的批评家，他同样认为夫妇间真正的忠诚只能建立于婚后形成的感情之上。19世纪的李慎传也声称未婚守贞的行为不仅在礼法上而且在感情上都是不恰当的。^③ 20世纪初的作者们沿着这条线索，在未婚守贞问题的争论中更加突出感情的问题而不是试图去破解礼法难题。

在当时流行的报纸《笑林报》上有一篇关于未婚贞女的报道讲的就是人的情感。该事件涉及一个广东官员何其洵的侄女，她与旅县（音）一位名叫陈溥的男子订了婚，在两人结婚前陈溥死了，这位少女宣称她将为丈夫守节。然后她的叔叔上奏请求将她的守节愿望记入旅县的地方志。汉军旗的一位副指挥官看到这个条呈后，公开对赞誉何其洵之侄女以及未婚守节的狂热做法发表了意见。^④

这位指挥官首先罗列了批评贞节崇拜的学术证据。他指出明朝学者归有光（1506—1571）曾引用《曾子问》有力地证明了未婚守贞行为不合乎礼法。更近一些，清朝中期的汪中（1744—1794）和张文虎（1808—1885）发展了归有光的观点立场。^⑤ 然后指挥官提出他自己的论据（其节录见于本章开篇的诗作）。他首先依据的是男女平等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参考当时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盛行的男女平等的话语，而是在中国的范式内来辩论。他宣称男人和女人是一个综合整体（“男女一

① 只有朱彝尊（1629—1709）等少数贞节崇拜的辩护者诉诸于情感的话语。Weijing Lu, *True*, 234—235。

② 同上书，第228页。

③ 同上书，第242页。

④ 《守贞说》。

⑤ 同上书。归有光、汪中等倡变文风的学者论述人情和礼教规定的张力的观点可参见 Rowe（罗威廉），*Saving*, 432。汪中是有关贞女的辩论中最重要的文献的作者；参见 Mann, *Precious*, 84—85；Kai-wing Chow, 205—207；Weijing Lu, *True*, 243。南汇（今属上海）的张文虎曾为曾国藩的部下，是金陵书局的创始人。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体”),应该平等地对待。如果要求妇女为丈夫守贞,男人也应为他妻子做同样的事。然而那些经典文献和流行风俗使得不平等的性别行为规范不断延续。当鳏夫可以立刻娶续弦纳妾时,寡妇甚至不能奢望与一个英俊的追求者有交往。^①

指挥官在他的第二段论证中诉诸于人的情感,这也许是鲁迅(1881—1936)在1918年尖刻讥讽贞节的先声。所有的人都好生恶死,为什么当贞女们自残自刎时,却引不起任何人的关注呢?所有的人都喜好与人接触而避免孤立,为什么贞女们把自己和社会隔绝起来呢?他认为,所有关于女性性纯洁的说法都违背了正当的原则。在他看来,把性别不平等和自我牺牲变成行为规范是反自然的,而男女平等和自我实现不仅自然,而且合乎道德。^②

《图画日报》中的《中外新列女传》也刊载了一个贞女的故事并就此展开了辩论。江西省的一名15岁的少女被人们称作“汪节母”,她在聘夫故去之后决意跟他“共赴黄泉”,在父母的阻止之下,她仍坚持嫁入汪家。在此后42年(到成文时止)中,她独居在汪家院子内一幢独立的二层小楼楼上。在其传记的插图中可以看到,汪氏在窗口读书,窗上有一匾额上书“节母楼”三字(参见图14)。^③

《图画日报》的报道来自于士大夫、贞节崇拜的批评者陈康祺的一篇杂文。^④ 在他对汪氏故事的评论中,陈援引了明末清初学者归庄(字尔礼,1613—1673)的看法,归庄认为未婚守贞从礼法和情感上都应该反对。^⑤ 归庄称未婚女子为她们的聘夫牺牲自己是“过情”并且“非礼之

①《守贞说》。

②同上书。

③《汪节母居楼守贞》。

④陈自己效法两位清代的学者——钱大昕(1728—1804)和俞正燮,他们二人都反对晚期帝国对处女守贞的狂热崇拜。有关钱大昕和俞正燮对女性的观点请分别参看钱大昕、俞正燮;有关钱大昕和俞正燮对贞节的论述请参看胡发贵。根据卢苇菁(*True*, 221—267)的观点,钱大昕在贞节崇拜问题上的立场终究还是模棱两可。

⑤归庄是复社的成员,清初时曾领导了抵抗满人入侵的运动。参见Hummel, 第427页。



图 14 汪氏在节母楼上读书

资料来源：《汪节母居楼守贞》

正”。他认为这样的女性与其说令人敬佩，不如说是令人同情，^①陈康祺对归庄的观点表示了强烈的赞同。^②

归庄遏制过度贞洁狂热的要求在 19 世纪后期越来越具有现实重要性，此时对贞节行为的褒奖正有上升之势。需要褒奖的妇女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得不在各地兴建贞节牌坊，对该地区当年的守贞女性集体加以旌表。^③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19 世纪 80 年代初陈康祺写这篇文章时，这种趋势越演越烈（直到 1909 年陈的文章在《图画日报》上重印时仍然

① 归庄。周婉窈（第 215 页）对归庄是否真正在这场辩论中持反对立场有所质疑。

② 陈康祺，《汪氏节母楼》。

③ 1749 年，乾隆皇帝批准建立集体贞节牌坊，到 1845 年时，守贞寡妇只能以这种形式被表彰。Elvin. 331; Theiss, *From Model Subjects*, 4-5.

如此),陈对此表示哀叹。他(可以想见,还有《中外新列女传》的编辑)不仅关心这种贞节崇拜的普遍扩张,而且关注它对妇女个人生活的影响。陈康祺将贞女比作野蛮的意识形态实践的囚徒。他不无尖刻地将汪氏故事和历史上的苏子卿(苏武,卒于公元前60年)相类比。苏武是汉朝中郎将,他曾被北方匈奴俘虏并关押了19年。^①

陈康祺解释道,他写汪氏的文章目的是提醒来者,反对女性贞洁模范故事中的“野蛮”观念。在评论的末尾,他发出呼吁——与先前例子中的汉军旗指挥官的观点一样——应放弃长期以来的贞节规范。^②《图画日报》的编辑们概略地重述了陈康祺的论述,重申了他的观点。^③他们在新版传记的末尾对归庄明智的观点表示支持,反驳时下学者对其所作的批评。^④

与这些讨论贞节的新媒体不同,魏息园的《绣像古今贤女传》采用的是一直以来学者们用以发表其贞节观的传统文学体裁。魏息园在此的贡献与其贞节观相一致,他并未直接赞成或反对早先的贞女辩论中的任一立场。他在《贤女传》中收录了三篇贞女的传记,对各篇给予了不同的评价。他称赞第一名贞女在未婚夫死后继续生活,第二篇传记中的少女死于悲伤但并非自杀,他对此保持中立;但他谴责了第三位为此自杀的少女。他的文章显示出20世纪初贞节问题的复杂性,表达了改良派的立场。

三篇传记的第一篇写的是清朝的金氏。她的未婚夫章文宝在婚礼未成时就去世了,金氏尽心操办了丧事,还要照顾章的一位已订婚并怀有身孕的小妾。小妾很快生下一个儿子,金氏接纳了这个儿子,成为了男孩的养母。这位养子在她身边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最后考中了进士。^⑤

① 陈康祺,《汪氏节母楼》。

② 同上书。

③ 例如,他们没有包括关于苏武的类比,可能他们认为《图画日报》的读者没有那么博学。

④ 《汪节母居楼守贞》。

⑤ 贞女是惟一可以合法收养孩子的未婚女性,她们通常也真会这么做,以尽到对其聘夫最高的责任——确保他的香火绵延,使他的子嗣能在其灵前为他进行祭祀。参见 Weijing Lu, *True*, 192-196。有关社会意义上的母亲和生理意义上的母亲的概念,参见 Bray, 第335—368页。金氏的故事在《浙江通志》第215卷《列女》中有所记载,但金氏只是被称为“某氏”。

这篇传记含有一种贞女传说中最常见的桥段：一个年轻女子通过培养并非己出的儿子，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并不认识的“丈夫”，并为她的“姻”家带来荣耀。有一出从15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都广为流传的戏剧可能就是受到金氏的行为和/或传记的启发。^①

魏息园在评论中称赞金氏确保了丈夫血统的延续并抚育了他的儿子。魏息园也赞许她怀念丈夫的感情投入。俞正燮等一些批判未婚守节的评论家声称未婚守寡的少女感情和身体上都不亏欠她死去的未婚夫，而魏息园与他们不同，他将金氏的行为描写成对其丈夫的感激之情的恰当表达。^②但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魏息园是对未嫁女守贞进行肯定，不如说他看重的是父系血脉的绵延。在魏息园的眼中，金氏放弃自我的性权利和情感满足的行为是高尚的，因为它并不以自身为目的，而是确保了张家香火的延续。

魏息园记载的第二个贞女是袁机（素文，活跃于1730年），她的故事很有名。她是诗人、学者、女性写作的倡导者袁枚（1716—1798）的三妹。据魏息园的《贤女传》记载，袁机年幼时与高家的儿子订婚。当婚期临近时，高家借口儿子身体不好，想解除婚约。袁机引经据典，表示拒绝：“女从一者也。疾我侍之，节我守之”。婚礼如袁机所愿如期完成。然而，袁机很快得知她的丈夫不是身体而是精神有病。他急躁而又暴虐，不断虐待她，还把她的陪嫁财产在妓院里挥霍一空。最后当他计划把她也卖掉时，她悲痛地回到自己娘家。后来高很快就去世了，袁机在哀痛中生活了一年后也相继去世。^③

在这一传记的评论中魏息园对袁机表示同情，没有明确批评少女守贞的偏执做法。他也没有为未嫁女守贞行为辩护，而是对她的选择表示尊敬。魏息园认为悲剧的根源是高的暴虐而不是袁机的坚持，他把这

① 这部取材历史的戏剧叫做《秦雪梅》，相关细节参见 Weijing Lu, *True*, 179 - 181.

② 魏息园, VI. 17. 有关俞正燮的批评参见 Weijing Lu, *True*, 243.

③ 魏息园, IX. 21.



图 15 拿着书的贞女袁机

资料来源:魏息园, IX. 21

个作为袁家的不幸来呈现,而袁家一向是以幸福长寿为人所称道的。他不承认也不附和汪中等评论家的观点,他们认为袁机的命运是她自己“愚蠢”的结果。甚至袁枚也责备自己妹妹是自愿效仿历史楷模和女性典范而牺牲自己,但魏息园也没有附和。^① 尽管魏在选集中提及了袁机随身携带三卷《列女传》和一部《诗经》——绣像中的袁机手中拿着一本书——他却并没有将她的学识和悲剧之间联系起来(参见图 15)。^②

魏息园对他所选载的第三位贞女的评价与对袁机生平的评论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他对这位 19 世纪后期名叫魏镜清的贞女的态度不再是中立的了。传记的序诗和叙述本身还未能体现魏的态度,他对这位年轻女子的批评只是在结尾的评注中有所体现。序诗的结尾还赞颂魏镜清“全节保贞”。传记文本则表达了对魏镜清所受到的古典教育和诗才的倾慕。她的诗才为她的未婚夫、一位名叫曾树藩的读书人所赏识。曾在婚礼之前突然离世,魏镜清准备冲到葬礼上去自尽,但被她的父母阻止了。之后她把自己锁在屋里投缢自尽,时年 26 岁。^③

魏息园在评论开头说,魏镜清只是订婚,并未结婚,在曾死后再嫁是适当的。他用历史类比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比较了魏镜清与公元前

① 有关这些观点,参看 Weijing Lu, *True*, 261 - 264; Mann, *Precious*, 84 - 85。

② 魏息园, IX. 21。

③ 同上。

1200年商朝的忠臣伯夷和叔齐，他们宁可在山里饿死也不为周朝的征服者服务。虽然伯夷和叔齐即使“食周粟”（对魏镜清来说就是再嫁）也并不越礼，这两人的忠贞还是（像魏镜清一样）至死不渝。魏息园一定知道汪琬（活跃于1700年），这位清初贞女辩论的参加者也使用过同样的类比为贞女自杀辩护而不是责难她们。汪琬称孔子并未谴责伯夷和叔齐，因为他们在社会混乱时期担当了忠贞的模范。由此，汪琬提出应该称赞贞女的极端行为，因为它能给缺乏道德勇气的人们以力量。^①

魏息园在《贤女传》的其他地方也表达了对女性自杀的反对，他一定深受魏镜清之死的困扰。在其评论的结尾处，他透露了自己对魏镜清的悲剧产生强烈反应的第二个原因。他与魏镜清在湖南衡阳的娘家有亲戚关系，魏镜清的父亲魏召亭是他的叔父。这种关联不仅加深了他对魏镜清的感情因素，而且很可能也给他提供了有关魏镜清的生活的私人资料。这一渠道使他得以摆脱对1872年出版的衡阳县志的依赖。与县志中典型的简明叙述相比，魏息园的传记中语气更加个人化、更加伤感，它动情地渲染了魏镜清和曾生之间的完美结合以及这位少女的文学天分。县志中也曾公式化地谈到魏镜清从小就很聪明并且有诗才，而魏息园的传记则详细地描述了她如何向母亲学习，精研《孝经》、《诗经》和《论语》。^②《贤女传》这一版本的作者——无论是魏息园或是别人——也看到了魏镜清的诗作原稿，还从中引用了一句。^③

考虑到魏息园与魏镜清的私人关系，魏息园对她的死的反应就像一位清朝的“学者父亲”，就贞女崇拜的知识立场而言，他们是辩护还是反

① 伯夷和叔齐是小诸侯国孤竹国国君的儿子。有关汪琬对这个类比的使用请参见 Weijing Lu, *True*, 243。

② 彭玉麟、殷家骅，第1031页。但是地方志中也记载了魏息园未记录的细节，包括魏镜清的名——泉生（镜清是她的号）、家庭关系，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她父母强加给她的第二次婚约。根据地方志的记载，这个新的婚约最终加速了她的死亡。

③ 魏息园，IX. 23。

对经常取决于他们作为殉夫女子的兄弟、父亲或者伯父的主观经验。^①魏息园在金氏故事的评论中认可金氏活下来抚育养子的守贞行为。面对袁机的不幸,他感到痛苦,但并没有责难她对高的专一。只有当他面对自己天赋诗才的侄女无意义的死亡时,他才明确表达了对未嫁女守贞行为的强烈批评。

闭塞和冷漠

古典现代派的论述中缺乏魏息园那种对女性贞节问题持续而复杂的反应。这种缺乏并不意味着在文化上不重要,而是由于贞节问题深深地嵌入在社会之中。在古典现代主义者和当下主义者的论述中,才女象征着过去中国的缺陷,女杰则代表了他们所希冀的男子气概,而贞节烈女则标志着与现代相冲突的尴尬。在他们的笔下贞女也常常被提到,但她们深刻地嵌入于家庭史、文化实践和道德纪录中,并未形成一个客观的社会类别,因此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

从晚清到民国早期,改良派内部对贞节问题的批评一直不断。^②但是从女德制度之外发出的批评之声直到1908年5月才发表。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作者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男性,而是日本女权主义大诗人奥谢野晶子(1878—1942)。^③奥谢的文章在新的文学杂志《新青年》发表后,有两篇以中文写作的文章马上跟进:胡适的《贞操问题》是对奥谢的文章的回应,还有一篇是鲁迅的《我之节烈观》。^④

尽管贞节问题在20世纪初古典现代派的辩论中付诸阙如,但在新

① Weijing Lu, *True*, 256 - 267.

② 早期民国改良派对于贞节问题的批评可以参见施淑仪。施曾于1922年出版了一本妇女诗集, Ellen Widmer (*The Thetic*, 第215页)曾经说这本集子是“保守的”,但也注意到它对美德的强调有所减弱。关于施在《妇女杂志》上的文章,参见胡晓真,第185—188页。

③ 奥谢野晶子。

④ 胡适;鲁迅,《我之节烈观》。也可参见章义和、陈春雷,第298—299页。

式课本中没有完全被忽略。虽然贞女——贞节最具争议的代表——从所有这类教材中被排除了，但节妇却还保留其中。^①

这种混杂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谢允燮的《初等小学女子修身教科书》，这本书被广泛采用，课文内容包括行为规范、中国历史模范人物和外国风俗。它介绍西方女子教育和爱国主义等新思想的同时，也包括了一篇名为《说节》的课文，还附上了一幅插图，内容是表彰贞节孝顺的牌坊（参见图 16）。课文说贞节是女子的最伟大的美德，忠贞的妻子为国家所尊重，为地方社区所仰慕，为后裔所敬佩。虽然谢允燮承认忠贞的模范很少见，他还是鼓励年轻读者去效仿她们。^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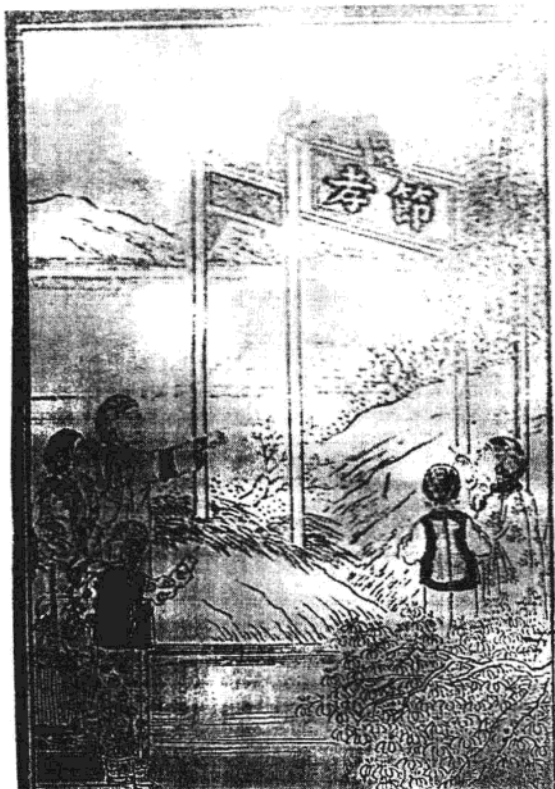


图 16 表彰贞节和孝顺的牌坊

资料来源：谢允燮，58a

大多数记述中国历史模范人物的教科书都将殉夫的贞节烈女排除在外，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许家惺编著的《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这本书是这类风格混杂的教科书中内容最驳杂的。许家惺采用了传统

^① 但忠贞的观念还是令人尊敬的，在一本为男童写的教科书里鼓励男子要像女子一样忠贞。书里举了刘廷式的例子，他未婚妻眼盲之后其娘家愿意解除婚约，但他还是坚持要迎娶她。这个故事引自《苏东坡集》。高凤谦、蔡元培、张元济，《最新修身教科书》，《最新修身教科书教授法》，4：9a—9b。

^② 谢允燮，58b。

的修辞和生动的插图,为贞节女子毫无保留地送上赞美。这本书中既包括有女性自杀等极端行为,又有西方的蜜月和尚武精神等进步主题。图17和图18表现了许家惺的教科书混杂的风格。^①

最值得关注的是,许家惺采用了国外价值观,但不是批评而是认同中国的贞节崇拜。他在序言中提到贞节原则在欧美就像在中国一样受尊敬,但是西方人更关心的是持久的婚姻关系而非性别隔离。他承认欧美婚姻的优点可能部分地源于西方缺少纳妾制度,但是他认为中国女性有责任去构筑更牢固的中国式婚姻。通过在课本里收录“大量的贞节故事”,他希望“女哲之光”(对节妇的雅称)能鼓励他的读者来效仿。^② 许不愿承认或者未能察觉的是——他在一章中介绍西方妇女的自由婚恋,而又在另一章中讲述中国妇女以死来维系包办婚姻的荣耀是多么的不协调,这反映了古典现代派的叙事中未解决的矛盾。

许家惺收录殉节女子故事时不加批判,其中也包括刘氏的故事。刘氏在饥饿的蒙古兵面前自愿替代丈夫牺牲自己,但这之前她曾向他们提供食粮,这曾遭到魏息园的贬斥。而在许家惺的记述中,刘氏称她的身体比她丈夫胖,最后成功地说服蒙古兵让她替丈夫而死,许认为这样的行为值得称赞。^③

许家惺介绍了相对克制的节妇陶婴的故事,这在魏息园的《贤女传》中也曾收录过,但许的书中更多的是那些极端的例子,包括魏息园所痛恨的自残的故事。例如唐朝的房玄龄的妻子,为使即将去世的丈夫放心她会守贞,剃去了自己的一只眼睛。^④ 从古代到明朝,那些殉夫自杀的楷模都受到许家惺的赞颂,其中一个例子是汉朝的焦仲卿的妻子,情诗《孔

① 许家惺。

② 许家惺,《例言》,1b。

③ 许家惺,71a。

④ 同上书,70a。

雀东南飞》即取材于此。焦的妻子被婆婆赶出家门并决心不再嫁，当她的娘家坚持为她再觅夫婿时，(按许的版本)她割喉自尽了。她的丈夫听说她死亡的消息后也自杀了。^① 在许书的“义烈”一章中，他重述了明朝博学而英勇的姜烈妇的故事。姜世进的寡妇姜氏遇其亡夫的叔父示爱，为了保全贞节她选择了投入水盆自尽(如图 18 所示)。^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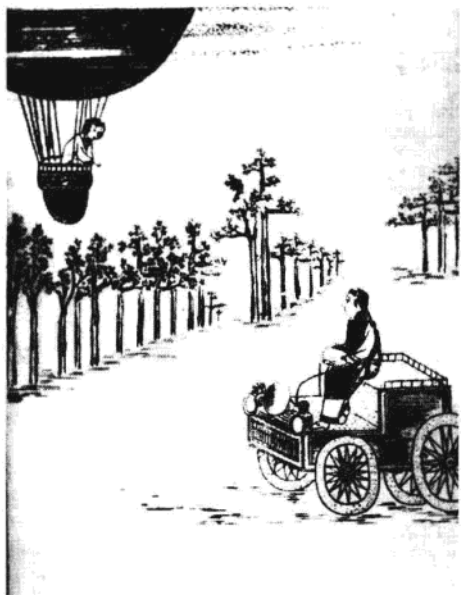


图 17 现代精神征服自然

资料来源：许家惺。83b



图 18 “义勇姜烈妇”为丈夫自溺盆中

资料来源：许家惺。78b

嘲笑

古典现代主义者留下的文本中收录贞女节妇的为数甚少，他们对这些道德典范的道德和思想地位的看法也常常互相矛盾，而当下主义者则对她们采取了驳斥或嘲笑的态度。许定一在他的《祖国女界伟人传》的

① 许家惺，71a(在书中有两页 71a 和 b，显然是印刷错误)。在原来的故事中，焦仲卿的妻子溺水而死。这首诗请参看 Birrel。

② 许家惺，78b—79a。

前言中,断言惟一值得赞赏的女性品德是从奴隶式的贞节中分离出来的英雄主义。他宣称在他书中的妇女都“对国家或民族”做出了重大的突出贡献。同时,他明确排除了贞女和节妇,因为她们只显示了“私德”。^①《世界十女杰》的匿名作者也发表了相同的言论。他控诉道,那些被尊为烈女和闺秀的女性仅追求“为丈夫牺牲自己,为婆婆牺牲自己,为父母牺牲自己,为‘所欢’牺牲自己。”虽然“她们为谁而牺牲和牺牲自己的方式不同”,他继续说,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缺点。大家都“为某一个人而牺牲,没有一个是为整个国家牺牲”。^②

其他作者则以一种破除传统的精神宣称女子守贞毫不重要,或委婉或辛辣地揭露她们的行为没有意义。这些作者包括日本作家高野弘,他于1905年在东京发表了中国报道《纪节妇马氏事》。由于当时正是中国留日学生运动的高潮,高野针对的读者大概是中国学生。他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嘲讽——这是一个文化局外人的标志和特权。贞洁的马氏是长城东端的城市山海关的马恩桂(荫之)的妻子。1900年冬天,当八国联军临近山海关时,马恩桂担任地方治安长官。在他离开妻子赴任前,他告诉妻子他估计难以生还,如果他未在指定的时间前回来,她应当认为他已经离世了。马后来活了下来,但延误了返回时间。当他到家时,妻子已经自杀了。“多么可怕的美德和勇气!”高野惊叹,这个故事应该“万代流传”。^③

对照:当代贞女节妇

20世纪初期的文献资料突出地显示出各派人物在评论贞节问题时的巨大差异,而这个问题是晚清时代女德制度的基石之一。永恒主义者

① 许定一,《凡例》,《祖国女界伟人传》。

② 《世界十女杰》,《序》,1。

③ 高野弘。

试图通过将妇女教育与对婚姻的忠诚相联系，把他们感到威胁的妇女教育和女德制度协调起来。他们建议妇女在家庭之外受教育的场所只能是节妇之家，他们还把一位为教育献出生命的学校创建者当作贞节烈女来表彰。古典现代派在其辩论中通常忽略女子的性纯洁问题，其为数不多的讨论此主题的课本持一种肤浅的中立立场，回避由此产生的难题。当下主义者明确地对贞节观念表示轻视，他们宣称这种观念不仅无关要旨，而且有害于中国的民族斗争。

这些认为女子贞节或者有害于国家、或者不值得认真考虑、或者是社会稳定的关键的种种观点，都未能公允地对待历史和当代问题的复杂性。晚清报刊报道的近期发生的寡妇和未嫁女守贞的事件中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复杂性。不同于议论杂文、文人笔记或者是将女子贞节问题放大为历史和意识形态话题的女子传记，这些社会新闻(*faits divers*)对当时的做法提供了相当不确定的一瞥。他们不会去赞美用眼泪冲垮长城的传奇女子，他们介绍的女英雄要每天面对日常的社会和经济压力。他们很少参考过去的规范，也不去联系宇宙宏旨，他们用俗世的语言表现贞洁的主人公，这些可敬的女子的行为最好能得到国家认可，至少要得到法律认可。

就这样，这些趣闻轶事的报道披露了那些曾经束缚于儒家礼教、充斥着天下大义的行为在礼教和天下秩序越来越受怀疑的当时尚未被抽空所有的社会意义。当有关贞节烈女的报道在定期出版的地方报章醒目标题之下出现时，它们仍然被认为有报道价值。并且，当这些故事被当作轰动一时的趣闻经常登载时，它们反映并承载了当时的道德价值观。虽然比不上遍布乡村的贞节牌坊那样堂皇，但是这些故事的刊载将地方新闻带到了全国读者的面前，并重申了妻子忠贞的重要性。通过刻画各个社会阶层及不同地区的妇女，这些报道具有充当典型教材、向政府请愿和诉求正义等各种功能。

这些典型报道推出了当代“可风”的模范。这些报道通常沿用正史

和方志的惯例，先将这些女子定位在某个家族和地域上，再开始描写表现她们非凡德行的事件。这些报道也起到了《京报》一样的作用，像官方证明书那样对杰出女子加以表彰。^① 例如，1906年2月在《顺天时报》“天津新闻”专栏的一篇文章中，一份官方表彰证书被授予一位姓王的贞女。在侍奉了亡故的聘夫之母20年之后她也自尽而死。^② 直隶的白国稳的妻子是另一位“闺阁模范”，1896年官方授予她证书表彰她守节50余年。根据新闻报道，这个单纯无知的寡妇深明妇道，谨守闺训，处理长幼关系十分得体。^③ 还有一位奉天官员的女儿，吉林的辛氏，她在死去的聘夫家里克尽妇职。《顺天时报》对她进行了连载报道，称其为道德典范。^④

各种报纸也刊载社会和各级官僚为贞女节妇请旌的奏折。例如，1909年《图画日报》报道了地方绅士、客商和学者向高级官员上奏，吁请给江苏省吴江县同里村一位妇女朱氏以旌表。他们坚称以朱氏为楷模能改进社会风气。朱氏按照礼法的要求在亡夫的祭坛前祭奠了49天后突然去世。^⑤ 1907年2月，《顺天时报》刊登了安徽巡抚恩铭（1846—1907）提交给礼部的奏疏，恩铭请求为30000位不知名的贞节烈女建立祠堂，表彰她们的贞操和德行。^⑥ 20世纪初的学者们也开始为他们并不认识的殉节女子请旌，延续着清朝学者的传统。^⑦ 在一个开封的案例中，一位面条商人将他女儿陈惠贞（活跃于1900年）嫁给了当地一个妓院的妓女之子。当陈惠贞拒绝接客时，她遭到丈夫和婆婆的鞭打，最后受虐身亡。附近一所学院的学生得知这个悲惨的故事后，鼓励陈的父亲为她

① 尽管包括《顺天时报》和《时报》在内的不少报纸都刊载了政府表彰的消息，《申报》直接摘登了《京报》的内容。参见 Mittler, 第202—203页。

② 《京报》。

③ 《规范可风》。

④ 《贞节可风》。

⑤ 《烈妇含悲殉夫终七》。

⑥ 《奏为皖省节烈妇女入祠折》。

⑦ Weijing Lu, *True*, 99 - 102.

请了一幅牌匾，安置在由地方政府提供经费的节孝祠中。^①

此外，晚清新闻报道还将节妇作为原告来报道。这些妇女与历史上的典范一样，面对同样的社会压力并且采取了同样的自我保护措施。一位新阳县的常石氏，在丈夫死后的十多年中致力于教育儿子并扩展家业。当她得知丈夫的哥哥觊觎她的家产并希望娶她为妻时，她剪掉了头发——使自己减少吸引力并表明她不再嫁人的决心——并请县政府主持正义。^② 另一个故事奇怪地混合了包括自残和野心勃勃的亲属等节妇故事的常见内容。苏州新阳县的刘某想要诱惑他弟弟的寡妇并声称她的财产属于他。一天，当这位寡妇将要启程回湖南农村的娘家探亲时，刘走进她的房间并砍落了她的手（当节妇与男子发生了不恰当的身体接触后通常会砍断自己的手）。当故事的真相被报道出来时，这位寡妇的手还在接受治疗，她的案件也被提交到了地方法院去审理（参见图19）。^③ 在《时报》的一篇报道中，湖州的王朱通过自杀来抵抗其叔父逼她再婚的压力。当这位叔父带了一帮人来到她的房间要强迫她时，她立刻刎颈自尽。这个故事的结尾呼吁地方官员和绅士们应保证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受到应得的惩罚。^④

虽然这些新闻报道中描述的妇女们生活在有法律主持公正的世俗领域而非在讲求宇宙天理的宗教领域，她们还是使用了和以前的典范人物一样的策略——自杀和自残——去声明和保护她们的贞节。在从报纸记者、杂文作家到教科书作者在内的各种的晚清朝社会评论者中，只有改良主义者对自杀带来的文化和个人问题提出批评。

尽管改良主义者相信婚姻忠诚代表了人类文明的顶点，但他们认为由自我施加的暴力是它的最低点。沿着明清两代以吕昆（1536—1618）、

① 《陈惠贞不愿为娼而死》。这些祠堂最初是雍正帝建起来的。Weijing Lu, *True*, 107-108.

② 《节妇发》。关于断发明誓这种文化习惯请参见 Weijing Lu, *True*, 17.

③ 《贞妇手》。

④ 《节妇因逼醮自杀》。



图 19 贞妇断手

资料来源:《贞妇手》

归有光、毛奇龄(1613—1716)、钱大昕(1728—1804)和汪中等学者形成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传统,他们谴责那些导致寡妇自残或自杀的社会和思想压力。他们争辩说,礼法必须表达而不是歪曲真正的人类感情,“礼”必须与感情相适应。^① 魏息园在《贤女传》中直接回应了这些观点,他表示“人情能难能者,圣人不以立教。”^②

和晚清的作品相比,五四文学中对守贞行为的不人道既表现出深切的共鸣,也有重要区别。当魏息园和其他改良主义者争辩说礼法必须与人类感情一致时,他们并没有对行礼如仪这一价值观表示质疑。在民国

^① Rowe, *Saving*, 432. Rowe 在这个“维新派学者”列表中加上了陈宏谋,但就笔者所知,陈并没有参与这场贞节辩论。

^② 魏息园, IV. 6.

时期第一个十年中，古典现代派对女性贞节的态度暧昧不明，而当下主义者对礼教的嘲笑逐渐发展为一种清晰连贯的立场，他们宣称礼教在本质上与人类的感情是对立的。鲁迅在1918年他的杂文《我之节烈观》中宣称贞节思想是对人类幸福的诅咒。“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他写道，“（他们的生命）必须有个意义……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守贞是困难而痛苦的，既不利于他人，也不利于自己。”^①胡适也批评贞节行为与人的感情不符。^②

尽管新文化运动和晚清改良主义者一样对古典现代主义者和当下主义者所忽略的感情问题都很关注，但他们与晚清改良主义者并非直系继承的关系。鲁迅、胡适和其他人没有参考过明清时期的贞操辩论，而这是改良主义潮流形成的基础所在。

五四作家们可能是忽视了改良主义的潮流，因为他们认为其过分嵌入在旧礼教中所以对他们没有意义；抑或他们是故意遗忘这种风潮，因为新文化运动有必要保持与“传统”决裂的姿态。这两种对贞节的批判十多年后就分道扬镳了，由此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过程，一种建立在对过去的内在卷入的基础上，第二种以打破偶像的方式拒绝过去。晚清改良主义者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是，它以人的感情和女性主体性之名，对晚期帝国的女德制度中最坏最极端的行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极端行为在20世纪之初的新闻报道中还在继续。

在亡故的聘夫家孀居、在闺房里断发、割耳鼻，或者在闺阁中悬梁自尽……贞女节妇们过激的个人行动引发了公开的争论。与女德制度唱对台戏的另一极端是，有一些妇女引发争论不是因为她们在私领域中恪守贞节原则，而是因为她们公然蔑视这些原则。

① 鲁迅，《我之节烈观》，第16页。

② 胡适，第298页。

第二章 公共领域中的女性：是放荡还是进化

沪上近来有种似妓非妓之荡妇。伪作女学生装束，招摇过市，惹草拈花。最为女学界前途之害。

——《冒充女学生之荒诞》，1909

贞节这一古老原则的重要性在晚期帝国的女德制度中登峰造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女性的公众性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超越了女德制度约束的新现象。当贞节模范因其在私领域的女性行动而被表彰时，少数中国女杰们就得伪装成男人或作为男人的替身才能直接介入公众领域。^①

相反，在中国文献中，公众性是那些留名于其民族史和世界历史的西方女杰的标志性特征。因此，西方公共领域中的女性这一新的文化类别就成了晚清想象中参与国际事务的象征。对这类人物的不同反应反映了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不同观点。永恒主义者坚决支持文化隔离

^① 例如《列女传》中的缙鬃，因为她父亲没有儿子可以帮忙，她便向皇帝请命。还有花木兰，其父亲年老时接到参战的军书，于是她代父从军。这两个女性的故事都可参见第五章。另一个例子是黄崇嘏，这位聪敏的女性伪装成男人在蜀国(908—925)做官。Ko, *Teacher*, 第130页。

模式，将“西方女性”作为对中国礼教的威胁全盘进行批判。改良主义者则试图承认中国当前的国际形势，也试图承认外国的典范人物。古典现代派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中国的世界地位，他们称赞西方女性的英雄事迹，但又往往用熟悉的女德概念去重写她们。当下主义者态度最明确，他们将外国女杰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加以拥护。

西方女性这一文化类别在中国本地形成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同样也有争议的社会类别——女学生，她们是西方方式的本土化身。这些学生成了一道新奇的城市风景，她们信奉的是诸如自由婚姻和女性自主等文明的价值观。她们的出现激起了如上述引文作者等社会批评家的警告，她们既被看作中国社会文明的希望，又被视为即将出现社会崩溃的危险信号。这些女学生的形象——以及本书第一部分引言中介绍的福建女学生等实际的晚清人物——承载了 20 世纪初女德制度和文明价值观之间主要的张力。

一种新的文化类别：西方女杰

在晚清时期的论战中，西方女杰和西方性别实践是对中国妇女和中国礼法原则的颠覆。但外国女杰不只是女性的对照物，同时也担当了中国民族的对照物。她们参与政治，名垂青史，与象征着国际孤立下的中国的深闺妇女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对西方女性的认识并不只是与社会性别概念相关联，它还关系着对中国疆域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态度。

西方是社会退化的根源

永恒主义派对公共妇女教育最为反对，并竭力维护儒家社会秩序，他们认为采用西方的方式会破坏中国的女德制度。官员们和女子教科书的作者们在神圣的中国价值观和颠覆性的西方方式之间，在顺从谦恭的中国妇女和放纵自负的西方妇女之间制造了尖锐的对立。当他们提

到某位外国人物时,他们警告说,西方性别实践——特别是自由婚姻和性别平等——将破坏中国的社会安宁。他们对中国女子公共教育的忧虑也来自于他们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现代世界秩序的恐惧。

在1904年曾呈上第一份有关女子教育的奏折的高级官员们对外部影响都非常谨慎:他们声称,女子学校是危险的,因为这会让青年女子读到西方书籍。^①两年后,在清廷对正规女子教育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时,工部主事刘掇反对以“欧化”方式进行女童和妇女教育。他认为这种方式建基于最近从西方传入并充斥于中国报章的诸如性别平等和自由结婚等“誓说妖言”,被误导的人们轻率地忽略了中外习俗的差别,将这样的观念实施于中国。他们的行为将会“蛊人心而败风俗”。^②学部在1907年的规定中响应了刘掇的观点。有关师范学校的文件告诫说不能让学生接触西方关于自由婚姻的言论,因为这抹杀了男女之别。^③

基于天地哲理并获得政府批准的教科书《女小学》的女作者戴礼,同样表达了对西方鼓动的文化堕落的担心。戴礼解释说,她写教材是为了强调中国礼教的永恒价值,并制止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等外来思想的渗透。她认为,打破男女有别这一中国原则等于毁灭中华文明。她宣称,如果不能保持适当的差别,而且年轻人“婚姻辄由自求之后,徒去人伦堕廉耻耳”。^④翰林学者章绶在给戴礼的教材作序时,特别警告要反对外国教科书的侵蚀。他宣称赞同刘掇的看法,“中外风俗不同,女教尤甚”。^⑤

清政府试图禁止章绶所反对的各种教科书。学部当局于1907年宣布,一本宣扬自由婚姻的歌本《改良再版女学唱歌》既违反了新颁布的女子学校的规定(对歌本的审查是在规定颁布一个月后),也与已有的礼教

① 荣庆、张伯熙、张之洞,第393—396页。

② 《工部主事刘掇学物要端折》。

③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第668页。

④ 戴礼,《自序》,2b。

⑤ 章绶,《翰林院检封章绶谨呈为代进女小学四卷恭请》,1a。

相冲突。他们要求地方教育当局在学校和书店查禁所有这类书籍。^①直到清末，尽管官员不断地呼吁查禁外国教科书，这些措施还是收效甚微。1909年，在妇女教育正式获批两年后，学部的张相国（活跃于1909年）禁止出售或阅读一本新进口的妇女教科书。他宣称这本书“充斥着可能会损害公众道德、煽动民众的文字，且终将阻碍女子教育（的发展）。”^②

以西方为尝试性的模型

改良主义者像永恒主义者一样，很少讨论具体哪位西方妇女。《每日画报》的专栏《新中外列女传》的编辑所承诺的外国女杰故事连载也一直未见报。魏息园的《贤女传》则恪守种族界限，只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典范人物。一个例外是薛绍徽和陈寿彭编的专门收录西方女杰的《外国列女传》。虽然薛和陈在表现这些妇女故事时尽量避免道德化，但他们仍然得顾及这些新的社会角色和中国女德制度之间的张力。陈寿彭坚持根据传记主人公的公众地位来编排全书结构，而薛绍徽曾经想根据她们个人的妇德来进行编排，但最终陈寿彭的观点占了上风。^③

像薛绍徽和陈寿彭这样的改良主义者评价西方影响时更为慎重一些。这点在《女学篇》的作者曾懿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与戴礼和章梈一样，曾懿也强调西方的教育方式和中国有差异。但是她接受了西方关于性别关系的新论点，而这些论点正是永恒主义者谴责的。婚姻自由和平等权利等观念在戴礼、章梈和政府官员笔下成了野蛮和社会崩溃的代名词，而曾懿却正面引用了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希尔伯特·斯宾塞

①《咨查女学唱歌》。关于报纸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参见 Bailey, *Unharnessed*, 342。大多数现存的新式教科书都包括有关婚姻自由的讨论，表明政府的这些禁令收效甚微。

②《相国注重女学教科书》。张相国进一步建议外务部和所涉国家协商禁止再输入更多新书。

③薛绍徽、陈寿彭，《译例》，见薛绍徽、陈寿彭，《外国列女传》，1a。有关这个意见分歧的讨论参见 Nanxiu Qian, *Borrowing*, 64 - 65。

(1820—1903)的观点,认为“爱和尊重”是和谐婚姻的源泉。她还倡导以男童女童教育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平权”。^①

正如改良主义者批评的是对贞节理想的过度表达而非这个理想本身,曾懿最后也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对西方思想不明智的滥用而非西方思想本身。例如她批评改良主义者的主张立足于对西方思想的肤浅理解之上。她还嘲笑某些人在吃饭穿衣的方式上盲目模仿西方,但缺乏对西方观念的深刻理解。^②

著名的西方社会改革家和社会之母



图 20 一位无畏的女探险家在射虎

资料来源:许家惺,87b

与改良主义者和永恒主义者不同,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推崇公众性的新价值观,并支持西方的思想、行为和女杰。在《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中,许家惺宣称,中国妇女因与外界隔绝而不如外国妇女。她们久居深闺,软弱、顺从且胆怯。因此,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堪称女杰的不过一二人。许家惺继续夸张地说,相比之下西方妇女都是豪杰。^③他选用了一张西洋女子在丛林深处射杀老虎的插图,以丛林来强调在肉体和心理上都远离闺房(见图 20)。

① 曾毅,6b—7b。

② 同上书,《自序》,5a。

③ 许家惺,第 88b。

除了像许家惺那样称赞西方女杰之外，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还赞美那些具体的外国妇女历史人物。他们编写的传记描写英勇、务实的西方女杰，无论是内容和结构上都显示出中国妇女的社会隔离和中华民族的国际孤立。从刘向时期以来的中国列女传都以引用前人之语作为结尾，将读者进一步吸引到儒家价值的世界上去，而这些外国女杰故事的中文版本结尾则强调了中国低下的国际地位，并激励中国妇女加入民族斗争。

在这一斗争中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都承担了基本的责任。尽管如此，他们的民族抱负并不一致，这在对西方妇女的表述中反映了出来。古典现代派倾向于赞誉本章所讨论的西方社会女杰，即那些致力于公共卫生改革、戒酒、妇女和种族平等之类的社会事业的妇女。当下主义者则相反，他们大多数更尊重激进的政治女杰，包括革命家、刺客和无政府主义者（这是第五章的主题）。从两派的文献来看，即便是他们都赞美相同的女杰，例如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玛丽·莱昂和罗兰夫人等，其叙述的框架也是不同的。古典现代派在外国社会女杰的故事中注入熟悉的爱情、教育和服务等内容，当下主义者则剔除了几乎所有的亲属关系，以强调女杰们载入世界历史的传奇事迹。

20世纪初的教科书和报刊中出现了一大批西方的女社会改革家。最突出的是英国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和三名美国妇女：社会改革家弗朗西斯·维拉德（1839—1898）、废奴主义者斯托夫人和教育家玛丽·莱昂（1797—1849）。

南丁格尔是20世纪初中国最知名的西方女杰之一。1850年代初期，她曾作为一名护士为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士兵服务，此后，她领导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改革。作者们用她的故事来向年轻的中国妇女介绍国际性的人道主义观念和国际组织的工作，并鼓励女性以护士身份投身中国的政治。

在晚清的资料中，南丁格尔的名字成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代名词，有

改良思想的中国人都为中国尚未参加这一组织感到遗憾。^① 比如,《中国新女界杂志》赞美她是国际红十字会护士团体的创始人。^② 她的故事还经常用于批评中国对国际协议的忽视。有个名为乾慧的人在其译介的南丁格尔传记中称,西方人不得不对北京救济善会成员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盗用红十字旗帜加以谴责。^③

这些作者还用南丁格尔的故事来动员中国妇女在民族救亡战争中担任护士。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写于1903年,这是民族斗争的一个关键时刻。自义和团运动以来俄国一直在满洲集结部队,年轻的爱国者情绪激动,要恢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④ 杨千里在读本中给南丁格尔传记来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总结,他勉励中国妇女到东北去当护士。他说,“嗟乎!弗洛伦斯之逝已五年矣”。

“西欧人得益于南丁格尔的仁慈,而日本妇女(在亚洲)继续工作。在这个时候,强大狡诈的俄罗斯再一次将其利爪伸展到东方,中国北方即将成为血腥的战场。听到这个消息,中国妇女纷纷起来拥护弗洛伦斯的事业。”^⑤

教科书的作者和各类记者还引用了弗朗西斯·维拉德——(美国)全国妇女禁酒联合会创始人的事迹来振奋中国妇女的爱国行动,揭露中国的国际隔离状态。维拉德在19世纪70年代初成立的禁酒联合会被

① 例如,可参见《女学生上振贝子书》。

② 《创设万国红十字看护妇队者奈挺格尔夫人传》。

③ 《英国女杰 涅几柯儿传》,第41页。

④ 杨千里的读本于1904年出版。关于这个事件和它在留学生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情感,请参看 Harrell, *Saving*, 131-139; Rhoads, 第13页,第285页。

⑤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16a。这些振奋人心的中国的“南丁格尔”包括共爱会和东京的笃志看护妇会的成员,还有上海的爱国女学校的学生,这些人都自愿在俄国入侵时以护士身份参与斗争。

广展云、广翼云和陈与新在1908年影印再版杨的南丁格尔传记时,删掉了杨千里在传记之外附加的激励之语,因为此时俄国入侵的事件已平息。这突出体现了在此类材料中对热门话题的关注如何影响了西方妇女传记的意义。

授权履行各种社会职责，包括推动反酗酒的政策和为新近释放的囚犯提供援助。自 1883 年以来，禁酒联合会在欧洲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其领导人也将信息传播到亚洲各地，该组织逐渐走向国际化。^①

同时收录在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和广展云、广翼云和陈与新的《最新妇女国文读本》中的维拉德传记突出了维拉德的工作世界性的一面，批评了中国的闭塞。传记作者惋惜地指出，在所有的禁酒联合会代表们访问过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都愿意接受维拉德的计划，只有中国一直不接受。传记继续说，“世界各国妇女之手”都按照维拉德的原则努力去改变风俗和人心。只有在中国任其人民“迷失在漫漫长夜中”。^② 拒绝加入国际团体不仅削弱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贬低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一名记者写道，当“美国新文明”尊重妇女时，“亚洲的古老文明”则继续轻视她们。^③

这位记者还用维拉德的故事鼓励中国妇女参加集体活动。他在文章后面所附的小传中提到，本不善缝纫的年轻弗朗西斯如何虔诚地为她家乡每年 7 月 4 日举行的庆典游行缝制旗帜。^④ 教科书作者吴涛在一篇关于合作是国家实力之基础的课文中，也同样声称维拉德是爱国主义的典范。吴涛通过维拉德的例子论证道，如果华人妇女们一起为社会目标而努力，她们就能够成功。^⑤

斯托夫人是美国废奴主义者，也是著名废奴主义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她在晚清时期的社会想象中成为了另一种社会行动的模范。中国作家们用维拉德和南丁格尔的事迹来增进人们对具体的人道主义组织的认识，而斯托夫人的例子则被用来强调国际平等的原则。无论他们最关注的是使中国摆脱满清政府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双重“奴

① Edward T. James, 3: 617.

②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 9b—11b；广展云、广翼云和陈与新，9: 14b—15b。

③ 刘庚藻，第 345 页。

④ 同上书，第 346 页。

⑤ 吴涛，39b。

役”，还是减轻国内的社会不平等以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他们都借用了斯托夫人的废奴主义思想。

作家和诗人蒋智由(1865—1929)翻译的斯托夫人传语言晓畅，是当时影响最广的斯托夫人传记。蒋智由宣称，这位废奴主义者比中国著名的女勇士花木兰或法国知名的爱国者圣女贞德更为伟大。花木兰仅仅是身家主义的模范，圣女贞德是国家主义的典型，而斯托夫人却是世界主义的象征。^①

斯托夫人世界性的影响力源自于她的废奴主义作品。蒋智由写的传记，以及其发表后派生出来的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和广展云、广翼云和陈与新的《最新妇女国文读本》等处的版本介绍说，斯托夫人著名的反奴隶制的著作发行了100多万册，被翻译成9种语言，并出版了21种版本。^② 尽管这些陈述大体而言是符合事实的，蒋智由和教科书编者却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著名的小说当成了《五月花》——后者其实是斯托夫人所写的关于新英格兰地区生活的一个小品文集，其中文译名为《五月花》。^③ 杨千里还进一步赞颂说，《五月花》“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奴隶制度。^④

无论被归于哪部作品，斯托夫人关于人的尊严和平等的思想在20世纪初的中国都引起了共鸣，当时国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忧虑日益加剧，社会不平等被看作中国劣势的根源之一。在1902年末载录于报刊

① 蒋智由的这个论断并未在传记中提出，而是出现在《女学报》所登载的一篇演讲词中。参见蒋智由，《爱国女学校开校演说》。这个传记（[蒋智由，《五月花》]）1902年首次刊载在《选报》上，同年7月在《女报》和《新民丛报》上都转载了。笔者采用的是后面这个版本。尽管杨千里和广展云、广翼云和陈与新等人的斯托夫人传记都转引自蒋的传记，但蒋的文献来源却不太清楚。可能的出处有很多。斯托夫人在日本明治时代的西方妇女传记集中经常出现，包括加藤眠柳和根本正的集子里都有，但这些都不是准确的出处。西方人也把斯托夫人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参见 Hanan。

② 蒋智由，《五月花》，9；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14a；广展云、广翼云和陈与新，7：16b。

③ 蒋智由，《五月花》；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14a；广展云、广翼云和陈与新，7：16b。

④ 尽管教科书里的传记忠实于蒋的原文，但这个细节是加上去的。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14a。

的一场演说中，一位名为杜清池（活跃于 1902 年）的女性认为，普遍存在的主妇虐待女佣现象昭示着中国的落后。如果中国人打算像美国人废除奴隶制那样克服目前社会进化中的“野蛮阶段”，他们理应遵循《五月花》的榜样。^① 1904 年，广州香山女学校的学生管理章程的制定者也用斯托夫人的例子来劝诫大家不要虐待女佣。^②

香山学校的例子说明，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均认为妇女教育可以开阔中国妇女的意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尽管他们很少翻译日文献中各种关于西方女小说家、画家或者诗人的故事，但在他们从 20 世纪初的东亚资料中广泛引用了西方妇女教育的先驱玛丽·莱昂的生平故事。^③

刊载于 1907 年《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一篇莱昂传记提供了她的个人背景、性格以及成就等细节（见图 21）。它描述了莱昂童年时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时候，在帮助其寡母的同时如何继续专注于她的学业。她自 17 岁起就任教于当地的学校，并在 1834 年创办了曼荷莲女子学院。无论是对于她的学生还是对于美国女性，甚至对于美利坚民族而言，她的教育工作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④

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都以讲述诸如莱昂那样的西方妇女的故事来提出自己的主张，但他们依据的设想



图 21 美国大教育家黎痕女士

资料来源：新女界杂志 2（1907 年 3 月 5 日）

① 《女士杜清池第四次演说稿》。

② 《香山女学校试办简章》。

③ 日本关于西方女杰的选集通常包括十余位各行业的杰出女性，莱昂往往是其中惟一的教育家。参见永山盛良；加腾眠柳；根本正。我所见到的中文教科书都没有包括她。

④ 灵希，《美国大教育家黎痕女士传》。

不同,因此叙述的框架也不同。古典现代派参照女德制度的原则将外国名人传记翻译成本土道德楷模,当下主义者则采用了普救论和女性自主的新语言。

在古典现代派的传记中,外国妇女的公共成就关系着私领域中女性的母性和教养冲动。尽管他们从未将西方人当作模范的生物意义上的母亲来表现——这是为中国的典范人物保留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他们还是将西方妇女描述为社会意义上的母亲,她们的母性特质具有比喻的性质,而非生物内在属性。^① 当下主义者很少使用母亲这一比喻,即使使用也有所不同。虽然中国的生理意义上的母亲们哺育的是父系后裔,古典现代派的社会母亲们治疗病人并给学生以母爱,当下主义者眼中的母亲们从事的则是拯救世界的工作。^②

古典现代派为南丁格尔的庄严形象注入了令人信赖的母性特质。杨千里记载了南丁格尔如何被克里米亚的伤兵们视为“慈母”,插图中的她在帮助伤员,流露出母爱(图 22)。^③ “慈母”这一词汇在《中国新女界杂志》刊载的南丁格尔和玛丽·莱昂的传记各版本中被频频使用。^④

与此相反,当下主义者在介绍西方女杰时用得更多的是“普救主”而不是“慈母”。^⑤ 乾慧声称南丁格尔“矢愿不嫁人”表达了她更高形式的博爱承诺。^⑥ 《世界十女杰》的作者称这位英国女护士为女菩萨,就像普渡

① 笔者这里所指的区别不是生母/养母在生育/养育孩子之间的差别,而是在那些为父系家庭养育(无论是亲生的还是非亲生的)儿子的母亲和在比喻意义上被当作社会运动之母的女性之间的区别。

② 例如,可参见《世界十女杰》,第 52、57 页。

③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15b。

④ 《创设万国红十字看护妇队者奈挺格尔夫人传》,第 71 页;灵希,《美国大教育家黎痕女士传》,第 67—68 页。恰在这一时期(1909)埃及的南丁格尔传记也把在克里米亚照顾伤员的她描述为“就像母亲一样”(Booth, *May*, 第 875 页)。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 20 世纪初,是否有一个西方女性传记的知识库,在非西方地区不断传播?

⑤ “普救主”是《世界十女杰》中南丁格尔传记的标题,第 47 页。

⑥ 《英国女杰 涅几柯儿传》,第 40 页。



图 22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护理士兵

资料来源：杨千里，《女子新读本》，卷首至第 2 卷

众生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样。她象征着荒芜世界中珍奇的爱之花。^① 一首 20 世纪初期的民歌也用类似的语言来歌颂斯托夫人。她风姿绰约，是世间的慈善家、西方的菩萨，她的爱洒遍全人类，任何困苦都能解除。^② 还有记者用同样夸张的词汇描绘维拉德的慈母之情。她是文明之母，是陶冶古今圣贤豪杰的母亲，为所有贤母所尊敬。^③

当下主义者关注超绝的女英雄，而古典现代派则始终让他们的偶像处于世俗的关系之中。他们坚称，由斯托夫人、南丁格尔和莱昂英勇承担的超越国界的行动必须依赖男性的援助才能完成。在蒋智由的斯托

① 《世界十女杰》，第 47、52 页。

② Xia Xiaohong(夏晓红), *Ms Picha*, 246.

③ 刘赓藻，第 344 页。

夫人传及其教科书版本中都提到,这位富有远见的废奴主义者在制订她反对奴隶制的宗旨时,感到不得不求助于她的丈夫和以前的老师卡尔文·埃利斯·斯托(1802—1886)。在新婚之夜她吐露了自己的抱负——她决心要写一本拯救黑奴的书,并希望得到卡尔文的支持,她还谦虚地谈到她缺乏承担这一任务所必须的知识。虽然她最终独立完成了这本书,但就这本书所引起的强烈反响而言,开始她对自己能力的自谦被看作只是自序的一种惯例。^①

当下主义者淡化现实和隐喻的家庭关系,突出英雄的独立性。这一点在《中国新女界杂志》的莱昂传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篇由灵希从日文文献——根本正的《欧米女子立身伝》——忠实译出的传记里,将莱昂描述为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但是灵希评注结尾寄语读者时则完全偏离了根本正的初衷。在被删掉的日文版结尾中,根本正将莱昂的成就与东亚家族规范联系在一起,称赞她通过教育工作培养良妻贤母。^② 灵希则与此相反,用莱昂的故事强调了社会行动主义的重要性。她声称这位伟大的教育家不辞辛劳,使其他的美国公民能够寻求幸福,得到启蒙教育。在灵希的重新讲述中,玛丽·莱昂不是因母亲形象而是以“敬爱英雄”的形象得到崇敬,作为一位“人杰”而名垂千古。^③

在当下主义者的笔下,莱昂的公共英雄主义来源于她强烈的主体意识。一位笔名瘦鹃的作者宣称,她之所以受到启发在《妇女时报》上翻译莱昂的生平传记,是因为这位著名的美国人决心抱着“守独身主义”来发展妇女教育。^④ 《世界十女杰》的作者对主体意识做了扩展。他声称,与大多数革命家、外交家、政治家和学者不同,莱昂并不依赖家族关系或社会地位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她具有前所未有的主体意识。^⑤ 尽管这位作

① 蒋智由,《五月花》,第9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13b。

② 根本正,第82页。

③ 灵希,《美国大教育家黎痕女士传》。

④ 瘦鹃,《美国女教育家丽痕女士逸话》。

⑤ 《世界十女杰》,第57页。

者与瘦鹃一样认为莱昂不结婚的决定反映了这种主体意识，但他用政治术语来阐释这一决定。他解释说，莱昂并不反对家庭生活的幸福，但她知道个人激情和浪漫情怀会削弱她对国家的爱，妨碍她更为宏大的教育目标。^① 在当下主义者的描述中，女德制度不再是社会行动主义的代名词，家庭关系已成为女性政治参与的直接障碍。

一种新的社会类别：女学生

全面描述 20 世纪初西方楷模的传记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是很困难的。第六章讨论到一大批妇女在此期间担任了越来越多的公众角色。^② 许多妇女追随玛丽·莱昂，成为新成立的女子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另一些人受到南丁格尔鼓舞，加入了日本笃志看护妇会 (Tokushi kangofu kai) 的中国分支或女子红十字军。^③ 还有的人通过诸如中国妇人会等组织，像弗朗西斯·维拉德一样参加救济工作，或通过女国民捐等团体致力于国民募捐工作。^④

这一时期出现的女性公众角色范围之广，往往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应。甚至进步作家鲁迅也暗示，这些名声越来越响的女性中最知名的——激情的演说家和革命烈士秋瑾——是她自己的公众性的牺牲品。用鲁迅的一句名言说，秋瑾是被热烈掌声送上了烈士的刑台。^⑤

① 《世界十女杰》，第 54—55 页。

② 除了扮演新的角色之外，还有很多女性继续担任演员和妓女等历史悠久的公共角色。参见 Cheng Weikun, *The challenge*; Catherine Yeh, *Creating*; Catherine Yeh, *Shanghai Love*。

③ 有关 1903 年东北争端之际成立的笃志看护妇会，参见《留学纪录》；女子红十字军于 1911 年 10 月 19 日离开日本，在上海参加了张竹君正在筹备的红十字会，参见孙石月，第 119—120 页。1906 年，革命家秋瑾试图通过翻译一本《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学教程》来推动这样的活动。前两期刊载在她的《中国女报》上，在她就义后不久《时报》也重印了。秋瑾，《看护学教程》；《时报》，1907 年 7 月 24, 27, 28。

④ 参见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第 3 期 (1907 年 4 月 5 日，第 107—114 页) 上对中国妇人会的讨论。女国民捐是吴芝瑛 (1867—1935) 为鼓励妇女为国家的事业进行捐款而创立的正式机构。参见燕斌，《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第 98 页。

⑤ 鲁迅，《鲁迅杂文全集》，第 303 页。也请参见 Eileen J. Cheng, 第 1、5、7、8、9、23 页。

像秋瑾那样从事激进政治活动的妇女成为社会批评的目标并不出人意料,但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女学生们成为毁谤的对象就有些不寻常了。在清政府正式批准女子教育前后,女学生们被视为文明价值观在本地的化身和前述西洋女子的中国版本。虽然女学生实际数量很少,但激起了不成比例的焦虑反应,人们担心中国的性别原则会受到侵蚀,会使女性性活动难以控制。^① 这些反应特别是来自永恒主义者,但也来自改良主义者和古典现代主义者。这些反应大量地见于公共媒体,反映出即使是这一时期最不具威胁的公共女性角色也具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

文明的化身

1904年起草的第一份关于女子教育的官方文件是在20世纪初私立女子学校开始兴办、年轻女子在公共场合的出现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做出的警惕性反应。^② 这份文件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它宣称女子不应上学或随便上街,应该在家里接受以服务家庭为目标的教育,她们的课程应体现自先秦三代以来年轻女子所受的基本教诲,训练她们如何扮演良妻贤母的角色。^③

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最终迫使清政府不再顾及1904年的立场,于1907年建立了女子公共教育体系。但是,官方的学校章程仍然试图禁止

① 虽然女学生的数量很少,但她们在20世纪头十年迅速兴起,引起了关注。根据不完全统计,在1901—1905年间,大概在中国有103名注册女生,仅在日本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这一所学校里就有超过210名女生注册;参见廖秀真,第225页;瀬地山角、木原菓子,第281页。随着政府于1907年批准开办女校之后,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女学生数量不断增加。1907年有420所登记在册的女校和14658名注册的女生。到1912年,女生数量翻了十倍,达到141130人。廖秀真,第226—227页;陈东原,第362页;夏晓虹,《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第269页;Bailey, *Unharnessed*, 330—331。从1907年直到清朝灭亡这几年间,每年大约都有100—150名女学生在日本留学。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84页。

② 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1904年只有26所学校和494名学生。廖秀真,第224—226页。

③ 荣庆、张百熙、张之洞,第396页。

年青妇女参加政治组织、出席公开讲座或专搞社会活动，以限制女学生的公共活动。虽然章程承认性别歧视是错误的，女子应当得到适当的对待和教育，但仍坚持认为开展社会变革是男人的责任而不是女人的权利。^①

这群被官方限制其权力扩展的学生经常被称为“文明女学生”、“开明”或“进步女学生”。^② 这些年轻女子所卷入的实践行动也被贴上了文明的标签，包括新式婚姻（文明结婚）、放足和穿时髦服装等。

中国的文明婚姻，学的是西方的“自由婚姻”，这是造成永恒主义者害怕和批判外国社会实践的主要根由。^③ 新式婚姻与传统中国婚姻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新娘新郎是自由选择自己的伴侣。宣告他们正式结合的婚礼仪式也按照外国礼仪，如交换首饰，结婚双方通常会身穿西式服装和鞋子。^④ 这种新型婚姻与新式女子教育密切相关：按照倡导者的说法，两者都对民族强大至关重要。^⑤ 新娘通常是学生，仪式一般也是在女子学校或者女校校长或教师的家里举行的。例如在 1905 年，南京承志女学堂的学生顾小姐和一位叫吴晋的先生在承志女学堂校长曹家麟家的花园里举办了婚礼。^⑥

顾小姐的婚礼服饰很可能包括为天足所设计的皮鞋，这是女学生的标志。那些缠过的小脚的特殊气味隐藏在带香气的缠脚布、袜子以及华丽的绣花鞋下面，而学生们未缠过的天足朴实地暴露着，行走无碍。^⑦ 永

①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第 668 页。

② 比如，可以参看《论上海女学生之装束》。

③ 1902 年左右在中文媒体上开始出现有关文明婚姻的文章，1905—1907 年间达到高峰，此后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是热门话题。比如，从 1911 年初到 1917 年《妇女时报》上都经常讨论这个主题。

④ 有关“文明”的礼仪的例子，参见《顺天时报》于 1905 年 8 月 23 日、9 月 10 日、9 月 13 日连载的文章《文明结婚》。也可参见夏晓虹，《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第 308—309 页。

⑤ 这标志着关于“优生性行为”的话语开始出现，这种观念认为，更自由的结合产生的后代更健康，最终可带来民族强盛。参见 Barlow, *The Question*, 7。

⑥ 《文明结婚》，《顺天时报》（1905 年 9 月 13 日）。

⑦ 有关用缠足来隐藏的内容，参见 Ko, *Cinderella's*. (高彦颐，《缠足》)，119—225。

恒主义批评家们谴责公然展示女子足部的无耻行为破坏了汉族女子独有的端庄。有人抱怨说,妇女过去自己做鞋遮掩小脚,但她们现在在大庭广众之下购买鞋子,还厚颜无耻地露出自己的未缠过的脚。^①

当天足运动的批评者们为女性隐秘世界的消失而哀悼时,缠足的反对者们则赞扬放足运动为妇女争得了进入公众教育世界的入场券。自从帝国中期开始以来,缠足就将《礼记》首倡的男女有别、互相隔离的教育强化并形式化了。对男孩来说,进入学校标志着一生中学习和服务公众的开端,对于女孩,缠足则意味着退入深闺和有限的家庭教育。19世纪晚期的改革家,包括宋恕(1862—1910)和郑观应(1842—1922)强调了缠足和限制女性教育的联系。^②从1883年康有为建立第一个中国发起的“不裹足会”起,天足运动就和妇女的公共教育密切联系起来。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一个建于1897年的不裹足会中十分活跃,在其颇有影响的文章《论妇女教育》中,梁启超将天足与女学、民族强盛联系在一起。^③

在中国和日本最早为中国女性设立的一批学校追随梁启超和康有为,将天足或放缠足当作注册入学的前提条件。这些学校包括1898年由梁启超和人一起创办于上海的中国女学堂,还有东京由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学校也于1901年起接收中国学生。^④吴若安(活跃于1902年)是成立于1902年的上海务本女塾的女学生,她说该校反缠足的政策吸引了许多学生。^⑤满清政府从1636年到1902年都在企图都禁止缠足,1907年学部关于政府学校的规章中也明令禁止缠足。^⑥

① 《上海妇女之新妆束》。

② 夏晓虹,《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第261—262页。

③ 梁启超,《论女学》,第875页。

④ 爱国女学校也有类似的规定。夏晓虹,《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第268页。

⑤ 吴若安,第603页。

⑥ 《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第658页。1902年慈禧太后曾颁布过废除缠足的圣旨。Pao Tao Chia-lin,第170页。早前满人也曾尝试废除缠足,参见Ko, *Cinderella's*, 266n49。

晚清教科书通过宣传小脚与新女性教育不相容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发展趋势。一则最早的小学教科书的广告声称，由于其目的之一是将女童纳入正规教育，所有插图中描绘的年轻女子都是天足女子。^① 那些为女子编写的教科书几乎所有都充斥着批评缠足的内容。^② 《女子国文读本》甚至包括了一篇补充材料，介绍在一个月內放开缠足的详细方法。^③

年龄大一点的女学生也是新式女作家，她们不仅放开了自己的小脚，而且公开谴责这种做法。一位留日学生陈彦安（约生于 1883 年）感叹说，规则就是这样，“（男孩）虽贫贱之子，亦恐不识一字为终身之累，故犹思勉强就学数年”，而社会各阶层的年轻女孩则都被“洞其耳，裹其足，饰涂其面目，一若天地间一种玩弄之物。”^④ 另一位留学生王莲声称，缠足穿耳都是自残行为，使女性与世隔绝和愚昧无知。像“折磨罪犯一样”，这些做法造成妇女虚弱不堪，使得她们没有精力和愿望去学习。^⑤

像王莲和陈彦安这样的学生双脚从小被裹缠，摆在她们面前的令人生畏的放足过程要逆转的正是高彦颐所说的“不可逆转的身体过程”。^⑥ 作为一个快 30 岁的东京女留学生，王莲向公众介绍了她放足经历以及伴随而来的赋权感受。她就读的日本学校的医生每天三次用石炭酸和热水为她清洗疼痛难忍的肿胀双脚，然后用棉花包裹起来。经过若干天的治疗后，她的脚趾逐渐放松，又能听使唤了。她现在穿着西式的袜子和皮鞋，每天上学和放学能够走“12 或 13 里（约 4 英里），完全没有困难。”^⑦

汉族永恒主义者反对天足的原因正是陈彦安和王莲她们推崇天足

① 《新书介绍》。

② 例如，可参见谢允燮，51a；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9；5b—6b；方浏生，19b。

③ 方浏生，《附录》，4a—b。

④ 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155[0585]。有关这个题目可参见 Ko, *Teachers*, 149; *Laison*, 77。

⑤ 王莲，《同乡会纪事：湖北之部》，第 114 页。

⑥ Ko, *Cinderella's*, 11。但 Ko(*Cinderella's*, 47—48)也举了较年长的女性试图放足的例子。

⑦ 王莲，《同乡会纪事：湖北之部》，第 114 页。

的理由：天足使妇女承担公共角色成为可能。^① 1907年，有人认为正是出于对不缠足和女子教育强大组合效应的激烈反对，造成了江苏省海州府青年女子胡仿兰（卒于1907年）被迫自杀的事件。胡仿兰自己放了脚，还鼓动和她亲近的女眷也这样做，这一无视传统的举动遭到了婆家的谴责。他们指控她的行动是家里的不祥之兆，会惹人笑骂并辱没祖宗。^② 然而当江苏教育总会就胡的死亡展开调查时发现，她最大的反传统“罪行”并不是放脚本身——她在公婆强迫她自杀前两年就已经放了足——而是她放足后生发的受教育的愿望。^③ 只是当仿兰的放足行为与她进“洋学堂”（当地的两江女子师范学校）的打算联系起来的时候，她婆家才开始全力虐待她。^④

悲剧主角胡仿兰试图加入新式女学生的行列，她们标志性的体貌特征并不只是不缠足，还包括那些经常引起争议的装束。服装作为社会地位的最公开的标志，必须依据自古以来对“妇容”的规范，遵循严格的裁剪规则。^⑤ 妇女的装束要得体，以使正统与狭邪有别，妻子不能像交际花，学生不能像娼妓。

从20世纪初第一批女子私立学校兴办以来，校长、政府官员和社会批评家们就试图制定庄重、朴素的着装规定，以避免女学生们在公开场合太过引人注目。例如务本女校的校规规定，帽子、鞋、衣服和裤子要朴素雅致。就单衣的用料来说，本色棉布是首选，白色或淡蓝色棉布也可

① 反对缠足的批评家包括辜鸿铭，参见 Ko, *Cinderella's*, 30-37。

② 这个事件在《申报》、《通报》和在东京发行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等中日报纸上都有所讨论。比如，可参见《沈仲礼观察上端午帅禀》；《江苏教育总会致江督端午帅督》；《天足会沈仲礼观察致宋敦甫观察书》；Hui Xin。

③ 《女士放足被逼毙命骇闻》。

④ 《淮徐海留沪学界公推调查员李壘报告书》。

⑤ 有关服装作为社会差异的标志和组成部分的讨论和相关缝纫规定，参见 Ko, *Cinderella's*, 182-186。引用在第183页。“容”是妇女的“四德”之一，其它还包括“德”、“言”和“功”。这在《周礼》里首次得到陈述，班昭在《女诫》的第四章《妇行》里对此做了详细的阐述。参见 Swann, 86; Mann, *Learned*, 30。

以接受。香粉、胭脂与珠宝之类——使用过分就成了妓女标志——通通严格禁止。^①

学部 1907 年对学校的规定也包含了类似的禁令。学生和教师必须穿庄重的不带装饰的棉长衫。白色丝绸、化妆和西式服装都在禁止之列。^② 两年后学部重申，学生应穿中式服装，不能做日式或西式打扮。它建议每所学校为教师、管理人员以及高年级学生提供制服（年纪较小、可能对社会为威胁较少的低年级学生可以继续穿自己的衣服），包括指定长度和颜色的长衣以及适当的鞋子和发型。^③

这几个规章以及随后的相关规定在清末民初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908 年《大公报》上一篇由编辑英敛之（1867—1926）撰写的文章批评了天津教师“怪异”和“性感”的打扮。^④ 五年之后，《妇女时报》的一位记者对引领全国时尚的上海女学生进行了批评。作者抱怨道，这些“文明”的女学生们都穿着妓女一样的“奇丽”服装。除非最久经世故的人，谁能把两者区别开来呢？^⑤

性规范和学生的身体

这些衣着引人注目的年轻女子形象突出了新式女学生最具威胁性的一面：她们在社会、性别和性上面都意义不明。学生们破坏了私领域女性和公领域女性的标准关系：前者通常被认定为声誉良好，而后者多被认定为声名狼藉。对女学生性别特点的忧虑延伸为对她们的衣着、天足和社会行动的讨论。在这些忧虑中，最直接的是指控女学生像妓女、

① 《务本女学校第二次改良规则》，第 593 页。呼吁规范女学生服装的文章包括《请定女学生制服》；《女学生应有准制服》；《女学士》。

②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第 674 页。

③ 《学部奏遵拟女学服色章程摺》。

④ 《师表有亏》，《大公报》2233，1908 年 1 月 10 日，转引自 Fong, *Alternative*, 34-35。也可参见秋柳。

⑤ 《论上海女学生之装束》。

假男人或者同性恋者。

由于允许妙龄女子在公共场所出现，新式教育侵蚀了长期存在的性别隔离规定，同时使得女德制度长期以来致力于区隔的两个社会世界——不正当的性愉悦世界和体面的女性世界——混淆起来。本章开头引用的诗文作者在其文章中表现了这种混淆，他描述“有种似妓非妓之荡妇”穿得像女学生，但实际上是妓女。作者引用了一个晚清至民国时期常被用来反对新式妇女教育的论点：新式妇女教育打开了一个社会空间，使妓女可以假扮学生恬不知耻地开展交易（见图 23）。^① 这个新空间使得街头妓女方便行事，却造成警察办公更加复杂。那些负责社会治安的人经常将女学生误认为妓女，或将妓女误认为女学生。例如在民初时期的安徽，一所师范学校位于妓院附近，就读的学生就曾被当成妓女逮捕。^②

被指控的学生们经常并非完全无辜，她们自己也促成了这种混乱。1910 年《妇女时报》刊载了一篇申诉文章，上海惠兴女学堂的年轻女子曾邀请妓女们在为学校筹款的公开演出中担任主角。最令人吃惊的是，在表演临近结束时，大约 20 个学生加入了妓女的队伍登台演唱。^③ 同时，普及教育的努力不仅使得妓女可以装扮成学生，而且可能变成学生。在 1906 年 6 月，上海的一所女子学校校长抱怨说，有妓女报名参加半天班。他担心她们的加入将破坏这些班级旨在改善社会风俗的目标。这种半天班将会提高妓女的地位，降低女学生的地位，只会削弱而不是加强道德风尚，破坏而不是推进妇女教育。^④

① 《冒充女学生之荒诞》。整个 1930 年代都可以在期刊杂志和政府文件中看到类似的评论。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曾提醒我注意 1933 年的一份文献，其中花县县长呼吁广东东区会议“规定妓女不能再以学生制服装束揽客”：《广东南区第二次绥靖会议各审查组审查点报告》，无日期（约 1933 年年中）。档案文件。广东中山省立图书馆文献馆，Ko. 47. 5/3938, 30。

② 《皖省公娼妨碍女学之交涉》，《申报》（1913 年 1 月 25 日），转引自 Bailey, *Unharassed*, 351。

③ 《女学界之怪现状》。

④ 《上海女学校长致江苏总学会函》。



图 23 一群冒充女大学生的妓女

资料来源：《冒充女学生之荒诞》

学生和妓女的社会世界之间日益混淆有目共睹，并且日益发展为将女子学校和淫邪场所混为一谈。所谓学校为不良活动场所的指责往往是思想意识作祟。在 20 世纪初第一批私人女子学校开办时，永恒主义者立即谴责它们是为赌场或妓院（书场）作掩护（见图 24）。1903 年，两名来自江苏常州的县官呼吁禁止妇女教育，其弊端是当地女童学校实际上是“伤风败俗”的赌窝。^① 1907 年，在政府所谓控制了女子教育发展之后，这类抱怨有增无减。例如 1909 年《图画日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官方在松江的一所寺庙设立的高级学校成了男女非法共处的场所。^②

① 《示禁女学》。大量有关女校的荒谬批评都使用了“伤风败俗”这一词语。比如，可参见《湖南女学废闭之原因》，该文报道了一个被当地学校女学生拒绝的男子如何使得学校被迫关闭。

② 《书场与学堂之关系》。



图 24 是学堂还是书场?

资料来源:《书场与学堂之关系》

批评者指责妇女教育不仅使得良家妇女和品行不端的妇女难以区分,还造成了性别和性的混乱。许多女学生男性化的装束也引起了非难。1906年,一位翰林在改革学生服装的杂文中说,所有女学生的衣着都是不适合女性的短上衣和窄短裤。^①其他批评者也批评妇女追随妓女中常见的女扮男装,剪短发,穿运动裤或长袍。^②《北京女报》一篇文章的作者感叹说:“今天的妇女一切都模仿男人”,不单单在她们的裤子上,还有“帽子、鞋、发型、眼镜和抽烟。”^③还有人将这种异性装束的流行归咎于

①《请定女学生制服》。

② 比如,可参见《看我们女子被人家耻笑》,《大公报》(1912年6月12日),转引自 Bailey, *Unharassed*, 352。

③《北京日报》(1910年8月11日),转引自 Cheng Weikun, *Going*, 128。

“大同思想”的进步理论，其中包括性别的大同，并鼓动受过教育的女子装扮成男人。^①（见图 25）



图 25 大同世界之男女

资料来源：《大同世界之男女》

女子教育的反对者还相信新式学校会诱发女子之间不正当的亲密关系。当正规女子教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的时候，女同性恋也首次被当作了社会问题。从 20 世纪初直到整个民国时期，女同性恋与女学生的形象、女子学校的环境氛围一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② 女子学校被当作师生之间各种“不正常”性爱行为的伪装场所，对由来已久的性别秩序和现存的经济与生育秩序都是一种威胁。

民国建立后不久，第一篇谈及女同性恋的文章出现在《妇女时报》

^① 《大同世界之男女》。

^②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 Tze-lan Sang。

上，一位叫善哉的作者称女同性恋令人厌恶，这篇文章开启了后来几年对教育和同性恋之关系的更多更广泛的讨论。善哉将同性恋作为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产物加以抨击。他解释说，有些妇女不能从身体上吸引男人，一些女人没有机会见到男人，还有一些女人对妇女会产生情欲。他认为女同性恋的历史可上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后来又出现在欧洲各地和“蛮荒之地”。^①

但善哉对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女学生群体的关注最为迫切。虽然我自己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没有发现其他相关资料，即使有也很少讨论这一主题，然而善哉说女同性恋在东京已成为迫切的问题。他提供了许多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方案，包括取消女生宿舍、将亲密的朋友安置在不同房间、教育年轻女子有正确的追求目标等。然而，最后他主张，要解决这种不正当的女性行为还要用古老的方案：道德教化。^② 这种新近被察觉的威胁来自这样的女性：她们拒绝被纳入和依赖古老的性秩序，也不信奉新的国家秩序需要“共和母亲”。在这种威胁面前，重拾熟悉的女德制度原则又成了一种选择。

与反对中国和海外的女子教育的善哉以及其他永恒主义者不同，改良主义者拥护新式学校教育，而不是去描绘道德败坏、社会崩溃、受西方价值观污染的骇人剧情。然而他们与永恒主义者都认为新式教育的任务是巩固而不是挑战古代典范的权威：要以与古老信条相协调的思想来塑造年轻女子，并不需要另一套替代性的价值系统。^③

第一批私立女子学校许多都是由古典现代派创立的，他们也赞成将西方女杰作为中国女性的典范。他们把对女学生的过激批评斥为反文明宣传。但是他们也不免担心新式女学生们太快地抛弃了社会道德和家庭责任。虽然他们并没有试图将受教育的年轻妇女限制在儒家礼法

① 善哉，《妇女同性之爱情》。

② 同上书。

③ 这种对于女子教育的理解可在魏息园书中有关“教子”的章节中清晰地见到。

的空间内，但他们建立了新的规范标准——“良妻贤母”和“国民之母”——在本书第二部分将予以详细研究。^① 这些新的标准大大拓展了女德制度的范围。它不再专指家庭领域，而是扩大到了南丁格尔、弗朗西斯·维拉德、斯托夫人和玛丽·莱昂活跃其间的，包括社会、国家和世界的领域。但是，这种女性继续活动的新领域还是要立足于中国性别观念的基本原则。女人人生的目标是养育和服务于她的生物意义、社会意义或国家意义上的家庭。

对照：作为社会资本的贞节

在结束第一部分时，让我们回到一个女学生的故事，这个来自福建的年轻女子在第一部分开始时的引文中曾经被提到过。在这个背叛和自杀的故事中，她坚持认为自己进入公众领域的尝试是无辜的。这个故事突显出，20世纪初年轻妇女必须面临思想、体制和社会不稳定的局面。她们接触了教科书和新闻中的公众典范，但她们自己采取公开行动的些许尝试都可能会遭致谴责。她们就读的新式学校被誉为文明的机构，但又被谴责为淫乱的巢穴。她们痛苦的放足的行为既被称作国家强大的源泉，又被贬为任性的现代性的征兆。同时，这些年轻的妇女可能得到的数量空前、风格新颖的阅读材料，展现了所谓女性规范是多么变动不居、众说纷纭。如《绣像古今贤女传》和《新中外列女传》等改良主义的材料质疑殉节的贞节烈女的人生价值，而某本新式教科书又在称赞自杀和自残是女性奉献行动的核心。古典现代派赞美永恒主义者所蔑视的西方女杰，但又继续用有关母性和服务的老一套说法。

虽然福建那位有抱负的学生、胡仿兰，以及其他无数的晚清妇女成了这种不稳定的牺牲品，但一位叫杜成淑的女子（活跃于1907年）却

^① 比如，可参见教科书作者庄俞和蒋维乔在《致南洋劝业会研究会书》中的抱怨。庄俞和蒋维乔明确提到女性需要培养良妻贤母的气质。

成功地应付了这种局面。她的故事与第一部分开头的引文形成了对照，使我们对于新式妇女教育和女德制度的关系的认识更加复杂化，也挑战了私下谨慎(private modesty)和公共利益(public expediency)等观念。

像那位福建的年轻女子一样，杜成淑也是一个学生。她就读于父亲和叔叔在北京创建的四川女学堂。学校的改良派制定的任务是“播洒女性知识权力的种子”，同时强调道德自我修养至高无上。杜成淑了解新的国际趋势，但并不亲西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追随孔夫子而非卢梭。^①然而她是一个有些西式的社会活动家。她是中国妇人会的书记，这是一个受弗朗西斯·维拉德启发而成立的类似红十字会的组织。^②尽管她的公共角色是妇人会成员和学生，但她却兼有永恒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对于性别规范的意识。她循礼守义，嘲笑那些新的“自由之说”。^③

1906年12月杜成淑收到了译学馆的一位雇员屈疆的信。^④在她看来，这种不当的浪漫求爱令人震惊和愤怒。但她并没有默默承受这种冒犯，或者像过去的贞节女子碰到讨厌的求爱后去自杀，而是选择将屈疆的“冒犯”所带来的羞辱从她个人身上转移到公众身上。她将自己给屈疆的回信寄给“所有的报纸”，包括《大公报》和《顺天时报》，还寄给了学部和译学馆监督。她在信中写道：“君以私来淑以公布”。这一大胆的举动倒转了上述福建女生故事中被羞辱的性别。^⑤

①《四川女学堂学生中国妇人会书记杜成淑答译学馆学生屈疆密书》。

②有关中国妇人会的内容，参见《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1907年4月5日)，第107—114页；燕斌，《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第98页。

③《四川女学堂学生中国妇人会书记杜成淑答译学馆学生屈疆密书》。

④屈疆字伯刚，来自浙江省平湖县。

⑤《四川女学堂学生中国妇人会书记杜成淑答译学馆学生屈疆密书》。杜成淑也在《女子世界》上刊发了给屈疆的另一封回信；参见杜成淑。此后，尽管在友人眼中屈疆是正人君子而非杜成淑所描述的登徒子，他还是不得不中断了在译学馆的学业。关于这个事件的描述请参考《学生轻薄被革》。

这一事件揭示了 20 世纪初在何种程度上女德制度的原则可以成为女性社会资本的源泉。杜成淑对屈疆的谴责表明她对道德机宜的策略考虑不亚于对永恒的道德价值的崇敬。她懂得要发展新的 20 世纪初的机构，女德的运用必须讲究策略。诸如女子学校和妇女团体等进步机构，只有他们的学生、教师和成员们继续坚持永恒主义者所称的不可侵犯的原则，才能够得到蓬勃发展。因此，在此期间女德制度不但要发挥行为规范的约束作用，它还要像过去一样成为女性道德权威的强大源泉。

但是，20 世纪初贞节不再是女性资本的惟一来源。其权威性日益受到挑战，挑战的对手包括长期存在的“女才”，还有刚红起来的女性英雄主义。



第二部分

历史、国家和女才

1905年，一位名叫张仲山的生员从日本留学归来，返回直隶省闻人村。他吃惊地发现中国内地妇女教育非常不发达，决定创立一个乡村学校。学校的基本宗旨是要启迪妇德、培养国民之母。这就需要摒除旧习、模仿日本和西方，还需要在学校课程表中排除诗词歌赋等旧内容。

——《倡立女学》，1905

张仲山在闻人村校进行的古典现代主义式设计，是以广义的女德制度和新的女才观念为基础的。虽然他强调女子道德的发展，他还是认为日本和西方的方式优于“旧俗”。为了推广新技术，连一度被视为别具女性特色的研习中国诗词格律也在被摒弃之列。

张仲山的方案中引用了两种女性形象。首先是第二部分第一章的主题——才女，她们是张的课程计划中要排除的诗词格律的主要研习者。其次是第二章的主题，即他决意要

加以教育的具有国家思想和世界意识的国民之母。这个在张仲山对闻人学校方案的讨论,以及古典现代派其他的讨论中与才女对立的形象,其爱国的形象也与“慈母”相对立。慈母和才女两者都标志着近代历史的衰弱,这是古典现代派决意克服的。相比之下,国民之母才是他们的新政治观的核心。

在第二部分的两个章节中,改良主义都是古典现代主义历史性和探索性的对照。这两个派别对女才的特点和女子教育目的的理解大异其趣。他们的分歧源于思想意识上的深刻裂痕和在构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间关系时的巨大差异。所以,这两个群体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些洞见,让我们得以去理解下面这个在整个 20 世纪不断烦扰官员和文化批评家们的问题:中国的认同到底应该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对自身的历史,应该是赞美、压制还是进行选择性的再诠释?



第三章 才女：被赞扬和被否定的

所谓的才女，只是粗通文理，但她们沉溺于吟风弄月……为自己的造诣沾沾自喜，不知羞耻。这便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的源头。

——吴涛，《女子师范修身学》，1907

吴涛的教科书对才女的批判表明了中国文化中对良好品德的重视远胜于虚浮的才华。它也反映了早期性别化的德才二分和对自由展示女性才能的强烈偏见。^① 自古以来，标准的男性特质基于道德和才能的相互强化和统一，而两者都指向公共服务。相比之下，女子特质的规范则建立于女才和女德之间不安的张力之上，女才由于缺乏被认可的公共功能而天然地遭到怀疑，女德则被规范在私的领域并因此受到普遍尊重。明朝末年活跃的商业出版文化带来了两种趋势，威胁着德/才的微妙平衡：这就是妇女识字率的提高和作为才女典型的高级妓女的出现。^②

① 最早的女教书中很明显是德高于才。有关刘向在《列女传》中的编选原则参见 Zhou Yiqun, 第39—42页，其中即使贤明女子的故事也是 Lisa Raphals (*Sharing*, 第23页) 所谓的“充满智慧的美德故事”。

② 有关这个时期的女子文学，可参见 Ko, *Teachers*。有关把名妓当作才女典型的讨论参见 Kang-i Sun Chang, *A Guide*, 146。

吴涛和其他 20 世纪早期的作者用来贬低女作家的说法“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正是在这一时期流传开来的。^①

德/才二分的意义从 16 世纪末直到 20 世纪初不断变化着。尽管反对妇女学习的人们最初断言女才与女德是不相容的,但到 18 世纪,关键问题已经不再是妇女是否应发展自己的才能,而是发展才能的目的是什么。盛清时期的复古主义者章学诚(1738—1801)宣称,真正的女才只由对礼仪的理解生发而来。他看不起对手袁枚(1716—1798 年)的女弟子,认为她们写的诗内容琐细而且败坏礼仪(“诗而败礼”)。^② 完颜恂珠(1771—1833)是一位女士绅作家,她也编选了文集,同样也只把女才当作道德的反映来加以评价。^③

帝国晚期关于才与德的这些不同观点在 20 世纪初有关新式女子教育的辩论中占有突出地位。永恒主义者重申了复古派的信念——有关“礼”的知识是女才的基础。例如在 1907 年女子学校规定课程时,他们推荐的课程材料中将章学诚的文章《妇学》置于重要位置。^④ 与此同时,改良派也学着他们盛清时期的前辈一样称赞才女是道德楷模。不过,他们同时也强调与国家有关的女性文字能力的培养和女性主体性的表达。古典现代派的国家主义论调关注的是女子教育的推广,他们对才女形象进行了最为公开的谴责——她们也是吴涛挖苦的对象。他们将所谓过时的女性诗才和新的爱国主义品质并置起来,从根本上重构和大大强化了德/才的分立。至于当下主义者则很少花费的笔墨去讨论才女在道德上的优点或缺点。

① 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冯梦龙(1574—1646)的作品,但他也只是表达了当时已盛行的一种观念。王光宜,第 148 页。也可参陈东原,第 188—202 页;Ko, *Pursuing*, 9, *Teachers*; Ho.

② 章学诚,《妇学》,10b; Zhang Xuecheng, *Fuxue*, trans. 有关章学诚和袁枚之间的争执,请参见 Mann, *Precious*, 83 - 94; 关于《妇学》的内容,可参见 Mann, *Fuxue*, 以及 Mann, *Learned*.

③ 完颜恂珠及其选集《国朝闺秀正始集》的相关内容,参见 Mann, *Precious*, 94 - 117; Widmer, *The Rhetoric*, 95 - 99; Kang-i Sun Chang; *A guide*, 145.

④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第 669 页。

古典现代派和改良主义者不仅确认和否定了抽象的才女形象，也引用历史上具体的才女传记。古典现代派既引用西方现代女作家，也援引古代中国文学上的典型人物，拓展了文化视野。相反，改良派只赞美中华帝国早期和晚期的楷模，却给古典现代派诽谤的近代才女们唱赞歌。这两个群体关于历史和近代、地方与世界的女性成就的意义重构突显出了晚清时期有关女才以及如何如何在政治和道义上运用知识的观点。

才女的形象

在 20 世纪初吴涛编写他的教科书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才女早已备受争议。虽然她们经常被批评，但在各种的历史关头，由于关于才、德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不断转变，对才女们还是有不同的理解。在“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俗语流行的一千五百多年前，班昭就已经宣称妇女的美德决不能被“才明绝异”所玷污。^① 然而，在仅几百年后的六朝（220—589 年）的思潮中，因为一些才能超拔而品德有瑕的才女公然受到赞美，女德失去了它的主导地位。^② 20 世纪初，由于激烈的中西学价值之争和女性的教育需要，对女才的不同观念涌现出来，并与越来越不稳定的女德观念交织在一起。

女才和女德

对永恒主义者来说，女德制度的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按清朝鼎盛时期复古主义者的说法，女才必须符合礼教。戴礼在她的《女小学》中沿袭章学诚的做法，试图将女子教育从无关紧要的诗词引导到

^① Swann, 第 86 页。

^②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咏絮才女”谢道韞（活跃于 350 年），她的故事在本章节后面部分有更多讨论。

礼义宏旨上来。^①和章学诚对袁枚女弟子的谴责一样,戴礼也谴责女性抒情诗的作者写的只不过是淫靡浮华。而她的课文将引用和解说一系列经史材料中有关礼法的内容,给女学生们以适当的教导。^②

女德制度的原则也引导着改良派对女才的看法。在《绣像古今贤女传》中,魏息园只对那些德才兼备的才女们予以赞美。同时,改良派试图让这种有道德基础的女才对当前的民族危机更敏感。《女学篇》的作者曾懿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才女,在诗歌、绘画和书法上都颇有天赋,但正如高级官员张伯熙在曾懿的教科书的序言中所说,当曾懿认识到她的“休闲”文学和艺术追求无助于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危机之后,她放弃了这些爱好。^③虽然曾懿效仿戴礼和章学诚,也批评那些才女写作的诗词没有意义,但她对这种浅薄的行为开出的药方不是回归礼法学习,而是以新的更实际的女子教育形式取而代之。通过在《女学篇》中融入中医药知识,可以更好地培训女子如何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和保持家庭卫生,最终有助于国家强盛。^④

于是,类似曾懿这样的女改良派与古典现代派一样,都将女子教育与国家强盛联系起来。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反对古典现代派全盘否定女子学问的旧传统。虽然《女学篇》中对女性教育所持的温和立场可能令更为激进的改革派们反感,曾懿却处之泰然。^⑤学者诗人薛绍徽对古典现代派的挑战更为直接。她驳斥梁启超对女子教育的意见华而不实,并系统地批评了他对才女的评论文章。薛绍徽坚持认为,假使妇女能继续研习那些长期以来滋养了她们的道德力量和主体精神的文学样式,国家

① 戴礼,《自序》,1b。

② 同上书,1a。

③ 张百熙,2b。

④ 曾懿。

⑤ 同上书,《自序》,5b。

只会更加强大。^①

女才和民族道德

在薛绍徽所驳斥的评论文章中，才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缺陷和中华民族的弱点。^② 古典现代派谴责她们沉溺于感怀伤情的诗词和陈旧的学术传统，而对国家危亡和国际政治一无所知。在其批评中，他们将自己与所谓陈腐过去的一切残余划清了界限。尽管如此，他们继续遵循其历史前辈二元逻辑：才能服从于更高的道德原则。他们用新的民族主义词汇来重新表现古老的二分法，“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名言也替换成了一句心照不宣的新格言——只有服务大众的女子才是爱国的。这样他们便将妇女的忠诚和服务的背景从礼教转向了民族主义，从丈夫和家庭转向了（通过丈夫和家庭服务于）政治组织。他们不再将女子写作的私领域浪漫化为虚荣的男性政治世界之外的天堂，而认为应该鼓励妇女文化为新政治服务。

这种由政治需要所驱动的人才女批评必须与过去彻底决裂，以推动当前社会的激烈变革。古典现代派们将所有的女子诗作都归为“闺房诗”，谴责所有的近代女作家在政治上无知轻率，批评她们代表的文化陈腐平庸，且有脱离政治的危险倾向。这种还原论的观点阻断了重新利用中国女性文学遗产中各种要素的潜在可能。包括忠贞的女作家形象和千百年来女诗人们针砭时弊的传统本来都可以在 20 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进程中得到复兴。^③

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蔡琰（文姬，活跃于 170 年），这是一位东汉时期的争议人物。第一任丈夫死后，蔡嫁给了一个匈奴王子并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被曹操赎回后又再度结婚。她的“悲愤诗”不仅写到自己的

① 引自 Qian Nanxiu, *Revitalizing*, 425 - 426.

② 我在“Talent”与“Revitalizing”两篇文章中曾经讨论过这种对才女的批评。

③ Mann, *Women's*; Mann, *womanly*; Kang-i Sun Chang, *Women's*.

悲惨命运,而且描写了汉朝末年广泛的政治创伤。^①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包括动荡的南宋时期的李清照(1084—1151)等女性延续着政治诗的传统。^②

古典现代派们认为才女们政治空虚最突出的时期就是 17 世纪直到此前的 19 世纪末,但那正是这种抒情证言诗的鼎盛时期。包括毕著(字韬文,活跃于 1643 年)和王端淑(1621—1701 年后)等晚明诗人,用悲惨的笔触描写了满族入侵时的破坏和社会混乱。晚清女作家如黄淑华(约 1850—1867)、张缙英(1792—1841 年后)、左锡璇(活跃于 1850 年)、李长霞(活跃于 1860 年)和王采苹(卒于 1893 年)掀起了证言诗的第二次浪潮,反映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期间的社会动荡和个人伤痛。^③ 一些才女在 20 世纪初期教材中很有名——如魏息园《绣像古今贤女传》中的黄淑华、许定一《祖国女界文豪谱》中的张缙英。这意味着古典现代派是有意地忽视这些诗歌遗产,而不是真的对此一无所知。

忽视近代才女以进行文化批判的做法并不只有古典现代派一家,也并非仅见于中国历史。^④ 盛清时期的复古主义者为了推进新的女性雅文化,有意忽略了明代妇女作品取得的造诣,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已经沾染了妓女的趣味。^⑤ 民国时期,五四运动中的辩论家们也在抹杀清朝女作家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原女权主义的立场。^⑥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和 20 世纪初一样,对于近期历史要先打倒,再抛弃,以推动当前的变革。

古典现代派认为,目前的政治变革也需要大力变革女子教育模式。他们试图搞明白中国在国际竞争舞台上为何地位会衰退,一个相对简单的意见说服了他们:西方社会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西方妇女受过教育。他

① Kang-i Sun Chang, *Women's*, 1.

② 有关李清照的内容,参见 Ideman 和 Grant, 第 204—243 页。

③ Mann, *Women's*; Mann, *womanly*; Kang-i Sun Chang, *Women's*.

④ 当代穆斯林女性传记写作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参见 Booth, *May*.

⑤ Mann, *Precious*, 78.

⑥ Widmer, *The Rhetoric*.

们深信中国妇女与她们的西方姐妹们一样聪明，值得教育，因此谴责儒家礼教限制妇女学习的机会，只让她们在与世隔绝的深闺里虚度时光。^①但是，由于不能或者不愿立即废除礼教社会进行再生产的思想和结构力量，他们将斥责的重点集中到过去比例很小的享有受教育特权的女子身上。古典现代派声称这些女子虚耗才情，沉溺于诗词歌赋和无聊的卖弄，他们认为这些“才女”是中国文化没有希望的象征。

晚清对才女的批判分三个阶段展开。首先是由维新派在 19 世纪末发起批判，20 世纪初日本女留学生和吴涛等教材作者进一步加强了批判，这些作者也是归国留学生，后来往往也投身于国民教育。而这一批判浪潮最后的代表人物则是激进民族主义者，他们雄心勃勃，批判起来越来越直截了当。

梁启超在 1896 年的文章《论女学》中确立了批判论调。《论女学》等一系列文章确立了梁启超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②文中梁启超为妇女教育提出了四点辩护理由，其中第二点驳斥了长期存在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女才本身，而是传统的女才施用之处有问题。他写道，“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披风抹月，沾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③两年后，严复对女才也表示不以为然。他声称，“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其十之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④

康同薇是梁启超的导师、著名维新人物康有为的女儿，也是首批公开批判才女的女性之一。她题为《女学利弊说》的文章于 1898 年 5 月和

① 例如，可参见严复《论沪上创新女学堂》；经元善，《劝女子读书说》。

② 关于 1896—1897 年间《时务报》上的系列文章，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Tang，第 3 页。关于梁启超在文章中对才女的轻蔑，可参见 Hu Ying, *Tales*, 6-8。

③ 梁启超，《论女学》，第 870 页。

④ 严复，《论沪上创新女学堂》，第 880 页。这可能指的是 19 世纪的梁端和王照圆等女子曾为《列女传》做注。梁启超曾经在《记江西康女士》（第 119 页）中直接抨击梁端和王照圆。第六章对这两位女子有所讨论。

9月先后在《知新报》和薛绍徽的《女学报》上发表，以民族主义的语言展开论述。^①她抱怨说，清政府太过忽视女子教育，使中国成了外国嘲笑的对象。然而，康同薇也和其他维新派批评家们一样，将我国女子教育不发达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认识最终归结为才女们自身的品德缺陷。她声称这些妇女行为失当，因为她们将智识上的成就和“才华”凌驾于德行之上。她们对自己才能的炫耀在男性心中投下恐惧的阴影，令其担心哪怕是粗识文字的妇女都会像“牝鸡司晨”，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变成不近人情的怪物。男人为了减轻这种恐惧，便限制其妻女们学习的权利，并把安排酒食视为女性惟一的正事。^②

批评过才女无德之后，康同薇接着谴责才女们写作的题材。她写道，最高雅的才女们，“沉溺于诗词歌赋”。当她们为春花秋月而伤情悲叹的声音充满了闺房，诗歌只会带来困惑。不那么有才的女子不沉溺于诗词而是钟情于小说和“弹词”。男人们担心纵情于这些诗文会使她们偏离正道，便禁止自己的妻女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康同薇认为，这种过度的限制相当于剜目治盲或削足治跛。不过，她仍然同男子一样轻视妇女文学实践。^③

康同薇的文章呼应了此前章学诚在《妇学篇》中的道德高调以及梁启超《论女学》中的民族热情，激起了深刻的反响，尤其见于东京的中国女留学生的作品中。20世纪初期，随着海外女学生群体日益激进的步伐，她们贬低女性文学遗产的语言也突然政治化了，甚至大大超越了其维新派前辈。她们拒绝认同和接受旧日知名女作家的文化资本，而是嘲笑这些文学前辈自私地背叛了集体利益，从而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主体立场。

何香凝(1878—1972)是首批在日本学习并加入中国最早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女子之一，她认为现有女性作品的形式令人厌恶，对强盛

① 康同薇。有关《女学报》发表此文的情况，参见 Nanxiu Qian, *Revitalizing*, 417。

② 康同薇，第 878 页。有关牝鸡的说法首见于《尚书》。

③ 同上。

国家事业毫无意义。她轻蔑地写道，过去的知识女性只知沉迷于情感之中，没有做任何利国之事。她的鄙视态度不仅与以前维新派作品相呼应，还直接继承了这些著作：在她大约 600 字的文章中，有 32 字是直接来自康同薇对上流妇女沉缅于诗词的描述中引述而来。然而，何香凝最终的论点比康同薇更激进，她不仅批评才女们多愁善感、言之无物，而且直接攻击她们缺乏爱国精神。^①

一批海外女留学生 1903 年春在东京成立了民族主义妇女组织“共爱会”，她们表达了与何香凝一致的观点。她们在海外学生期刊《江苏》上发表了一篇集体署名的文章，称妇女写的诗只有文盲的水平。她们还说，过去的中国妇女要么目不识丁、“灵光如豆”，即或有识字的，最高等也只是“春花秋月，吟诗作赋以自遣而已”。^②

这些海外女批评家们认为喜欢散文的女子与醉心诗歌的女子一样没有责任感。王莲的放脚过程我们曾在第二章提到过，她写道，过去有学识的女子被视为是杰出的，因为她们能“少读经，老读诗”。但是，王感叹这种学习并不重要。她问道，在这些中国经典和小说中除了忠臣孝子、怨夫离妇外，哪有一点爱国主义讨论呢？如果只是提供像《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或《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样被遗弃的悲惨人物作为典型，这样的文学传统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这些也算是知识女性，又怎能说中国从来没有任何类型的女性教育呢？最后，王莲加入了反才女的大合唱，她重申“能够识字的姊妹合那不识字的一样，并且又比不识字的还坏得很些。所以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福。”^③

新式教科书的作者——维新派报刊的热心读者和不断归来的留学生们——将这种批判融入到民族主义的教育里，令它更深地嵌入了 20

① 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

② 《共爱会同人劝留学启》。

③ 王莲，《同乡会纪事：湖北之部》，114[0288]。王莲在文章中回应了梁启超对才女的批评和他后来对文学革命的诉求。有关崔莺莺和林黛玉的讨论，参见 Walter。

世纪初的话语中。复古主义者、永恒主义者和一些古典现代派结合史上和当时的批评,谴责才女不够谦逊、缺乏道德。本章开篇引用的诗文选自一本修身教科书,其作者吴涛指责那些“在诗书以及其他女性才艺上面才华出众”的女子“沾沾自喜、自高自大、不知羞耻”。她们的傲慢造成一种印象,只有无才能的妇女才有道德。^① 谢允燮在他的《初选小学女子修身教科书》中有类似的表述。女性诗歌使文化传统贬值,引得“保守派”宣称“女子无才便是德。”^②

这些作者继续深入对才女的批判,并将其融入一场更广泛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批判在早先的文章中还只是隐而不彰。1904—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敲响了儒家正统礼教的丧钟,此后他们的作品大胆地将对“才”的轻视并入对“学”(儒学研究)的控诉。他们将“枯燥的”治学行为与“感伤的”女性作品一起予以痛斥。

在《女子师范修身学》有关自尊这一章中,吴涛声称,那些“粗通文墨”的才女们“吟风弄月”的行为并不比八股文这一“毒药”更好,而男子写诗只是为了科举考试。^③ 杨千里在《女子新读本》的序言中也将女子学习与男性文人传统联系起来。他指出,虽然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和现代社会中都有精通文学、才华出众的女子,但她们已经被“男子汉学、宋学的流毒”所腐蚀。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其思想尚未沾染男女文人之风的遗毒,她们才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惟一希望。^④

才女传记

古代中国与现代西方的典范人物

按杨千里和其他古典现代派的观点,对当前的民族危机有价值的中

① 吴涛,《女子师范修身学》,4b,10a—b。

② 谢允燮,《序言》,1a。

③ 吴涛,10a。

④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之《导言》,1:1b—2a。

国文学典范只存在于先秦历史里。他们将这些在复古主义的文章中广泛出现的经典模范用于新的政治目的。他们并不关心复兴先秦之道，而是力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模式，以表明尽管近代才女轻薄无知、中华文化也随之衰落，但中国历史中依然有值得重新利用的因素可以作为西方现代国家那种新政体的基础。

康同薇对女才典范的讨论就是基于这种国家实用主义的观点。她写道：“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虽男子而知其无益也，而奚论妇人耶？”^①古代典范们以其文学才能服务于最高的共同目标：充实、传播和维护传统儒家经典中的智慧。康同薇写道：“观古之贤女，类能引经据义，以决祸难，苟非读书，谁复能此”！她把这种古老智慧与现代西方妇女教育联系起来，这是古典现代派的论述中标准的时空转移。康同薇认为，西方人“深通古义，因此才设立女子学校，“昌明女学”。^②

康同薇列举了三个古代知识妇女，她们都是 18 世纪的复古主义文本中出现的具体例子。首先是班昭，从公元 1 世纪直到 20 世纪她都是女子治学的核心人物。班昭的传记最初收录在《后汉书》中的《曹世叔妻》中，传记赞美了她的才华和美德。据记载，在她哥哥班固(32—92)去世后，她接手完成了兄长编纂《汉书》的工作。她还为汉室服务，曾担任邓太后的老师和顾问。此外，班昭还作为忠实的妻子、尽职的妹妹以及著名女教书《女诫》的作者受到称赞。^③

在此后的千百年间，班昭的这个官方传记被有选择地加以呈现。例如从帝国初期到晚期，这些描述突出的都是她的品德——她的贞节守寡和女德著作等，而没有着墨在她的才能上。直到 18 世纪时她的文学成

① 康同薇，第 878 页。

② 同上书，斜体为作者所加。

③ 《后汉书》中收录了两篇班昭的文章，一篇是她给皇帝的上书，恳请皇帝恩准被放逐的年迈兄长还乡；另一篇是《女诫》的全文。有关她的传记，参见 Mou，第 79—86 页。Idema 和 Grant（第 17—42 页）提供了这两篇文章的英文翻译和一个颇有见地的班昭介绍。

就才再度得到充分的认可。^① 康同薇在这些清代中期遗产的基础上,强调了班昭在编纂《汉书》中的作用和对文化经典的贡献。^② 无独有偶,教科书作者们也纷纷赞美班昭的学问与其对女性家计的贡献可以等量齐观,不再认为前者从属于后者。^③

清中朝的文献和康同薇文章中的第二位献身于古典传统的女性形象是古文经学者伏生(生于公元前 260 年)的女儿。^④ 西汉(公元前 202—公元 9 年)的文帝(公元前 180—157 年在位)征求对先秦典籍《尚书》的阐释,他听说伏生是惟一在世的《尚书》权威,但是伏生年事已高,无法传唤到宫内。于是皇帝派了一位特使前往伏生家里。这位高龄学者的话旁人难以理解,于是伏生的女儿充当翻译,把他的意思转达给了这位朝廷特使。^⑤

第三个类似的故事主角叫做宋氏,是一位杰出的经学大师。^⑥ 前秦(351—394 年)时期,统治者决意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但他们意识到最重要的礼仪著作之一《周礼》已经失传。当时学者推荐了宋氏,即太常韦逞(活跃于 380 年)的母亲,她来自一个治《礼》世家。皇帝便下诏在她家中开设讲堂,宋氏在为学者和官员们教授礼仪时始终隔一道帘子,保持着端庄。她展现了女性的端庄得体,又掌握了有用的知识——据说这正是近代才女们缺乏的品质。^⑦

当古典现代派描写自己写作而非补编或转述文章的中国女性时,他们再次选择了盛清时期的学者所尊崇的女性,并强调她们对中华文化的

① 关于班昭在经典中的重生,参见 Mann, *Precious*, 80-81。

② 康同薇,第 878 页。

③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1:11a-b)赞扬班昭通过写作《女诫》、续写《汉书》继承了家学渊源。谢允燮(46a)赞扬《女诫》教导女子缝纫织补、烹煮饭食,但最终还是认为班昭的角色是宫廷女教师。吴涛和彪蒙都突出了班昭的学问。

④ 康同薇,第 878 页。

⑤ 同上书。伏生传《尚书》的故事首次出现在司马迁《史记》的《儒林传》里。伏生女儿充当传译助手和中介的故事是后来唐代颜师古(581—645)的注本中增加的。至于清代中期对伏生女儿的种种说法,参见 Mann, *Precious*, 212。

⑥ 康同薇,第 878 页。

⑦ 章学诚在《妇学》中重述了宋氏的故事。参见 Mann, *Precious*, 81。

贡献。许多这种女作家都写了女教书。名列其中的除了班昭,还有两位挂名作家,即唐代女子教科书《女论语》的作者宋若莘(活跃于820年)和《女孝经》的作者郑氏(郑氏,活跃于750年)。^① 古典现代派还赞美东晋书法家卫夫人(272—349)。卫夫人指导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鼻祖王羲之(约303—361年),为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②

古典现代派支持有益于政治的女才,当他们介绍西方女作家时,他们对“无聊的”为文学而文学的厌恶表露无遗。在他们的笔下,这些西方女性正是明清才女的反面,她们既不多愁善感,也不会惟我独尊,而是致力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她们品性庄重,毫不自负轻狂。

《中国新女界杂志》上的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1819—1880)的传记和第二章中讨论过的斯托夫人传记一样,强调了这位小说家致力于服务社会,而没有突出她的文学才能。它侧重于她的仁慈之心和侠义精神,介绍她将自己的收入慷慨地捐献给穷人、困于生计的学者和女子学校。^③

一位叫荣旃的女子将艾略特传记翻译成中文,在后附的评论中她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她继续忽略艾略特文学上的贡献,强调小说家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操守和正义感(“行谊”)。与第二章写到的西方传记的编译者一样,她还用艾略特的例子作为对比,突出自己女同胞身上的缺点。荣旃感叹女同胞们是迷信、无聊、只知“烧香拜佛”的寄生虫,完全不知道有艾略特那样的外国妇女。她希望这本传记能指导她们更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才智。^④

曾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上翻译了玛丽·莱昂传记的灵希,为中国年

① 参见歌曲《女著作》,其中提到了四位女性:班昭、郑氏、宋若莘,以及唐代写作了《女则》的长孙皇后。叶中冷,《女子新唱歌初集》第30页。Theresa Kelleher(827)认为尽管宋若莘写出了《女论语》,她的姐姐宋若昭使它得到了推广普及。有关清代中期的文本中对于这些女性的赞美,参见 Mann, Precious, 81, 213, Zhang Xuecheng, *Fuxue*, trans., 791。

②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导言》,3a, 1:12a—b。

③ 启旃。这一传记译自根本正的日文选集。

④ 同上书,第54—55页。

轻妇女们提供了另一位外国女作家作为榜样——先验论者玛格丽特·富勒·奥索利(1810—1850)。^①(灵希译为阿索里女士。——译者注)奥索利的第一个传记是根本正以日文写作的,这一次灵希没有在日文原稿中添加自己的评注,让奥索利的高尚道德形象保持了原样。^②

作为女权主义者和知识女性,奥索利供职于新闻界(见图 26)。但灵希所翻译的传记把她当作儒家知识分子谦逊的典范来加以介绍,字里行



图 26 玛格丽特·富勒·奥索利
传记中的插图

资料来源:《中国新女界杂志》1(1907年2月5日)

间特别强调奥索利所受的古典训练,特别是她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一点。就像描写正直的儒家学者一样,传记描写了奥索利每天严格的学习计划和对学术的无比热爱。奥索利学习刻苦,甚至会忘记吃喝,正如孔子所说的“奋而忘食”。^③她避免担当公众角色,遵循儒家“人不知而不愠”的教导和后来章学诚所告诫的“为名声所困扰的女子行为会丧失本性”,^④奥索利和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个人遭遇的困厄是知识的源泉,并且她还非常孝顺。^⑤

① 灵希,《美国大新闻家阿索里女士传》。灵希这一传记译自根本正的选集。

② 这一传记没有提到富勒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品《十九世纪的女性》(*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也没有提及她非婚生子。很有可能灵希自己也不知道这些细节。但《十九世纪的女性》在同时代的薛绍徽和陈寿彭的选集(4:21a—21b)里提到了,非婚生子这一点则没有。

③ *Analects*, 7:18, 见于 Legge, *Confucius*, 201。

④ *Analects*, 15:18, 见于 Legge, *Confucius*, 300; Zhang Xuecheng, *Fuxue*, trans., 786。

⑤ 灵希,《美国的大新闻家阿索里女士传》。

帝国晚期的典范人物

改良派对古典现代派所称颂的西方女作家只字不提，倒是向古典现代派所嘲笑的帝国晚期的才女们表示敬意。尽管吴涛等人批评所有的女诗人都厚颜无耻、缺乏道德，改良派们却赞美那些以才智和美德著称的女子。

在《绣像古今贤女传》中，魏息园的编选原则与清代女子诗歌辑录者们相同：只有道德高尚的女作家才能入选。^① 道德先于才华，这一点在魏息园对女文人的分类上进一步体现出来。在他的选集中她们大部分被归于“贞节”篇中，并且她们是作为尽职尽责的家庭成员而不是作为才女来介绍的。不过，其中有两个耐人寻味的例外。

魏息园没有归入“贞节篇”的才女之一是女诗人、学者蔡琬（季玉，1695—1755）。她的父亲是明末将军蔡毓荣（1633—1699），而母亲据说以前是曾与蔡毓荣交过手的叛徒吴三桂（1612—1678）的宠妾。魏息园称赞蔡琬才貌超群，赞赏她的诗歌格调高雅，充满智慧。在书中她的条目以“季玉诗谏”为标题，突出了写作上的才华。附后的插图中她手持毛笔，而这本集子里能手持毛笔的女性少之又少（见图 27）。但是魏息园最强调的仍然是蔡琬作为



图 27 明清才女蔡琬持笔像

资料来源：魏息园 III. 1

^① 完颜恽珠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更重视德行，单士釐（1858—1943）在她的续集里也延续了这一原则。Mann, *Precious*, 94 - 117; Widmer, *The Rhetoric*, 213.

妻子的美德而不是她的诗才。他将蔡琰的故事放在“相夫”篇中,在传记标题中称呼她为“高氏”。在魏息园看来,蔡琰的文学才能本身并没有价值,它的价值体现在为丈夫高其倬(1676—1738)的仕宦生涯提供帮助。^①

魏息园的《绣像古今贤女传》里归入“贞节”章的女子中有一位歌妓,也是一位贞节烈女——唐朝的关盼盼(活跃于800年)。魏息园赞美的不是她的才名而是她在道德上考量周到。当丈夫去世后,关盼盼为了避免玷污丈夫的名节而没有立刻自杀。魏息园认为关盼盼比他所认识的那些高门大户里的女人们还要懂得克制,不纵情。^② 作为对比,他谴责并强调了自己侄女过度的贞节,他的侄女即本书第一章讨论过的贞女魏镜清,也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女诗人。^③ 此外他还赞扬了太平天国时期的黄淑华,这位贞节烈女为家人报了仇,并给后人留下了传扬其生平故事的动人诗作,“魂兮哀江南,乌啼白门柳”。^④

有时候魏息园比复古主义者对才女的道德要求更高。例如,谢道韞(活跃于350年)这位才华出众的东晋女诗人连章学诚和完颜恽珠都交口称赞,而魏息园却拒绝收入选集。^⑤ 他只是在齐国相国晏子的御者之妻的传记中提到了谢道韞作为反面教材。

这篇传记最初见于《列女传》,讲述了齐国相国晏子的御者之妻看到丈夫在准备主人的车马时表现出傲慢得意的样子,对丈夫进行了深刻的谴责。她的斥责促成了丈夫的重大转变,最终晏子奖励御者做了官,而御者的妻子也得到了国家的封号。魏息园在评论中将御者之妻那样严肃地责备丈夫与谢道韞那样不当地鄙视丈夫区别开来。在魏息园看来,

① 魏息园,III. 1。高其倬拥有不少官衔,还曾在南方兼领军队。有关蔡琰的内容,参见闵尔昌,第3265页;Chang and Saussy,第445页;Hummel,第735页。

② 魏息园,IX. 11。有关关盼盼的内容,参见 Carlitz, *Desire*, 116、125。

③ 魏息园,IX. 23。

④ 同上书,第22页。黄淑华的诗作收在《黄烈女遗诗》中,参见胡文楷,第503页;Fong, *Signifying*, 121-128。

⑤ 有关谢道韞在清朝中期的地位,参见 Mann, *Precious*, 17、76、83、91、213;章学诚对她的看法可参见 Zhang Xuecheng, *Fuxue*, trans., 790-791。

谢道韞在丈夫面前的优越感是有害的，对后世那些感叹她没能嫁给与其诗才相匹的刘宋诗人鲍照（414—466，实际上生活在谢道韞之后半个世纪）的说法，魏息园也给予了批评。他宣称谢道韞的例子有可能颠覆婚姻制度并导致天下混乱，对中国的两万万妇女具有潜在的危害。^①

魏息园通过反面描写谢道韞并赞美有原则的才女而塑造起来的才女形象，却因为“贞节”篇的最后两则传记变得更复杂了。其中一则写的是元朝的一位道姑，诗人元遗山（1190—1257）的妹妹，本人也是一位女诗人。^② 第二则颂扬的是明朝末年的叶小鸾（1616—1632），她文才敏捷但英年早逝，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社会对“情”的崇尚。^③ 从魏息园的结集原则来看，这两则传记在很多方面都有点不寻常。它们打乱了前面八则传记都遵循的年代顺序，从上一则的晚清跳回到元明两代。更重要的是，故事所赞美的两位年轻女子并没有像魏息园选集中的其他女子、儒家的优秀楷模那样经历过诸如聘夫死亡、早年守寡或差点被奸污等考验。她们的才能也没用于服务家族——她们既没有为丈夫写悼念文章，也没有写诗以捍卫家族的荣誉。元道姑甚至为了她的宗教信仰而抗拒婚姻。^④

在这些值得注意的条目中，魏息园不仅将女才与传统观念中的女德联系起来，还与主体性以及献身宗教的纯洁贞女所具有超凡力量相联系。他不同意那些称元道姑违背“圣人之教”的说法，称这些妇女属于“天下人类之绝秀者”之列。^⑤ 根据魏息园的记载，叶小鸾曾预见了自己的死亡，她的母亲说她最终超越了卑微的女人的肉身达到了永生世界，显然魏息园也这么想。^⑥ 在这里魏息园背离了写作其他才女传记时的道

① 魏息园，IX. 3。

② 同上书，第 24 页。

③ 同上书，第 25 页。有关叶小鸾的内容，参见胡文楷，第 149—150 页；Ko, *Teachers*, 82, 100, 138, 161, 166—168, 187, 201—202, 211—212; Idema and Grant, 390—406。

④ 魏息园，IX. 24, 25。

⑤ 同上书，第 24 页。

⑥ 同上书，第 25 页。Idema and Grant, 400—406。

学的家族主义原则,从而不仅在本章,而且为整部传记做出了一个结语——女才不一定要完全与女德制度绑在一起。

《中外新列女传》还以改良派的口吻记述了才女孔璐华(经楼,活跃于1800年)的故事,她并不只是由家庭中的角色来定位的。这个专栏的编者为了突出女才的重要性,将孔璐华的传记排在第一位。尽管传记提到了她作为“孔子第73代长孙女”的尊贵门第,但主要还是强调她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和诗人的才华。她著有《唐宋旧经楼稿》,由此赢得了经楼夫人的美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阮元(1764—1849)的第二任妻子,她也被称为阮夫人。^①

《中外新列女传》中的孔璐华传记和第一章中讨论过的汪节母传记都来自19世纪晚期学者陈康祺的一篇文章,但这些后期改编版本和陈的原文在标题上有所差别,反映了它们不同的侧重点。陈的文章题目为“毕阮二公缔姻孔氏”,重点是阮元的婚姻对其仕途十分重要。^②《中外新列女传》上的传记题为“阮夫人湛深经史”,转而强调孔璐华的文学造诣,而且她的才华也并没有被归为阮元的文化资本。在陈康祺所附的插图中,她与祖母一起恭顺地跪在皇帝面前,而《中外新列女传》的插图(见图10)以通常用来刻画班昭的经典姿态来表现她:在藏书无数的书房里,孔璐华正独坐读书,她的腿上有一本打开的书,身旁还有一本,而女仆正在为她取另一部厚书。^③

对照:无德之才

尽管儒家道德在孔璐华、叶小鸾以及元遗山妹妹的传记中并不是决

① 《阮夫人湛深经史》。孔璐华的简介可参见李瀛之,3:664。有关阮元的内容,参见 Vissière; Hummel, 399 - 401。

② 当阮元在山东巡抚毕沅手下担任督学期间,他们立下誓言要让儿女结为夫妻。他们都尊崇先秦先贤和儒家思想,使他们有资格与孔圣人的家族血脉相联。参见《毕阮二公缔姻孔氏》。

③ 《阮夫人湛深经史》。

定性的,但从其叙述中仍然可以感到,儒家道德充塞于宇宙天地间。而主张当下主义的作家则撕开了道德说教之幕,完全脱离道德来描写才能。许定一拒绝将贞女节妇收入他的《祖国女界伟人传》中,并坚决在《祖国女界文豪谱》中摒弃道德内容。

许定一的《祖国女界文豪谱》包含了女子写作史、百美图集以及传记集等多种体裁,^①但是在观点上却十分鲜明。他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女作家不一定要是“闺秀”,道德上有疑点并不影响她们进入文豪谱的资格。^②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为宽泛的收录范围——其列入女子多达365名,还体现为百美图风格的36个女作家插图。许定一认为她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作家。^③这36人中包括蔡琰(文姬)这位两次再嫁的汉代寡妇,她才能卓著,但是德行有瑕(见图28)。除 不明



图28 两番再嫁的汉代寡妇蔡文姬

资料来源:许定一,《祖国女界文豪谱》,出版者

① 近来有篇文章将许定一的作品放在民国女性文学史的脉络中来介绍,这一脉络中包括了谢无量(1916)、雷瑁和雷城(1916)、谭正璧(1930)和梁乙真(1932);参见林树明,第257—258页。许定一的集子里对每位女性的介绍文字长度不一,但一般都只有几行字,在说明家族、出生地等基本的个人信息之后列出其作品的标题。

② 许定一,《祖国女界文豪谱》之《序》,1a—b;《凡例》,1a。

③ 在许定一书中所载的365位女性中,清朝人最多,达到106人。除此之外,明代69人,元代18人,金、辽代各1人,宋代58人,五代时期6人,唐代49人,隋朝6人,南北朝时期11人,东晋时期26人,秦汉时期14人。

蔡文姬之外,还有遭到魏息园痛斥的谢道韞以及名妓关盼盼。^①许定一认为,从一个人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并不能判定其才能高低、是否值得尊重,才华本身就体现了天意。因此,关盼盼等所谓道德有瑕疵的名妓也得到了他的称赞。^②

许定一这一说法和本章的内容说明,中国对女才的观念随着女德的定义变化而发生变迁,而什么是女德又关系到更广阔的文化、政治潮流。清末的社会批评家面对西方挑战,重新评估了儒家道德的主导地位,在女子教育正规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女才问题进行了再思考。才能和品德之间历史悠久的双人舞此时呈现出既熟悉又新鲜的新局面。

永恒主义者没有远离盛清时期的遗产,即复古主义者所坚持的以合乎礼法作为衡量女才的惟一标准。改良派的立场没有那么死板,尽管道德的地位仍然至高无上,但他们给予了女才一些自主权,其道德观念反映了新民族主义者的视角。

古典现代派对才女的言辞最尖刻,也最有影响。在海外留学生出版物和20世纪初的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的文章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从梁启超1896年的《论女学》,到20世纪头几年东京留学生们发表的文章和1904出版的女子教科书,在这短短几年期间,对才女的批判不断深化,令人清晰地感觉到文化变革的步伐。尽管诸如梁启超、康同薇等维新人物抵制儒家文化遗产,但他们毕竟受过儒家价值观的训练,仍受其约束。而最先出国留学的女学生们文化上所受的约束较少,政治上更激进,更加蔑视女性文学前辈。教科书作者们通常本身就是归国留学生,而且教科书都写于科举制废除之后,于是她们将对才女的文学批评扩大到对儒家学说的批判。晚清时代过去多年之后,左派评论家们还

① 因为蔡琰再嫁,包括唐代的刘知几(661—721)等学者都对《后汉书》是否应该载录她的故事提出了质疑。参见Mou,第87页。

② 许定一,《祖国女界文豪谱》之《序》,1b。

在继续借用才女的形象来哀叹中国文化的堕落。^①

在 20 世纪初的文化领域中上演的各个剧目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各种力量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张力，但粗略的勾勒难免会掩盖文化的复杂性，我们的理解不应止步于此。举例来说，古典现代派同时借用了先秦历史和现代西方，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建立清晰的二元对立，也并未以此历史改写彼历史。相反，他们开启了积极的文化杂交和融合过程，将班昭改写成国家实用主义的代表，把玛格丽特·奥索利当作儒家道德典范。他们赞美的才女范围很广——从伏生的女儿直到乔治·艾略特，她们都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了文化和社会，并不耽于自我表达。与当时的永恒主义者不同，古典现代派愿意接受西学，同时他们继续将中国的过往作为文化资源，这又不同于反传统的下一代。他们将自己对西方价值观的诠释天衣无缝地融进现有的文化知识库中来，正如把西方妇女添加到中国历史典范的谱系中一样。

尽管古典现代派愿意接受西方并尊重中国古代历史，但却对近代历史不屑一顾。虽然断然拒绝晚期帝国的历史有损其自我认知，但他们华丽雄辩的文辞最终还是在妇女教育领域占了上风，从女子学校的创办、管理和 20 世纪初新式教科书市场上都可以看出其优势地位。这些教科书的目的是摧毁所有中国(女性)文化中不问世事的唯美主义残余，打造具有进取心和世界意识的新国民(之母)。才女正是古典现代派“政治化的母亲”的反衬。

^① 1920、1930 年代的左派批评家以及后来几十年的共产主义者都将国家的弊病和才女联系起来，批评她们过分个人主义、缺乏社会责任感、不现实、没有爱国热忱。他们认为抛弃了田园抒情诗的浪漫情怀之后才能看到中华复兴的前景。参见 Larson, 140 - 146、165、10 - 72; Judge, *Talent*, 802 - 803。

第四章 贤母和国民之母

吴孟班(卒于1901年)在怀孕之后自己去做了流产,她向大骇不已的丈夫邱公恪(活跃于1900年)做了如下的一番解释:“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

——《道听途说》,1902

吴孟班对母亲角色做出的激烈反应,只是20世纪初众多的呼声之一。在晚清文化教育大辩论的风潮中,为母之道也被重新评价、理论化和政治化了。对母亲角色的强调体现出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议程中暗含的性别悖论。尽管它强调了女性的生育和家务劳动对于民族国家改革具有核心作用,但同时妇女与政治和历史却保持着一段距离。^①

在晚清时期所有的女子教科书中,母亲角色都和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即便是永恒主义者也对历史悠久的“教子”的角色给予了新的政治评价。1904年呼吁女子接受家庭教育的学者们也称母教是“国民教育之

^① 有关西方现代性里母亲的位置可以参看 Fleski 的简单介绍。Fleski, 第 55 页。

第一基址”。^① 三年后，学部在女子师范学校管理章程中重申了这一表述。^② 改良派不仅将母亲角色和国家相勾连，还和国际政治联系起来。魏息园在《绣像古今贤女传》关于教子的一节中，也坚持认为古代对为母之道的规范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很重要。^③

但是，改良主义者和永恒主义者都没有采用古典现代派材料中尤为突出的两种新构建的母亲概念：“良妻贤母”和“国民之母”。这两个概念为“家国一体”的经典儒家表述赋予了更强的种族和国家意义。^④ 首先是“良妻贤母”，这个儒家思想、明治民族主义以及西方影响的复杂混合体 20 世纪早期从日本传入中国。尽管其明显偏向于家庭，但它将女子教育作为国家强盛的基础，在日本和中国女子教育正规化过程中起到了作用。它还将女子体育教育视为种族强大的基础来大力推进。

“国民之母”的理想吸收了“良妻贤母”许多内容，但这个直白的政治化翻译更中国化。古典现代派在教科书和论战杂文中频频高唱“国民之母”的颂歌，意图在女性和国家之间、母亲角色和公民身份之间、母亲健康和国家力量之间建立起生物学联系。它也强调了女子体育的重要性，当然，在中国语境下这直接意味着解放缠足。

除去当下的理论，晚清的作者们还援引了许多历史上的例子来证明母亲角色与国家地位的关系。如同他们对才女的讨论一样，改良派和古典现代派在筛选历史材料时各有不同的方式。他们都援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受人敬重的母亲，但只有改良派肯定了近代母亲的成就。古典现代派对近代母亲的批评与对“才女”的批评有些类似，他们斥责近代的

① 荣庆、张百熙、张之洞，第 396 页。

② 根据 1907 年的规定，“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参见《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

③ 魏息园，VI。在魏的选集中，“教子”一章包括 19 个例子，占全书的篇幅仅次于有 25 个例子的“贞节”部分。《图画日报》上的《中外新列女传》的 11 个传记中也有 5 个写的是著名的母亲。

④ 家国一体的观念在儒家经典《大学》中阐释得最清楚。《列女传》的许多传记也清楚明白地强调了女性个人角色的公共表现。

“慈母”们过于无知和纵容,难以培育中国的下一代公民。

有关母亲角色的新理论

晚清文献中对母亲角色的强调,其实背离了先秦时代和帝国晚期的规范。尽管在中国深厚的生育文化中生孩子的确十分重要,但在古代经典中母亲的角色并不突出。^① 在作为儒家社会基础“五伦”中,并不包括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② 作为从汉代到 20 世纪初流传最广的道德启蒙读物之一,《孝经》选择父亲作为子女孝敬的主要对象。^③ 在《礼记》的《内则》一节中,母亲通常附属于父亲,其地位甚至低于孩子的闺塾师。^④

包括刘向的《列女传》在内的早期女教书突出了母亲的角色,但用的是一种双重化约的方式。^⑤ 生育和抚养子女被当作女性最高理想,于是女性的角色被化约为母亲的角色;他们还特别关注教子成功的母亲,将母亲角色化约为伟人之母。

帝国晚期的母亲角色仍是边缘化的。明清时期的旌表绝大多数是褒奖妻子的忠贞而不是母亲的奉献,牌坊和祠堂表彰的也是贞女节妇,而不是为了善良正直的母亲而建。当时的学者们忙于议论贞女崇拜,给贞节烈女写了无数传记,但母亲的美德只是在回忆录或墓志铭等更私人化的文学样式中有记录。^⑥ 这条规则的惟一例外是明末的罗汝芳(1515—1588),他强调母亲的养育之恩(“慈”)高于贞节,将母爱与孝、悌

① 有关对生育的高度尊重,请参见 Furth, *Concepts*, 9。

② Yu-yin cheng, 第 103 页。这五种关系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

③ Ebrey, *The Book*, 47。

④ 《内则》讲到母亲的时候一般是和父亲并提的,除非父亲去世了,或者是在说女子孕期幽居时才会单独提一下母亲。孩子生下来的最初几个月里会交给三位代母,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教师。参见 Legge, *Li Chi*, 453, 471, 473。

⑤ 《列女传》的第一章包括了有关《母仪》的 14 个例子。关于《列女传》中的母亲角色,请参看下列隆雄。

⑥ Hsiung 的“Constructed.”分析了若干这种墓志铭。

相提并论。^①

清朝末年，罗汝芳所赞扬的慈母进一步被贬低。由于慈母和情绪化的才女一起被民族主义者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母亲的教师角色也被政治化了，并常常与妻子的贞节脱钩。^② 对母亲的这一新关注点反映了东亚地区正在抬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理论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国社会的生物化解读。在晚清时期的传记、教科书和社会辩论中占据舞台中心的新母亲形象不再多愁善感，而是体格健壮，培育着强壮、爱国的后代。她还是严格的道德导师和政治老师，有能力培养品行正直且具有世界意识和民族思想的新公民。

贤 母

改良派受到外国观念的束缚比古典现代派少，又比永恒主义者更少感到“列强”的文化威胁，他们将母亲的角色置于世界范围之内。在《绣像古今贤女传》“教子”一节的序言中，魏息园以国际力量和宇宙论的语言来强调母亲角色的重要性。他说只有当对君上的忠诚和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充塞天地”、“横扫六合有余”时，中国才能够与白种人竞争。但是，无论官员还是学者都无法传授这些基本的价值，可行的只有“贤母”的谆谆教诲。^③

在这一节里，魏息园提出，受到教导的贤母会反过来教育儿子。他以工业生产来引申比喻这一过程，可以看出他力求在教育法创新的同时也保护古老的道德原则。同时。他将年轻的中国妇女比作铸造未来贤

^① Yu-yin Cheng, 103 - 116. 另一个例外是写《女世说》的李清(1602—1683)，他高度颂扬母爱的文化价值。在李清看来，“慈”应该被看作“人世间最基本和最普遍的价值”。Nanxiu Qian, *Milk*, 209.

^② 慈母只在描述西方服务社会的女英雄时才被正面评价，这在第二章有所讨论。同时，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古典现代派利用那些对中国妇女来说已经过时的价值来减弱人们对外国妇女的敌意。

^③ 魏息园，VI。

母的原料“铜”，而当时的学校就是熔炼金属的熔炉，学校的课程就是熔炉的燃料煤，在他的《贤女传》中，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作为“模”的古今历史上的贤母，当代的贤母将按照这种模子塑造出来。

魏息园用古老的“贤母”一词来提出母亲角色的新概念，展示了贤母形象不朽的力量。这一形象至少可上溯到西汉时期。^① 魏息园也揭示了贤母形象随着时间而产生的戏剧性的变化。这一词语的可替换性明显地体现在另一新造词汇——“良妻贤母”上，这是 20 世纪初建构出来的一个有关理想女性的重要概念。

良妻贤母

良妻贤母的概念 19 世纪末期形成于日本，并在 20 世纪初期传入中国，这一概念将女性和国家、料理家务和服务国家、家务劳动和正规化女子教育等内容都联系起来。虽然良妻贤母这四个字突出了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但其丰富的意义在那个时代常被误解，并被后来的研究所曲解。

四字组合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深了这些误解，在不同的东亚环境里它有不同的形式和内涵。这四个字的组合不仅有晚清文献中的最常见“良妻贤母”，还有“贤母良妻”（只是颠倒了前后两个词的顺序），以及“良妻贤母”，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语义转移，意思是妻子的聪明才智主要用于辅佐丈夫，而不是作为母亲去教导孩子。至今学者还在辩论这个四字短语（无论怎样排序）究竟是源于儒家道德还是近代观照世界的产物。学者们争执不下的另一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究竟是限制了妇女还是赋权于妇女。^② 这些问题突显了这一概念背后的认识论与文化张力。^③

① 这个词最初见于《战国策》之《赵策》，因此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公元前 206—公元 8 年）。吕美颐，第 15—16 页。

② 最新的有关近代亚洲“良妻贤母”主义的评论可参见陈姪媛。他回顾了中日韩的研究，提出“良妻贤母”主义随着儒家女子教育一起式微。

③ Judge 在其“The Ideology”里对中日两国在这一概念上的不同维度做了深入的探讨。

汉语里的这一复合词组最早见于1903年的一本杂志——《教育世界》，这是20世纪初介绍日本教育信息的最主要的中文资料。^①引入这一复合词组的文章是从日本著名教育家吉村寅太郎(1848—1917年)的一部专著《日本现时教育》中翻译摘录而来。^②在其“女子教育”一节中，吉村解释道，明治时代女童教育不如男童教育发展快，因为人们认为女子只负责家庭内部的事。吉村对这种论调提出了质疑，他坚持认为母亲能对子女的道德和智力发挥影响，任何国家的“良妻贤母”都是“国家启蒙和文明之母”。^③

对吉村著作的这一摘录可能是“良妻贤母”第一次引入中文，而晚清时期日本教育家下田歌子对这一复合词组的解说和传播起的作用最大。作为日本明治时期“良妻贤母”观念最有力的推动者，在1898年官方宣布以这一思想作为明治女子教育基础理念之后，下田立刻于1899年创办了实践女子学校(Jissen jogakkō)。下田的学校后来成为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的理论培训基地，它公开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良妻贤母”。^④

下田歌子关于良妻贤母的理想观念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她生长在一个汉学学者的家庭，研习过汉学。她也亲身体验过“西方”，1893年到1895年间，也即创立实践女子学校前不久，她在英国生活了两年，研究了西方的女子教育法，后来她将其融入到实践女子学校的课程设计之中。

① 《教育世界》1901年由罗振玉(1866—1940)创刊。

② 吉村寅太郎，《日本现时教育》。作为日本明治时期教育界的重要人物，吉村是东京女学馆的第二任校长，1898年他还创办了成女学校。

③ 吉村寅太郎，《日本现时教育》，第19页。主张“良妻贤母”理想的中日学者明显没有留意到吉村文章的这一译本。他们声称中文中这一说法初次出现于1905、1906年，见于日本人投资经营的《顺天时报》。吕美颐，第17页；瀬地山角、木原葉子，第287—291页；高群逸枝，第545页。

④ 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第98—99页。取得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之后，日本政府一方面努力在迅速军事化和工业化的世界中谋求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又将母亲角色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希望维护社会稳定、保存东亚基本的价值观念。

她还敏锐地看到了日本和中国在与西方相比时的劣势所在,开始将女子教育看作泛亚地区抵御西方侵略的关键因素。

1895年下田回到东京,她联合了决心共同强化东亚的中日教育家、政治家,包括明治政府的官员和一批有政治影响力的华人——从1904年上奏主张在家中教育妇女的张之洞到后来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孙逸仙,1866—1925)都名列其中。^①这一时期下田对妇女的教育理念基于张之洞等中国教育家提出的体/用二分思想。同时她也很重视包括体育在内的西方实践教育和东亚的伦理教育,前者有益于国家实用主义的目标,而后者则能打下道德和文化的根基。^②

这种体/用二分思想,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时的矛盾立场。这两个国家的改革者们都为西方的财富和力量所吸引,但又都反感西方的种种社会思潮。这种张力在关于良妻贤母理想起源于何处的辩论中显而易见。大多数支持者认为它来源于19世纪欧洲的关于女性气质的经典形象,但后来被儒家化了。19世纪70年代是日本接触西方思想最多的时期,此时旅欧学者中村正直(1832—1891)首先将这一理想形象用于东亚。^③一位中国记者则坚持认为,尽管它起源于西方,但这一形象后来在西方被性平等、个人主义、独立和追名逐利等观念所破坏,因此他认为,这一观念的早期日本版本才是惟一可接受的起源。^④

其他中国作者则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良妻贤母最初是中国儒家的理想。一方面,这种理念的支持者们希望使其对中国受众更具吸引

① 其中明治政府的官员包括嘉纳治五郎(1860—1938),近卫笃磨(1863—1904)以及犬养毅(1885—1932),参见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

② 片山清一,《明治40年代の女子教育论》,第4页;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

③ 当今很多日本学者还是持欧洲起源说。高群逸枝,第44页;片山清一,《明治40年代の女子教育论》,第9页。中村忠行在当时的重要刊物《明六杂志》的最后几期里面采用了这一概念。Sievers, 22—23。

④ 《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第131—132页。

力,将其与历史悠久的儒家伦理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反对者也试图将它与名声越来越差的儒家价值观联系起来,从而制止它在中国的传播。^① 这两个群体都赞成中国起源说,并拿出了古文字证据:组成这个复合词组的两个二字词汇(良妻、贤母)都可以在公元前1世纪的中文文献中找到。^②

但是,当20世纪初人们再使用这个复合词组时,它的日语意思或泛亚地区的含义与它的中国“构件”有着明显的差异。在人们心中,明治或晚清时期的良妻贤母不只是按照古代礼教“具酒食”而已,而要教子相夫,为国家做出贡献。^③ 尽管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有相似之处,又带着后来西方影响的印记,但它最好被理解成一个跨越国界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尽管最初是受到了西方观念的启发,但其目的是振兴西方威胁下的东亚社会。虽然它的两个二字“构件”来自早期中文文献,但现在却用于世界性的新环境了。

当下田歌子向中国读者描述贤母的理想时,全球化的背景也蕴含在其文本之中。她说,来自母亲的良好教导对中国和东亚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女子教育是母亲得以提供良好教导的必要条件。她坚持认为这一教育质量将决定中国女性的智力、身体、儿童的素质,从而最终决定中国国民的体力和活力。在她的论述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和生物学的比喻随处可见,这是20世纪初东亚和西方的一种典型认识——健康母亲塑造强大国民。大概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下田在英国经历了优生运动,很自然地接触到了这些观念。而在当时日本社会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成为流行话语。例如,上文引述过的吉村的著作中就曾写道,日本希望进入世界先进国家之列,而不教育占一半人口的妇

① 刘宁元以这一概念和儒家思想的联系为依据对此作了一番评论,刘宁元的评论转引自陈延媛,第200页。

② “良妻”最初见于司马迁《史记》的《魏世家》。参见吕美颐,第15—16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

女,等于期望一个“半瘫痪”的残疾人去面对一个身体强健的竞争对手。^①

下田引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达成两个最高目标:第一,将中国和日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诉诸“泛亚洲”“黄种人”的生存;第二,以女性的生物性间接地将女性和国家联系起来,不直接诉诸其智识。^② 尽管女子教育是她泛亚洲视野的中心,但她并不认为女子教育本身是目的,而把它当作是改善人种的一种手段。1902年她在东京对中国听众作了一次演讲,被中文期刊广泛转载。下田在演讲中称,像朝鲜、越南、缅甸和土耳其等所有弱小民族一样,黄种人是弱小的,因为它们没有发展女子教育。相反,因为“欧美白种人”的女子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体格强健,所以培育出来的儿子很有见识,种族也很强大。下田鼓励她的中国听众(主要是男性)“返回家园,推动作为男性教育之基的女子教育。”她解释说,“这不仅关系到你的国家富强,还能确保我们亚洲和我们黄种人繁荣昌盛。那时我们才能与白种人抗争。”^③

除了公开演讲之外,下田还运用了多种方式来向中国传播她的思想。1901年,她在中国第一批海外留日学生戢翼翬(活跃于1900年)的帮助下,在上海创立了出版社“作新社”。^④ 从1902年12月9日到1906年1月,该社发行了名为《大陆》的杂志,上海乃至全国各省都能读到。^⑤ 它还翻译出版了有关女子教育的日文著作。这些作品里有下田自己的

① 吉村寅太郎,《日本现时教育》,第19页。但是,英国和日本对如何利用优生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英国的女性主义者声称,女子繁衍种族的责任为她们在公共领域获得平等提供了依据;而下田歌子和其他一些中国人、日本人则以种族主义的理由来强调女性家庭内部角色的重要性。英国的情况请参见 Burton。

② 有关泛亚洲主义的内容,请参见 Duara, *The Discourse*。

③ 《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论中国女学事》,第11[39]页。

④ 戢翼翬也是教下田歌子现代汉语的老师。参见 Liu Mei Ching, 第154页。

⑤ 杂志的大部分作家和编辑都是曾留学日本的年轻华人,也和下田歌子一样对教育有兴趣。杂志共出刊47期,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和福建等省发行。实践女子學園八十年史編纂委員會,第101页;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編纂所,第428页;黄沫。黄没有说这本杂志是由日本人资助的。

《家政学》，这是张之洞、张伯熙和荣庆 1904 年推荐进入新女子教科书的惟一一篇外文课文。还有成濑仁藏(1858—1919)的《女子教育》，1901 年译成了中文。上述两篇课文都阐述了“良妻贤母”的思想，成了中国讨论女子教育的基础文本。^①

从下田的学生身上也可以看出她的影响力。很多她的学生都热心地加入了 20 世纪初创建的私立中国女子学校中去。例如，1902 年河原操子(1875—1945)成了上海务本女校的 9 名教师之一。^② 服部繁子(活跃于 1904 年)曾在北京豫教女学堂任教，这所学校是她和她的丈夫服部宇之吉(1867—1959)于 1915 年创立的。^③

不过，最重要的是，下田将她的“良妻贤母”思想译成了中文，并纳入到实践女学校中国留学生的课程中。正如学校的名字“实践女学校”表明的那样，下田更强调发展实践能力的而非增长知识。她坚信这种教育形式特别适合中国学生。她解释道，“这些女子远道而来，”“不能给她们无用的教育。”^④她的课程设计对道德修养、家政技能和体育锻炼的重视胜过诵读课文。下田亲自讲授修身课程，并使用自己写的教材《支那留学生修身讲话》。这本教材注重忠、孝等基础性的中日伦理概念，同时还有对卫生保健等日常问题的实际指导。^⑤

最后，下田把体育看得比德育更重。如第二章中所指出的，她坚持要求所有人校的中国女生都不缠足，这样她们上各种课程都不受限制，尤其是体操课。留学生们每周上 3 小时体操课，而修身课才 1 课时。^⑥ 这位 20 世纪初颇有影响的人物声称，如果中国妇女要承担国民之母的角色，身体强健是必需的。

① 成濑仁藏，《女子教育》、《女子教育论》。成濑的文章写于 1896 年。

② 吴若安，第 606 页。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第 99 页。

③ 上沼八郎，第 85 页。

④ 《述教育中国妇女事》。

⑤ 下田歌子，《支那留學生のための修身講話》。

⑥ 实践女子學園八十年史編纂委員會，第 113—116 页。

国民之母

下田的课程大纲设计表明日本“良妻贤母”的理想是与新一代东亚民族主义者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中国的“国民之母”概念则使母亲角色和政治更明确地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一时期指称西方“公民”这一概念的“国民”一词既可以指国家中的某个人,也可以指整个国家,^①人们便号召中国女性不但要养育爱国的子女,还要像母亲照顾孩子一样关心国家。1905年出版了一本公民读本《国民必读》,作者解释说,国民(民人)和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国家的利害,就是民人的利害。”^②

与日本的“良妻贤母”、法国和美国的“共和母亲”等理想概念一样,“国民之母”的构想也在赋权给女性的同时也约束着她们。这个构想对母性进行了政治化,同时也通过将国家的意涵赋予最基本的人类关系——母子关系,使得女性在政治中的角色避免了失去本性,回归了自然。

这个转向国家的新角色使发展女子教育和塑造新的女性体态的诉求都合法化了。^③此外,通过强调女性家内角色的外部或公众表现,妇女得以进入政治理论之中。但是,它给予女性的只是间接的政治角色,这可能会延缓女性充分参与政治的进程,并回避了更加激进的“女国民”概念。这样以母性取代政治是吴孟班这样的女子所不能接受的,本章开篇的引文中她曾声明希望成为独立的政治主体。

“国民之母”的概念谱系可以追溯到刚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维新派的作品,刚好在这一时期,“良妻贤母”思想在明治日本也得到了

① 正如 Peter Zarro(“Introduction”, 18)所写的那样,“国民”这个词介乎于含义单一的“民族”和完全的“公民”之间。对这些议题更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见 Judge, *Citizens*, 31-37。

② 陈宝泉、高步瀛, 1:1-2。

③ 体态包括身体的物理形态和行为举止,被视为表达一个人真实性格的窗口。参见 Bourdieu, *Masculine*, 64。

发展。梁启超 1896 年论女学的文章对此有很多论述,虽然他没有明确使用这个字眼。梁文所提出的四个建议中后两个涉及到母亲。在第三个建议中他提出了和下田一样的观点——女子教育和国家强盛之间有着重要关联。他和下田一样都从西方经验中看到了这种联系:他指出,“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①在第四条建议中,他赞同下田认为生物学对国家强盛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还坚持认为,通过胎教可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②

梁启超的论述中暗含着家国一体的观念,它在中国由来已久,近来又被重新获得重视。经过 20 世纪初的各种文章和教科书的广泛推动,这一想法成了中国本土有关女性和民族主义的新的世界性观点的概念框架。1908 年《最新妇女国文读本》的编者提醒年轻的女激进派,女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由家庭来协调的。他们声称国家只不过是“家庭的集合体”,不意识到这一点而去“侈谈爱国主义和拯救集体”是误入歧途。如果妇女把家庭和孩子当作她们的第一要务,国家只会更加强大。^③

海外女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很可能就是《最新妇女国文读本》的编者批评的对象,成日“侈谈爱国主义”;然而,女留学生中有一些人也会响应《读本》关于妇女必须通过子女来服务国家的说法。像“良妻贤母”的倡导者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女斗士一样,她们给妇女的家庭角色赋予了新的国家意义,呼吁扩充而非放弃妻子和母亲的责任。^④

女作家黄菱舫(活跃于 1903 年)为金天翮(1874—1947)激进的小册子《女界钟》写了序言,她在其中强调了这些家庭责任在国家层面上的重要性。她提出,“凡世界人群智识学业进步,其事万端,而其元素有二,曰

① 梁启超,第 871 页。经元善也有类似的说法,参见经元善,《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第 881 页;康同薇,《女学利弊说》,第 877 页。

② 梁启超,《论女学》,第 871—872 页。

③ 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1:《大义》,1b。

④ 根据 Lynn Hunt(123)的论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即使最激进的女性也认同共和母亲的理想。

社会,曰教育。言社会则妇女为丈夫之顾问,言教育则妇女尤为幼稚之导师。”^①批评才女的王莲坚持认为,女人可以通过其家庭的男性成员影响外部世界。她对祖国的爱激励着丈夫和儿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她的道德影响决定后者来日成为腐败官员还是国家英雄。^② 24岁从江苏去日本的曹汝锦(1878—?)声称,妇女只要学会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对待国家,就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③ 就连抛弃丈夫和两个孩子远走的秋瑾,也呼吁妇女鼓励丈夫去报效社会、儿子去出国留学、女儿去接受教育,从而为国家强盛尽到自己的力量。^④

20世纪早期母亲和国家之间的这种联系最终体现为“国民之母”这一新范畴。从一开始,这一概念范畴就明显是世界性的。它最先出现的地方之一就是《江苏》杂志于1903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而《江苏》杂志是以东京为基地的留学生刊物。^⑤ 这篇文章从下田歌子的旅欧日记中摘译了一则有关欧美女子体育教育的内容,在其译者说明中引入了“国民之母”,据称是引用了拿破仑的话,它指出:“欲强国本,须强国中之母。”^⑥

“国民之母”的新类别在中国话语中真正确立起来是在1904年或1905年,即“良妻贤母”概念引入中国后不久。这个中文词汇吸收了很多日本理想的内容,最终在晚清的话语中取代了日文词。它成了古典现代派教科书上的口号、主流媒体中通用的比喻。例如,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在1905年刊登了一篇文章,声称该文由七个汉字组成的标题“女子

① 黄菱舫,第133[943]页。

② 王莲,《同乡会纪事:湖北之部》,第115页。

③ 曹汝锦。曹汝锦是留学生曹汝霖(1876—1966)的妹妹,她和哥哥一起前往日本旅行。大量女留学生的文章中可以见到“家庭是缩影”的观念,例如,可参见《支那女子之爱国心》,67[0385]。

④ 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⑤ 在梁启超的《论女学》和后来的文章中,西方是这个概念遥远的灵感来源。1907年一位作者声称西方人首先表示“女子是国民之母”(《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第129页)。

⑥ 下田歌子,《欧米诸國女子之体育》,第91页。

为国民之母”表达了对女子教育的尊重并代表了民族强盛惟一的希望。^①

这七个神圣的汉字频频出现在女子教科书的开篇,包括谢允燮的《初等小学女子修身教科书》。谢解释道,因为妇女是国民之母,女童教育是当今最迫切的工程,甚至比男童教育还要迫切。^② 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第一章讲到著名的孟母,也以“女子为国民之母”开篇。^③ 吴涛的做法也跟杨千里差不多,他将这一概念和古代典范以及新的政治使命联系起来。他提出,受过教育的女子成为国民之母将会进一步发扬从前的良好家风,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④

正如国民之母这一词汇所指出的,这些教科书的最终目标不是女学生自己而是她的子孙。而她要传播的关键知识是国家意识,从定义上来说,国民之母便是将爱国主义传播给儿子的女人。^⑤

所有 20 世纪初的教科书,无论是道德启蒙书、汉语读本或教师培训手册,都传播着新的民族思潮,期望女性可以将它传给儿子。许多教科书也弘扬了民族自豪感,例如,许家惺在他的修身教科书中宣称:“我国的领土是神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我们的种族是繁盛的华族,自古以来就优于所有野蛮种族。爱国妇女必须懂得这一点。”^⑥ 另一些作者用当代地缘政治学来中和这种沙文主义的意识。谢允燮用地图直观地说明他的观点(见图 1),他解释说,虽然“中国人常称中国为天下,其实它只是东亚的一个国家。”^⑦ 方浏生也同样说道,“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必须学会“学习他们的好方法,而不成为他们的

① 《女子为国民之母》。

② 谢允燮, 1a。

③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 1: 1a。

④ 吴涛, 9b—10b。

⑤ 这又一次呼应了共和母亲的理想。Linda Kerber(*The Paradox*, 268)写道,在共和制的美国,女子只有私下保证了她们的政治就是为家里的男子服务,才能宣称她们参与了政治。

⑥ 许家惺, 86b—87b。

⑦ 谢允燮, 49a。

奴隶。”^①

方浏生进一步解释说,个人与国家相连,就如同地方上某个区域与中国这更大的国家实体相连一样,“我来自南浔,南浔在乌镇,乌镇又属于湖州府,湖州又属于浙江省,浙江省属于中国。”这种地域嵌入的结果是“中国的荣辱都是我的荣辱。无论我是女是男,我都有责任保卫中国”。^②《最新妇女国文读本》的编者以游记的形式,给女读者们勾画了中国从海岸到内陆各个地区。^③除了对国家疆域的介绍之外,还有一系列课文介绍国家从古至今的历史,最后讨论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如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的维新变法,以及义和团运动等。^④《读本》还讨论了“国家”和“社会”等概念,解释了包括政治体制、议会、法律、税收和兵役制度等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构架,将读者引入新的政治想象。^⑤最后,《读本》强调母亲有责任教育儿子认识到公共道德的重要性。^⑥

因此,年轻女子需要掌握、并最终教给子孙的道德和政治原则必须包含在她学习的内容里。然而,体育教育是她个人转变中最重要的一点。和日本“良妻贤母”所强调的一样,“国民之母”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增强女子体魄以强壮种族。

在中国,这并不是第一次把生物意义的母亲和健康的后代联系起来。以前,社会意义的(给予孩子道德教育的)母亲重于生物意义的母亲,但由于妇科医学在帝国晚期的发展,顺序颠倒了过来,养育健康后代的角色受到了重视。^⑦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很多文章用农业生产的

① 方浏生,4a—b。

② 同上书,1b—2b。

③ 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5:2b—3b。

④ 同上书,7:9b;8:16b—17a;9:10a—b。

⑤ 例子同上书,卷4、6、7、8、10。

⑥ 同上书,7:17b—18a。

⑦ Furth, *A Flourishing*, 131, 307; Furth, *Rethinking*.



比喻来形容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例如，一篇清朝中期讨论女性生育失调的文章称，“选择一名女性(作为未来的母亲)就犹如选择耕种的土壤”，20世纪初一位叫孙清如的女作家感叹道，期望次等母亲生出优秀的儿子，就像“种得差又想苗好”。^①但是晚清时期国际环境发生了新变化。妇女不再是为绵延男性血脉去生能干儿子，而是为国家抚育强壮的国民。

这种将生物意义的母亲政治化的新观点得到了很多像孙清如一样的受教育女性的肯定。早稻田大学的医学生，《中国新女界杂志》的编辑燕斌(1870—?)在一篇讨论妇女与医学关系的文章序言中说，只有中国妇女的医疗得到改进，中国国民的体魄才能强健。^②中国首批女教育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之一吕碧城(1883—1943年)指出，公民素质高低与母亲对孩子的道德或智力影响关系不大，而胎教的影响更重要。^③

很多教科书直接将抚育强壮的公民和女子体育教育联系起来。许家惺《最新女子伦理教科书》第六章的标题就是“体育”，副标题是“女为国民之母”。许在课文一开始就指出，虽说体育对男女都很重要，但妇女是“国民之母。她们身体健康的优劣关系到国民的强弱”(见图2)。^④吴涛也在“运动”一章中阐述了“国民之母”的概念。^⑤

这些普通的修身读本、国文识字课本将体育教育与国民之母相联系，此外，一批女子体育教育的专业教材也在此期间出版。其中许多是翻译教材，传达了东亚地区女子体育教育的新概念(但修身读本从未被翻译过)。一位名叫干姆爱兰西(Alice R. James)的英国女子高中校长编写的《女子体操教科书》由日本体育教育界的一位知名人物白井规矩

① Dikötter, 43; 孙清如, 第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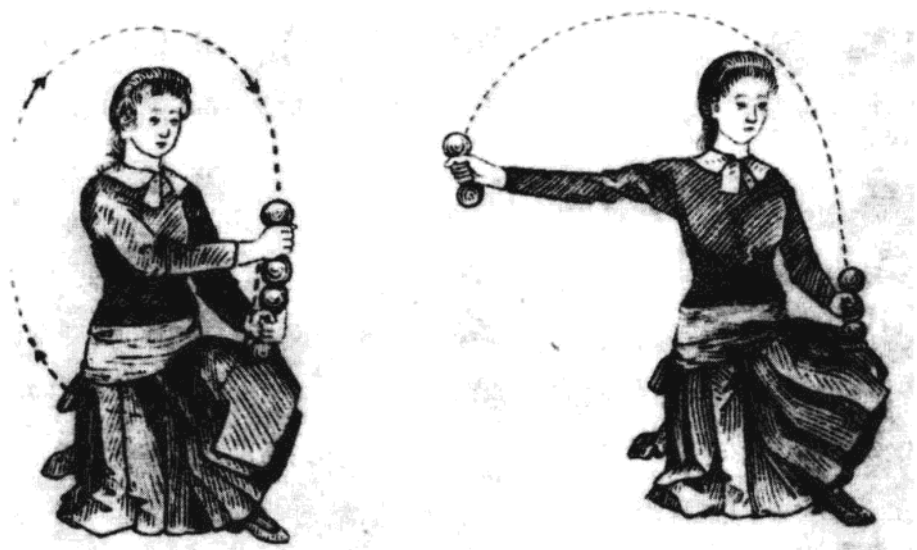
② 燕斌在给彼隳写的序言中写下了这番话。

③ 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第94页。

④ 许家惺, 4b。谢允燮(16a)也强调了体育活动的重要性,他引用西方医生的权威观点,强调男孩和女孩锻炼方式应有不同。

⑤ 吴涛, 13b—14b。

郎翻译成日语,又在1906年由蔡允译成了中文。在前言中,蔡允和白井都强调了女子体育教育和国家的密切关系(见图29)。^①



圖六十第 圖五十第

图29 女孩的体育锻炼

资料来源:Alice R. James, 566

不过,中国在这个领域很快就不怎么依赖外国专业知识了。早在1905年,他们就能够培养自己的体育教师,几年后便开始写自己的专业教材。清末民初时期,徐传霖(活跃于1908年)出版了好几本通用的体育教科书,1908年他还写了《女子体操范本》。^②

这本体育教材反映并促成了学校开设体育课的政策。中国最早的

^① 白井規矩郎,2b;蔡允,1b。不知道这本书最初刊行的时候是英文版还是日文翻译版。

^② 我从《介绍批评》中找到了关于徐传霖这本书的信息。有关徐传霖在民国初年出版的教科书,可参见张静庐,《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243、244、247、249页。

私立女子学校往往模仿日本学校，在课表中设置一些体育课程。下田的弟子河原操子任教的上海务本女学堂还举办了包括竞走在内的运动会。^① 学部 1907 年的女子学校章程中也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中国学校也像下田的实践女子学校一样，每周的课表中都要安排几个小时的体育课。初级小学在 26 个小时的学时中安排 4 小时体育课，两倍于修身课的课时；高级小学则是 30 小时内安排 3 小时，而师范学校是 34 小时内安排 2 小时。^②

对女子体育教育的关注与 20 世纪早期的反缠足运动密不可分。教科书作者提出了几个反对缠足的论据。据谢允燮的说法，缠足阻断脚部血液循环，妨碍自然生长，使妇女身体衰弱，还使她们在遇到洪水、火灾等天灾或者太平天国运动等人祸时难以逃生。但是，在谢允燮以及其他教科书作者那里，反对缠足最重要的理由是小脚女人不能抚育强壮的国民。^③ 《最新妇女国文读本》有一篇课文介绍了 1908 年天足会成立的经过，编者在其中阐述了“国民之母”的概念。课文宣称“女子是国民之母。女子身体的强弱直接影响男子身体的强弱。今天，妇女缠脚令她们身体虚弱，导致男子不能强壮。这将影响到我们民族的未来”。^④ 而“女子是国民之母”这一神圣口号的课文作者称女子教育应该分三步走，女子教育的目标旨在强盛国家，而第一步就应从反缠足开始做起。^⑤

对母亲的引用

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体育和国际政治成了女子教育中全新的内容。

① 例如，可参见《务本女塾增设初等高等女子小学规则》，第 594—595 页；《务本女塾及幼稚舍运动会记》；陈擷芬，《记务本女学堂》，第 599 页。

② 《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第 661—665 页；《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第 671—672 页。

③ 谢允燮，28a, 29a。

④ 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9:5b—6b。其他教科书也同样把母亲、民族和缠足联系起来。例如，可参见方浏生，19b。

⑤ 《女子为国民之母》，第 607 页。

然而,从先秦时代起,相信胎教的人们就将母亲和儿子的身体联系在了一起,女教书也规定母亲对儿子的早期德育负有责任。对这一历史遗产,20世纪初有关母亲角色的各种新理论吸纳了不同的成分。无论他们推出的是新的“国民之母”还是旧词新解的“贤母”,都采用了历史上的模范母亲的文化形象来宣传民族主义对母亲的新认识。在有关现代母亲角色的讨论中,处处引用历史模范人物是中国文献的突出特点。虽然国民之母的概念来源于日本的良妻贤母思想,而且这两个东亚构想都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气质及共和母亲的概念相呼应,但唯有中国将历史高度整合进了政治性的母亲角色。^①

删 除

在古典现代派有关国民之母的构想中,删除历史和引用历史一样重要。就像对帝国晚期的才女作品的批评一样,古典现代派也批评近代的母亲的做法,他们指责慈母宠坏了孩子,不能培养子女的品德和才能。他们将这种不合格的母亲比作在当前社会风气中缺乏道德勇气的人,正如才女代表陈腐的文化一样。他们认为母亲的纵容娇惯和才女们感伤的诗作一样有害于中华文化的新生。

这种对慈母的批评与《礼记》中得到确立的母亲角色的等级制度是一致的。根据这部礼仪经典的说法,一个孩子由三种妇女负责抚养。按重要性来排列,首先是“子师”,她应该正直、端庄、严肃,谨言慎行。排第二位的是慈母,第三是保姆,后两者的作用不那么重要,描述也不详细。^②改良派魏息园在他的选集中区别了教子之母和慈母。他提出,未受过教

^① 法国和美国共和母亲或爱国母亲的概念发端于斯巴达的母亲。Kerber, *The Republican*, 42。但斯巴达母亲只是一个孤例,而中国人有一个丰富复杂的资源库,其中也包括了斯巴达母亲(例如,可参见柳亚子,《论铸造国民母》,第574页)。日本也倾向于以年代稍近的人物为模范,不要那些年代太久远的人物。

^② Legge, *The Nei Tse*, 473。

育的母亲用“姑息”去爱自己的孩子，而受过教育的母亲则用“义方”去爱。^①但魏息园相信不仅在古代，就在近代也存在有原则的母亲，他这一点看法与古典现代派不同。

当古典现代派描写近代母亲形象时，由于他们并不认同这一形象，便有意忽略了上层女性以“家学”传统传授基本经典的关键历史文化角色。事实上，即使在妇女问题上并不开明的宋代，许多受过教育的母亲都会教子女阅读，带他们读一些经典的蒙学课本。在帝国晚期，妇女继续以母亲身份承担蒙师的角色。^②然而，20世纪之初的古典现代派无论男女，都坚决否认这个历史遗产。

“共爱会”是一个以东京为基地的妇女组织，一些“共爱会”成员撰文称，中国历史上女子教育水平非常低，因此母亲不是教育子女的合适人选。据他们的说法，“欧美二洲，其幼童之习皆以妇女充之……今我中国女子，其程度且不啻幼童。”^③另一篇发表在海外杂志上的谈家庭教育的文章也有类似观点，其作者很可能是男性。他声称，日本和西方的政府理解母亲的重要性。在日本人看来，“建立美好的家庭，必须先培养贤明的母亲。”而据拿破仑的说法，“孩子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母亲的知识程度。”作者感叹道，“在中国情况不同，妇女愚昧无知，不会自我进取。”他的结论是，“在中国，家庭教育要采取别的方法，父亲必须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④

如前所述，教科书在抨击才女的同时，也赞成近代母亲愚昧无知的说法。吴涛在“为母之权限”一章中称，中国的父亲对子女教育负有责任，而妇女很少有受教育的，并且她们认为这些事情与己无关。^⑤

① 魏息园，VI. 16。

② 有关宋代的母亲兼蒙师，参见 Ebrey, *The Inner*, 185-186; 有关 17 世纪的内容，请参见 Ko, *Teachers*; 有关 18 世纪的内容，参见 Mann, *Precious*, 101-108; 明清两代的内容，参见 Hsiung, *Constructed*, 94-95, 97, 99, 108。

③ 《共爱会同入劝留学启》，第 160 页。

④ 《论家庭教育》，47[801]。

⑤ 吴涛，28a-29a。

一些教科书编者不仅将近代中国不合格的母亲与西方成就卓著的母亲相比,而且还跟中国古代的模范母亲比较。例如,杨千里认为贤母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早就存在。从周朝直到秦汉女子教育都十分盛行,造就了圣贤英雄辈出的时代。^①一位名叫孙清如的女记者、教科书作者也说,近几个世纪以来,未受教育的女性不是像古代妇女那样用礼教来训诫子女,而是溺爱后代,把他们宠坏了。^②吴涛则称这种母亲给孩子的“慈训”根本没有知识和道德的实质内容。^③

由于“溺爱的慈母”成了批判的对象,一些古典现代派文章就从历史上挑出一些具体的母亲作为典型加以批判。一首谈到“母型”的校歌引用了宋代学者程颐(伊川,1033—1107)举过的例子:有一位母亲在儿子每次犯错误时都替他担当,最终毁了儿子。正因为母亲的纵容,儿子从小目无尊长,长大后缺乏礼貌。^④《最新妇女国文读本》的编撰目标很明确,就是培养“令妻贤母”,因此选取了大量过分宽容的当代母亲的故事来当作为反面教材。例如,于青(音)的母亲由于太溺爱儿子,即使他在说谎或浮夸,都听信他的每句话。结果他长大以后缺乏道德判断力,被人们看成“虚言家”。^⑤

历史上堪为典范的母亲

反面的历史典型在20世纪初的材料中极为少见,但那些历史上堪为典范的母亲却被改良派和古典现代派广为引用。当我们比较这两派人物引述的策略和对同一故事的不同讲法时,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立场的差异。尽管如此,他们对模范母亲的讲法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从中

①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1:1a。

② 孙清如,第2页。

③ 吴涛,28b。

④ 叶中泠,第24页。

⑤ 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7:12a—13a。另一个例子可见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9:12a—13a。

可以看出中国人所理解的“母亲”这一概念的核心特征。

受到赞扬的伟大的中国母亲培养的都是儿子，而不是女儿；她们给孩子的从来都是严厉的教诲，而不是亲切的鼓励；她们做母亲的经历被描绘成苦难和牺牲，而不是喜悦与满足；她们常常会伤害自己或破坏周围的物品，以便让孩子们深刻地记住重大的人生哲理而非知识。^① 像许多其他著名的中国妇女一样，她们通常是寡妇，之所以能被载入史册，是因为她们的丈夫由于亡故、缺位或别的原因无法担任教导者的角色。她们不只是赋予孩子生命的生身母亲，而且是文化的创造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

从 20 世纪初的资料来看，一些原型式的母亲(Ur-mothers)在众多的模范母亲中特别突出，包括周室三母、孟子(公元前 372—289 年)和欧阳修(1007—1072)的母亲。从永恒主义者戴礼的《女小学》到最具自我意识的新教科书，从改良派的传记选编到妇女杂志的杂文，各种晚清文本都在反复讲述这三位母亲的生平故事。在主要由改良派编写的后世女子传记中，她们的故事也成了范本。

周室三母：胎教和文化声望

在 20 世纪初的文献中，周王朝的三位母亲地位突出，体现了人们对母亲间接扮演的国家角色的关注。这三位女性分别是传说中的周朝(公元前 1122—255 年)奠基人的母亲或妻子：征伐商朝创建周朝的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活跃于公元前 1160 年)、妻子太姒(活跃于公元前 1140 年)，以及周朝的第一位统治者、周武王的妻子太姜(活跃于公元前 1122 年)。她们三位(史称周室三母为太姜、太任和太姒。其中太姜为周朝先祖古公亶父之妻、周文王之祖母，而非周武王之妻，此处原文有误。——译者注)的故事最初出现在《国语》、《诗经》、《史记》、《汉书》和《列女传》

^① 在特殊时期，有些杰出的母亲的确承担了教师的责任。例如，魏息园(VI. 16)和许定一的《祖国女界文豪谱》都记载了一位女性，即元代虞集(1272—1348)的母亲杨氏(活跃于 1280 年)，在蒙古人占领中原的混乱时期，她为儿子虞集和虞槃口授儒家经典。

等早期的儒家经典中。

太任是胎教和生身母亲的绝好典范。根据《国语》的记载,一位叫胥臣的大夫用太任的例子向晋文公说明了胎教的重要性,据说太任怀着未来的周文王时行为举止无可挑剔。胥臣强调指出,孩子的学习能力取决于他的“质”,而这是由他在母腹中受到的教育质量预先决定的。^①此后千百年来,太任的榜样不断被提及,讨论产前教育的家书、家训和朱熹的《小学》等颇有影响的哲学著作里都以她为例。^②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的教科书中。戴礼的《女小学》大致模仿的是朱熹的《小学》,她在提到



图 30 太任精心进行胎教

资料来源:魏息园,VI,1

母亲时特别突出了太任。^③曾懿在她的《女学篇》胎教一节中引用了不少刘向写“太任”的条目,但没有明确提到她的名字。^④

在《绣像古今贤女传》“教子”章的开篇,魏息园引用了刘向《列女传》中太任的故事。根据他的描述,文王卓越的才能、品德和慈悲都要归功于太任在孕期格外谨慎。她“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非常注意自己坐卧的姿势和食物的加工方式(见图 30)。魏息园在他的评论中给这个古老的故事赋予了时代性的、世界性的意义。他写道,“家之成败,国之兴

① Despeux, 第 70—71 页。

② 同上书,第 95—97 页。

③ 戴礼,4:1a。

④ 曾懿,1:8b—9a。

亡系焉。”^①

古典现代派将胎教和国家联系了起来，因此女子教育也势在必行。前面提到的梁启超在关于女子教育的文章中坚持胎教对于国家而言十分重要，而他的老师康有为则认为母腹中的教育关系到人类的改善。^② 经元善于 1899 年提倡女子正规教育时，强调了妇女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问道，没有太任和太姒，“何来文王、武王”。^③ 孙清如在杂志上撰文倡导妇女权利和女子教育，她也引用“周室三母”的成功故事来证明女子教育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④ 教科书作者们也提出了类似的相关关系。例如吴涛就认为，杰出的周朝文化被后世视为中华文明的典范，但它“植根于内闱之中”。^⑤

改良派的文章里还写到了后世效仿太任的模范母亲，例如《中外新列女传》中有一篇名为《李太夫人之胎教》的传记，反复申明母亲在妊娠之初就对孩子的道德和智力有影响。这一传记的主人公是南昌的万承苍的母亲。万承苍在雍正（1723—1735 年在位）时期和乾隆（1736—1796 年在位）早期时曾任翰林院编修。传记中写道，万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每天在佛寺祷告（见图 7）：“不愿生儿为高官，但愿负荷先世之学统。”万承苍很小就开始上学，果然和他的先祖一样酷爱王阳明（1472—1528）的儒家学说。在传记作者看来，他对学习的热爱应当归功于胎教。^⑥

孟子的母亲：选择文明的环境

在古代和晚清文本中，儒家学者孟子的母亲称得上是模范母亲中的

① 魏息园，VI. 1。

② 康有为在他论述乌托邦社会的专著《大同书》中甚至倡议应该设立负责胎教的专门机构。Despeux, 第 96 页。

③ 经元善，《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第 882 页。

④ 孙清如，第 6 页。

⑤ 吴涛，2b。

⑥ 《李太夫人之胎教》。根据 Despeux 未发表的会议论文，晚清时期的教科书对李太夫人的胎教有所讨论。



图 31 孟母终于把家搬到学宫旁

资料来源:谢允燮,39b

模范。20 世纪初的材料对孟母品行节操的描写取材于《列女传》和另一部汉代著作《韩诗外传》。第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只见于《列女传》，为了确保儿子生活在良好的环境中，孟母先从坟场附近搬到市场附近，最后搬到了学宫旁边(见图 31)。^① 第二个故事经常用画面来呈现，在《列女传》和《韩诗外传》上都有。这个故事说小孟子放学后，向母亲宣布他打算不再上学了，孟母听后，将她耗费了大量时间才织成的一段锦绢割成了两半。她用这个戏剧性的行为向孟子表明，中断学业对教育的损失也是不可挽回的。^②

第三个故事来自《韩诗外传》，描述了孟子母亲如何教会儿子诚信的价值。有一天，小孟子问母亲邻居们为什么杀猪，她谎称说是为了给孟子吃。后来她从邻居那儿给儿子买来了猪肉，兑现了自己的话。^③

晚清时代的各种孟母故事传达了特定的政治或文化意义。古典现代派将这个经典形象明确地加以政治化。如上所述，杨千里将她和中国的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在他的《新读本》中有三章专门论述“妇女是国

①《列女传》，1:11；张敬，第 35—40 页；O'Hara，第 39—40 页。

②《列女传》，1:11；张敬，第 36 页；O'Hara，第 40 页；Hightower，第 290 页。

③ Hightower，第 290 页。

民之母”。^①《最新妇女国文读本》的编者也给这个古老的经典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虽然第一卷的一篇课文中只是重新讲了讲孟母最为人熟知的三件事,但第七卷名为《说勇》的一篇课文则将她塑造为民族女英雄。

《说勇》这一课详细地讲了孟母、邻居和猪的故事。它还提到了孟母卖掉发簪和耳环给儿子买肉等原始文本里没有的细节。妇女卖首饰维持家计的行为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历史,但在清朝末年,这种行为的目标从家庭变成了国家政府,女子典当珠宝衣物以献金给政府、购买国家铁路公司的股票或用于其他公共福利成了值得鼓励的事。^②根据这些教科书的描写,孟母的行为所表达的是女子的爱国主义,而这在20世纪早期已得到认可,同时,编者还给历史悠久的母亲角色注入了新的政治意涵,女性新的政治实践也由此得到了认可。^③

教科书还将孟母与国际上各位模范母亲相提并论,以加强这种政治共鸣。比较对象中有一个是中国女杰,唐代郑义宗的妻子,她为了保护婆婆打跑了窃贼。^④其他都是当代的外国女杰,她们在本世纪初席卷全球的政治斗争中无私而英勇。这里面有卖掉头发为军队筹款的日本爱国女子;还有如第二章所提及的勇于为社会牺牲的西方女杰,比如“冒着生命危险……,随军(上战场)救死扶伤”的红十字志愿者等等。从孟子母亲到红十字会护士,这些女子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按课文编写者的说法,这便是“急公好善”。这一信仰使她们能够超越自己柔弱的身体,为国家历史做出贡献。^⑤

①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1:1。

② 《最新妇女国文读本》也有一篇课文描写了女界保路会的成员典当自己的“发簪、耳环和义务,购买股票,帮助国家保住苏州—杭州—宁波铁路的主权”。见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4:11a—12a。1910年收在《龙江女学文范》中的文章包括一篇题为《捐首饰建银行之政策》的文章;参见陈东原,第348页。

③ 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7:2a—b。

④ 有关郑义宗的条目请参看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1:12a—b;魏息园,IV.5。

⑤ 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7:2a—b。其他晚清的作家也以类似的方式引用了孟母的故事。孙清如将孟母三迁的故事和女子教育计划以及国家强盛联系起来。参见[孙]清如,第3页。一所招收中国女留学生的日本学校的章程指出,孟母“为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参看《日本东亚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俗称师范学堂章程》,第145页。



图 32 孟母断机启圣

资料来源:魏息园。VI. 2

与古典现代派的评论家相反,改良派没有将孟母的故事纳入英雄式的民族主义方向。魏息园也讲述了这三个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有的故事,特别突出了断机杼的故事。他将这一条目命名为“断机启圣”,并附上了表现孟母纺织的插图(见图 32)。然而,魏息园对孟母的处理与众不同,他从《列女传》中直接引用了表现她品行端正的第四个事例,而几乎没使用 20 世纪初的材料。这个故事里孟母不再是孩子威严的导师,而是顺从成年儿子的母亲。当孟子告诉母亲因为她年事已高,他

正在犹豫是否要离开他当时为官的齐国出去周游列国,她回应说,完全由他自己做主。她尊奉的是自己教给孟子的礼教原则——三从,即女子在生命过程中,先后要服从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并听命于他们的意愿。^①

从魏息园所引用的这个成年孟子故事中,可以看出改良派和古典现代派在表现母亲时的第二个差异。只有改良派文本将母亲写成成年儿子的对话者和顾问,这种母亲的女性特质和小男孩的母亲有所不同。后者给幼子基础的道德教训,突出了古典现代派新的历史出发点,

^① 魏息园, VI. 2。

而前者继续对成年儿子发挥着影响,反映出改良派对文化连续性的强调。这些不同的描写隐含着不同派别对女子和国民的理想关系的不同设想。在古典现代派那里,母亲对幼子的影响力是前政治的,这与他们对中国女子当前的智力和政治能力的判断是一致的。相反,母亲给成年儿子以道德和策略上的建议则具有——虽然是间接的——政治上的影响,这与改良派对女才的评价相符,在改良派看来,女子的才能可以通过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得到发挥,达到更大的善。

魏息园、《北京女报》的作者和其他改良主义者所称颂的几位成年儿子的母亲都出自《列女传》。楚将子发的母亲不仅有良好的判断力而且有历史知识,她能用越王勾践的旧例来说服儿子善待部下。^① 田稷子的母亲劝诫儿子万勿政治腐败,儿子听取了她的话。^② 西汉时期陈婴和王陵的母亲是通晓政治和军事的典型。^③ 隗不疑的母亲教育她当汉朝京兆尹的儿子执法时要宽仁。^④ 还有吴夫人也给儿子孙策(174—200)提出了高明的军事建议。^⑤

年代稍近些的圣人指导者有虞泽(活跃于341年)的母亲孙夫人,她教儿子认识到了忠诚的重要性;王义芳(615—669)的母亲鼓励儿子审查腐败官员,即使这会危及自己的仕途也在所不惜;唐朝将军李景让的母亲为儿子提供军事指导;还有隋唐官员郑善果(572—629)的母亲崔夫人,她在帘子后面听儿子议论政事,一旦发现他逾矩行事,就私底下对他提出反对意见。^⑥

《中外新列女传》收录了许多这种近代历史中的母亲。颜中丞(名静

① 魏息园,VI.3;《子发》。

② 同上书,VI.4。

③ 同上书,VI.5。在《列女传》中陈婴和王陵的母亲有各自单独的条目,而魏息园则将她们二位放在一个条目之下。

④ 同上书,VI.6;《隗不疑》。

⑤ 同上书,VI.7

⑥ 同上书,VI.8,9,10,11

甫,活跃于1750年)康熙时期任山东平度州知府。当时平度州突发水灾,破坏严重。颜母作主开放官府粮仓,赈济贫民。皇帝降旨奖赏颜家,擢升颜静甫为知府并特赐匾额给太夫人表示褒扬。^①

上述最后一个例子表明,改良派和古典现代派之间的另一区别在于他们对唐宋到明清之间的母亲的描述。虽然古典现代派对这些妇女表示不屑,但改良派赞颂了一大批这类母亲,称她们是孟母在当代的化身。和古代的母亲一样,近代历史上的这些母亲是严厉的道德导师,并非只知道仁慈和感情用事。

在这些严格的导师中最突出的是宋代儒家学者的母亲。魏息园在宋代的寇莱公(961—1023)故事中评论道,有些男儿是生而有“雄气”,而他们的母亲却很贤明。他指出,所有的年轻男子都渴望冒险,喜好驰骋田猎,他们母亲的责任就是约束这些冲动,教育他们懂得学习和学术的重要性。该传记中的一段小故事与孟母断机杼异曲同工:寇莱公的母亲试图改变儿子重狩猎轻治学的倾向,发现劝说无效之后,愤怒的她用秤锤砸伤了自己的脚。震惊的寇莱公就像警醒了的孟子一样立即改变了态度,最终成了宋代名相。^②

魏息园还对著名宋代理学家吕希哲(1039—1116)的母亲表示了赞美。他详细描述了吕母对儿子实施的严苛管教,例如在儿子10岁时就强迫他在雨中站好长时间。像孟子的母亲一样,吕母还试图防止儿子堕落,她禁止他去茶馆酒肆或阅读不良书籍。^③ 赞美吕母的同时,魏息园还提到了另一位模范母亲,即著名的程氏兄弟程颢(明道,1032—1085)和程颐的母亲。和吕希哲的母亲一样,程母对儿子们的饮食穿着都有规定,还教育他们克制欲望。最终二程都不负母望,成了当时的圣贤。^④

① 《颜太夫人发仓粟赈饥》。这个故事初次见于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I:1,142—43。

② 魏息园,VI.12。

③ 同上书,VI.13。

④ 同上书。

这些尽职的母亲利用为人之母的影响力，不仅培养了正直的儿子，而且丰富了中华文明。魏息园极力赞颂孟母式的女性，她们为儿子的发展，进一步说也是为文化的发展积极创造了条件。程夫人（活跃于 1040 年）是宋代文豪苏轼（东坡，1037—1101）的母亲、苏洵（明允，1009—1066）的妻子，为了使家里的男性能好好做学问，她承担了家中一切实际事务，因此，她的两个儿子潜心研究学问，成为了第一流的学者。^① 同样，清初梁廷佐（活跃于 1700 年）的母亲冯夫人（活跃于 1650 年）不仅帮助家人专心向学，还在当地购置土地，兴办了一所学校。^②

在改良派的材料中，明清时代的母亲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她们尝试从严苛的母亲兼蒙师转向一个稍微温和一些的类型，即孟母或宋代学者的母亲那一类。著名的乾嘉学派学者洪亮吉（1746—1809）的母亲形象在《中外新列女传》中是一个有人情味但又不放纵溺爱的近代母亲。^③ 这篇传记认为洪母继承了孟母的传统，插图也画的是她在织布机前纺织，年幼的洪亮吉在她旁边的小桌子上阅读（见图 33）。同时，传记也描述了她感性的一面。有一次，她儿子正在朗读《仪礼》的一段，有一句是“夫者妻之天”。这位守寡的母亲眼泪不禁涌了出来，感叹“吾何戴矣”！为了不让母亲难过，儿子停止了诵读。洪亮吉后来的造诣显示出他也同样的感性。根据《中外新列女传》，洪亮吉身为翰林院编修，还是画家、诗人和书法家。他一生保持着高尚的品德，这是他母亲精心培育的成果。^④

① 魏息园，VI. 15。

② 同上书，VI. 18。

③ 有关明清时期严厉的母亲跟儿子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可参见 Hsiung, *Constructed*, 94, 104。

④ 《洪太夫人教子成名》。《清史稿》中有关洪亮吉母亲的传记也概略地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个传记一字不差地引用了其中的两个短语，还引用了“夫者妻之天”的说法，但认为其出自《礼记》。赵尔巽，46: 508, 14025。有关洪亮吉的内容，参见 Hummel, 373 - 375; Elman, *From Philosophy*（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106, 121, 123; Hsiung, *Constructed*, 95 - 96。关于洪亮吉童年时期的故事以及母亲在早期教育上对他的影响，请参见 Jones, 第 30—42 页，特别是第 32 页。



图 33 洪母织布,小亮吉在她身旁读书

资料来源:《洪太夫人教子成名》

欧阳修的母亲:拮据的寡妇

孟母和洪亮吉母亲这样的是标准的节母,也就是说她们在丈夫死后,惟一的志向就是好好培养儿子。这种母亲的形象明智能干、正直纯洁,在刘向写作了《列女传》之后的千百年里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巩固。^① 元朝时期,学者们决意在蒙古统治之下重申儒家学说的核心地位,于是出现了一位新的模范母亲:北宋官员欧阳修(活跃于 1010 年)贫困的寡母郑氏。

^① 例如,成书于 17 世纪的《隋书》中,所有的好母亲都是贞妇。Mou, 第 121 页。

有关欧阳修母亲的记载最初见于《宋史》，她代表了战胜丧偶孤独和贫穷困苦、培育杰出儿子的女性。后来比较经典的说法是，郑氏买不起笔墨纸张，就用芦苇在地上写字教儿子（见图 34）。由于帝国晚期对女性的贞操更加关注，欧阳修母亲的例子便被用来鼓励年轻而贫困的寡母战胜困窘、尽心培育亡夫的后人，而不要去再嫁他人。

除了孟母，欧阳修之母便是古典现代派课本中最常见的模范母亲，这些课本常常把她和孟母相提并论。在谢允燮《初等小学女子修身教科



图 34 欧阳修的贫母以荻画地，教子学书

资料来源：谢允燮，44b

书》中有两篇关于“母教”的课文，第二篇描述了郑氏用芦柴棍写字教育儿子的故事。^① 许家惺和吴涛称赞孟子和欧阳修的母亲，说她俩一前一后，都是母教的模范。^② 《中国女杰小乐府》还将《宋史》中欧阳修母亲的传记改写成了抒情的乐府音乐，并以模范母亲为题。^③

改良派也赞美欧阳修的母亲。魏息园在“画荻教子”（用芦苇在地上写字教育孩子）这一条目之下称赞郑氏培养儿子追随父亲的志向。^④ 为了

① 谢允燮，45a。

② 许家惺，15b—16a；吴涛，30a。

③ 谢允燮，25。

④ 魏息园，VI. 14。

呼应郑氏的故事,《中外新列女传》还赞颂了一位清代人物,即汪廷珍(1757—1827)的母亲程氏。汪廷珍 12 岁时父亲去世了,程氏将他培养成了一名正直的官员。^① 传记中说他们母子穷得一天只吃一顿饭,插图描绘了母子二人分享一碗饭的情景。程氏向世人展现了她面对贫困时的尊严。她认为乞求帮助比贫困更为羞耻,不愿向人诉说他们的困境。她的自尊塑造了儿子的性格,后来他在履行公务时严守法纪,办事严肃认真、遵循礼法,都源自“太夫人教也”。^②

欧阳修母亲的传记套路还被改良派用来写当代的贫困寡母。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以乞讨为生的姓刘的母亲。虽然她只接受了初等教育,但她孝顺的品格吸引了未婚夫,于是她在 16 岁成婚并很快生下一个儿子。此后不久,她丈夫和父亲都死于火灾,她变得一无所有,被迫乞讨为生。但她利用所有空闲时间来教育儿子,像欧阳母亲一样,她“折枝画地”教儿子写字,还用乞讨得到的钱给儿子买书。当她乞讨时,儿子就背诵课文,他常常因其聪明得到施舍。1910 年,刘氏病倒了,她要儿子牢记学习和光耀门楣的重要性。在她去世后,儿子继续发奋研读,后来创立了一所平民学校。^③

对照:反母性的案例

本章讨论了对历史模范人物的各种引用以及对母亲角色的各种再理论化,展现了晚清作者在以母亲作为妇女进入公共领域的中介、家庭与国家间的桥梁时所采取的复杂方式。他们在家庭生活与政治之间所找出的联系在 20 世纪初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发明。至少从《列女传》时期以来,在中国的性别观念中母亲的影响力就从内闱渗透到了外部世界。

① 汪廷珍 1789 年中了进士,最后官至礼部尚书。参见 Hummel, 第 776 页。

② 《程太夫人之耐贫》。

③ 《刘丐妇守节抚子》。

20 世纪初的贤母、良妻贤母和国民之母概念,只不过是这一历史悠久的思想的新发展,它带着种族倾向,面向全世界。

无论是继续把女性塑造为贤母的改良派,还是自觉使用“国民之母”这一新词的古典现代派,都强调了生身母亲的政治意涵。魏息园在一些评论中强调指出,对于国家强大来说,女子所扮演的角色即使是间接的,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角色始于母腹孕育儿子生命之初,一直持续到他们长大成人入朝为官。魏还声称,只要有像古代田稷子和李景让的母亲一样贤明的女性来襄助儿子,当今官僚腐败、军事不利等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古典现代派将母亲角色与更为积极的女性参政形式联系起来。政论家和教科书作者称赞孟母的爱国精神,赞美缔造了中华文化的古代母亲,强调女子教育与民族生存密切相连。虽然他们以“国民之母”的理想认可了女性新的知识领域和体态,但还是只说女子为文明创造环境,而非直接对文明有所贡献。女子识了字便可以成为有用的母亲和妻子,可以掌管家里财政收支、缴纳税赋,还可以写信让出远门的丈夫和家里保持联系。^① 假设 20 世纪早期的妇女就像宋代苏轼或清代梁廷佐的母亲那样善于打理家政,家里的男子就可以继续在外面治学、为官,担任更重要的角色。虽然这些教科书作者也强调了与家政相关的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如卫生和儿童心理学这些新知识,但最终还是强化而非改变现有的女性角色。

由此,古典现代派和改良派都通过“母亲”和“教育”将女子间接地与国家联系起来。他们将爱国新公民的出现和优质育儿相联系,而优质育儿又与女子教育相关。他们整合了母亲、民族主义和教育的议题,确定女子教育的目标是发展母亲的技能,而母亲的技能能给未来中国的男性公民提供有效指导。

^① 有关女子识字的作用,请参见吴涛,38b—39b;方浏生,27b—28a。也有专门教写字的教科书,比如彪蒙系列。

当下主义者强烈抵制这种女子学习和参政的调和方式。陈以益(活跃于1909年)是《女报》的创始人,革命烈士秋瑾的同路人,他在1909年宣称,最近成立中国女子学校将妇女贬低为丈夫和儿子的“识字之婢女。”^①以他为代表的一些评论家认为,教育是一个赋权的过程,而不是功利主义的过程;母亲的角色只是学习的障碍,不是学习的目标。他们也充分认识到新型女子教育背后民族主义者的迫切心情,但仍坚持认为女子应当自己去掌握并实践国际政治知识。与其将她们培养成为国民之母,不如使她们成为独立的公民。

本章开篇引文中提到过吴孟班的话,她相信自身的教育比起教导孩子更能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无独有偶,革命医生张竹君(约生于1879年后)是女子教育和就业的推动者,她拒绝结婚生育。她坚信家务会妨碍她献身于民族的事业。^②革命烈士秋瑾离家去日本追求她的教育和革命抱负时撇下了一双年幼儿女,摒弃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③

医科学生燕斌是《中国新女界杂志》的编辑,她也直言不讳地支持女性扮演新的政治角色,不要以母亲身份作为中介。燕斌在她的杂志中推动“女子国民”的理想,她强调,若女子和政治之间建立了直接关系,这一理想也就卸去了历史包袱。虽然永恒主义者、改良派和古典现代派建构的贤母良妻、贤母或国民之母等能与历史相呼应,燕斌还是坚持认为,“女子国民”一词的力量在其与过去的决裂。她写道:“这‘女子国民’四个字,自从当初造字的老祖宗仓颉造出这四个字起,经过了四五千年,他们四个字总没有在一块儿亲热过一回。”^④,燕斌和其他当下主义者宣称,古典现代派援引国民之母和改良派母性美德的观念导致女子被客体化,是时候冲破这些束缚了,应当开始书写女性自己的历史。

① 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

② 马君武,第3页。

③ 秋瑾1905年、1906年从日本回国时没有去看望她的孩子。她也没有告诉她的同事和同道徐自华她有孩子。第六章我们将对秋瑾进行讨论。

④ 燕斌,《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

第三部分

新的世界女杰谱

木兰本是将门之女，或者预先晓得些武事，亦未可知……若安（即圣女贞德——译者注）为法国农家的少女，向未习武，又非贵族，……（木兰）的事业亦不过代父从军，并没有什么大功劳……（而若安）要听神命，就做不孝的女子……（木兰）的名声不过传于一国……（若安）把一个亡国都振奋起来，真是从古以来少有的女杰……一个人只要有志气，那怕他是不出门的闺女，他的事业就是同一等英雄豪杰比较起来亦分不出高下的。

——梅铸，“法国救亡女杰若安传”

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话语中，英雄气概也加入了女才、女德的行列，成了女性特质。上面的诗文引自圣女贞德（1412—1431）的传记，从中可以看出英雄气概这一新的特性被视为世界性的，有高下之分的。致力于动员女同胞参加民族斗争的晚清作家们，经过仔细比对，把中国历史上的女英雄和西方女杰的业绩来了个大排名。笔名为梅铸的作家认

为圣女贞德排在花木兰之前，但蒋智由则宣称花木兰和贞德均不及斯托夫人。^① 当时的中国妇女也出现在世界女杰的谱系中。革命烈士秋瑾被处决后不到一个月，一位署名“明夷女史”作者说，像动物一样无知的女性充斥了中国历史，只有少数中国妇女摆脱了愚昧，其中包括了南宋爱国女杰梁红玉（约 1100—1155）和明朝忠臣秦良玉（卒于 1648 年），但她们也只是为了家庭进行斗争。只有秋瑾（如同西方女杰一样）为公民权利而战斗，为中国人民抛洒热血。^②

在这种跨文化的评价中，对梁红玉、秦良玉和花木兰最不利的是她们忠于女德制度的基本原则——为家庭奉献。从前花木兰那样的女勇士受到称赞，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她们重视家庭的美德；而 20 世纪初，新的英雄主义的行为规范要求她们反对女德制度。这种价值观的变化也表现为语言上的转变。永恒主义派和改良派继续把女英雄描写成“烈女”，而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却只是在嘲讽时才提到这个字眼。真正用于形容女英雄时，他们使用了各种新的复杂的表达形式，包括女豪杰、女英雄、女杰、女英雌和巾帼之杰等等。

如前所述，古典现代派改编才女故事以便为国家服务，改良派对帝国晚期过分的女德制度加以约束，而当下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把女杰从儒家道德约束下解放出来。虽然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都将女性纳入了民族英雄主义的新风气，并将西方妇女引为典范，但古典现代派不同意当下主义者将女杰与任何形式的女德分离开来的看法，他们也不认同当下主义者崇尚个人自由、以暴力参与政治的做法。对于

① 蒋智由，《爱国女学校开校演说》，2a—2b。

② 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明夷”是《易经》的六十四卦之一。晚清时期“明夷”卦意味着君子受困，无法实现理想。

政治体制，古典现代派仍坚持嵌入式的观点，认为妇女在国家中的新角色应该通过在家庭中由来已久的传统角色来间接实现。他们的理想是“国民之母”而不是“女性公民”，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他们讨论西方社会女杰的成就时，会使用包括“慈母”等母亲式的比喻来加以调和，而当时这些词汇已不用于讨论中国的母亲了。第五章考查了这些互相竞争的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探究它们是如何在当下主义者和古典现代派对中国和西方妇女的论述中交织在一起的。

第六章的重点转移到晚清妇女，从秋瑾式的煽动者到其他比较温和的女性，都在构想并引用自己理想中的新女杰。她们不再是讲述自我牺牲的儒家话语中沉默无言的客体，而是公共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女教育家，她们成了国家舞台上的新演员。但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给她们赋予了新的角色，同时也约束了这些角色，她们也不断为性别悖论所困扰。这一时期女性经历的矛盾和分裂凸显了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的立场间的差异，并暴露出 20 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进程中的困惑。



第五章 中国女勇士与西方女杰

木兰之名，至今妇孺莫不知而赞之，不必待余表彰。若复啧啧不休，是蛇足也。虽然世俗仅以为孝女，而余则以为实祖国之女军国民也，其追杀胡人不遗余力，爱国之诚迫于眉睫，非种族主义刺激者，余岂肯信哉。阅者勿徒嘉其孝且勇也可。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

在上面引述的传记中，许定一对伟大的中国女勇士花木兰的故事做了一番大大的修改。故事原本说，一个孝顺的女儿女扮男装，代替年老体弱的父亲应召参军。许定一在 20 世纪早期重讲这一故事时，把这个故事的寓意从孝顺变成了勇敢，把孝女归家的故事讲成了汉族的民族主义者反抗外国——可理解为满族——力量威胁的英勇斗争。^①花木兰身上最令许定一称颂的，正是许定一生活的时代最为人赞赏的品质：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许定一大胆地使用脱离时代的语言，将花木兰描写成一个英勇的“祖国之女军国民”、受“爱国至诚”驱动的“种族主义刺激者”。而花木兰人所共知的主要优点——孝顺，许定一却没有提及，

^① 最初的叙事诗版本中并没有指明木兰属于哪一个民族，只是说她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拓跋魏氏统治时期，时间大约在公元 5 世纪。Mann, *Presidential*, 846; Wu Pei-yi, 167.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故意挑战读者，对此视而不见。^①

许定一在花木兰故事中注入的民族主义特点常常与外国女杰相关。中国偶像与西式的爱国主义在此合二为一，表明对英雄女性的再现成了晚清时代多文化融合和全球竞争的场域。20世纪头几年“西风”盛行，包括斯托夫人、罗兰夫人等颇有影响的欧美妇女传记于1902年在主要的中文期刊上多次出版、重印。^②翌年年初，两种读者甚众的西方女杰选集出版。第一本从日文版译出的《世界十二女杰》在二月出版，第二本《世界十女杰》是匿名作者模仿第一本写成的，几个月后问世。在随后的几年中，西方妇女的故事被纳入新教科书，在流行杂志和女子刊物中逐渐声名远播，保留在了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之中。

并非所有的当下主义者都认同这种西化的中国女英雄形象。许定一公开反对这种做法。他要求不必“醉心苏菲(亚)，稽首罗兰(夫人)”，他声称像花木兰那样的中国典范有同等的重要性。^③一位叫周动的作者向读者保证，中国女子楷模的勇气并不亚于彼罗夫斯卡娅和罗兰夫人，只是她们在历史文献比较少见。只要中国人依然迷恋顺从和贞节，像花木兰那样勇敢的人物就会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④当下主义者希望能了断这种过度痴迷并改变书写历史的方式。

许定一在《祖国女界伟人传》的序言中宣称，他的传记选编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国妇女比西方妇女更伟大。^⑤丁初我在介绍他的期刊《女子世界》时也称，该期刊弘扬的是“国粹”而不是“欧风”，并证明不但女子不亚

①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23页。

② 蒋智由的斯托夫人传于1902年发表在《选报》上，同年7月又被《女报》和《新民丛报》转载。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于1902年10月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几个月后《女报》也做了转载。

③ 许定一，《祖国女杰伟人传》，《自序》，第4页。当时相信真正的女英雄不一定源自西方，中国历史上也有某些观点回应了“西学中源”这一流行的说法。Huters，第23—42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全汉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尽管这个说法常常被解释成中国的文化权威在西方新知识面前的保守表达，但在这里它代表的是对巨大变化的肯定。

④ 周动，《感木兰从军》。

⑤ 许定一，《祖国女杰伟人传》，《自序》，第4页。

于男子,而且中国女子也不亚于男子。^① 金天翻为丁初我的刊物写了发刊词,为《女子世界》称颂的许多女性人物献上了赞美,这些勇敢的女杰、女游侠、成绩斐然的女作家、女艺术家来自“三千年中国历史”,她们气质高雅、文才出众、慷慨洒脱。金天翻还斥责读者“远到海外去寻找,对近在眼前的(自己历史的价值)却视而不见。”^②

但是金天翻在宣扬女英雄楷模时并非总是如此排外。在《女子世界》上的文章发表前一年,他在《女界钟》里认为当代中国妇女比不上包括圣女贞德、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1854—1881)和佛罗伦萨·南丁格尔等西方女杰,也比不上班昭和花木兰等著名英雄前辈。^③ 在《女界钟》的结尾,金天翻为当代女性给出了一份综合的女子模范名单,包括 13 位中国女性和 8 位西方女性。^④

经过金天翻的朋友、《女子新读本》的作者杨千里之手,这种供中国年轻女性学习的华洋混合的女子原型成了主流教科书的一部分。^⑤ 杨千里的教科书以金天翻的名单为基础,共写了 18 位中国典范、10 位西方人物。杨在前言中解释说,这两组女性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同样重要:中国历史典范是“新中国女国民历史上的领路人”,而近代的西方女杰则“反映了她们未来的形象。”^⑥

① 丁初我。

② 金天翻(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丁初我对各类女子都给出了具体的例子,他所举的勇武的女性包括冯嫫(西汉)、花木兰、梁夫人、秦良玉,女侠包括缙紫、聂姊(活跃于 395 年)和庞娥(东汉),工于文字和艺术的女性则以班昭和左芬(255—300)为例。参见丁初我。

③ 金天翻,《女界钟》,第 4—5 页。金天翻在这里说西方女性好话,但在后来发表于《女子世界》上的文章里则变了一个口气,原因可能有两种。可能他在《世界十二女杰》和《世界十女杰》两本书出版的间歇感到西方女性的传记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令他焦虑不安,也可能他只是简单地听从了编者丁初我的建议。

④ 同上书,《女界钟》,第 82—83 页。

⑤ 根据夏晓虹的研究,金天翻和杨千里都来自吴江(根据杨千里《女子新读本》书后附录的记载,杨千里来自震泽,现在属于吴县)。杨千里为金天翻的《女界钟》题写了书名,这本著作也有一篇序言出自杨的妹妹杨勿兰之手。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到女报传记栏》,42n18。

⑥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导言》,1:2a。

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模范故事和新传入的西方女杰故事相互作用,便产生了杨千里、金天翮、丁初我和许定一等人推出的新的世界女杰典范。这些复合的典范形象不仅重塑了以花木兰和她的中国姐妹为代表的中国女勇士的意涵,还建立了一个新的以圣女贞德和她勇敢的姐妹们为代表的,西方的爱国志士、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家的中国英雄谱。可是,这些英雄人物却没有在“中国新女杰应该是谁”的问题上提供一致意见。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这两个群体对如何定义女英雄主义最为关心,但他们引述中国女英雄和外国激进女性的英雄事迹时各有不同的目的。他们对中国女勇士和西方女杰的种种描述,显示出 20 世纪初有关女德、文化适应和国家未来的观点上所存在的分歧与裂痕。

花木兰和她的英雄姐妹

并非军人的古代女杰

花木兰在中国的英雄姐妹们并非都是军士。大量 20 世纪初的文献材料描写了不是军人的民族英雄,比较突出的两人是初次出现在《列女传》中的缙縈(约公元前 167 年)和鲁漆室女,还有一个是汉朝的女学者班昭。

按《列女传》和其他早期文献记载,缙縈的父亲淳于意(生于公元前 205 年)曾是一个汉朝官员,他被控入狱并被判处了肉刑。因为没有儿子来为他辩护,五个女儿中最小的缙縈大胆地代表他上书给汉文帝。在上书中她委婉地劝诫皇帝颁布新法令,让犯罪的人能有机会改过自新。她明晰的论辩说服了文帝,文帝下令修改法律、废除肉刑。刘向将缙縈的故事收入《列女传》中的“辩通”篇,突出了她的辩论才能。^①

早在晚清之前好几百年,这个传记就已经被赋予了别的意涵。到了

^①《列女传》,6:15;张敬,第 258—261 页;O'Hara,第 183—185 页。缙縈的故事在《史记》和《汉书》中也有记载。

帝国晚期,缙縈已不是以辩才知名,而是孝顺的典范。^① 这一转变反映在故事的插图中。在最早的插图里,缙縈或站或跪,独自恳求皇帝,插图强调的重点也就落在了勇气和辩才上。^② 但到帝国晚期,包括晚清的插图中,她总是在父亲身旁,而父亲比她高得多(见图 35)。



图 35 《缙縈救父》

资料来源:谢允燮,35b



图 36 缙縈勇敢地呈交上书

资料来源:魏息园,1.2

虽然这样强调孝顺歪曲了缙縈故事的原意,但它承认了女性的自主权,尝试对女德制度提出挑战。在明清两代,女德制度把对丈夫的忠诚(“节”)和为夫家服务看得比侍奉娘家父母更高。从清代标准女教书《女四书》中的《女孝经》被删除、清代的地方志将“孝”和“忠”两类合并都可以看出这一点。^③ 20 世纪初的作家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扭转这一趋势,

① Raphals, *Sharing*, 47 - 48, 133 - 136.

② 参见上书的三幅图,第 134—135 页。

③ Du and Mann, 第 238 页。

《女孝经》再度回归,列入了新成立的私立女子学校的教学大纲,并以白话版本刊行。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和传记也重新强调了孝顺。^①

这些传记也包括改良派的传记集。虽然魏息园的《绣像古今贤女传》还是把婚姻关系放在首位,但它是“以孝父母”一节开始的。这一节颂扬了对生身父母特别孝顺的十一个年轻女子。^②第一个是为照顾生病的父母不出嫁的婴儿子(约公元前300年),^③第二个就是缇萦。这一条目的插图描绘了缇萦勇敢地独自上书。(见图36)

魏息园的改良派文本没有对缇萦的孝顺中的英雄主义意涵多加阐发,而古典现代派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他们将这个古老的故事与民族、变法的新事业联系起来,特意突出其中的英雄主义。在杨千里古典现代主义的《女子新读本》中,缇萦为父亲辩护不过是她伟大历史成就的背景。杨千里解释说,在汉文帝签署废除肉刑法令后,“数千年来酷虐的肉刑得以结束。今天除死刑外没有别的肉刑。这就是缇萦取得的成就。”^④一篇登载在《顺天时报》上的传记也宣称“(缇萦)一举收两大效果。既救了父亲的性命,又改了刑法的恶习,一种义勇精神,空前绝后,在女历史上留下个大纪念,在刑法史上留下个大荣。可称中国女杰。”^⑤

当下主义者则更加积极地对缇萦的历史角色加以改写。一位叫忆琴的女作家在一篇题为《论中国女子之前途》的文章中简直将缇萦当作了现代的爱国者。就像许定一去除花木兰孝顺的外衣一样,她也试图除去缇萦身上孝顺的光环,她说:“缇萦复生,吾将易其爱父之心使爱同

① 即使是在永恒主义者戴礼编写的《女小学》中,四章里也有两章强调了女子在结婚以前的角色。也请参见吴涛。

② 魏息园书中9个大类中的5类,包括106个传记中的66个都是直接与侍奉丈夫或夫家有关的。

③ 历史上的有关齐国婴儿子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成书的《战国策》之《齐策四》。

④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1:2a—b。

⑤ 《中国女杰大义勇家淳于缇萦小传》。可能秋瑾是传记的作者。根据《记山阴秋瑾女士》的记载,秋瑾曾写了一个题目几乎完全相同的传记——《中国女杰义勇家缇萦传》。

胞”。^① 丁初我和金天翻决心从中国深厚的历史中寻找自己的女英雄，他们把这位恭敬地向皇帝上书的孝顺女儿描写成了一个女侠。^②

在 20 世纪初的文献中，“鲁漆室女”也变成了新式女英雄。她的故事最初出现在刘向《列女传》的“仁智篇”，更接近爱国主义而不是英雄主义。和缙萦一样，她的故事并不涉及女扮男装或突出的军事功绩，然而在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的文本中，她成了女性献身政治的象征。

她在《列女传》的传记中以哭泣出场。她的邻居以为她是因为还没有嫁人而难过，她声明说她是为鲁国而悲伤。她感叹道，自己是“忧鲁君老太子幼”。邻居说，这关你什么事呢？她回答说：“当然有关。”她解释说，每个人，包括妇女和普通百姓，都会在年老昏庸或年少无知的统治者之下受苦。^③

这个具有政治意识的典型人物成了 19 世纪中晚期女子诗歌中爱国主义的代表。在赞颂忠于明朝的女将军秦良玉的诗中，王采苹（卒于 1893 年）引用了鲁漆室女和花木兰的传记。^④ 20 世纪早期，在女作家写的以及为女子而写的民族主义作品中，“漆室悲吟”成了标准的修辞方式。鲁漆室女的故事在古典现代派的教科书频频出现，许家惺的修身教材中也有一篇题为“妇女的爱国责任”^⑤的课文对她大力宣扬。古典现代派和当下派的期刊文章也常引用她的故事。

在 1911 年辛亥革命前不久，1911 年 7 月《妇女时报》刊载了一篇长文来悼念有民族意识的女子。作者朱惠贞介绍了一大批当代女性，其中一位叫戚琬珍。她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在家接受过母亲的教育，一心想要学习新的知识。她找了一个刚从女子学校毕业的学生当辅导老师，她教给戚琬珍的不只是历史、地理、科学和代数，还给她带来了家庭革命和自由婚

① 忆琴，《论中国女子之前途续》，130[940]。

② 丁初我；金天翻，《女子世界发刊词》。

③ 《列女传》，3:13；张敬，第 121—124 页；O'Hara，第 95—97 页。

④ Mann, *Women's Poems*, 15。王采苹引用漆氏女故事的诗作还不止这一首。

⑤ 许家惺(86b)把漆氏女和一位《左传》中记载的寡妇女子放在一起加以赞扬，这位寡妇不为织布发愁，只担忧王朝的衰亡。

姻的思想。然而，戚琬珍最关注的是中国的命运，她在历史中寻找榜样，为花木兰故事感动流泪。虽然她说《列女传》只是看来消遣的，但她最终选定鲁漆室女作为自己的楷模。朱惠贞因此称她为漆室女第二。^①

戚琬珍更像历史上的先辈，跟同时代的人，包括传记中提到的秋瑾等激进分子却不那么相似。戚琬珍不赞成鲁莽的暴力行为和自我牺牲，也从不参加这类活动。^② 这位漆室女第二最终怀着对国家深沉的忧虑悲伤地离世了。朱惠贞在结语中尖锐地质问：有多少妇女能像戚琬珍那样关心中国的命运？^③

在陈以益的《神州女报》上有一篇文章中以漆室女为例，揭露了当代人爱国感情的淡薄，主张女性参政合法化。作者周春英是一名汉口学生，她声称当今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女同胞都与鲁漆室女一样有着深沉的国家关怀。在《列女传》中，刘向只是委婉地将这位古代女性典范与其不问政治的同时代女子相比较，而周春英则将与她同一时代的爱国女子跟当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男同胞作对比。周春英认为，这些男性独占着政治权力、升迁机会，还有不少风流韵事，但令人忧惧的是，他们对国家的事务却漠不关心。^④

班昭作为汉代著名的《女诫》的作者，在古典现代派关于女才的文章中被广泛引用，也在当下主义者关于女英雄主义的论战中获得了救赎。许定一认为，班昭应该被视为所有妇女的“至圣”。他根据现在的男女平等理论重新解读了她的故事，认为她的地位甚至应该高于当时的儒家学者，包括曾经听过她讲授汉史的马融（79—166）和她的父亲、杰出的儒家学者班彪（3—54）。许定一认为，班彪因培养了班固、班超和班昭等儿女而广受称赞，班昭也培养了丈夫的妹妹曹丰生和自己的侄女丁夫人，应

① 朱惠贞。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戚琬珍还是本文作者知道漆氏女的故事最初见于《列女传》。

② 朱惠贞记录了她和老师戚琬珍以及一位同学三人之间有关秋瑾的一场对话。她们有关这位近代烈女的集体评价不太明确。

③ 朱惠贞。

④ 周春英。

该得到肯定。^①

当下主义派的女作家甚至对班昭的生平做了戏剧性的改写。忆琴在《论中国女子之前途》中感慨道,如果班昭今天还活着,(从她续《汉书》和辅佐邓太后中彰显出来的)“爱君之心”一定会转变为“爱国。”^②新闻媒体上刊登的故事和戏剧将班昭重新塑造为革新派的英雄。在一个题为《补天石》的小故事中,女娲娘娘派班昭返回地球帮助妇女进行改革。转世的班昭不再教育她们要端庄、谦恭,而是呼吁妇女抛弃旧观念,拥护启蒙思想,组织起来进行新的战斗。而且班昭还反思自己的《女诫》,她承认,虽然这本书在当时是值得尊重的,但它后来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当前先进的观点来看问题很大。^③

第二年又有一个剧本,描写班昭出现在法庭上,而法官便是最近刚被处决的秋瑾。秋瑾指控班昭教导女子要卑微温顺是压迫妇女,而班昭则为自己辩护说,她只是遵照前面提过的女娲等天神们的指示办事,秋瑾给了班昭一个赎罪的机会,要她重返地球,用她的动人言辞去推动女性权利、发扬女英雄主义。秋瑾承诺,到整个世界在妇女问题上完全开明之时,班昭过去的罪行便可以赦免。^④

尚武女英雄的传统

就这样,最先见于《列女传》或早期断代史中的很多妇女楷模被引入了20世纪初对英雄主义的讨论中。然而,那些最有名的女英雄却来自一个非正式的女勇士的传统,其出现比刘向的《列女传》晚200年左右。^⑤

①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7—9页。有关班昭教育马融的内容,参见 Idema and Grant, 第27页。

② 忆琴,《论中国女子之前途续》,130[940]。

③ 娲魂,《论戒》,3:174。

④ 悲秋,《谁之罪戏曲》,第2—3期(1908年12月),转引自夏晓虹,《古典新义:晚清人对经典的解说——以班昭与〈女诫〉为中心》。

⑤ 从魏到唐,女勇士在正史、地方史和野史中都很突出,而且从唐代直到明代,每到王朝末年的动荡时期都会有一位英勇无畏的女杰出现。参见 Carlitz, *Mixed*, 7。

这个非正式的传统不像《列女传》文本所建立的传统那样正式,它没有形成一个清晰明确的经典文本,也没成为官方历史的组成部分。正史里也出现了少数勇敢的女性,但她们很少被独立记述,只是在丈夫或父亲的传记中一笔带过。^① 另一些女英雄,如花木兰,则首先是在比较通俗的文学样式中被人传诵。于是,晚清时期编纂女英雄故事就不得不“躬亲旅行于黑暗历史中”,去寻找那些散落的珍珠。^②

尽管文献很分散,20世纪初的编者们还是从正史、地方史、口述文学和学者笔记中把相关资料挑了出来,形成了很多女勇士故事汇编。^③ 由于历史来源不同,这个传统也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轨迹。古典现代派的女勇士谱系终止于帝国晚期,但当下主义者却追溯了整个明清时期的尚武传统。他们的英雄谱既有古典现代派也称颂的明代遗民,也有太平天国的抵抗者和支持者。

这些女勇士的典型特征也因时而异。有的因其能征善战被歌颂,有的因其英勇的抵抗为人所称道,还有些因为牺牲自我的忠诚品格得到赞美。但是千百年来女英雄故事中的某些特征是保持不变的。首先,也最重要的是,这些勇敢的女性不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女性,而是男性的替代者。作为一个替身,身处在男性空间——战场、军队之中,她往往要伪装成男性,或者与男性共事。女性的男性化和通常具有暴力性、公共性的功业带来了潜在的颠覆性,而特殊的叙事方式则缓和了这一点。她的行为尽管有违女德制度,但这被写成是暂时性,而且是在特殊环境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她要协助平息社会动荡或政治动乱。而故事的转折

① 有关《宋史》中对梁红玉等女子极为简单的记录,请参见 Wu Pei-yi(第 138、156、161 页)。

②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自序》,1。

③ 很显然,20世纪初的部分作者和编者在写到女勇士时使用了同样的史料。比如,《巾帼须眉传》和《中外新列女传》在写到晚明女勇士沈云英时几乎一模一样,参见《巾帼须眉传》,第 41—42 页;《沈将军勇夺父尸》。《祖国女界伟人传》和杨千里的读本也同样有一些条目类似,至少写秦良玉的内容完全相同;参见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 32—33 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I:8b—9a。

点不是在她越过女性规范、穿上男性装束扮演男性角色的一刻，而是她回归的时刻。这时社会恢复了安宁，她也恢复了女性特质。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种种评论通过强调其行为背后的孝顺、诚信和忠诚等价值观，进一步中和了女英雄的英勇事迹。

在 20 世纪初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情境下，人们认为大胆行动对中国的存亡至关重要。女勇士们不但在古典现代派、当下主义派的文章中被大书特书，在改良派的文献里也很重要。魏息园在《绣像古今贤女传》中对花木兰备加推崇，《中外新列女传》的编者则以绘图的形式详述了明朝忠臣沈云英（1624—1661）的功绩。甚至那些不完全赞成英雄主义新价值的作者也使用了新的英雄主义语汇。有一位作者刻画了许定一和其他当下主义者所蔑视的“贞孝节烈”楷模，并将该传记集题名为《巾帼须眉传》。^①

古典现代派吸纳了梁启超的意见，援引历史上的女勇士作为当代女子民族主义的典范，以培养“进取冒险”和“尚武”等新品格。^② 杨千里等教科书作者在新教材中描写勇士般的女英雄，《顺天时报》等主流报纸的编辑们则出版诗集歌颂历史上英勇无畏的女性。

然而，当下主义者一方面对女勇士毫不吝惜赞美之辞，一方面又将其故事极端政治化。他们将女英雄主义与女德分开，将女英雄模范从过去掩护其激进行为的道德伪装下解放出来。他们忽略这些历史上的女英雄所谋求的任何个人、家庭或地方利益，将这些父权制度下顺从的代理人改写为大无畏的汉族爱国者。

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文化想象中，花木兰是孟母的武士版。她出现在帝国晚期各种体裁的作品中，是人们提得最多的女勇士，包括百美图、《列女传》增广版、教科书和日报上都有她的故事。和孟母一样，她是能

① 编者坚称，这些女子脱胎于圣人豪杰、文人达士。《巾帼须眉传》，《序》。1a—b。文本没有作者署名，也没有日期，但当时的广告说明这是在 1910 年左右出版的。

② 有关梁启超呼唤英雄主义的内容，参见梁启超，《新民说》。也请参见 Judge, *Print*, 91—96; Tang, 80—116, *passim*。

进入主流出版物和男童教科书的少数几位女性典范之一。^①

花木兰的名声既不像孟母那样来自《列女传》，也不是来自正史的传记记载，而是来源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木兰辞》。这首民谣在公元6世纪被著录，写成时期大约在公元5世纪。在这个戏剧性的故事中，木兰看到拓跋魏宣布征兵的12卷军书中每卷都有父亲的名字，忧心如焚的她知道父亲必须应征，同时也痛苦地意识到父亲年纪太老不能作战，而她的弟弟们又太小，不能代父从军。于是她决定乔装成士兵代替父亲去参军。她掩藏着美貌，保持着贞操，在男人堆里生活、征战了12年。战争终于结束了，花木兰率军队凯旋而归，当皇帝问她要什么奖赏时，木兰只要求用一匹骆驼送她回家。回乡以后，她立即恢复了女性的装束并继续织布。^②

和缙紫的故事一样，花木兰的故事在后来的千百年中被反复修饰润色，以强调她的孝顺和谦逊。例如，在明朝徐渭(1521—1593)的杂剧中，木兰回家后不只是继续做好女儿，还嫁给了一位当地的学者。^③

改良派故事版本保留着道学色彩，但还是回应了时代的声音。魏息园将花木兰放在选集中的“孝父母”一节，并在评论中强调了她的作为女儿的奉献精神(参见图6)，他认为这种奉献精神比作战英勇更值得推崇。同时，魏息园用花木兰的例子表达他对反缠足运动的支持。他说当他年轻时读《木兰辞》，“窃怪女子纤足，何以从军旅之事”，他很快就发现，正因为过去的妇女不缠足，她们是“壮健”的。然而，结束语中他反缠足的呼吁背后仍是男权主义：天足妇女可以更有效地帮助男性。^④

女子教科书也强调了花木兰作为女儿的献身精神和女性的正直端

① 高凤谦、蔡元培、张元济所编的《最新修身教科书》里谈孝顺的一篇课文里赞扬了木兰。参见高凤谦、蔡元培、张元济，7:1a。

② 晚清很多文献都收录了这首叙事诗最早的版本，可参魏息园，1.13；杨千里，《女子新读本》，1:4a—b。

③ Mann, *Presidential*, 847。

④ 魏息园，1.3。其他的作者也用木兰的例子来支持他们反缠足的观点。例如，可参看《直隶创办天足会演说》，第38页。

庄。在《女子新读本》中杨千里专门用了三课来描写这位女勇士,这样的荣誉只有孟母可以与之媲美。《读本》有木兰的两幅插图,其中一幅画的是木兰骑马去从军(见图37)。^① 在第一课介绍《木兰辞》时,杨千里重点刻画的是年轻女子还乡的场景:家人热烈欢迎她,她恢复了女子装束;战友惊讶地发现了同袍的真实性别。^② 谢允燮也在一幅插图中刻画了花木兰骑着马代父从军,而在课文中则重点表现了她回家的场景。^③ 吴涛在一篇课文中以花木兰、缙縈和班昭为例,颂扬孝顺精神和兄弟感情。^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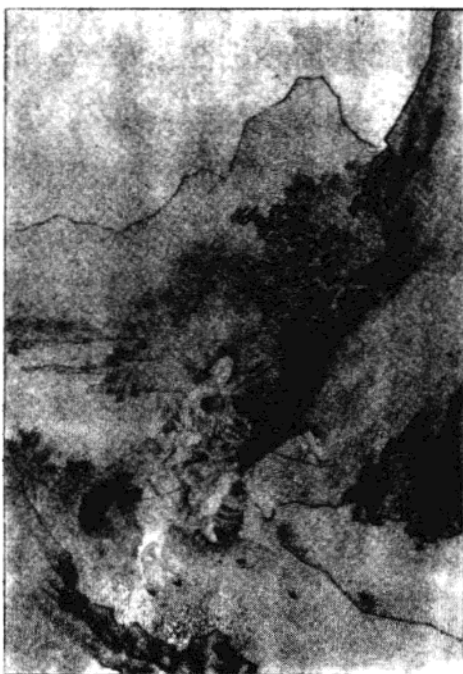


图37 木兰骑马去从军

资料来源:杨千里,《女子新读本》,第一卷卷首插页

晚清报刊对这位伟大的女英雄也表达了类似的赞美。《顺天时报》分几期连载了组诗《咏历代女将》,花木兰是其中重要的代表。这一组诗赞颂了从东晋到明末多位女勇士的美德。^⑤ 在一首诗中,袁骥孙称赞花木兰坚持女德观念:代父从军为父尽孝,掩藏美貌保全贞节。^⑥

与古典现代派和改良派相比,当下主义者不看重花木兰的孝顺和谦逊。他们使用中国的民族斗争等语言来宣扬她的英勇善战。本章开篇

① 这一幅花木兰的插图也刊载于1904年3月的《女子世界》上,配着另一篇介绍花木兰的传记(柳亚子,《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

②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1:3b—5a。

③ 谢允燮,36a。

④ 吴涛,6a。

⑤ 金绶熙等。

⑥ 袁骥孙。

所分析的许定一的一段文字便是本着这一精神写就的。柳亚子(1887—1958)也是如此,他发表于《女子世界》的一篇传记文章用花木兰的故事来宣传“尚武精神”、“军国民资格”和“民族主义”。根据柳亚子的说法,花木兰参军不在于维护其家庭的荣誉,而在于“保我民族”。他替花木兰发出声音:“我虽女子,亦国民一分子也”。^①

晚清时期人们喜欢给全世界的英杰排名,一位笔名“保素”的人坚称,花木兰在国际上都是十分杰出的。她在为《中国新女界杂志》写的一首诗里指出,所有的“欧美名媛”都系于琐事而不去参军,没有一位能够与花木兰相提并论。保素还为其他当下主义者试图遮掩的真相感到惋惜——这

位中国的伟大女英雄最终放弃了她的武士角色。她问道,为什么花木兰以军人身份获得成功之后,却“着我旧时裳”了呢?^②

在清朝最后几年的报纸上可以明显看出,当下主义者用他们再造的花木兰形象来动员女同胞成效显著。1910年初出版了题为《花木兰第二》的绘本故事,描述了一个佛山的妓女女扮男装在广西梧州参军。传记作者没有提她是为父亲尽孝还是效忠于皇帝,但坚称这位“花木兰第二”本身就值得载入英雄史册(见图38)。^③ 辛亥革命之前



图 38 《花木兰第二》

资料来源:《花木兰第二》

① 柳亚子,《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

② 保素,第132页。

③ 《花木兰第二》。

的几个月,花木兰的戎装形象被用来证明“巾帼能兵”,号召年轻女子加入新组建的女兵部队。^①

除了花木兰以外,晚清文献中还有一些秦汉到唐宋时期的知名度稍低的女军人。其中之一是晋朝(280—420)宁州的军事领袖李秀(活跃于约350年),在她父亲——校尉李毅(活跃于约300年)故去之后,她继续领导当地少数民族军队抵抗南蛮强盗。^② 李秀的故事在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派的材料中体现了不同的时代之音,在解读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作为《咏历代女将》中首先被赞美的女子,李秀勇敢地领导了数千男子参战,同时维护了自己的贞操,没有辱没父亲的名声。^③

在许定一的《祖国女界伟人传》中,这位晋朝南方少数民族忠诚的保卫者变成了反清和反外国斗争的楷模。许定一赞赏李秀的智慧、勇气和谋略,详述了部队被围断粮时她炙鼠拔草而食的细节,但他的评论中最强调的是她“以排外为宗旨”。^④

荀灌(活跃于约350年)的故事最初载于《晋史》,后来出现在20世纪初多种教科书之中。让她载入史册是这样一段故事:其父荀崧担任河南省(原文如此,经查,应为今湖北省。——译者注)襄阳城太守时,襄阳遭到叛军围攻。只有13岁的她决心为父亲求援。她出奇制胜,在夜里成功突围,将自己亲手写的求援信交给了父亲的盟友。^⑤

《女子分类尺牍范本》的作者在序言中称赞荀灌像花木兰一样勇敢。^⑥ 其他古典现代派则更详细地讨论了她的功绩,突出了她对父亲的忠诚和为忠诚服务的文学才华。^⑦

① 例如,可参见桐乡徐雪华;清江徐珊。有关用花木兰来呼吁女子参军、就学、就业和争取政治权利的内容,参见 Edwards, *Men*, 89, 112。

② 我只在二十四史中找到了一条有关李秀的简单记载,参见《载记》。

③ 朱点衣。

④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12页。

⑤ 《荀崧小女灌》。

⑥ 彪蒙编译所,《女子分类尺牍范本》,1a。

⑦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1:5a-b。

与此相反，许定一却在荀灌故事中读出了对超越家庭之上的事业的责任。他把她保护襄阳城人民的斗争与汉代女子杨香虎口救父相比较。改良派和古典现代派盛赞杨香的孝心和勇气，而许定一则把她当作反面典型来强调服务社会比服务家庭更重要。许解释说，杨香不值得进入他的选集，因为她仅仅挽救了一个人，这与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乡里的荀灌不同。^①

许定一认为洗夫人（活跃于 535 年）值得赞扬和仿效。洗夫人最初载于《隋史》，在六朝（220—589）晚期，她为高凉郡（在今广东省）英勇战斗。她的丈夫冯宝本是负责安抚岭南边境的高凉郡太守，丈夫死后洗夫人接替了他的工作，先是动员岭南部队支持陈王朝（557—589），后来又带领其家孙等人支持新建立的隋朝。隋朝的开国皇帝封她为谯国夫人。^②

《咏历代女将》组诗赞颂了洗夫人的领导能力以及她获得的种种荣誉，但没有详细记述她的故事。^③ 而杨千里和许定一都突出了洗夫人一生中对民族关系的重视。洗夫人的官方传记只提到她“世为南越首领”，杨和许称她“世为蛮夷酋长”，“世为蛮长”。^④ 许定一评论说，幸运的是洗夫人嫁给了一个汉人，并且引用一个隋朝官员的话说，“蛮夷”中能有这样聪慧的女人十分了不起。在评论中许定一将洗夫人的故事与时事联系起来，他说如果今天的蛮族中有这样优秀的妇女，一定会令同时代的女同胞感到汗颜。^⑤

洗夫人为巩固隋朝的江山做出了贡献，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566—635）的女儿平阳公主（卒于 623 年）则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功劳。她的

①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 13 页。收录了杨香故事的教科书包括杨千里，《女子新读本》，1:9a-10a；谢允燮，34a。魏息园，1.4 也记载了杨香的故事。

② 《谯国夫人》；文中所说的岭南是今天的广东广西一带。

③ 朱点衣；汪应焜。

④ 《谯国夫人》；杨千里，《女子新读本》，1:7b；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 17 页。

⑤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 17—19 页。

故事见于丈夫柴绍(卒于638年)在《旧唐书》中的传记。根据记载,当时柴绍随岳父带头起兵反隋,平阳公主则帮助筹款,组建了一支七万人的军队,加入到她亲自统兵的“娘子军”中。^①

《咏历代女将》也有一组诗称赞了平阳公主的忠心,并肯定了皇帝在其死后给她特殊荣誉的做法。^②与此相反,许定一并不看重平阳公主为政治和父权统治所做的贡献,他关注的是娘子军的重要性。但是,生活在晚清时期的许定一希望建立的娘子军不是由女子领导的,而是由女军官和女士兵组成的。^③

另一位和平阳公主一样伟大的女勇士梁红玉出现在一个风雷激荡、江山易主的时期,但她只是在丈夫的传记中被简单提及。在20世纪初女英雄主义的话语中,她通常是与花木兰相提并论的。《宋史》记载她丈夫、爱国大将韩世忠(1089—1151)的条目下有一行文字提到了她。传记描述了“梁夫人亲执桴鼓”,激励丈夫的部下抗击入侵的金兵。^④后世的作者们对这简短的资料做了演绎发挥。然而有一位宋代学者质疑梁红玉的德行,称她是韩世忠身边的一个妓女。有两出明代戏剧对梁红玉的过去作了净化处理,只是赞扬她作战英勇。到了明代后期,她的名气使她成了爱国名妓柳如是(1618—1664)的偶像。^⑤

梁红玉在晚清时期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楷模,因为她抵抗的是满族的祖先女真人。但古典现代派为她作的传记中没有强调这种种族狂热,也没有过多地改写这个明朝流传下来的故事。根据杨千里的记载,梁红玉得到皇上封赏是因为她协助韩世忠和宋代名将岳飞(1103—1141)打败了入侵的金兵。^⑥《咏历代女将》组诗则颂扬了梁红玉击鼓吓退敌兵和恶

① 《柴绍/平阳公主》。

② 袁骥孙;汪应焜;钱文彬。

③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22—23页。

④ 《韩世忠》,第11361页。

⑤ Wu Pei-yi, 第161—164页。有关柳如是的内容,参见Ko, *Teachers*, 第274—283页。

⑥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I:8a—7a。

鬼,保护韩世忠部队的故事。组诗还赞扬了她的美德,称她是一个美貌出众而且为人谦逊的女子。^①

当下主义者则对梁红玉的历史地位做了戏剧化的改写。一出名为《黄天荡》的独幕剧描写了梁红玉在名为黄天荡的河边击鼓退金兵的故事,作者给了梁红玉一个正式的军人身份。在剧中她身着戎装,领导水军作战,还有四名女将在左右辅佐。^② 保素写于1907年的诗作也同样提升了梁红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她看来,是梁红玉保卫了南宋,她哀叹人们没有充分地认清梁红玉的历史功绩。^③

陈以益将梁红玉和花木兰列入了世界英杰的谱系中。在他看来,梁红玉和花木兰的故事对国外保守的性别理论提出了挑战。他在《神州女报》中写道,“倍如西人言,则女子仅能间接以有助于国。日本之教育,仅能利用女子以助男子之事业,女子不能自为事业。然则,吾国之木兰、梁红玉者,当为历史之虚诞矣。”^④ 柳亚子以“潘小璜”这个女性化的笔名在《女子世界》上撰稿,将梁红玉过去的壮举和当今世界上的斗争径直联系在一起。他使用了当时流行的修辞手法来描述她的功绩,声称梁红玉“投身于民族战争之盘涡”。更让人惊诧的是,柳亚子说他希望中国女性能够追随梁红玉,“助我杀异种保同种”。^⑤

继梁红玉、花木兰之后,在20世纪初的文献资料中引用得最广泛的两女军人是明末女英雄沈云英和秦良玉(卒于1648年)。^⑥ 沈云英的事迹在《明史》中“流贼”张献忠的条目下有一行记载。记载中说,沈云英

① 黄第;汪应焜;曾福谦。

② 转引自 Wu Pei-yi, 第165页。

③ 保素,第132页。

④ 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第682页。

⑤ 柳亚子,《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第22、24页。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到女报传记栏》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柳亚子是以潘小璜的笔名写了此文。据称潘小璜是“一位松陵女子”,松陵在江苏就是吴江的别称,而吴江也就是柳亚子的家乡。

⑥ 沈云英和秦良玉经常被放在一起描写,但也会单独出现。1751年有一场戏以她们二位为主人公。参见 Hummel, 第168—169页。

的父亲，湖南道州守备沈至绪（卒于 1643 年）在战场上被张献忠的叛军杀害，云英决心夺回父亲的遗体。^① 根据后来的传记，她接替了父亲的守备职位并勇敢地保卫了道州，但她的丈夫，湖北荆州都司也在与叛军的战斗中身亡了，于是沈云英辞去了军职，回到了浙江萧山的家中。^②

《中外新列女传》和《巾帼须眉传》载录的沈云英传记几乎一字不差，这位改良派的传记作者强调了沈云英对父亲的忠诚。在孝女复仇精神的鼓舞下，她斩下了三十多个杀害父亲的叛贼的头颅，夺回了父亲的尸首（见图 39）。她还研读《四书》、《春秋》和唐诗宋词。传记的结尾部分同时强调了沈云英的才能和对故土的忠诚。她带着父亲的遗体回到家乡后，在家族的祠堂旁开办了一所学校，亲自讲学直到辞世。^③

对帝国晚期的才女不屑一顾的古典现代派很少提到沈云英的文学才能。他们不看重她的美德，而对她的勇气表示赞赏。《咏历代女将》中有一首诗称赞沈云英，“尽孝尽忠兼尽节，备斯三者古来稀”。^④ 《女子新读本》的编者赞美了沈云英“游击将军”的封号，但突出的是她心甘情愿为父亲而死的精神。^⑤

当下主义者忽视沈云英所有的美德和才华，就赞美她的英雄主义是挽救当前中国全球地位的灵丹妙药。秋瑾在她的《精卫石弹词》和诗歌中，也常常（连同秦良玉一起）赞美沈云英英勇作战、大败敌军。与那些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男性叛徒不同，她用“力量和勇气”为祖国而战。^⑥

在正史中有独立传记的女勇士寥寥无几，和沈云英一起出现在《精卫石》和其他明清作品中的秦良玉便是一位。秦良玉世居四川忠州，和

①《李自成 张献忠》，第 7975 页。

② Hummel, 168 - 169.

③《沈将军勇夺父尸》；《巾帼须眉传》，第 41—42 页。

④ 曾福谦。这一组诗中另一首汪应焜的诗作还将沈云英与唐代一位名叫云英的神仙联系起来。

⑤ 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6:16a - b.

⑥ 秋瑾，《精卫石》，第 135 页。也请参看秋瑾，《满江红》，转引自 Kang-I Sun Chang and Saussy, 第 653—654 页。



图 39 《沈将军勇夺父尸》

资料来源:《沈将军勇夺父尸》

家里的兄弟一样文武双全。她是当地的土司马千乘(卒于1615年)的妻子和军事上的搭档。他俩并肩抵抗当地的叛军,1615年马千乘去世后,秦良玉继承了他的土司职务。满人入侵后,秦良玉一面继续与西部的叛军作战,一面率部抗击南下的满人部队。1620年,皇帝派遣她的部队抗击入侵辽东的满人军队。1630年,她带领部众参加了保卫首都北京的战斗。明代皇帝曾赋诗赞美她的忠勇,并授予她“忠贞侯”和“太子太傅”等封号,褒奖她保护家乡免受劫难。^①

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上的秦良玉传记和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上的记录如出一辙。这一传记简要地介绍了她的军事成就,包括她

^①《明史》,270/6944-6998。也请看 Hummel,第168—169页。

阻止张献忠进犯的事迹。传记作者在评论中还提到了她背诵文学作品的的能力,^①不过许定一在评注中直接与晚清的政治危机相联系,为秦良玉的故事增加了一层当下主义的意义。许定一把秦良玉的军事成就归因于对战略的重视:与其同当地汉族流寇作战分散精力,不如专注于抵抗“胡”人。许定一建议,现在有必要将反清战略统一起来。评注结尾又是许定一典型的哀叹:“惜哉!祖国女界近世竟无斯人,惜哉!”^②

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都赞扬秦良玉那种清朝建国之初抗击满人的明代忠臣,但只有当下主义派称赞更晚近的抗击清军的妇女。许定一在《祖国女界伟人传》的序言中表明了他的民族主义观点,暗示其排满的立场。他宣称我族人民不能胆怯。许定一举了很多例子来勉励中国妇女不要像男同胞一样成为胡人的奴隶。这些拒绝屈服于北方侵略者的巾帼英雄包括抵抗蒙古人的南宋女子韩希孟(活跃于1120年),以及两名勇战清兵的太平天国女勇士: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1814—1864)的妹妹、萧朝贵(1820—1852)的妻子洪宣娇(活跃于1860年),还有萧朝贵的妹妹萧三娘(约1830—约1854)。^③

许定一的选集以这些太平天国女英雄的故事来压轴。他描写洪宣娇是明朝遗民转世,声称任何见过她行事的人都不得不相信她是“秦良玉再世”。他还将洪宣娇和萧三娘写成晚清革命斗争的楷模。她们日日夜夜受到种族主义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强烈的排外思想。许定一在结语中斩钉截铁地说,任何有关中国伟大女性的传记集都只能以这些太平天国女英雄来结尾。她们不灭的精神必将把中国民众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① 杨千里的教科书在上海出版两年后许定一的书在横滨出版,可能是许定一采用了杨千里课本中的讲法,也可能是两位作者都借用了同样的文献材料。杨千里,《女子新读本》,1:8b-9a;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32—33页。

②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33页。

③ 《祖国女界伟人传》,《自序》,第3页。Ono(第17、18页)简单地介绍了洪宣娇。萧三娘其实是苏三娘之误。许定一也把苏三娘的家族,说她是萧朝贵的妹妹,因此也就成了洪宣娇的小姑。有关苏三娘的内容,参见BD I,第197—199页。

鼓舞他们抵御北方强敌。^①

圣女贞德及其勇敢的后继者

某些改良派会赞誉中国女勇士,但西方女杰几乎只是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在歌颂。但如同表现中国女勇士时一样,这两个群体描写西方女杰的方式也不同。虽然我收集了大量反映这种分歧的资料,但下面关注的只是 1903 年出版的两本最能表现这种关联和区别的西方妇女传记集:《世界十二女杰》和《世界十女杰》。

如其前言所指出的,《世界十二女杰》1903 年初由一本同名的日文书翻译而来,而《世界十女杰》则是在前者出版几个月后问世的,虽然名为译本,但按照其匿名作者所说,其实这是一部原创作品。^②《十女杰》的作者在前言中声称,《十二女杰》是它的蓝本,但同时他也指出其文本基于 17 种不同的资料。他说在他完成手稿还没付印之前看到了《十二女杰》的广告,于是把这本书和《十二女杰》联系起来。^③最后的《十女杰》中只有五位女杰与《十二女杰》相同。最重要的是,它对这五位女杰的描写与其“蓝本”中的描写有显著的差别。

《世界十二女杰》属于明治日本时期的自助类书籍,这类书都受到了 1871 年翻译过来的塞缪尔·斯迈尔斯 1859 年作品《自己拯救自己》的启发。^④《十二女杰》以罗兰夫人对即将到来的处决泰然处之来赞扬英雄的决心。^⑤给《十女杰》灵感的则不是塞缪尔·斯迈尔斯,而是让·雅克·

①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第 36—38 页。

② 《世界十女杰》,《例言》,1。《世界十女杰》没有标明日期,但 1903 年 6 月 12 日的《江苏》上介绍了这本书,因此它大概是同年四五月间出版的。

③ 《世界十女杰》,《例言》,1,2。《世界十女杰》和《世界十二女杰》对很多人名地名的翻译都不同,由此可知《十女杰》的作者不只参看了后书这一本资料。

④ 有关《十二女杰》和中村正直 1871 年所翻译的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己拯救自己》的关系,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到女报传记栏》,43n35。

⑤ Iwasaki and Mikami, Sekai, “Jo”; 岩崎祖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序》,第 1—2 页。

卢梭,这本书的目的是褒扬牺牲自我而不是鼓励自助自立。作者将自由和革命浪漫化,以其名义为暴力辩护。在他笔下,无论是刀尖滴下的还是妇女心中涌出的鲜血,都自由颂歌中的最响亮的主旋律。

这两个文本所突出的女性特点明显有别。《十二女杰》看重的是女王和爱国者的特点,而《十女杰》强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刺客的性格。《十女杰》的作者解释说,他有意排除了七个在《十二女杰》中受到赞美的女性。不写罗兰夫人是因为技术原因:他注意到她的故事最近已发表在《新民丛报》上了。其他六位没有被选入的女子包括三个女王,即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 of Spain, 1451—1504),英国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England, 1558—1603)和普鲁士的路易斯女王(Louise of Prussia, 1776—1810),因为作者认为她们是“无关紧要的人物”。^①不过他保留了一位女王,俄罗斯的凯瑟琳大帝(1762—1796年在位),因为她留下一个“进步的遗产”。她死后不到10年,青年和学生发动了革命。20世纪初出现的秘密社团和恐怖活动也可以追溯到她统治的时期。^②排除圣女贞德的原因不太清楚,可能是因为她不是近代的女英雄。

除了凯瑟琳大帝,两部选集都有的女杰有夏绿蒂·科黛(1768—1793)、阿妮塔·加里波第(1821—1849)、斯塔埃尔夫人(1766—1817)和路易斯·米歇尔(1830—1905)。只收录在《十二女杰》中的是圣女贞德(1412—1431)、罗兰夫人(1754—1793)、露西·哈钦森(1620—1680)、伊莎贝拉女王、伊丽莎白女王,路易斯女王和弗朗西斯·威拉德(1839—1898)。只为《十女杰》颂扬的有平等主义者、同情革命的日记作家和诗人多萝西·华兹华斯(1771—1855)、英国妇女参政论者米利森特·福塞特(1847—1929)、为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的和平

①《世界十女杰》,《例言》,第1页。

②《世界十女杰》,第65页。

进行斡旋的俄罗斯贵族妇女多罗西娅·利芬(1785—1857)、南丁格尔和玛丽·莱昂。《十女杰》独有的那些女性未必是西方历史上最激进的,但作者为她们的故事注入了激进的精神,例如米利森特·福塞特就反对过于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但在《世界十女杰》中她被描写成英国妇女权利斗争中的“勇将”。尽管她是与“启蒙之母”相关联的,但作者把这个母亲的比喻与种族、政治奴役等激进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他断言,具有奴性的母亲会带来整个民族的奴性,最终导致国家的消亡。^①

《十二女杰》和《十女杰》也形成了不同的文本源流。在《十二女杰》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批有影响广泛的教科书,最著名的就是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杨千里的读本有十篇西方妇女传记,其中有八篇是《世界十二女杰》中的传记简写,包括了被《十女杰》排除在外的七位“无关紧要的人物”中的五个。作为金天翻的朋友,杨千里自然与激进人士有联系,但可能因为他的选集毕竟是教科书,他还是选择了比较温和的《十二女杰》作为蓝本。^②他在《女子世界》上介绍《女子新读本》时,目录表中曾包括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她既没有名列《世界十二女杰》中,最后也没有收在他的读本中。^③我们不清楚杨千里最后把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删去是出于自我审查还是屈从于出版商的要求,但在他写作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路易斯·米歇尔的传记时,确实曾重点提到过她。他将米歇尔等同于名誉不佳的苏菲亚,这不同于《十二女杰》中原有的传记内容。^④

①《世界十女杰》,第31—35页。谢谢 Heather Jackson 帮我确认华兹华斯。

②有关杨千里和金天翻的友谊,请参看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到女报传记栏》,42n18。

③杨千里,《女子新读本》,第83页。

④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5a。杨千里也把米歇尔与一位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相比,笔者没能确认后者是谁。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的传记刊载于包括《浙江潮》、《闽报》等海外留学生的激进刊物上。参见 Hu Ying, *Tales*, 第111—117页,更为广泛的介绍见于第105—152页。

由《世界十二女杰》和《女子新读本》所树立起来的西方传记传统影响广泛,从其他晚清作品对这些传记的再利用可见一斑。再版的多卷本《女子最新读本》几乎是逐字照抄了杨千里的《读本》中的斯托夫人、路易斯女王、南丁格尔、弗朗西斯·威拉德和圣女贞德的传记,而这五篇中又有三篇来自《十二女杰》。^①其中至少弗朗西斯·威拉德的传记也成了改良派在《北京女报》上发表的一篇传记的基础。^②此外,《世界十二女杰》还被改编成了一首同名歌曲,登载在叶中冷的《女子新唱歌初集》上,这本学校用的歌曲集曾流行一时。^③

《世界十二女杰》在一系列教材中留下了印记,相比之下,《世界十女杰》的影响主要见于激进的杂志。1903年6月,陈范的《苏报》向公众介绍了这本传记集,但几个月后就被清朝政府查禁。介绍文章的作者明确表示,《十女杰》和《十二女杰》相比,他更偏爱前者生动的语言和戏剧性的描写。^④陈范的女儿,《女学报》主编陈撷芬(1883—1923)也深有同感。介绍登载四个月之后《十女杰》出版了,不久之后陈撷芬和父亲陈范为躲避追捕流亡东京,陈撷芬宣布她打算在《女学报》上连载《世界十女杰》的白话版本。^⑤她的目的是强调当下。她解释说,这些传记可以教导女同胞拥护全新的不受女德教条约束的英雄主义。年轻的中国妇女们若要效仿传记集中的第一位女性路易斯·米歇尔,应该懂得政治高于道德,即使有得罪人的风险,也要仗义执言。^⑥

《世界十女杰》的第一部分发表后,《女学报》停刊了。然而,无论是《十女杰》本身还是《十女杰》所赞美的包括多萝西·华兹华斯等女性,仍

① 这个斯托夫人传记载于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7:5b-7a; Queen Louise(路易斯女王),7:15 a-b; Florence Nightingale(南丁格尔),8:14b-15b; Joan of Arc(圣女贞德),10:15b-17a。《世界十二女杰》中的斯托夫人传和南丁格尔传并不是首发。

② 《演说扶兰志斯》。

③ 叶中冷,第52—58页。

④ 《世界十女杰》。

⑤ 陈范险些被捕的经过,请参看 Rankin, *Early*, 第86—95页。

⑥ 陈撷芬(楚南女子),《世界十女杰演义》,第55—56页。

然不断地被激进杂志提及,丁初我的《女子世界》就是一例。^①

通过解读重要的西方女英杰的传记,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在“女英雄”这个观念上的差异浮现了出来。这些重要的西方女杰包括圣女贞德和罗兰夫人,她们是《世界十二女杰》和 20 世纪初众多文献中的主角;还有《十二女杰》和《十女杰》都不忘赞美的,杨千里的教科书也几乎没落下的人物:夏洛特·科黛、阿尼塔·加里波第、斯塔埃尔夫人和路易斯·米歇尔。

圣女贞德在晚清文献中相当于西方版的花木兰。她的传记在《北京女报》、《世界十二女杰》、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以及《中国新女界杂志》上都有。^② 贞德既是一位宗教幻想家、又是欧洲最重要的爱国者之一,贞德领导着法国的军队在百年战争(1336—1453)中击退了英国。她在战场上的成功阻挠了英国的贝德福公爵将侄子亨利六世推上法国王位的企图,促成了查理七世 1429 年成功加冕。1430 年,对贞德的法国爱国者身份不屑一顾的英国人捕获了贞德,把她当作宗教异端来审判。宗教裁判所指控她的男性装扮触犯了圣经有关服饰的戒律,1431 年她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年仅 19 岁。24 年后的重审中,原来加给贞德的政治罪名被推翻,大约五百年后,天主教会宣告她彻底无罪。她在 1894 年被宣告成为“可敬者”(Venerable),接着在 1909 年,受宣福礼,并在 1920 年封圣。^③ 西方有很多作品写的都是这位名声赫赫的女英雄,其中许多被译介到了非西方世界,包括明治日本,随后也成了许多中国版贞德故事的源头。^④

① 《女子世界》在 1904 年刊登了一篇赞赏《世界十女杰》的文章,作者在文末号召中国女性要武装起来,保卫汉民族。例如,柳亚子在《哀女界》中提到了华兹华斯。但《女子世界》也提到了《世界十二女杰》。参见竞厂。

② 《爱国女子若安达克的故事》,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31—42 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5a—7a,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10:15b—17a 也做了转载;梅铸,第 53—82 页。

③ 有关圣女贞德的内容,参见 Pernoud; Warner。

④ 关于贞德在埃及的内容,参见 Booth, *The Egyptian*。1866 年日本出现了两篇贞德传记,其中一篇显然是翻译文章,后来一直到 20 世纪早期很多传记文章都以此为蓝本。例如,可参见朝仓禾积;Tuckey。

从改良派到当下主义派的晚清作家都称赞贞德是民族英雄。改良主义的《北京女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利用贞德动员贫弱的法军对抗强大的英军这一故事，激励人们忠于清王朝。不过，同时他也谨慎地声称自己对清王朝是忠诚的，他解释说自己不主张对外国的事物一概逢迎，只会对热爱祖国的女性加以颂扬。^①《世界十二女杰》称颂这个勇敢的来自栋雷米的农家姑娘是“法国的救星”。她为民族牺牲自我，使她成了一个国际偶像，一个“无论是法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会忘记”的人物。^②杨千里把这位充满幻想的女青年刻画成“懂得爱国主义含义”并决心带领同胞反抗英国的聪明女人。^③梅铸在《中国新女界》上称赞贞德“恳切的爱国心”，她认定这位悲剧女英雄的血不会白流：在她死后不久，卢瓦河以北的地区重新归属于法国。^④秋瑾则称贞德为恢复江山的“同俦”。^⑤

然而，圣女贞德也给渴望将她的英雄故事用于自身政治意图的中国作者带来了许多问题。她确实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也是一个得到神启的伟大爱国者，一个穿着男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得到神启的伟大爱国者，一个没有完成回归常规女性角色这一重要步骤的女英雄。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使用了相似的策略——忽略贞德的宗教色彩。但古典现代派仍然为她的性别倒置所困扰。

《世界十二女杰》原初日文版的贞德传记详细描述了她的宗教虔诚。根据这个版本，她每天工作结束后都去当地教堂祈祷，每周都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按天主教的惯例，贞德的世界也和月夜下的天使相连，他们就住在村里老橡树下的小河里，正是这些天使呼唤她去拯救法国。她在战场和法庭上经受了各种考验，保持着虔诚的信仰。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① 《爱国女子若安达克的故事》。

②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41—42页。

③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5b。

④ 梅铸，第81、82页。

⑤ 秋瑾，《勉女权》。

前,她还在祈求上帝保护。^①

在翻译岩崎徂堂和三上寄风的《世界十二女杰》中的贞德传记时,赵必振基本上忠于原著,但他用插入评论和译注的方式与贞德的灵性保持了批判的距离。他认为贞德的宗教信仰“令人费解”,对那些不生活在上帝定义一切的世界中的人尤其如此。^② 但是,他试图解释说,贞德令人困惑的宗教热忱是因为她生活的时代科学还未战胜迷信。他还把贞德的信仰和中国民间传说联系在了一起,将她的信仰与中国著名传说《白蛇传》和南方之神赤帝做了一番比较。最后他说,宗教往往是为政治服务:狡猾的统治者好谈鬼神,以操纵无知的人民。^③

在改编《世界十二女杰》的赵必振译本时,杨千里又对贞德的故事增加了另一层世俗的怀疑。他扩展了赵必振所谓的宗教是一种政治操纵形式的说法,认为是贞德自己把所谓“神谕”当作一种策略。她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16岁的农家姑娘,要赢得愚昧且十分迷信的群众拥护是很难的,于是她设计愚弄他们,让他们相信她得到了神启,以赢得他们的信任。^④

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上发表的《法国救亡女杰若安传》(“若安”是贞德的早期中译名。——译者注)中,梅铸在文章开头对贞德的宗教信仰做了一些让步。她提到贞德对于“神道”有着极其坚定的信仰。^⑤ 可是她最终对这个故事做了世俗化的阐释。她不同意将伟大的女英雄的行为归于上天或超自然力量,相反,她相信强大的意志可以移山填海。她宣称“至诚之道可以感神”,相比上天对于贞德的启示,贞德的精神对上天的启示甚至

① Iwasaki and Mikami, Sekai, 第51—52、63—64页。

②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33页。

③ 同上书,第35、36页。

④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5b;转载于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10:16a。

⑤ 使用“神道”这个词表明这一文本也采用了日本材料,因为“神道”这一词就来自日文神道教(Shinto Religion)。

更多。^①梅铸在结论中也附和了杨千里的论断,贞德利用神谕是“哄骗那些愚民罢了”。她还解释道,从古以来一切大英雄大豪杰,本来没有一个不用权术的,何况贞德是个女子。^②

作为古典现代派特别推崇的模范女英雄,贞德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她的性别扭曲。自从贞德向国王请求着骑士装获允以后,她身着男装,夺得了又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英国人怕她以女性装扮在法庭上出现会使她被赦免,所以就为她提供了她男子服饰,她兴奋地穿戴了起来。^③《世界十二女杰》和《女子新读本》认为:贞德那一刻的虚荣心导致了她的毁灭。根据《十二女杰》的记载,当英国人试图诱使贞德穿上男人的衣服时,她回忆自己装扮成男人觐见国王的光荣的日子,当时的她是一个英勇可爱的“盔甲中的美女”。这荣耀的记忆令她忽略了着异性服装有违律法。^④虽然《女子新读本》中的贞德故事大大简写了《十二女杰》中的贞德传,但杨千里在描写这一时刻时添加了细节:贞德身着男装,自我陶醉地载歌载舞。杨千里指出,她正因为这一点才被英国人当作异端处死。^⑤

当下主义者没有古典现代派那么反感性别倒置。梅铸指出,贞德是因女扮男装有悖律法而获罪,但她并不因此而贬损贞德。^⑥比起古典现代派材料中的视角,梅铸阅读贞德故事的视角完全是世俗化的。她不仅去除了贞德故事中原有的基督教元素,还剥除了它的东亚复述版中添加的有关性别规范的儒家教条。

在本书第三部分开头的引文中,梅铸指出,更确切地说,贞德是比花木兰更伟大的女英雄,因为她不受中国女德教条的束缚。如果她为男女

① 梅铸,第60、63页。

② 同上书,81—82页。

③ 但最近的研究显示,贞德很有可能在狱中遭到了强奸,而她继续着男装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洁,也可能是因为英国人没有给她别的衣服。有关法庭上贞德的男性装束的讨论参见Pernoud,第220页。

④ 岩崎祖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40—41页。

⑤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6b;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10:17a。

⑥ 梅铸,第81页。

有别、恪守孝道等规矩所制约,她绝无可能领导法国人抗击英军。梅铸声称,正是因为贞德不遵守女德,才使她成为一个倍受赞誉的女英雄。她问道,“如今法国的人,哪一个不晓得她,哪一个不崇拜她?”法国之外又有谁没有听说过法国伟大的爱国者圣女贞德?^①

革命烈士罗兰夫人是另一位在晚清时期广受赞誉、闻名世界的法国女杰。罗兰夫人和她的丈夫让·马利·罗兰都是温和的吉伦特派,反对过分的革命暴力。当以罗伯斯庇尔(1758—1794)为首的激进派开始清洗吉伦特派时,罗兰夫人选择冷静地等待命运,拒绝和她懦弱的丈夫一起逃离巴黎。她被诬告为保皇党,1793年11月8日在断头台上被处死。罗兰先生则在听到她的死讯两天后自杀了。^②

梁启超在1902年向中国公众介绍了这一不凡的人物。^③ 梁启超的介绍文章影响很大,所以《世界十女杰》的作者声称,自己不必在明年出版的选集中去重复罗兰的故事。^④ 不过这位伟大的吉伦特烈士收在了《世界十二女杰》中,被当作典范中的典范来描写,她在断头台上的坚定完美地代表了这部选集所推崇的英雄气概。^⑤ 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以《十二女杰》中的罗兰传记为基础编写了两篇课文。^⑥ 罗兰夫人也经常被当下主义者所引用。

梁启超的文章、《世界十二女杰》和由其派生的《女子新读本》传记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日文资料,但不是同一个日本源头,在翻译和细节上也不同。^⑦ 这些文章在政治上都比较温和,都

① 梅铸,第53—54、55、59、62页。

② 罗兰夫人本名玛侬(Manon Jeanne Philipon)。有关她在晚清文化想象中的地位,请参见胡纓的深入讨论。Hu Ying, *Tales*, 第153—196页。

③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

④ 《世界十女杰》,《例言》,第1页。

⑤ Iwasaki and Mikami, *Sekai, "Jo"*; 岩崎祖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序》,第1—2页。《世界十女杰》的罗兰夫人传见于第42—50页。

⑥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7a—8b。

⑦ 梁启超文章所依据的日文材料是一篇连载的罗兰夫人传记,自1893年11月到1894年2月刊载于日本的《家庭杂志》(1892年9月到1898年8月)上。参见松尾洋二,第265—278页。

批评了这种开始吞食自己孩子的革命。梁启超用罗兰临刑前一句著名的话作为传记的开篇。在把头放在刽子手刀下之前,罗兰向协和广场的自由神像前鞠了一躬,留下了一句话:“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①《十二女杰》和杨千里的《读本》记录的语录可能知道的人不那么多,但也同样震撼,据称在同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罗兰夫人冷笑着说:“公等今送我上断头台,来日即将面对公之断头台。”^②

这些温和的传记强调了罗兰夫人的母性和女性特质。没有一篇材料用生理意义上的母亲来描写她,只有《十二女杰》顺便提到过一个女儿的诞生。但这些材料都把她比作政治和社会的母亲。^③在梁启超的讲述中,她养育了现代政治。她是拿破仑之母、梅特涅之母、马志尼之母、科苏特之母、俾斯麦之母和凯沃尔之母。总之所有 19 世纪的欧洲伟人不得不把她认作母亲,19 世纪欧洲的一切文明不能不把她视为母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法国大革命是 19 世纪欧洲之母,而罗兰夫人是法国大革命之母。^④

后来的传记也都以这一母亲的比喻为基础。《图画日报》1909 年分二十部分连载发表的罗兰传记开篇就说:“罗兰夫人是自由之母。”^⑤(见图 40)《十二女杰》把罗兰夫人当作社会之母来描写,忠诚的女佣和男仆受她感召,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她和罗兰先生的尸骨。这两个仆人最终因忠于被打倒的吉伦特派而被捕,年轻女佣以精神错乱为由获释,男仆则被处斩首。^⑥

这些不同的传记还突出了罗兰夫人的女性外表和风范。《十二女

①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1。胡纛对梁启超如何运用罗兰夫人为他自己对革命的暧昧观点服务给出了深刻的分析。参见 Hu Ying, *Tales*, 第 173—174 页。

②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49 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8a。

③ 提到罗兰夫人女儿的内容,参见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42 页。胡纛(*Tales*, 第 179—186 页)探讨了一个讲述罗兰夫人和女儿之间的关系的弹词作品。

④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第 1 页。

⑤ 《罗兰夫人》。

⑥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49—50 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8b。



图 40 “自由之母”罗兰夫人提倡革命

资料来源:《罗兰夫人》

杰》多次称她为(美丽的)女丈夫,她从不会表现出圣女贞德那样的性别混乱。^① 罗兰集英勇和优雅于一身,但前者从来没有掩盖后者。梁启超赞美她美貌惊人、陈述意见有礼有节,还描写了身着白色丝裙、长发飘飘的她在临刑前的惊鸿一瞥。^② 《十二女杰》则强调罗兰的典雅婀娜、同样也刻画了白色丝裙和行刑时的凄美。^③ 虽然这些文献都提到罗兰夫人结婚时不顾父亲的反对自己做主,他们还是把她按照传统的贤内助来描写。^④ 让·马利·罗兰担任的官职是内政部长,但按梁启超的说法,实质上这个职位是罗兰夫人在担任,她是吉伦特党实际上的领袖,一直在吁

① 例如,可参看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46 页。

② 胡纒分析了烈女的性化(sexualization),参见 Hu Ying, *Tales*, 第 176—179 页。

③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45、49 页。

④ 同上书,第 46—48 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7a。

请政府改革。类似地,《十二女杰》也提到,罗兰夫人所写的报告和演说词为她的丈夫赢得了忠实的追随者。^①

最后,梁启超和《十二女杰》的作者用罗兰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证明英雄人物的传记能起到多么大的力量。根据这些传记的记载,罗兰从9岁起就热切地阅读了普鲁塔克(约45—125)所作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本传记集将25个希腊英雄、25个罗马英雄对照起来,中文译本名为《英雄传》。这本传记为罗兰提供了基督教教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梁启超和《十二女杰》的作者都描写了她在教堂偷偷地阅读《英雄传》,令父母惊惶不已。《十二女杰》中写到她在1763年一个圣斋日祈祷的时候第一次承认了这种过错。传记还声称,正是在普鲁塔克的持续影响下,罗兰发展出了共和思想,并能在动荡的政治风波中保持坚定。^②

罗兰夫人令当下主义者赞赏的不是她的母性,而是她对革命的宣传鼓动。他们赞扬了她的历史眼光,她的牺牲在世界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女留学生们也不断给罗兰夫人锦上添花。何香凝称她是“历史上伟人”。^③ 王莲提到她在法国革命中流尽了“朱血”。^④ 陈彦安声称,她的历史功绩胜过男子。^⑤ 有一首宣传女子教育的流行歌曲赞美了赵必振译本中所有的世界十二女杰,因为她们对国家、家庭和民族深切的爱,她们的名字将“万代流芳”。然而,这首歌只把罗兰夫人当作最典型的当下主义的精英,歌词唱道,“罗兰重生廿世纪,愿我女同胞兮速起!”^⑥

在晚清时期,另一位耀眼的法国大革命英雄是夏洛特·科黛

①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48页。也请参见 Hu Ying, *Tales*, 第176页。

②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第1—3页; Hu Ying, *Tales*, 第174—176页;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43、44—45页;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7a。

③ 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

④ 王莲,《杂感七首》,106[0116]。

⑤ 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155[0585]。也请参看勇立,第241页。

⑥ 佛群,《女学兴》,第138页。

(1768—1793)。《十二女杰》、《十女杰》、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以及最简要的许家惺的《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都赞美了科黛。^① 与罗兰夫人一样,科黛也支持温和的吉伦特派、反对激进的雅各宾派,她认为道德的转变才是革命的目标。她的名声源自于一个暴力行为:乘雅各宾派领袖让·保尔·马拉(1743—1793)沐浴之机,她成功地刺杀了他。^②

上述三个较长篇的传记有若干共同点,提供了科黛年轻时代的类似的细节,比如母亲早逝、家庭陷于贫困、父亲患病,以及她后来从 1780 年到 1785 年或 1786 年在修道院的生活。这些传记都强调科黛像罗兰夫人一样,同样从普鲁塔克的《英雄传》那里得到了重要的启示。科黛在修道院发现了普鲁塔克传记,躺在床上狂喜地阅读。她前往巴黎时也随身带着这本书,在刺杀马拉前还在查阅,甚至在她被处决时手里还攥着这本书。^③

这些不同的版本使用了类似的表达来描写科黛的目标:终结以马拉为代表的雅各宾派之恶。^④ 它们都声称,科黛的榜样将唤起人们的英雄气概,令羞愧的男人行动起来。^⑤ 《十二女杰》和《十女杰》都描述了科黛在去巴黎的途中与一名男子邂逅,他浪漫地爱上了科黛。这个小插曲强调的是科黛不关注情感琐事,只是决心完成她的使命。《十女杰》的作者传记末尾又写到这名男性,讲述了科黛如何在他心里激起了同样的共和主义信念,他也准备为事业而流血。^⑥

在《十女杰》、《十二女杰》和杨千里的简写本之间有很多语气和重点

①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1—9 页;《世界十女杰》,第 9—16 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1a—2a;许家惺,79b。

② 有关科黛的内容,参看 Schama, 第 729—731、735—741 页。

③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2、4、5、8 页;《世界十女杰》,第 10、11、13、14 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1a;许家惺,79b。

④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3、7 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1b—2a;《世界十女杰》,第 13 页。

⑤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1、7 页。

⑥ 《世界十女杰》,第 15 页。

上的差别。《十二女杰》的基调与中国女勇士传记最相合：在“道德与正义沦陷时”，科黛为恢复道德秩序牺牲了自己。^①《十女杰》则与此相反，将夏洛特写成推动历史巨变的人，它把科黛的死描述为“殉国”，认为革命恐怖统治的领导人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和罗伯斯庇尔之死、恐怖统治的结束、以及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都要归功于她。^②

《十二女杰》和杨千里的读本都强调了科黛的柔弱，表明弱女子也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而《十女杰》则看重她的英雄血，宣称伟大的业绩需要流血牺牲。《十二女杰》描写她“素手持白刃”，杨千里也称“威严的马拉死于柔弱女子之手”。^③与此相反，《十女杰》在开篇就声明，暴力和流血是正义和幸福的种子。^④鲜血成了科黛英雄主义的标志：它不仅在刺杀马拉时喷涌而出，也留在了普鲁塔克《英雄传》的书页上。科黛从马拉的锁骨下拔出了血淋淋的匕首，在书页上擦拭干净。临刑前，她用指血给父亲写了一封血书，告诉父亲她在普鲁塔克的书上留下了“马拉的纪念”。^⑤

阿尼塔·加里波第(1821—1849)是意大利革命家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的巴西籍妻子和英勇的战友，她也出现在《十二女杰》、《十女杰》和杨千里的教材中。^⑥这位非凡的女性离开了在巴西圣卡塔琳娜州的第一任丈夫(在中文传记中未见其细节)，于1839年10月登上加里波第的船并加入他的队伍。加里波第是由意大利利古里亚水手成长起来的民族主义革命家，1836年逃离欧洲，并在巴西南部为共和国独立而战斗。阿妮塔在乌拉圭反抗阿根廷的战争中和加里波第并肩战斗了9

①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1页。

② 《世界十女杰》，第16页。

③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1、5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1b-2a。

④ 这被称为“西方真理”。参见《世界十女杰》，第9页。

⑤ 《世界十女杰》，第13、14、15页。

⑥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9—18页；《世界十女杰》，第37—45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2a-3b。

年,直到他们回到欧洲参加 1848 年的革命并反抗奥地利皇帝。1849 年 2 月,阿妮塔和加里波第一起参加了保卫新成立的罗马共和国的战斗,抵抗那不勒斯和法国旨在恢复教皇统治的武力干涉。在法军的围攻下,罗马于 6 月 30 日陷落,阿妮塔与加里波第军团一起逃离了法军和奥地利军队的追捕。1849 年 8 月 8 日,在意大利取得统一前大约 17 年,怀着第五个孩子的阿妮塔病死在了丈夫的怀中。

晚清时各种阿妮塔·加里波第的传记有很多共同的错误,例如她的出生年份本是 1821 年,这里都误为 1828 年。她的国籍也被搞错了,还有她父亲的角色也出了错,实际上他抛弃了家人,但《十二女杰》和教科书中都写他训练了女儿的军事技能。《十二女杰》和《十女杰》都赞扬了阿妮塔·加里波第的勇气以及她为促进意大利统一所做的贡献。尽管加里波第为阿妮塔参战而担忧,但她从未害怕过。最后加里波第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尊敬并深爱阿妮塔,他的成就有一半要归于阿妮塔。^①

两个主要的传记都称阿妮塔既英勇又有爱心。《十二女杰》赞美她是一位深情的女子、正义的英雄,《十女杰》则颂扬她的勇气和深沉的感情。^②《十女杰》甚至还用女性的字眼描写了她温柔地包扎和看护受伤的士兵,是天生的教师和母亲。^③两种传记都提到加里波第如何被她的美貌所震撼。^④但是《十二女杰》认为她完美地结合了母性气质和英雄气概,描写了阿妮塔如何在一个隐蔽的小屋里平静地生下第一个儿子;而《十女杰》却侧重刻画了她分娩过程的血污、孤独和困难,加里波第收到了一封“滴着阿妮塔手中鲜血的信”,信上讲述了她怀孕八个月期间所经历的战争磨难,生产之后又如何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抚育儿子。^⑤

①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16 页。

② 同上书;《世界十女杰》,第 44 页。

③ 《世界十女杰》,第 37、39 页。

④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10 页;《世界十女杰》,第 38 页。

⑤ 《世界十女杰》,第 40 页。

两种文本都说阿妮塔是丈夫的战友。但在《十女杰》中，她的英雄主义是直率和阳刚的。作者特别描写了她训斥士气低落时的丈夫、强迫南美洲共和军接受她的方式、穿着男装运筹帷幄、发表振奋人心的讲话等等。当她和加里波第在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作战时，她激励他说，那些此生不能为人杰的人死后会成为幽灵，而失败和羞辱会使刺猬被动地蜷缩起来。^①《十二女杰》中的结束语是“当人们回想这位可爱而正直的女英雄时，安妮塔就会醒来”，《十女杰》则直接引用了她的墓碑碑文：“爱国女侠阿妮塔”。^②

女作家斯塔埃尔夫人(1766—1817)是拿破仑一世(1769—1821)的激烈的反对者，也是最早拥护妇女权利的人，她的传记在《世界十二女杰》和《世界十女杰》中都有，但没有出现在杨千里的教科书里。^③这种省略可能是出于谨慎：斯塔埃尔夫人以其政见与作品闻名于世，她的情人众多也人所共知。1786年她曾与瑞典驻法大使德·斯塔耳·荷尔斯泰因男爵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短暂婚姻，后来便和一些人发生绯闻。绯闻对象包括路易·德纳博讷伯爵(1755—1813)，她还和他生了两个儿子；还有阿道夫·路易·理宾伯爵(活跃于1790年)，他策划了对瑞典和芬兰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暗杀；另一位是本杰明·康斯坦丁(1767—1830)，他是作家和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在巴黎的文学沙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斯塔埃尔夫人后来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沙龙，在法国大革命即将来临时这个沙龙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君主制终结后她在瑞士避难，1795年她以共和主义者的身份回到了巴黎。她原本希望拿破仑会很快结束大革命，但拿破仑很快就怀疑起她来。从此她和拿破仑两人之间就开始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到1802年她被迫流亡。她的足迹遍及欧洲，所到之处都受到流亡君主一般的拥戴。她还写了许多小说。1815年波旁王朝复

① 《世界十女杰》，第41、38、39、43页。

②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18页；《世界十女杰》，第45页。

③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18—26页；《世界十女杰》，第21—24页。

辟时她回到了巴黎,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去世。^①

这两个传记都关注斯塔埃尔夫人与拿破仑的冲突。据《十二女杰》说,在拿破仑的眼中她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视她为敌国”。^②《十女杰》则声称拿破仑不害怕海洋、高山或大雪,甚至面对刀枪也不退缩,但他非常害怕这位美丽女子细小精妙的笔写下的斗志昂扬的篇章。^③当拿破仑坚持认为妇女与政治无关时,斯塔埃尔夫人反驳说:“法国是属于法国人的,难道我不是法国人?”拿破仑强行流放了斯塔埃尔夫人。^④当她的朋友和家人请求拿破仑让她重返巴黎时,拿破仑说如果她是保皇派或共和派的一员,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请求,但她暗中操控着势头强劲的沙龙运动,这是他无法容忍的。^⑤

这两个传记都突出了斯塔埃尔夫人的学问和文才,连拿破仑都承认,如果加以适当的引导,她的学识和才华会超过男子。^⑥十五岁时,她就看孟德斯鸠(1689—1755)的《论法的精神》。婚后不久她就成了一名政治记者,运用手中的笔有力地抨击政府、唤醒民意。^⑦与其他晚清时期的外国才女传记一样,这两篇传记都没有深入研究斯塔埃尔夫人著作的内容。《十二女杰》简要地介绍说她所著的书有18本,而《十女杰》则列出了许多她的著作的书名。^⑧

只有《十二女杰》提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斯塔埃尔夫人的保守观点。根据它的描写,当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以“自由的美名”被处决时,斯塔埃尔夫人感到恐惧。^⑨而在《十女杰》中则完全没有提到过这些

① 有关斯塔埃尔夫人的内容,参见 Ozouf, 第 64—87 页。

② 岩崎祖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18 页。

③ 《世界十女杰》,第 10 页。

④ 岩崎祖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24 页。

⑤ 《世界十女杰》,第 24 页。

⑥ 岩崎祖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25 页。

⑦ 《世界十女杰》,第 22 页。

⑧ 同上书,第 24 页。

⑨ 岩崎祖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23 页。



情绪。《十女杰》没有去批评那些以自由之名行事的人，而是去描述她流亡英国时如何在各处呼唤平等自由的情感。她宣称拿破仑是自由的敌人，并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自由党”接触，在她临死时嘴边还喃喃地念着“我爱自由”。^①

两个文本间的另一显著区别是，《十女杰》对斯塔埃尔夫人的浪漫情事总体上保持了沉默，而《十二女杰》则将这些风流韵事称为斯塔埃尔夫人“最大的错误”，但又替她开脱说，她生活的时代法国处于道德混乱之中，她是一个真正的巾帼英雄，因为这些不当举止而批评她是愚蠢的。^②虽然《十女杰》的作者所参考的17本作品中肯定涉及了这一话题，但他完全避谈此事。他显然认为，这种道德细节对于刻画这个拿破仑的政敌、政治自由的捍卫者来说无关紧要。

无政府主义者路易斯·米歇尔是另一位热爱自由的法国女英雄。《十二女杰》、《十女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杨千里的《读本》，包括陈撷芬的《女学报》都分别写到了她。^③米歇尔是一位女佣和主人家的儿子所生，从祖父那里接受了自由的教育，从小就怀有帮助下层人民的热忱，后来致力于教育、慈善工作，并成为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她卷入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于1873年被驱逐到新喀里多尼亚。在流放的七年时间里，她与其他政治犯打交道，教育土著人民，开始形成其无政府主义立场。终其一生，她一直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在英国、法国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她曾因煽动罪多次入狱，短则数月，长则数年。1905年1月10日她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旅途中死于马赛。

《世界十二女杰》和《世界十女杰》上的两篇主要传记将米歇尔表现为西方世界屈指可数的“无政府党的女将军”之一，并用她的故事来向读

① 《世界十女杰》，第23—25页。

②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25—26页。

③ 《世界十女杰》，第26—32页；《世界十女杰》，第1—8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3b—5a；陈撷芬，《世界十女杰演义》。

者说明无政府主义。^① 两篇传记都提到了米歇尔政治思想的两个来源:她的早期经历和祖父的教导。米歇尔小时候曾看到别的孩子虐待动物,把鸟儿关在笼中,她感到很震惊。她试图说服他们把动物放了,当他们拒绝她的要求时,她就自己去把笼子打开。当时她小小年纪,已经明白了说理行不通时必须采取武力。^② 她的祖父推崇共和主义,他让米歇尔学会了用政治语言来表达这种自然的渴望,他教她卢梭的哲学,与她分享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经验,以及他对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之情。^③

但两种传记如此介绍米歇尔和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不同的。《十二女杰》的作者和译者是要向读者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原理,即通过破坏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来创造平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从“一切皆应自由”的前提出发,这种“自然的律法和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废除国家政权、宗教与伦理原则、婚姻制度和阶级体系。^④《十女杰》的作者则相反,他不仅着眼于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原理,而且衷心希望能够在当时的中国付诸实现。他坚称,米歇尔的故事说明了无政府主义所指的不仅仅是刀、血、炸弹和无情的暗杀。归根结底,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死亡和破坏不是出于私人恩怨,也不是源于对生命的无情漠视,而是源于寻求美好世界的英雄的慈悲感。^⑤

《十二女杰》把米歇尔当作一位不寻常的人物来表现。书中的其他传记都用美丽、纤弱、温柔来形容其他女杰,而在描写米歇尔时多次暗示她“夜叉”般的丑陋和怪异。^⑥ 它还就米歇尔是私生女的说法加以评论,

① 两篇传记都提到了另外两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女性,美国的爱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和另一位意大利女子。

②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28—29页;《世界十女杰》,第3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4a-b。

③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29页;《世界十女杰》,第4页。

④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26—27页。

⑤ 《世界十女杰》,第2—3页。

⑥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27—28页;杨千里,《女子新读本》,2:4a。

说只是对她母亲婚后不久就生了她感到有点困惑。^① 但是,《十二女杰》中她的传记像所有的女杰故事一样结尾:不仅是妇女,男人也必须学习米歇尔的故事,引导人民树立美德(“顽廉懦立”)。^②

按《十二女杰》的说法,米歇尔引起了一些人反感,但她却使得《十女杰》的作者大受震动。^③ 他试图将米歇尔在他身上唤起激情传递给冷漠的同胞——那些世界上最值得同情的人。^④ 他大声疾呼,拒绝保护你的权利是最严重的犯罪。如果中国人不放弃自己的奴性,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国家将会灭亡。^⑤ 这部传记是《十女杰》中的第一篇,也是最震撼人心的,它确立了选集的主题,表达了当下主义派的核心信念:自由和鲜血。作者宣称自由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没有空气人会死亡,没有自由人也会死亡。”^⑥米歇尔的一生充分体现了这个信念。米歇尔最为热爱自由,并且愿意为之而战,她宣称上帝并不存在,只存在自由。^⑦ 她相信自由只能用鲜血来赢取,《十女杰》的作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声称,惟有鲜血的救赎力量可以摧毁邪恶,拯救中华民族。^⑧

对照:英勇的贞节烈女

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中,英雄主义显得空前重要。人们对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各执一词——流血和救赎、国家实用主义、渐进式改革等等方案在对女英雄的不同描述中交织在一起。改良派赞赏花木兰等中国

①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28 页。这反映了晚清西方妇女传记中的一种模式,即掩饰令人不快的细节,例如阿妮塔·加里波第的第一次婚姻和玛格丽特·富勒·奥索利的非婚生子。

②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第 21 页。

③ 《世界十女杰》,第 2 页。

④ 同上书,第 8 页。

⑤ 同上书,第 1—2 页。

⑥ 《世界十女杰》,第 7 页。

⑦ 同上书,第 4—5 页。

⑧ 同上书,第 5—6 页。

女勇士,还有圣女贞德等几位西方女杰,目的是巩固目前的皇权。他们以花木兰为榜样,提倡女子更积极地效忠朝廷,还通过圣女贞德来证明,如果由真正的爱国者来领导,一支很小的军队也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

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赞赏中国女英雄不爱红妆爱武装,为保卫朝廷或建立新政权英勇奋战。他们还赞扬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政见者、军事领导人、刺客和革命者在内的西方女杰。尽管这两派人物经常提到相同的中国和西方妇女,但引用这些女杰故事的目的却有所不同,显示出他们政治意愿上的本质差异。

古典现代派希望妇女能更多地参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不要丢掉中国的道德和文化根基。他们既赞扬中国女勇士的勇气,又称颂她们的美德。在他们讲述的故事中,花木兰勇敢而孝顺,梁红玉无畏而谦逊,沈云英大胆而忠诚。他们同样也强调了伟大的外国女杰的女性特质。如罗兰夫人所展现的女性的优雅谈吐和风范,刺客夏绿蒂·科黛的美丽、纤细和柔弱等等。当外国楷模逾越性别规范时,古典现代派则说她们或她们所处的时代不正常。如路易斯·米歇尔相貌丑陋而且是私生女,斯塔埃尔夫人是道德混乱时期的产物,像圣女贞德那样坚持倒错性别角色的人物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下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力图摧毁而不是加强中国摇摇欲坠的伦理基础。他们的兴奋点就是借助世俗化、暴力和流血争取个人自由,打破一切道德、文化和政治上的束缚。他们和古典现代派一起努力淡化西方女杰身上的基督教色彩:并不是神的声音召唤贞德,而是因为无知的下层群众需要哄骗;启发罗兰夫人和科黛的是英雄传记,而不是圣经。同时,他们也力图使中外的女英雄都摆脱儒家教条的束缚。他们把中国女勇士从她们所嵌入的道德世界中抽拔出来,又剥掉西方女杰故事的说教外衣。他们给这些女子的故事披上了国家和民族议题的外衣。

于是,当下主义者将花木兰描写得异常勇敢,而且孝顺得有点可悲,对著名的花木兰回家的情节,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嗟叹不已。他们

重新刻画了东晋李秀的贞节孝顺和陈朝少数民族妇女领袖洗夫人的忠诚,把她们当作中国反清斗争的勇敢榜样。当下主义者对西方的女杰故事也大加改造。他们不考虑古典现代派一直强调的女性品质,而是着眼于女杰们自我牺牲的英雄精神,赞扬她们渴望洒热血的激情。因而他们认为圣女贞德的男性装扮、米歇尔的丑陋相貌和斯塔埃尔夫人的不贞都没有关系,在他们看来,科黛、米歇尔和斯塔埃尔夫人这些女子之所以值得效仿,是因为她们明白,消灭马拉那样的革命恐怖分子或是拿破仑那种反动领袖会带来政治解放和个人自由。他们没有称赞罗兰夫人的谦虚或上断头台的决心,而是赞美她的鲜血穿越了历史。能拯救国家的是自我牺牲而不是自主权。

但女英雄的流血牺牲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并不新鲜。英雄的贞节烈女的传统至少从蒙古入侵南宋以来就一直存在。尽管英雄烈女和烈妇随着贞节烈女一起被许定一等人打倒了,但许定一嘲笑的是后者的私德和绝对的忠诚,相比之下英雄烈女和烈妇的行为还是更具公众性和政治性。这些英雄的女子之所以牺牲自己的性命,不仅是为了保护个人名声和家庭荣誉,还为了在外敌来临时保卫家园的完整。然而,因为她们的英雄主义是自卫时反应性的英雄主义,所以 20 世纪初积极捍卫中国国家荣誉的作家们很少以她们为榜样。

尽管如此,英雄的烈女形象还是在 1900 年夏天进入了公众的视线之中。8 月 12 日,到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进入了北京以东 14 英里的通州城。^① 500 多名“良家妇女”投水自尽或在树下自缢,逃脱了被

① 八国联军是一支大约 200000 人的国际军队,1900 年 8 月 4 日八国联军离开天津,8 月 14 日激起了北京的义和团运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内容,参见 Cohen。有关八国联军的角色,参见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由于通州在北京界内,有一些作者称此地为北京,因此我们我们还不清楚究竟是只有一个“通州事件”,还是在北京和通州都发生了自杀事件。最可靠的史料是当时坪谷善四郎以日文写成的报告,他没有提到北京发生了自杀,但其他史料的意见却指出北京也经历了自杀事件。参见《联军劫掠纪闻》,[3952];“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第 277 页;赵尔巽,46:510,14140。

外国士兵侮辱、强奸和施暴的命运。在评论这一近代史事件时,人们提出了女英雄主义和国家荣誉的观点,以求与早期历史或外国的例子做对比。

由日本、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士兵联合组成的八国联军在通州城犯下了疯狂的暴行,以至于穿过通州城的潞河都被尸体堵塞了。城里的4000人口有60%死亡,30%逃走,留下的10%都是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①死者中有570名妇女是自杀的。^②

八国联军各国的观察员带着各自的偏见记录了这一事件。尽管各种文献都承认确实有许多妇女死亡,但不一致的是她们为何自杀,她们是否受到强奸,以及哪些部队最应该为他们的暴行负责等等。据美国观察员A·亨利·萨维奇·兰德(1867—1924)的记载,妇女跳下城墙自杀不是因为她们已经被西方士兵摧残了,而是因为义和团和清廷军队刚洗劫过她们的家园,令她们感到绝望。^③ 另一名美国人,美国国外宣教会传教委员会委员麦美德(1861—1924)记载说,通州数百名妇女自杀“以免落在俄罗斯和日本禽兽手中,那样命运更糟。我们的美国士兵看到她们跳进河里或井里,在通州的一口井里有12名女孩自杀,他们还亲眼看见一位母亲将她的两个小孩淹死在一个大水缸里。”^④ 英国人E·J·狄龙(1855—1933)声称,非英语国家士兵或德国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后把她们刺死,或强奸并虐待她们至死。他把“忠贞的妻子和纯洁的女儿”看作佛教和儒家的贞节烈女,她们自杀是为了逃避更坏的命运。年轻妇女们把头淹没在浅浅的河水里,同情她们的士兵试着把她们救上来,但她们又跳回河中寻死,或者在树上投缢自尽,或者在自家花园里投井自杀。^⑤

通过这些西方人的报告,通州的恐怖可略见一斑。然而,与晚清中

① 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第230—231页。李德征等人认为死者约为2400人,一篇百科全书上的文章给出的死者数字稍小,为1178人。

② 坪谷善四郎,第225页。

③ Savage-Landor, 1:379。

④ 转引自Cohen, 第184页。

⑤ Dillon, 第21—22页。

国后来对此事件的描述关系最直接的报告却出自日本记者坪谷善四郎(生于1862年)之手。坪谷的报告可能是首先作为新闻报道交给日本媒体的,后来收录在1901年东京出版的报告文学《北清观战记》中。海外女学生何香凝也曾评论过这一事件,她声称坪谷的作品是她的材料来源,很可能其他评论家也是如此。坪谷描写的大屠杀细节与西方报告相同。他描述了处女和良家妇女如何在遭受俄罗斯和法国士兵侮辱后跳入院子里的大水缸自杀。只有这一观察给出了死亡妇女的精确数字——570余名,现代的学者也都接受这个数字。^①

这570名通州烈女也属于千百年来贞节烈女之列。她们所遵循的集体溺水等女性殉难的习俗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纪。^②她们代表了一种类型的典范,自元代以来已成为中国历史作品中的一个固定模式。^③本章已经讨论过,晚清作者更愿意赞扬中国和西方女英雄战士身上经过深思熟虑的英雄主义,但也并没有完全无视这些历史上的贞节烈女反应性的英雄主义。改良派引用这些故事最多,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也有所引用。和描写更为激进的中外女杰时一样,他们对贞节烈女的描写也在美德与英勇存在着张力。

20世纪初的材料中所描写的贞节烈女一般死于蒙古入侵南宋时期或晚清的太平天国动荡时期。虽然贞节烈女这个类型在满清入侵时达到了顶点,但明末清初的女烈士在20世纪初的资料中基本没有记载。^④或许是因为和沈云英、秦良玉等晚明时期豪气干云的女勇士相比,为贞节殉难的她们很难撇清她们身为明朝遗民和名妓的不良身份。

① 坪谷善四郎,第225页。中国学者对这一事件最全面的学术考察(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第231页)也引用了坪谷善四郎的文章,采用了他的570名妇女自杀的说法。

② Mou,第124页。集体溺水在1900年之前许久就已经成为了通州烈女传说的一部分了。参见赵尔巽,45:511:14180。

③ Fong, *Signifying*, 122.

④ 关于只有晚明烈士才是忠贞代表的内容,参见 Carlitz, *The Daughter*, 第38页; Theiss, *Managing*, 第49页。在民国初年,这些女性能正式得到赞美了。参见赵尔巽,46:510:13108-13115。

南宋的王贞妇(或烈妇,活跃于约 1260 年)被杀害了公婆和丈夫的元兵抓获。她拒绝了一个士兵的挑逗,在悬崖上用血书写下绝命诗后跳崖而亡。^① 魏息园的《绣像古今贤女传》和许家惺的《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都收录了她的故事。改良派和古典现代派重述王贞妇故事时采用了不同的插图,分别强调了她的贞节和英勇。《绣像古今贤女传》用一副古典的插图表现这位女子优雅的品格,图中的王贞妇形象高贵,平静地用手指在岩石上写血书,画面中看不到蒙古人(见图 41)。《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的插图则采用了悲剧的表现手法来突出王贞妇欣然赴死,英勇地捍卫自己的荣誉。插图描绘了王贞妇飞身跳下悬崖,蒙古兵手持长矛站在崖上(见图 42)。^②



图 41 王贞妇用指血在岩石上写下遗言

资料来源:魏息园 XI. 15



图 42 王贞妇飞身跳下悬崖,蒙古兵手持长矛站在崖上

资料来源:许家惺,72b

① Fong, *Signifying*, 122.

② 魏息园, IX. 15; 许家惺, 72b.

这两位编者描写临川梁夫人时也有类似的反差。梁夫人不但像王贞妇一样宁死也不向蒙古兵投降,而且还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敌人赦免丈夫。魏息园突出了梁夫人的忠诚,称赞她长眠之后还继续侍奉丈夫,托梦给他指导他选择第二任妻子。^①许家惺着眼于梁夫人的英雄气概,正是她英明地决定与丈夫分开,才使丈夫幸免于难。许家惺还描写了她在自杀前无畏地痛斥“匪徒”。^②

第三个对蒙古人以死相抗的南宋女子是韩希孟,在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派的书中各有一篇她的传记。她同时是文学和道德的典范。跳河身亡前,她在衣服的腰带中藏进了一篇绝笔诗,留下了最后的抒情遗言。^③在《最新女子伦理教科书》中“韩希孟”这一条目里,许家惺赞誉她谙熟经史、品德高洁。按殉节者传记的惯例,许家惺写道,当人们从河中找回时她的遗体时发现,她纯洁的处子之身看上去仍栩栩如生。^④许定一在《祖国女界文豪谱》的序言中称赞韩希孟的才华,在《祖国女界伟人传》中歌颂她的英雄气概。他把这个宋朝的故事和中国晚清的民族危机联系起来,称赞她是“女子排外思想最发达者也”。他感叹说,“强胡至今犹张气焰于祖国”,而他的同辈人不像韩希孟,没有直面敌人的勇气。^⑤

许定一把这位宋朝才女的悲剧故事和自己当下的政治联系起来是有点勉强,但太平天国之乱中的女英雄故事就有着真实的政治紧迫感。太平天国女烈士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女德和英雄主义之间的矛盾,还反映了晚清各种有关政治品格和民族英雄主义的观点。不难看出,永恒主义者用这些故事来宣扬忠于清朝政权,包括许定一在内的当下主义者则赞美前文讨论过的太平天国女领导人,并用这类故事来反对清王朝。而这两种立场之间的一些中间立场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① 魏息园, IX. 16.

② 许家惺, 71a.

③ Fong, *Signifying*, 122.

④ 许家惺, 74a.

⑤ 许定一,《祖国女界文豪谱》, 17a - 18; 许定一,《祖国女界伟人传》, 第 30—32 页。

在永恒主义者讲述的男人背叛朝廷的故事里,对清廷的忠诚压倒了女德制度。有三个这种故事后来收入了《清史稿》,它们描写安徽的一些女子在丈夫或公公投降太平军后选择自杀。其中一个故事说,桐城的一位生员加入了洪秀全的队伍,1861年随太平天国部队回到家乡,妻子赵氏对他严辞谴责。她嘲讽地问道,他是否忘记了自己出身缙绅之家而不是逆贼的后代?说完这番话以后,她带着年幼的儿子一起投水自尽。^①

太平天国时期忠于清廷的烈士故事也流传甚广,但魏息园的《贤女传》一个也没收录。但他记载了受清兵欺凌的少女黄淑华(约1850—1867)的故事。19世纪50年代初,黄淑华四岁时,她的家乡江苏省上元被太平天国攻占。大约13年后,清兵“解放”了上元,但他们的残暴行径与太平军不相上下。他们杀死了黄淑华所有的家人,留下了这个女孩,打算把她卖到他们的老家湖南去。三个月后,两个清兵带着黄淑华经过湘潭,投宿在一家旅店中。黄淑华毒死了一个,刺伤了一个,之后上吊自尽。像王贞妇和韩希孟一样,黄淑华上吊前在旅店的墙上草草地写下了遗书,后来两名旅客抄录了遗书。魏息园在传记简短的评论中赞扬了这位17岁少女的勇气、坚韧和美德。^②

有一个题为《四忠女传》的古典现代派传记突出了效忠清朝的英雄。这篇传记描写了三位女性诱杀太平天国领袖杨秀清(卒于1856年)失败后选择自杀,还有一位毒死绑架她的太平军后自尽。传记的作者把她们归入了中国英雄的传统,并将她们与春秋时期鲁国年幼的汪錡抵抗齐国作比。^③作者还在故事中按照写殉道女子的惯例描述了她们的处子之身所带来的神力。四忠女之一,安徽赵碧娘的鬼魂在她死后17年左右重

① 赵尔巽,46:511:14175。

② 魏息园,IX.22。1874年黄淑华家乡出版的方志中收录的《黄烈女遗诗》中记载了黄淑华的故事,她的故事也见于闵尔昌,第3342—3345页。闵尔昌版的传记比魏息园更长。黄烈女的故事和方志可能是魏息园传记的材料来源,有关这些内容请参见 Fong, *Signifying*, 第121—128页。

③ 汪錡的故事见于《左传》和《礼记》;参见 Legge, *Li Chi*, 1:185。

返人间,制止了南岭的瘟疫流行。^①

在对太平天国殉难女子的评论中,政治色彩还只是引而不彰,但对通州事件的解读却带着明显的政治化倾向。有三位女作家为晚清各种报刊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分析,她们是日本教育家和“良妻贤母”的提倡者下田歌子、《同盟会》成员何香凝以及笔名“巾侠”的一位作者。从女德、女英雄主义和当前政治需要等种种不同的假设出发,这些评论家都给通州自杀注入了民族意义。她们都表示,这一事件标志着对女英雄主义和国家政治实践的理解必须在20世纪初做出转变。

下田歌子可能是中国晚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外国女子。她曾在一场有关女子教育的演讲中称赞了通州烈女,演讲的文字记录稿被广泛转载。下田精通汉学,认同儒家价值观,关注东亚的政治命运。当20世纪初中国面临各种挑战时,她采取的是改良派立场:“我听说当八国联军攻击(北京地区)时,”她说,“男人一般都投降了,而被外国人侮辱的所有的妇女都自杀了。这体现了中国妇女身上最美的品质。”她把对国家的关注融入了儒家思想原则,接着指出,只要这些妇女懂得像“爱自己身体一样爱自己的国家”,将她们个人的美德变为国家的美德,她们将成为模范的爱国主义者。^②

何香凝并不认为下田如此赞赏的这种女性品德在中国争取国际地位的斗争中是一种资本。在谈到坪谷善四郎的《北清观战记》时,她认为这是一个屈辱的事件。她在江苏省海外学生杂志《江苏》上写道:“当日联军在通州纵性屠戮,肆行淫掠,良家妇女蒙羞含耻,投身于贮水瓶中自杀。”^③她加大了坪谷善四郎的数字,指出通州一处“已千数百人”。尽管下田歌子认为这种自我牺牲是中国妇女“最美品质”和民族尊严的根源,何香凝却把它说成是中国人的消极和民族退化的标志。她问道,为

^①《四忠女传》。

^②《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12—13[40—41]。

什么她的中国男同胞们没有对外国士兵的可耻行径感到愤怒?为什么她女同胞不作积极的民族主义者,而甘当消极受害者,“必待肌肤之辱,死亡之惨及身而后觉乎?”^①

在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上,巾侠对这一事件采取了明确的当下主义者立场。她从下田对通州事件的描述出发展开评论。她写道,“日人下田歌子谓,联军攻北京时,男子多执大日本顺民旗以为向导,而女子之为外国人所辱者,无不自杀。是女也而有男性矣。”^②然而,下田关注的是将妇女贞节国家化,巾侠则追求将其男性化。下田力图维护女性自我牺牲的美德,巾侠则只是将它视为英勇的男性气概的新标志。^③

这三个评论所表现的重点分别是对女性英雄行为的男性化、克服以自杀来回应国家屈辱的倾向、维护在国际政治时代女德的神圣。但它们都使用这个女性自杀的实例来表达政治其见解。本章所讨论的作者引用中国和西方女杰故事都带着政治目的,巾侠、何香凝和下田也都借通州的烈女来来传播她们各自的民族抱负。

最后一个对此事件的简短评论来自地方志,它提醒我们,通州570名受害者不是民族想象臆造出来的,而是曾在外国士兵手中遭受噩运的真实的历史个体。地方志的条目记载着,“魏裴是魏廷玉的妻子,1900年当八国联军部队进入(通州)时,她投井死亡,时年二十一岁。”^④

只有遭遇到年轻的妻子投水自杀这样令人心碎的景象时,我们才不得不回想起在“女烈士”的名义下夭折的生命。只有当我们试图进入魏女士的世界时,我们才真正面对了“贞节烈女”和“女勇士”的沉默,在不断变化的世界英雄谱上,她们成了各种民族抱负的替身。

20世纪初中国的新型女杰们决心打破的,正是这种沉默。

① 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144[762]。

② 巾侠,第8页。

③ 巾侠。

④ 徐白,第343页。

第六章 新型女杰和女性时间的悖论

“务令其宗旨与志士相等，其热诚与志士相等，其气焰与志士相等，咸能执干戈以卫祖国”。

——忆琴，《论中国女子之前途(续)》

作为 20 世纪初生活在国外、在新式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女子，忆琴和她的女同胞决心结束历史前辈的沉默，克服中国女性作为美德、才学的典范或贞节烈女所遭遇的客体化。她们采取了一种新女杰的主体立场，不再受制于许定一和其他当下主义者所嘲笑的女德规范。她们的目的是跳出个人的、受生命历程限制的女性时间，投身于公众的、线性的男性时间，和男性一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① 作为这一代人中最坦率直言和最有影响的女性，这些新的公众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并不能代表所有晚清妇女。但是，她们的生活确实代表了中国女性在民族国家历史的紧要关头所面对的现实可能性。她们身上还凸显出晚清的民族主义事业内部，以及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之间的紧张。

新型女杰以当时流行的西方女杰来界定自己的类别。她们不是烈

^① 有关循环的时间与线性的时间、女性时间与男性时间，参见 Lefebvre，第 231—232 页；以及 Kristeva。

女、才女或烈妇,而是女杰、女豪杰和女英雄,这些词汇被用来修饰最新的出版物的标题,并扩展到政治和女子刊物中。^① 她们用笔名表达她们的抱负和热情。革命家秋瑾使用的笔名是“鉴湖女侠”、“竞雄”和“秋竞”。^② 《中国新女界杂志》的编辑燕斌使用的笔名是“炼石”,取自女娲补天的英雄功绩。^③ 其他作者的笔名也表达了同样的毅力和勇气,例如笔名“敬群”表示为集体的利益而奋斗。还有一个例子,一位作者用代表雌性禽兽的“雌”字取代了常用词“英雄”中的第二个代表雄性的汉字,构造了新词“英雌”。^④

这种新的女杰主体立场是 20 世纪早期的国家危机的结果,也是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对这一危机的反应。许多新型女杰认为她们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宏伟抱负是分不开的,她们追随著名的古典现代派人物,用期刊上的新式语言和参与爱国组织、推进女子教育等实际行动来声明这种联系。

但这种新的精神却被性别悖论撕裂了。女杰们声称她们新的历史角色既代表女性自己,又是男性的代理人,这样一来,对“女性”这一身份她们又拥护又拒斥。^⑤ 她们追求个人抱负,希望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行动者得到认可,同时自己却脱离了中国广大的妇女群体——她们称之为愚昧的玩物,“蠢如鹿豕、呆如木石。”^⑥但是,当她们希望实现民族抱负、

① 这些词汇也被用于通俗小说中,包括罗普的《东欧女豪杰》(1902)、詹垵(思绮斋)的《中国新女豪》(1907)等。

② 竞雄也可以被翻译成“男性的挑战者”或者“效法男性的勇敢”。参见 Rankin, *The Emergence*, 第 52 页。

③ 女娲在 20 世纪早期成了一种女性主义的偶像。她是我们第五章讨论过的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参见媧魂),还有一本未完成的通俗小说《女娲石》也以她为主角。1905 年春在媒体上可见到这本小说的广告。参见《申报》,1905 年 5 月 2 日、4 月 5 日;刘慧英,第 167—170 页。女娲的光辉形象也见于《天义》第 1 期和《中国新女界杂志》的第 2、3 期。关于《天义》是如何使用女娲形象的,请参见 von Sivers。

④ 楚北英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哀叹用于女性的语言都是软弱和屈从的。参见 Liu Mei Ching, 第 240 页。

⑤ 关于西方女性主义中的悖论,参见 Riley, 第 17 页。

⑥ 胡彬,《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

复兴中华时,又表示要发动“两万万女同胞”,这是一个既有修辞分量又有实际政治潜力的新比喻。^①

在古典现代派的内部张力之外,还有很多外部的矛盾。民族主义的愿景和其限制因素之间的裂痕也日益显现出来,女性意识到这种男性主导的话语无法容纳她们对自己、对女性气质和对更广义的文化的种种渴望与期待。作为一种回应,许多女性认为应该把妇女教育放在政治斗争前面,也有少数人公开质疑加入男性时间这一艰巨的事业,还有一些当下主义者则试图书写超越时事政治范畴的妇女压迫史。但是,在男性时间和女性时间之间、民族抱负和个人意愿之间、群体的追求和自治的愿望之间所存在的种种难题,无论是在新式刊物的讨论中还是在具体个人的生活中都很少能得到明确的解决。模糊和悖论仍然是新型女杰的标志性特征。

新女杰精神

民族主义:背景

对 20 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的感受,不仅促使维新派男性去研究妇女问题,而且也让女性中的积极分子自己去建立妇女和时间的新关联。这些女活动家将女性永恒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加以扩展,把女学生、女记者和女民族主义者这些前所未有的角色都包括进来,并借用了政治危机等警世之语来为此正名。她们营造紧迫的时代氛围,宣称我们中国妇女必须在“祖国瓜分,同胞奴隶”之前就行动起来。^② 她们坚持认为,对女性的自我定义最有意义的背景是国家的现状,而不是古老的文

^① 梁启超等男性改良派和秋瑾等女性活动家采用过这个比喻。例如,可参见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② 胡彬夏,《胡女士彬夏演词于左》,149[0381]。

化或子孙后代。^①

这些女作家拉开自己和所有家庭角色的距离,并不攻击女德制度本身,而是认定它是国家衰弱的根源之一。有人写道,由于长期存在的“夫为妻纲”的说法,以及妇女必须随夫姓的做法,中华民族已经衰弱了。她认为,如果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夫者妇之代表人,而妇者,夫之寄生物也。”这个国家必然会衰落。^②

继梁启超之后,这些新女杰们将民族危亡之感和女子教育的紧迫性联系在一起。留学生陈彦安宣称,如果狭隘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依赖他人的妇女代表了全国一半的人口,“国中若是者占民数之半,国乌得不亡哉?由此观之,女学之关系于国之存亡实大矣。”^③王莲认为,她在东京受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增强了她个人的能力,而是提高了自己的国家意识。王还写道,此前在中国时,“哪里晓得什么叫做国家,什么叫做女学。到日本的时候常听见人开口便说国家……方才晓得,合各人为家,合各家为国,凡是一个人皆要有国家,皆要把国家当作自己。”王莲继续说,如果妇女不懂国家大事,“必要读书看报……自己越强壮越聪明,就是国家越强盛越聪明”。^④

留学生:催化剂

类似王莲和陈彦安这样的女性到日本去留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治危局将国家生存和妇女教育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性别规范认为,女学生只能由女老师来教导。^⑤ 19世纪晚期,渐趋衰亡的女子教育几乎只能在家里或在教会学校里进行,而只有很少的上层人家的女

① Mary Poovey(196)讨论了个人是如何把国家当作定义自我的最有意义的背景来加以接受的。

② 楚北英雄,96[270]。

③ 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156[0586]。

④ 王莲,《同乡会纪事:湖北之部》,第115页。

⑤ 公立学校的所有负责人都必须由女性担任。参见《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第673页。

孩能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因此 20 世纪初的中国急缺合格的女教师来实行新的妇女教育。于是,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引进教师,政府也的确这么做了,引进的外国教师为数不少;要么输出留学生,政府也真的这么做了,而且派出的留学生为数更多。女留学生们海外留学的经验增强了对时代变化和民族危机的意识,而这正是新女杰精神的核心。^①

1901 年至 1905 年间,估计有 103 个中国学生进入了中国的女子学校,而大约有 210 人在东京就读于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子学校,是前一数字的两倍左右。^② 在日本的中国女学生大多数在下田的学校入学,1907 年中国的学部正式批准女子教育后,赴日留学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这一年在东京有近 100 名中国女留学生,1908 年是 126 人,1909 年 149 人,1910 年略有下降,有 125 人。1909、1910 两年间有 67 名中国女子从实践女子学校毕业,这几年时间被看作女子赴日留学的高峰。^③ 1911 年有 161 名中国留学生从日本的主要五所女子学校毕业,其中 94 人来自实践女子学校。^④

实践女子学校之所以受中国学生欢迎,主要是因为下田在日本的妇女教育中起着领头作用,在中国官员中也有很高的声誉。实践女子学校自 1899 年开办以来,按“良妻贤母”的教育理念培养上层日本妇女,1901 年下田接收了首批中国学生。翌年她成立了一个“清国女子部”,开设了为期一到两年的速成教师培训班和手工艺训练班。^⑤ 1904 年两名中国学生(包括陈彦安)从实践女子学校毕业后,各省提学使开始组织派遣学

① 详细的发展情况请参见 Judge, *Between*; Judge, *Beyond*。

② 关于中国学校里的中国女学生具体数字,请参看廖秀真,第 225 页;在东京实践女子学校的女学生数字,参见瀨地山角、木原菓子,第 281 页。我怀疑这两个数字都偏低。

③ 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编纂委员会,第 119 页;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第 59—60 页。1909 年有 40 名学生毕业,1910 年有 27 名毕业。

④ 孙石月,第 101 页。

⑤ 因为 1908 年出台的管理中国学生的新规定要求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减少政治宣传活动,所以这些课程时间都加长了。实践女子学校的中等课程和师范课程扩充为三年,工艺课也扩充为两年。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 82 页。

生团去进行师资培训。1905年清国女子部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乃至需要一栋独立的两层大楼,二楼作为宿舍之用。^①

下田的实践教学原则和伦理观念符合中国官员和女留学生家长们的期望。她把中国学生的正式教学内容限制在家政和早期儿童教育的范围内,而且,从她对通州自杀事件的反应和她对“良妻贤母”角色的理解可以看出,她的主张与儒家性别规范是合拍的。她坚持要女学生们住在男性亲属家中或在严格管理的宿舍中,试图限制她们参与校外的政治活动。1904年她在中国首批学生毕业典礼上说,海外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家政技能,而不是政治激进主义。尽管如此,还是有包括秋瑾、张汉英(惠芬,1872—1915)和唐群英(1871—1937)等一大批曾就读于实践女子学校的女性成为了抗议日本政府、晚清的政治革命和民国初期妇女参政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下田的担心是正确的,改变秋瑾、张汉英、唐群英和许多留学生命运的课程是她们在东京时从课堂以外学到的。这些留学生所学到的大大超出于基本读写或家政技能,她们获得了对历史时间和性别化空间的新的感觉和理解。她们认识到了明治日本政治上的成功进展,而且日本各种媒体又说中国文化停滞不前,因此她们都十分关注当下,认为当前就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同时,在东京高度政治化的留学生群体中与男性成员的互动也形塑了她们的女杰精神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抱负。

由中国赴日的女性经常将她们在地理空间中的航行描写成穿越历史时间、驶向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的旅程。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的诸创始人宣布,海外妇女运动是赋权于女性的“一大关键”,将帮助中国妇女“脱旧社会,入新时代”。^② 张汉英在写给日本湖南留学生监督的一首诗中,将东京的女子教育描绘成强大的历史力量,它将使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建

① 《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20页。

② 转引自谈社英,第13页。

立新的王国,并成为东方的主导力量。^①

晚清文学作品也强调了女子海外留学经历的历史作用。在1907年的一个剧本里,两个女性人物宣称海外学生运动是一种催化剂,能推动中国妇女超越她们当前“无知可怜”、又跛脚又堕落的屈辱状态。^②在《新石头记》里,悲惨的文化偶像林黛玉没有在贾宝玉与她的情敌薛宝钗结婚时死去,而是通过留学海外告别了空虚的过去。林黛玉去了日本,最终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在横滨的大同学校的教授。当宝玉赶到日本去看她时,她明确地告诉他,现在学问对她来说比浪漫爱情更重要。新国民的进步风尚需要把所有的儿女私情都抛在脑后。^③

但是,学生们在日本所经历的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进步。她们在东京的遭遇常常令她们将古老的过去和进步的现在之间的差异对应为空间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别,突出了全球差异。张汉英描述了她在“旧”中国和“新”日本之间的灰色地带生活时与日本同事一起庆祝农历新年所感受到的难堪。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张汉英吟诵了一首描写农历新年贴对联驱鬼的宋诗。学校的教务长讽刺地回应说,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已经抛弃了所有的迷信习俗。后来在回家前张紧张地唱了一首有关在日本呼吸文明之风的新歌。这一次,她的听众们赞许地鼓起掌来。^④

中国海外留学生对日本女性的观察增强了她们对中日文化差距的

① 张汉英。

② 《女子出洋:新班本》。

③ 严安生,第70—71页。有关《新石头记》的内容,参见David Wang, *Fin-de-siècle*, 第5、29页;王德威,《贾宝玉也是留学生——晚清的留学生小说》。诸如詹培的《中国新女豪》(*China's New Heroines*)等晚清小说以矢志于发展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留学生为主人公,把她们当作女英雄来表现。参见Widmer, *Inflexing*, 第147—151页。中国和日本学界近年来主张,20世纪早期人们在女子留日学习和时代变迁之间画上了等号。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95页)称女子出洋留学的经历是中国妇女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石井洋子(第48页)声称这是可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的重大历史转折点。王奇生(第31页)认为女子留学使得她们终于能摆脱“封建牢笼”,走向解放和现代化。

④ 燕斌,《留日女学学界近事记》,第83—84页。这首诗是王安石(1021—1086)的《元旦》。

认识。陈彦安说:“日本维新以来仅三十余年,国中之女子诵读之声无间都鄙。”她抱怨说,与这些受过教育的、独立的、世俗的明治女性相比,她的中国女同胞们不问外事,不讲读书,终生依赖于人,不知道她们与中国民族存亡有什么关系。^①王莲说东京识字妇女的例子使她感到羞愧,促使她更勤奋地学习。她解释说,“妹在家本来未多读书,到日本后才知道日本女子个个读书,个个能写信、看报,愧悔到底。如今每天上学。”^②

这种自卑感被日本各媒体(包括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对中国女子文化落后的报道加强了。据一篇文章说,中国学生更关心她们的外表而不是卫生。她们用同样的水洗脸、洗茶杯、洗手、洗碗,晚上睡觉也不换衣服。她们不大整理自己的房间,随便将瓜子皮吐在地上,刚刚才克服了对洗澡的恐惧。^③

日本的博物馆和展览以缠足作为中国妇女的象征和中国不发达的标志。20世纪初前往明治日本的中国游客的必游景点之一是东京帝室博物馆,而它正以小脚和鸦片烟枪来表现中国的风俗。^④在对缠足的描绘中,对年轻的中国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发生在1903年,筹备中的大阪博览会计划布置一个展示不同文化和最新科技发展的展台。^⑤1903年3月8日,两家日本报纸都宣布“人类馆”将介绍中国人、阿伊努人、台湾原住民以及琉球群岛、朝鲜、印度和爪哇居民的前现代风俗习惯。用

① 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

② 王莲,《同乡会纪事:湖北之部》,第115页。

③ 《在日中国留学生其一》,1256;石井洋子,第34页。更多的表现中国女性的文章可参看 Judge, *Between*, 第127—132页; Judge, *Beyond*, 第372—380页。

④ 东京国立博物馆建于1872年,1900更名为东京帝室博物馆;参见椎名仙卓。20世纪初前往日本的中国游客会在日记中提到这座博物馆,比如,可参见朱绶,16a—17a;林炳章,5b—6a。但朱绶和林炳章对这座博物馆的描写并不一致。朱描写了许多的部门,每部门各有一个展厅,而林描写了博物馆中最大的五个部门。他们俩都注意到了展览中包括中国缠足妇女穿的小鞋子,但是在朱绶的游记里,小鞋子是在表现各国风俗的一个展厅展出的,而在林炳章的描述中则是在参考文献的部分。也可能是博物馆在朱绶参观之后、林炳章参观之前,即1899至1903年之间对展品做了调整。

⑤ Harrel, *Sowing*, 127—129。

于体现中国风俗的是 21 名缠足的妇女，其中一位抽着鸦片。这个筹备中的博览会激起了海外华人群体的愤怒，最终被取消了。但是，由于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馆的展览还是按计划进行，在其陈列中包含一位“盛饰小足者”，还有在茶肆的“妇女二人伺客皆小足”。^①

这一事件带来的羞辱感明确地表现在女留学生的作品中，她们谴责缠足使中国妇女成为了无用的玩物。^②深切感受到这种羞辱感的绝不仅仅是海外华人群体而已，它最终成为了中国本土教育中的行为准则。大阪博览会两年后出版的一本女子修身课本解释说，当日本在会场举行展览时，他们将缠足放在“野蛮”部分。作者问他的女读者：“这难道不是羞辱吗？”^③

她们的海外学习经历不仅揭露了中国像缠足那样的“野蛮”行为，给她们带来了新的世界历史时间的意识，而且还冲击了中国“野蛮”的性别隔离习俗，为她们提供了新的性别空间的意识。王莲 1902 年从湖北前往东京，她描述了自己从中国前往日本途中是如何逐步适应与男子的关系的。在第一站汉口，与男伴同行使她感到不安。但当她到了上海，她对她的男性旅伴开始有点习惯了。在从上海到神户的轮船上，她与男乘客一起进餐，一路让他们帮她上船下船，她感到更自在了。到达东京以后，她对性别间的差异更不敏感了。她遇到数十个男女朋友，他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天天来看她，循规蹈矩，互敬互爱。王莲把这种自然的感情与中国“男女不可见面的野蛮习俗”作了对比。^④1903 年，来自她的家乡湖北的男生从东京宏文书院和士官学校毕业，王莲在他们返回中国前的告别聚会上发表了演说，可见她已经融合在留学生群体之中了。^⑤

① 关于留学生对这次博览会的反应，请参见《博览汇报》、《日本大阪博览会中国福建出品移出台湾馆始末记》。

② 例如，可参见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

③ 谢允燮，51a。

④ 王莲，《同乡会纪事：湖北之部》，第 114—115 页。

⑤ 王莲，《同乡会纪事：湖北之部》。

王莲赞扬男同胞的讲话发表于东京上野的青阳楼西餐厅,这里是东京城里中国男女见面的若干公共场所之一。^①“即使所谓的隔离空间,包括大多数中国女留学生居住的保卫比较完善女子宿舍,也没有完全隔绝。”^②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子学校的教师、支那留学生部主任坂寄美都子(1883—1975)在报告中说,尽管他们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并谢绝来访,还是有一些学生让“男客”进入她们的房间。结果,学生中曾发生过不少次流产,还曾有一名女子死于分娩。^③

在东京,年轻男女会面的新空间受人指责不仅仅是由于性的缘故,还与政治有关。海外华人群体由参与政治的流亡政论作家、革命家以及数万名中国男学生组成。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激进的中坚力量,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及其后续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④女学生们在中国留学生会馆等公共聚会场所、甚至自己的家里与这个群体接触。^⑤何香凝于1903年离开学校宿舍,与丈夫廖仲恺(1877—1925)共同生活在一所为孙中山的同盟会作掩护的住宅里。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她在自己的家中正式加入同盟会,成了同盟会第一批女成员。^⑥

① 同上书,第113页。关于男女学生聚会的公共空间,可参见 Judge, *Between*, 第122—127页; Judge, *Beyond*, 第362—371页。

② 比如说,1909年正值女子留日的高峰,在实践女子学校55名女生中就有大约30名住在宿舍里,而其余25名和家人一起住。参见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纂所,第406页。

③ 坂寄美都子关于这个问题的评价比较含糊,当然也可以理解。但不幸的是,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献资料在这个问题上也都保持了沉默。坂寄美都子,《坂寄美都子氏谈》,第6页。

④ 1906年日本有13000名男留学生。有关男生留日的情况,参见实藤专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增补》;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Huang Fu-ch'ing, *Chinese; Harrel, Sowing*。

⑤ 有关这个会馆的内容,参见 Judge, *Between*, 第124页; Judge, *Beyond*, 第366—367页。秋瑾在这个留学生会馆上过日语课、参加过周末的讨论会,也经常在这里发表演说。秋瑾在她的《白话》杂志上介绍说,会馆每逢星期日都会举行辩论会。参见 Liu Mei Ching, 第291、295页。

⑥ 何香凝,《我的回忆》,第15—20页。He Xiangning, *When*, 第135—143页。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何香凝是第一位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例如可参见孙石月,第118页。有人认为这个荣誉应该属于唐群英,比如 Lee, Lily Xiaohong(ed.), 第505页。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90页)总结说这两位女性应该算“最早的成员”。

新的书写:新闻媒体

在东京进入了男性政治空间的女子也进入了男性话语空间,这些新领域包括留学生、维新派和翻译的刊物。包括何香凝、王莲和陈彦安等在内的许多女学生在留学生刊物上发表文章,还有一些人则为女子刊物写文章并(或)编辑女子刊物。20世纪头几年,这些女子刊物形成了以上海和东京为主要中心的跨国的想象的共同体。在上海出版的女子刊物的编辑们密切配合日本留学生的活动,而在东京生活的作家们也密切关注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① 上海和东京出版界之间的这种联系在各地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来自广州(广东省)、醴陵市(湖南)和上元(江苏)等地的留学生,以及生活在长沙(湖南)、福州(福建)的中国年轻妇女也为东京的刊物写文章。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一直发行到中国内地,从东北的奉天直到西南的云南都有它的读者。^②

据估计,1898年至1911年间共有44种妇女杂志在中国和日本发行。^③ 只有结合当时的实际环境才能明白这一数字多么惊人。^④ 考虑到无论是在日本的海外学生中还是在中国,女子的识字率和女子的人学率都比男子低很多,这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虽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女生和男生的比例仅为1:40,而女子刊物与男子主办的刊物的总量之比却达到了1:10。^⑤ 1898年至1911年期间,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女子刊

① 比如说,《女子世界》第6期上刊登了一张实践女子学校学生们的照片,其他期上也刊载过有关留学生的新闻。

② 比如,《中国新女界杂志》借由个人和女子学校之力几乎发行到了中国每一个省。请参阅杂志封底列出的目录。

③ 前山加奈子,《附3 中国における女性向け新聞、雑誌一覽 1898年—1937年》。据 Charlotte Beahan 发表于1975年的开创性研究(387)估计,从1902年第一份妇女杂志开始刊行以来,直到1911年间只有17种妇女杂志得以发行。

④ Evelyn Rawski(140)估计19世纪的中国男性识字率大约为30%—40%,女性识字率为2%—10%。

⑤ 石井洋子,第43、46页。

物与男子主办的刊物总量之比为1:5,也大大高于1907年中国女校与男校的比例——1:77,而1907年女子教育刚刚得到批准,女子学校的数量正在增长。^①最成功的女子刊物的发行量可以与主流刊物一争高下。《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被日本政府强行关闭,此前的发行量估计高达10000,这个数字甚至高于当时若干重要刊物。^②

对女子刊物的比例偏高可有多种解释。这可能意味着女性的识字率比以前假想的要高,也暗示着这些刊物将其目标读者群体从女学生扩展到了包括在家受教育的老年妇女和年轻妇女,她们听从新式教科书的劝勉,在家读书看报。而且,这些数字似乎还证明了一个论点:创办和支持各种妇女杂志的男人们,不管他们是临时代班、猎奇还是真正关注妇女问题,也是其最热心的读者。^③

无论确切原因是什么,这一时期出现的女子刊物如此众多,可见20世纪初的文化、政治话语中妇女问题是多么重要。此外,它还反映了一种当时流行的看法——报刊将鼓励妇女承担新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前后曾参与过几个中日刊物的唐群英宣称,培养妇女为中国存亡而斗争最见成效的是各种报纸杂志,而不是女子学校或职业训练。^④

从中国历史上看,20世纪初像唐群英这样的女子为新式刊物写文章,

① 由于文献资料很少,这个数字远远说不上精确。我比较了前山加奈子所列出的女子刊物的数字和丁守和五卷本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中所给出的男性主办的杂志的数量,得到了这两种杂志数量之比。但是丁守和所列出的很多都是报纸,不能与女子刊物相提并论,如果把它们排除在外的话,这个比例应该会更高。同时,很有可能丁守和也没有把当时发行的所有刊物都包括在内。女子学校和男子学校的数量比引自廖秀真,第229页。

② 10000这个数字来自于新加坡的刊物《中兴日报》(1909年2月13日;23),转引自李又宁,《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创刊及内涵:中国新女界杂志重刊序》,241n71。但是其他人估计的数字没这么大。Charlott Beahan(405)称有一种月刊发行量达到了7000份,是日本第二大的中文报纸,但她没有对这个说法进行补充说明。根据熊月之的《中国新女界》,第566页)的说法,《中国新女界杂志》第4期(在我所见到的重刊本上没有包括在内)上自称第3期的发行量已达到了5000。方汉奇(第20页)也提到了5000这个数字。

③ 根据Perry Link(250)对《妇女时报》主编的采访记录,该杂志的女性读者不到10%。Barbara Mittler(310)总结说“看妇女杂志的男人就算没超过女人,显然也不比女人少”。

④ 唐群英,《对于女报之感言》,转引自李又宁,第686页。

也并不是第一次违背由来已久的女子“内言不出”的禁令。^①但是,这些新型作家们认为自己不属于我们第三章讨论过的丰富的女性文学遗产的任何一个脉络,她们与过去的女作家分道扬镳,并以此来为自己定位。她们也附和梁启超,谴责明清时代的才女,但比起充满借代的男性话语,她们的批评具有个人优势。她们批评过去才女的作品题材局限,强调自己的报刊文章着眼于全球。她们还鄙视才女们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诗作,强调自己的读者群很广,晚清时这个无名的阅读大众的数量一直不断地在增长。^②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和 20 世纪初的文学女性文化之间还是有某种形式上的连续性。新型女作家往往要仰仗她们的男同事才能进入新的出版界,就像过去的女诗人依靠家族里的男性传播其诗作一样。以中国两个最早的妇女杂志为例,一个是作为新型机构之一由维新派男性建立起来的,另一个是作为男性刊物的一种补充而出现的。^③20 世纪的早期最著名的女作家或编辑们,往往是通过为“男流”(原文为 male-stream,与 mainstream[主流]音近,作者借此讽刺当时的主流刊物全由男性掌控。——译者注)刊物写作才获得了初次新闻从业经验。女留学生组织“共爱会”的几位成员,包括后来民国时期的《妇女杂志》的编辑胡彬夏和编辑了《警钟日报》等晚清刊物的林宗素(活跃于 1905 年),她们的处女作都发表在留学生刊物《江苏》上。^④

① 这个说法见于《礼记》的《内则》篇;参加 Legge, *The Nei Tse*, 1, 第 455 页。

② Ellen Widmer (*Beauty*, 第 253 页) 注意到在晚清时期女性写作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女作家的身份不用再掩藏起来,反而值得赞赏。她认为女性小说家的这一变化发生于 1904 年,比女性开始为期刊撰文的时间稍晚。

③ 1898 年的《女学报》,或者钱南秀所说的“母亲女学报”是包括经元善和梁启超在内的男性改革家与中国妇女和西方人一起建立的一系列机构之一,参见 Qian, *Revitalizing*, 401。陈撷芬的《女报》(后来名为《女学报》),也即“女儿女学报”,最初是由“苏报馆”当作《苏报》的副刊发行的,陈撷芬的父亲即为《苏报》的负责人。关于这两本杂志的关系,参见 Nanxiu Qian, *The Mother*。

④ 1902 年 6 月,胡彬夏 14 岁时由江苏来到了日本,有关她东京留学期间的活动,参见孙石月,第 107、114 页;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第 51—53 页;石井洋子,第 107—108 页。1907 年胡彬夏前往美国留学,最后毕业于卫斯理学院。参见 Weili Ye, 第 136—140 页。

即使妇女进入了这一新的报刊出版界,她们的作品仍然被标上女性符号。她们与过去的女作家(或男子假冒的女作家)一样,在姓和名中间插入表示女性或知识女性的汉字(“女士”)。在男性主办的报刊中,她们的文章标题一般都针对着特定的性别。^① 最值得注意的是,妇女杂志也是明确地性别化的。针对男性或一般读者的出版物的刊名反映的是时事问题或所属地区,而针对女性读者的刊物其刊名几乎都有一个“女”字。

所有妇女的刊物都没有发表诗歌的文学栏目,而诗歌一般是和才女联系在一起的。^② 举例来说,据称有政治煽动性而最终被日本当局关闭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也定期刊登文学专栏,男性办的留学生刊物也刊登女子的诗词。王莲写的一首七言诗就刊登在《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一期上(她接着在第二期上发表长文对才女进行了猛烈抨击)。^③

但是这些早期文学实践的痕迹更多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由妇女自己主办或为妇女主办的刊物与过去的女性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有高度的时代感,对性别和文化变迁十分关注,还采用了一些新的政治化的文学体裁。它们为读者带来了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振奋人心的散文,以及前面的章节讨论过的西方女性人物的传记。每期刊物都以社论开头,提出当前的重要议题,经常勉励读者们要行动起来。

与这些时政文章的深沉的语调相呼应的,是“发表在女子刊物最经典的文学栏目中的新诗。”^④这些新诗形式上是传统的但内容是新的,表

① 比如,共爱会成员发表在《江苏》上的系列文章都以《女学论文》和《女学文丛》等为栏目标题。参见《江苏》第3期(1903年6月25日):155—158[0585—0588];第4期(1903年6月25日):141—146[0759—0764]。

② 这类文学栏目一般都以“文艺”、“文苑”为题,大多数的留学生刊物和女性刊物都有,只有主要刊登翻译文章的《游学译编》和何震的《天义》没有。包括《顺天时报》和《时报》在内的主流报纸一般也都有文学栏目。有关《妇女杂志》中的栏目“文苑”,参见胡晓真。包括《女学报》、《中国新女界杂志》和《妇女时报》等许多女子刊物也以“传统的”女子图像作为封面。

③ 王莲,《杂感七首》;王莲,《同乡会纪事:湖北之部》,第114页。

④ 梁启超在1899年曾给这种新式的诗歌下过定义。参见Michelle Yeh。

达了对当前问题的思考,对性别规范的批判和侠义女子的抱负。^①王莲用诗歌宣称,只有破除妇女不能德才兼备的看法,才能播撒“启蒙的种子”,中国妇女才能领悟到自由的可能。^②秋瑾在《中国女报》上发表“感时”和“感愤”诗,对中国的落后表示了强烈的悲愤。^③

与过去的女作家只为文学同行写作不同,女子刊物的编辑们致力于与所有的“两万万”女同胞沟通,包括那些识字不多难以阅读充满影射的“新诗”或旁征博引的政论文章的妇女。因此,女子刊物用文言和白话两种文体发表作品。^④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能用文言文给这些刊物写文章,但她们也是最早和最有建树的白话文作者。^⑤一些妇女杂志在不同的栏目分别使用文言文和通俗语言,反映出这些新女杰的双重目标——进入男性政治话语圈,同时创造一个兼收并蓄的女性话语圈。经过多次辩论,1898年《女报》的编辑决定,每期使用30%的文言和70%的白话。^⑥《中国新女界杂志》规定,杂文必须用文言,而演讲文稿只能用白话。^⑦其他刊物中,包括秋瑾的刊物《白话》和《中国女报》则专用白话。

行动主义:付诸实现

新型女作家担负着吸引教育程度较低的女同胞的责任,这一点有别于过去的女勇士。历史上英勇的妇女都是单独行动,受等级意识的指

① 何震《〈秋瑾诗词〉后序》,第342—343页)对秋瑾的诗词有这样的描述。

② 王莲,《杂感七首》,第105[0116]。

③ 例如,可参见《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3月4日),第39期,第40期。

④ 尽管包括《顺天时报》在内的很多主流杂志也有白话文的栏目,但在女子刊物上白话文的文章显然更多。

⑤ 作为最早的白话文杂志之一,《无锡白话报》也是由女性创办的。裘毓芳,以及她的叔父裘廷梁于1895年5月11日创办了这份杂志。参见Clara Wing-chung Ho(ed.),第179—180页。有关这一时期的白话文报刊,请参看蔡东苏。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晚清女子刊物的编辑们对于发展明白晓畅的语言所做的努力也是白话文运动的一个源头,而后者大约在10年之后达到高潮。胡适是1917年白话文运动公认的功臣,他说自己是1906—1908年期间在上海一家据称是秋瑾帮助建立的中国公学里面接受了白话文写作的训练。Liu Mei Ching,第298页。

⑥ Nanxiu Qian, *Revitalizaing*, 413—415.

⑦ 李又宁,《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创刊及内涵:中国新女界杂志重刊序》,第207页。

引,服从于君权、父权或夫权,而晚清时期的女杰日益为平等、合作的精神所推动,渴望在中国历史上为所有的女性争取地位。^① 她们受到西方女性楷模的鼓舞,结合了罗兰夫人的政治抱负和弗朗西斯·威拉德、米莉森特·福西特的改革热情。这种新的行动主义兴起于早年的海外学生运动,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参政权运动,但始终为男性的政治议程所塑造和约束。虽然新女杰们急于建立一个积极投身此事的中国女性集体,但她们的行动往往是为了响应男性的号召,或是出于加入男性时间的愿望。

新的女性主义和占支配地位的男性议程之间的张力催生了一批中国的组织,其中最早的组织之一就是1903年4月8日在东京成立的妇女组织“共爱会”,大约有12名成员。“共爱会”成立大约三个星期后,1903年4月29日,协会成员们参加了被称为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民族主义游行(这也促使杨千里在南丁格尔的传记中写下了那样的结尾,具体请见第二章的讨论)。示威游行队伍在东京的留学生的带领下,对俄罗斯借口义和团运动拒绝撤回集结在中国东北的部队表示抗议。^② 当男学生宣布成立拒俄义勇队时,“共爱会”会员们也呼吁组建一个类似的妇女组织。

“共爱会”的创始人胡彬夏第一个走上讲台,接下来八名女学生,包括陈彦安、王莲、林宗素、龚圆常和另外四名女性都做了演讲,这九人加入了日本笃志看护妇会中国分会,并宣布她们将跟随义勇队去满州。^③ 这些满腔热血的护士并不满足于在东京组织小分会,而试图进一步动员中国的妇女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组织。她们在发给上海女学校的电报中声称:“妇女也是国家之一部,世界之一员。”她们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④

1904年秋瑾抵达东京后接任“共爱会”领导,此后该会变得越来越激

① 关于历史上的女勇士模式,请参看 Edward, *Men*, 第101—102页。

② 这个矛盾在第二章与南丁格尔相关的讨论中有过简要的介绍。

③ 《留学记录》。登上演讲台的其他四名学生是钱丰保、曹汝锦、方君笄和华桂。

④ 《留学记录》。

进。秋瑾将该组织改名为“实行共爱会”，以强调其转向行动主义。这个新社团呼吁中国妇女到日本学习并参加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①

“共爱会”的成员曾宣告她们要随男生志愿队去东北抗击俄罗斯军队，“实行共爱会”的成员也随男同胞一起抗议公然冒犯中国人爱国心的行径。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管制法律（即《取缔留学生规则》——译者注），中国留学生们认为这一家长式举动的目的在于管束他们在东京的活动，秋瑾被指定为抗议活动的女学生代表，呼吁学生实行总罢课。当时东京的各女子学校，包括女子实践学校的女学生们都奋起响应。著名的男性革命活动家陈天华（1875—1905）因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待遇感到绝望在东京湾溺水身亡，这一事件给了这场运动极大的推动力。由于在海外华人群体中痛苦和屈辱的情绪加剧，约有2000名中国学生离开日本。秋瑾也带领30名女学生回到了中国。^②

在中国本土，妇女行动主义被完美地局限于参加温和的、男性主导的组织。有一本宣扬爱国主义的女子教科书反映了这一点，它的插图描绘了商会中男子和女子坐在一起开会的场景。商会男女成员身后的



图 43 一群男女爱国者承诺
“挽回国势在结团体”和
“不用美货坚持到底”

资料来源：谢允燮，49B

① 孙石月，第 108 页、116—119 页；石井洋子，第 41—44 页；当时陈撷芬是实行共爱会的领导人。

② 关于陈天华的死，请参看 Huang Fu-ch'ing, *Chinese*, 第 235 页。关于这一事件后中国女学生离开日本回国的内容，参见孙石月，第 108 页、116—119 页；石井洋子，第 41—44 页。

楹联上面写着“挽回国势在结团体”和“不用美货坚持到底”(见图 43)。^①在妇女努力加入某项具体的民族斗争时,如 1907 年中国收回苏杭甬铁路权的斗争中,这种克制的、从属性的妇女行动主义显露无疑。妇女活动家们紧随男子之后购买铁路股票,参照男性组织了类似的女性保路组织,如“女界保路会”。^②她们还试图建立诸如“女国民捐”这样的基金会,以将女子对国家事业的捐献制度化。^③

参加各种这类组织的妇女符合古典现代派的女子社会行动主义的观点。而另一些女性(往往是有日本经历的)则采取了更激进的行动。方君瑛(1884—1925)便是一例。她是东京高级女子师范学堂最早的中国毕业生,其七弟方声洞(1886—1911)后来成了革命烈士。在清朝统治结束当年,她曾在香港和中国南部参与接应革命。在东京横滨,她曾与包括秋瑾和陈撝芬在内的一批留学生一起接受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培训,学习如何使用炸药。她还加入了汪精卫(1883—1944)1908 年组织的一个谋杀团。1909 年方君瑛前往香港,此后两年内在一系列起义和暗杀计划中一直担任殿后工作。她和嫂嫂曾醒还参与策划了 1911 年 4 月 27 日的广州起义。当起义被镇压后,方君瑛的弟弟方声洞成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君瑛一直没有从弟弟方声洞英年早逝的悲惨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1925 年自杀辞世。^④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支持革命,积极从军。在日本,唐群英等八名学生组织了女子红十字军,她们于 1911 年 10 月 19 日离开日本,与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赤十字会的广东医生、革命家

① 谢允燮,49b,50a。

② 例如,可参见《女界保路会传单》、《记上海女中学堂开第一次女界保路会》、《敬告女界意见书》;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4:11a-12a。有关保路运动的内容,参见 Judge, *Print*, 第 183—186 页。

③ 有关女国民捐的内容,参见燕斌,《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第 98 页。也请参见第 2 章。

④ 李又宁,《辛亥革命先进方君瑛女士》;蔡元培,Clara Wing-chung Ho(ed.),第 36 页。

张竹君会师。^① 10月24日,这些日本归国留学生、张竹君,还有12名女子和20名男子一起前往武汉支持革命军。^② 唐群英也是直接参加革命战争的妇女之一,她和张汉英一起组织了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③

革命前后,包括唐群英在内的许多妇女,还参与了诸如“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等新兴妇女组织,这些组织的纲领不是直接由男性的议程决定的。如“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由来自湖北的学生李元于1906年9月建立,其目标是为中国妇女的利益而奋斗。该协会自称有70名成员,比更为激进的“共爱会”人数多得多。担任主要职位的妇女包括:《中国新女界杂志》的编辑燕斌、唐群英和王昌国(1880—1949)。^④ 1911年3月,唐群英还帮助组建了一个类似的协会——“留日女学会”,并担任其在日本会刊《留日女学会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人。^⑤

辛亥革命在唐群英、张汉英、方君瑛、张竹君等等无数仁人志士的支持之下获得了成功,此后包括唐群英和张汉英在内的许多女性不再满足于辅助性的妇女社团。当陆军部在1912年2月禁止妇女参加军事活动之后,她们和林宗素、王昌国等一起致力于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⑥ 对上述四位女性及其同志来说,获得选举权标志着正式承认妇女对1911年辛亥革命的贡献,并确保女性在中华民国政治中有自己的声音。林宗素已经于1911年11月组织了争取妇女参政的“女子参政同志会”。^⑦ 1912年2月20日该组织与其他四个组织(其中三个是由留学生

① 孙石月,第119—120页。

② 有关1911年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内容,参见徐辉琪、刘巨才、徐玉珍,第520—532页。有关张竹君的活动,参见上书,第526—527页。张竹君在1911年之后继续在医疗领域开展活动,例如在上海的南市医院担任院长,但她似乎是1912年之后就不再参与红十字会的工作了。也请参见 Clara Wing-chung Ho(ed.),第310—313页。

③ 1911年12月唐群英和张汉英在上海协助成立了女子后援会,会员们去往各个省份支援北伐军。她们两位还成立了女子北伐军救济队。参见 Clara Wing-chung Ho(ed.),第290页。

④ 石井洋子,第44页。

⑤ 这一刊物自1911年4月开始发行。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88—90页。

⑥ Clara Wing-chung Ho(ed.),290—291。

⑦ Ono,第80页。

建立的)合并,成立了“女性参政同盟会”。^①

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能赋予妇女平等地位,包括张汉英、唐群英、林宗素、王昌国在内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成员,开始了后来名声不佳的抗议运动。她们和大约20名妇女一起,3月19日到21日之间三次冲击南京议会,砸烂窗户,冲破警戒。^②这种戏剧化的姿态收效甚微,反而受到了社会的谴责,于是她们停止了政治对抗,并于1911年4月将妇女参政联盟改组为“女子参政同盟会”。该联盟通过了九项决议,强调了新型女杰的双重目标:第一,推动男女平权;第二,推广妇女教育。^③

1913年,在袁世凯政府统治时期,妇女在教育之外的其他公共领域进行活动越来越困难。同年,“二次革命”失败,张汉英的丈夫和政治同道李发群(1873—1913)也因此牺牲,10月份内务部下令驱散南京的妇女参政运动。1914年3月袁世凯宣布了治安条例,禁止妇女加入政治组织或出席公众讨论。唐群英、张汉英各自带着遗憾回到了家乡衡山和醴陵,只好把精力倾注到当地办学之中。^④

教育:社会再生产

唐群英、张汉英在民国初年的政治中敏锐地看到了对中国女性参政的强烈偏见,1914年的治安条例、1907年的女子学校章程和1904年关于女子在家接受教育的奏疏都使得教育成了惟一始终允许妇女参加的公共领域。但是,新女性所受到的教育并不只是让更有政治抱负的女性

① 其他的四个组织包括王昌国的女国民会、吴木兰的女子同盟会、唐群英和张汉英的女子后援会,以及沈配贞的女子尚武会。参见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93页。

② 有关此役的详细描述请参见 Ono, 第80—89页。

③ 同上书,第85—86页。

④ 1913年张汉英成立了醴陵女子学堂,获得了成功。参见 Clara Wing-chung Ho(ed.), 第292—293页。唐群英继续从事地方教育和参政活动,直到1937年辞世。参见 Lily Xiao Hong Leez(ed.), 第508—509页;曾启球。

们退守二线,它也是女杰的目标里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在各种主流报刊和妇女杂志中将女子教育与英雄主义联系起来。陈以益在1909年主张,女子教育“勿以贤母良妻为主义,当以女英雄女豪杰为目的”,^①两年后海外女学生林士英呼应陈以益的言论,她写道:“如果女英雄女豪杰们希望启发愚昧无知的中国妇女,她们必须接受师范培训并提倡全民教育。”^②报纸上也赞美英勇献身教育的晚清妇女。1904年,《顺天时报》称赞曾国藩(1811—1872)的侄女为女中之杰,她独自筹款在湖南兴办了景山女学堂。^③1906年,《顺天时报》又宣称为办学殉道的旗人女子、惠兴女子学校的创始人惠兴是真正的女中豪杰。^④而且,这一时期出版的外国女子传记作品不但赞美那些为革命抛洒热血的女子,还称颂那些妇女教育的先驱者。美国曼荷莲学院的创始人玛丽·莱昂就被《中国新女界杂志》赞为“亲爱的英雄”。^⑤

妇女教育与英雄主义的结合标志着20世纪初中国女才观念的重大改变。从先秦直到帝国晚期,中国对女子的才学和美德的理解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按照20世纪初永恒主义者和改良派们所坚持的标准,女子教育的目的是让年轻妇女在道德和实践上为将来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作好准备。19世纪90年代末,古典现代派开始将女子教育的目的从个人道德转向公众和国家的迫切需要,以培养国民之母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当下主义者强化了这一政治重点,进一步将妇女教育的目标从培养母亲转向塑造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活动家。

尽管人们对女子教育的意见各不相同,但都需要培训中国的女教育工作者,为20世纪初不断增加的女子学校配备师资力量,这不仅需要将年轻女子派到国外去留学,还要在中国建立教师培训计划,并承认教育

① 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第683页。

② 林士英,《论女子当具独立之性质》,《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年5月),转引自李又宁,第687页。

③ 《女中之杰》。

④ 《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第1450页。

⑤ 灵希,《美国大教育家黎痕女士传》,第70页。

工作是女子可以接受的职业选择。1904年,几位高级官员上奏疏要求将女子教育限制在家庭内部,同时却有几个省开始安排年轻女子到日本师范学校学习。1907年,学部批准建立小学和师范学校。此后几年,随着女子学校的数量不断上升,对女教师的需要也一直在增长。1912年,刚成立的民国政府批准了中学一级的女子教育,高级师范学校的数量迅速增加,社会对师范学校的需求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女子中学。^①

20世纪头几年,只有上海务本女校等几所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尝试推展师资培训项目。^②南方和北方都建立了几所师范学校。^③1907年以前,这些项目尚不能满足私立女子学校对教师的需要,此后随着私立和公立学校的不断增加,缺口更是越来越大。虽然有些学校也聘请男教师,但1907年的章程试图叫停这种现象,明确规定女子学校只能聘请受过良好教育且品行端正的女性作为主任、校长、教师和宿舍管理员。如果没有中国妇女可聘用,学校须聘请高级师范院校毕业的外国妇女。^④

20世纪初,地方教育当局认识到要培养自己的女教师,而不是依赖外国妇女或中国男子,他们开始寄期望于日本学校。1904年11月,湖南

①《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第669页;Cong,第181页。

②务本女校从1905年起开设了一个师范学校预科课程,可参考《时报》(1905年12月17日)。

③这些师范学校包括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可参考《时报》(1905年4月7日);还有成立于1906年初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后来更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堂,可参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第687—693页;McElroy。奉天省1906年也成立了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参见Cong,第56页。

④《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第673页。从1844年起,自从西方女传教士在中国成立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外国妇女在中国女子教育上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教会学校的角色,可参见罗苏文,第56—83页。一些最早的中国学校也聘用日本女教师,下田歌子的学生河原操子就是务本女校1902年聘请的9位老师中的女老师。参见Abe,《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第191—193页;Harrel, *The Meiji*, 第132—133页。1904年长沙的景山女学堂聘请了日本女性来教授西方语言;参见《女中之杰》。1909年时,中国开始在政府认可的公立学校培训自己的女教师已经两年了,根据一个肯定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在中国有23名日本女教师;参见多贺秋伍郎,第74页;Abe,《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第189—190页。随便翻阅晚清的报刊就可以发现其中多次提到中国女子学校的日本教师。例如,可参见《女学渐兴》;《育贤女工艺学堂改名迁地》。

省的官员们率先通过留日男学生范源廉(静生,1876—1927)正式与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子学校取得了联系。^①湖南省的首创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成了各省留学计划的一个样板,并造就了一大批新型女杰,其中既有教师,也有像张汉英这样的妇女活动家。

范源廉得知两名中国女生已于1904年7月从实践女子学校毕业,于是请求下田1905年接纳20名湖南年轻女子。下田表示同意,并为中国学生制定了一个培训计划,包括一个为期一年的速成师资培训课程(在1907年拓展成3年的完整项目),一个为期两年的普通课程,还有一门一年速成的工艺课。^②后来,中国政府于1904年正式批准了女子留学的动议,1905年初范源廉在上海发表演说,宣传下田的速成师资培训课程。^③

1905年7月下旬,20名湖南女学生来到了下田的学校。她们中最小的14岁,最大的48岁,来自湖南好几个县,也有4名来自其他省份。^④她们20人中有13人学习速成师范课程,其余7名学习速成工艺课程。范源廉等人则在课堂上充当口译,以帮助她们克服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日语。^⑤

① 范源廉1898年追随梁启超去往日本,先进入大同学校,后来又进了一所日本的师范学校。他后来为中国学生开设了法律和政治速成课程。自1906年起他供职于清政府的学部,后来也在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他1914年还为女子编写了一本语言教材。刘绍唐,1,第117—118页。张静庐,《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247页。

② 有关中国学生部成立的内容,参见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编纂委员会,第96—121页;有关范源廉的角色,可参同书,第102页。

③ 《创设留学女子速成师范于东京》。

④ 这些湖南学生来自于长沙、湘潭、善化、醴陵、萍乡和衡山。省外的学生来自江苏上元和湖北江陵。关于这些学生到达东京时的情况,参见《中国留东女学生》;孙石月,第66—68页;Abe,《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第100—101页。

⑤ 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中国学生通常需要课外的语言教育。秋瑾在中国留学生会馆的日语讲习所里上过日语课,参见平野日出雄,第112—113页;郭长海、李亚彬编,第128页。何香凝曾经因为日语水平不够被迫从她上的第一所日本学校里退学,后来终于在日本女子大学校长的帮助下提高了日语,成瀬仁藏。参见何香凝,《我的回忆》,第12页;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58页。日语掌握得不如秋瑾、何香凝那么好的学生则只能上音乐、工艺等课程。很多人离开日本的时候在学业上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燕斌,《留日女学学界近事记》,第84—85页。



图 44 海外留学生朱敬仪

资料来源:实践学报,文件号 1132,承蒙实践女子大学图书馆提供资料

中国和日本媒体宣传了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媒体记录了她们在日本如何热衷于学习,以及回国后如何致力于教育事业。湖北荆州的朱敬仪(生于 1888 年)于 1905 年夏季抵达东京,当时 17 岁(见图 44)。^① 她的哥哥朱永珍是东京法律和政治学院的一名学生,比她来东京早,他曾告诉朱敬仪,日本是最先进的国家,尤其是教育。朱敬仪介绍说,她发现实践学校所有课程都富于挑战。她最喜欢体育、唱歌和作文,这些课程与她在日本接受的阅读、书法、刺绣等有限的训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朱敬仪打算回国后从事儿童保育

工作(“育婴”)。^②

朱敬仪的同学、来自省会长沙的黄国厚(生于 1881 年)更是踌躇满志。她在 21 岁时参加了实践学校的速成师资培训课程,作为培训课程中的尖子生,她在接受《顺天时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回国后会从事教育工作。^③

① 各种文献对朱敬仪究竟在中国待了多久说法不一。根据谢长法(第 274 页)的说法,她是 1905 年 7 月离开实践女子学校的。这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后来她还作为实践女子学校的学生接受过采访并拍照留念。王惠姬(第 269 页)称朱敬仪是 1909 年毕业的,但她所在的班级毕业时间应该不晚于 1907 年。

② 《在日中国留学生其一》,第 1256—1257 页。这个访谈称朱敬仪想教英语(育英),但是第二个字肯定错了。她没有提到英语教育,而且实践女子学校的师范类学生所受的训练是针对学前教育 and 小学教育的,也即幼儿教育,或育婴(“育英”中的“英”在中文中意指英才,“育英”泛指从事教育,培育英才,与英文原本没有关系,此处原文作者理解可能有误——译者注)。

③ 《纪留学女士之谈话》。根据王时泽(第 228 页)的说法,黄国厚一直活到了共产党时代,供职于北京文史研究馆。

其他省份也纷纷效法湖南,派遣女子前往日本,在下田的女子实践学校以及东京其他学校接受教师培训。^①虽然语言、文化上的困难以及个人原因造成女留学生退学率相当高,但还是有大量的女生完成学业后返回中国,成为女子学校的创始人和教师。^②由于数据不完整,难以估算留日女学生准确的数字,但考察在东京学习的某个女学生群体的数据会对这个总的数字有个大概的感觉。在湖南省1905年送进实践女子学校的20名女生中,有1/5活跃在妇女教育领域中:速成师资培训课程招收的13名中国女生有12名在1906年毕业,至少有四人开办了自己的学校。^③

张汉英就是这四人之一。当她还是一名日本女留学生时就为女子教育做出过贡献:1905年,张汉英因抗议日本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新法规而离开日本。1906年张汉英回到东京,但并没有回到下田的实践学校,而是在成女学校创办了“支那女学生部”。她跟来自湖北的男学生匡君一合作,为中国学生设立了5个项目,其中包括一个速成项目和两个为期三年的教师培训项目。^④这些项目比实践女子学校的课程设置更能体

① 1905年,奉天农工商局总办熊希龄(1870—1937)计划从辽宁每年派遣15名学生去下田的学校就读。首批23名学生于1907年到达了东京。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73—74页;孙石月,第68页。江西省也有10名学生进了实践女子学校,此外,包括胡彬夏在内的几个江苏学生被派往东京的其他教育项目。上沼八郎,第80页;孙石月,第68页;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第54页。但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74页)指出,去往别处的江西学生可能其实没有去。其他的师范项目包括1905年3月东亚女学校附设的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编纂委员会,第104页;Abe,《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第105页。从1906年12月起,成女学校的支那女学生部也提供一个为期三年的师范项目。石井洋子,第39页;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第55页。Abe,《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第105页。本章后面将会讨论成女学校的这个项目。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也招收中国学生;参见石井洋子,第39页。它后来变成了今天的御茶水女子大学。还有其他的日本学校也为中国学生提供普通课程和专业课程;参见Judge, *The Ideology*, 第236页。

② 根据孙石月(第326页),从1909年到1922年间,大多数女留学生回国后都从事教育行业。

③ 根据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纂所(第405页),有三个人开办了自己的学校。不过我找到了材料证明还有第四位。

④ 其他的课程包括一门两年半的普通课程以及一门为期两年的工艺课程。匡君一是法政大学的学生,张汉英为他们的提议争取到了一定的政府支持。考虑到这些学生以后都会支持他们,每个省的留学生督查都同意支付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参见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75页。

现女杰们的期望,它们的宗旨不是为了培养良妻贤母,而是培养妇女与男同胞一起承担起民族责任,学成回国后在女子学校任教。^①

1906年12月16日,第一批中国女学生开始进入这个项目学习,其中包括张汉英本人,还有曾经也就读于实践学校的唐群英,以及教科书作者、《中国新女界杂志》的撰稿人孙清如等。^②包括唐群英在内的12名学生于1907年12月从“支那女学生部”的速成师资培训项目毕业。^③在教育上取得这样的成绩之后,张汉英回到中国,于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在长沙和醴陵致力于发展女子教育。^④

王昌国在民国初年曾与张汉英一起参加女子参政运动,从东京回到湖南后她成为了萍乡务本女校的校长。^⑤在湖南留日项目培训的教师里还有黄国厚,她在1906年接受《顺天时报》采访时承诺回国后要献身教育。1916年,黄国厚成了家乡长沙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翌年她在这里开始教授家政学,五四前夕从事妇女职业教育。^⑥平江县的李樵松(1872—1933)在抵达日本时已经33岁,从1905年毕业到1908年之间,她与丈夫凌容众(1874—1929)一起创办了私立启明女学堂,1908年她还给下田歌子寄去了一张她与启明女学堂学生的合影。^⑦李樵松的学校办得特别成功,1916年正式申请获得了学部的教师培训学校资格。^⑧

关于20世纪初其他女留学生在中国各地女子学校任职的情况,各

① 燕斌,《留日女学学界近事记》,第84页。

② 同上书。唐群英1904年进入下田的学校,此前不久她的女儿和丈夫刚去世。她丈夫曾传纲是曾国藩的堂弟。孙石月,第83页。

③ 周一川,《中国人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第75页。

④ 关于张汉英的教育活动,参看上书,第94页;Clara Wing-chung Ho(ed.), 292-293。

⑤ 王时泽(第228页)记录了王昌国在萍乡学校的活动,但没有记录时间。

⑥ 黄国厚1918年在艺芳女校教工艺,1919年担任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校长。

⑦ 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纂所,第431页。在《中国女留学生之调查》和《中国留东女学生》中,李樵松的姓都写作凌,也即她丈夫的姓,她的年龄也都写成了23岁,而不是33岁。

⑧ Cong, 第91页。

种资料提供了不同的参考线索,有的记下了她们的姓名,但许多资料上都没有记载。有一批人曾任教于著名的上海爱国女校。教育家陈永声(1900—1997)民国初期曾是那里的学生,她说她的老师都曾在日本留学。^① 这些归国留学生曾在上海各个学校里教体育。^② 实践女子学校的学生曹汝锦是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曹汝霖的妹妹,1903年曾参加过东京拒俄运动,回国后在她的故乡上海也参与了许多非正式的教育活动。1906年冬季,她创办了一个妇女音乐讲习会,并于1910年创办了慈善机构“贫儿院”,照料和教育贫困儿童。^③

女留学生也受聘于北京的学校,这里的女校发展比上海晚一些。有几名女留学生在江亢虎(1883—1954)1905年后创立的三所传习所中担任教师。江亢虎的妻子是北京内城女学传习所的负责人,她积极网罗日本毕业生到学校来任教。1907年,她写信给在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编辑燕斌,请她以学校的名义聘请教师。^④ 到1909年已有六名留日的女教师在这三所学校里讲授多门课程。^⑤ 直隶省也聘请归国女学生担任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1907年冬,在保定开办的一所学校曾聘用了一位廖小姐担任主管,她的名字之所以为我们所知,是因为她由于带女学生去参加当地军校的毕业典礼而遭到辞退。^⑥ 日本培养的女学生在广东也很有地位。例如陈永声曾任教的学校校长就曾在日本留过学,她是何香凝

① 陈永声记载了这些归国学生在体育课上教她们体操、球类运动、武术,还有怎么使用接力棒和杠铃。Wang Zheng,第265页。

② 有一位在日本学过体育教育的老师名叫汤琳任,她在1908年成立的女子体操学校教课;参见《上海女子体操学校开学记略》。这种学校旨在培训女子体育教师,也教授诸如伦理、中文、教育、算术和音乐等课程。

③ 音乐讲习会还在《时报》(1906年12月16日)上做了广告。

④ 《参观内城女学传习所记》。

⑤ 《三城女学传习所开学》。例如,北京的外城女学传习所聘请了一位毕业于日本美术学校的王小姐来教画画。参见方城。

⑥ 尽管廖小姐认为这次远足能让学生们更尊崇军队,提升尚武精神,但校方以违背了性别隔离的原则为由对此表示反对。廖小姐被开除之后学生举行了罢课抗议活动。《直隶女学堂罢学始末记》。

丈夫廖仲恺的姐姐。^①

新女杰的悖论

比起那些因砸碎议院窗户或策划暗杀而留名青史的女子,回国投身教育的女性的经历更难追溯。像唐群英、张汉英和秋瑾这些妇女是典型的新女杰,因为她们既从事教育又投身政治。她们推动妇女到日本留学,在中国提倡女子教育和新的人生历程,为新的女性文化和女性时间奠定了一个基础。然而她们的最终目标是使这一新的女性时间与男性时间取得同步。她们在刊物上把教育作为新的女杰精神的组成部分加以宣扬,教育常常是她们的默认模式,或是为她们的政治激进主义提供掩护。张汉英和唐群英在民国初期建立了许多新学校,但正是袁世凯政权禁止她们搞女子参政运动的时候她们才这样集中地办学。下面要讨论的秋瑾的教育活动,主要也是她反满活动的一种掩护。

这些妇女身上体现了新女杰精神中的基本分歧:是作为受过教育的女英雄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斗争,还是作为英勇的教育家来促进女子教育;对于古典现代派主导的民族国家的男性时间,是争取加入还是尽量超越?

男性时间问题以及与历史的斗争

有些留学海外的女性为新报刊写文章推动妇女教育,但并不接受由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计划。这些怀疑论者从性别差异、男性的弱点和无政府主义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批判。

来自安徽省合肥的龚圆常是一个热衷政治的留学生,她1903年加入“共爱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加入在日本的中国留日女学生

^① Wang Zheng, 第267页。我只看到其中提到廖仲恺有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妹妹,廖咏筠。

会。她还是一名标准的“差异论女权主义者”。与忆琴和其他呼吁男女平等的人不同,龚圆常认为,谈论两性平等是天真的还原论。但凡以男子气为准则,便总是会倾向于延续对女性的压迫。她鼓励女同胞不要追随男子,而是要培养女性特有的能力,在最适合女性的领域里担起责任来。她认为教育和美术便是这样的领域。^①

福建省的方君筭是方君瑛的堂妹,她反对女子摆出所谓的扭曲的男子气。方抱怨说,“今人之倡女权者”,总是让女性效法男子,这意味着甚至要去模仿他们最严重的毛病,包括他们的任性和不道德。^②

无政府主义者何震是《天义报》的挂名编辑,她不仅对女性加入民族主义进程表示警惕,还反对民族主义。她认为这一新理论和儒家学说等男性话语一样再生产了性别不平等,应该加以摒弃,她还拒绝以民族主义为由教育女性识字。她嘲笑女同胞们赞美能征善战的女英雄只是支持了男性的好战。在她看来,除非妇女能够不再通过男性价值系统去获取、发展和使用知识,否则她们仍将处于从属地位。^③

对男性时间持有抵触看法的新女杰对历史时间也同样心怀矛盾。和其他当下主义者和古典现代派一样,她们都严厉地拒绝过去,但又策略地重新援引历史旧例。她们迫切希望与持久的传统完全脱离,然而又继续保留着历史宝筏,以应对中国的和她们自身的转变。

与从前的女文人不同,新女杰对过去是持批判态度的。续《汉书》的班昭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真正的女历史学家。尽管一些 20 世纪初的作家让班昭在想象中重生,令她发挥才华为当下所用,但许多女杰型的作家们认为她是使妇女经受了两千年压迫的罪魁祸首,是不可救药的灾

① 龚圆常。龚在 1902 年随丈夫崩寿枢(若木)前往日本,1910 年回到中国。关于她在日本的生活与活动,参见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第 52、53 页;郭长海、李亚彬,第 229 页;佐伯惠,第 18 页。关于西方的各种女权主义者立场的差异,参见 Scott, *Only*, 173。

② 方君筭。

③ 何震,《女子复仇论》,第 17—20 页。对于何震我们知之甚少。现在对她介绍得最多的是 Zarrow, *He Zhen*。夏晓虹现在在进行有关何震的研究。

星而不是楷模。燕斌称班昭著名的女学课本《女诫》是中国妇女历史上为害最烈的作品之一。^①何震斥责这位伟大的女学者是中国女性的叛徒,因为她使儒家宗法主义的说教深入人心,让她们变得冥顽不化。^②

在何震和燕斌这样的批评家看来,近来一些清朝妇女忙于注解历史文本是无可救药的徒劳和迂腐,而且毫无政治意义。这些女性殚精竭虑去校勘整理刘向的《列女传》,她们常常以班昭为榜样,因为她是最早增补和注释刘向作品的学者之一。^③她们之中包括一位女学者萧道管(卒于1907年),她比现代的女杰型作者生活的时代稍早一些,于1892年编纂完成了《列女传集注》,并于1907年出版。^④萧道管在序言中将自己置于《列女传》女学者谱系之中,这一谱系从班昭、梁端(1757—1825)开始,直到19世纪初期的王照圆(1763—1851)。^⑤

新型作家的历史态度与王照圆、梁端和萧道管等相去甚远。她们不认可主流的规范,既不像永恒主义者那么尊崇历史,也不像改良派那样考虑历史的延续性,而是以一种当下主义者的批判精神来质疑这些典范。燕斌在书中讲到,以前她和一名同窗女友罗瑛一起学习《史鉴》,两人都对妇女的孱弱和卑微感到震惊。她们决心揭露历史的偏见,但持久不衰的男权力量立即表示了反对。罗瑛的父亲听了她们的见解,指责她们“诬蔑祖先”,令她们无言以对。燕斌有感于这种历史上的不公,创办

① 燕斌,《罗瑛女士传》,第54页。

② 何震,《女子复仇论》,第17—22页。

③ 班昭给《列女传》增加了1卷《续列女传》(徐兴无,第917页)并给全书做注。参见Mou,第27页。王端淑(1621—1702以后)显然进行了一种不同的历史写作,但这一著作并未流传下来。参见Widmer, *Selected*。

④ 萧道管。萧道管的丈夫陈衍(1856—1937)在其过世后出版了此书。据胡文楷(第584页)记载,此书原名《列女传集解》,陈衍将其更名为《列女传集注》,以彰显其与梁端、王照圆的作品之间的联系。参见陈衍, 1a。

⑤ 萧道管,《列女传集解自序》, 2a。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第119页)谴责梁端和王照圆是退步的才女。也请参见Hu Ying, *Naming*, 186—187。梁端的《列女传校读本》最初出版于1831年,1875年重印,1910年再次重印。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里采用当时最新的考据方法,1812年初次出版,1833年再版,并至少于1917年再次重印过。王照圆致力于将班昭注释刘向原文时漏掉的注释补齐。

了《中国新女界杂志》作为发表她观点的平台。这本杂志传播有关妇女问题的新观点,反对嵌入在中国历史中的种种不公。^①

燕斌和其他女杰型作者认为,要是妇女想摆脱在历史中的被动地位,必须参与政治,展开自己的历史实践。就像前文提到的许多作者一样,这涉及以社会和政治意义重新诠释历史典范。同时,这还意味着必须勾画出女性受压迫的历史谱系。

第五章提到过一位笔名保素的作者,她曾试图借中国历史上女杰的功绩来提高妇女地位,激励女同胞。她称花木兰是世界级的女英雄,而梁红玉是拯救南宋王朝的孤胆英雄。^②她还援引另一位中国典范——战国时期的婴儿子的故事,表达了对婚姻制度的忧虑。按照传统的讲法,婴儿子是为了侍奉生病的父母而拒绝出嫁,而根据保素的复述,婴儿子拒婚不仅出于孝顺,还出于对女性从属地位的愤慨。保素解释说,婴儿子不结婚“一半原因是家中的病人。另一半原因是(女权衰落)。”^③

保素追溯了妇女权利中落的历史进程,激励妇女收回这些权利。她说,“怜他迹熄诗亡日,正是男权猖獗时”。^④在《孟子》这段话的第一部分,她在行间注释中评论说:“孔子删诗,首言后妃之德,想当时尚不过轻女,自战国后,女权遂逐日陵夷”。^⑤

保素的诗文指出了妇女受压迫起源于一个特别的历史时刻——“迹熄诗亡日”,于是新的女作家们也就能够将这种压迫重新放回历史中去。而通过将这种压迫历史化,她们就能够证明,妇女的从属地位并不是中华文化亘古不变的特征,它既然有起点,就会有终点。

① 燕斌,《罗瑛女士传》,第54页。

② 保素,第132页。

③ 同上书,第131—132页。

④ 同上书,第132页。这句话引自 *Menciusbk. IV; II, ch. 21; 1; Legge, The Works*, 327。这一段提到了周朝统治结束以及《诗经》里《雅》部的没落。周朝灭亡之后,雅歌就没有再进行过增补,渐渐退化成了对过往的记录而不再表现当下的情形。

⑤ 保素,第132页。

如果真的有女性受压迫的历史,它也必然有一个史前时代。恢复史前时代就成为了当下主义者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们中有许多人都不愿崇拜罗兰夫人等外国偶像,不希望模仿西方模式寻求妇女的权利。就像许定一、丁初我等人试图重拾中国女杰的故事一样,他们试图恢复的是曾经深植于中国历史中的女权。李秀和荀灌等被遗忘的女勇士的故事可以将青年女子发动起来,变成今天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了解妇女受压迫之前的时代则会激励有志于此的女性起来终结这种压迫。

对于几乎所有的晚清妇女组织和期刊来说,恢复妇女失去的权利都是最基本的。共爱会在其章程中指出,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是“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的第一步。^① 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就是由致力于恢复女性权利的“女子复权会”印行的。^② 同时,支持女英雄主义理想的男性也鼓励女子去夺回她们在中国远古社会曾经拥有的权利。^③ 许多女活动家也承认这些男性是她们在这场斗争中必不可少的同盟军。^④ 比如林宗素就曾向《女界钟》的男作者金天翮致敬,在她看来,他们是复兴女权幕后的推手。^⑤

《留日女学生会杂志》的“发刊词”写道,必须收回这些失去了数千年的权利,“我国女界数千年来,浑浑噩噩,以依赖为生活,以服从为义务”。^⑥ 巾侠感叹说,“女子之气味男子所抑遏者数千年”,^⑦ 忆琴也指出,经过长达千年的压迫,花木兰等古代妇女曾享有的权利也已荡然无存。^⑧

这些批评者常常将千年的压迫归咎于古代哲学的发展,而不是社会

① 《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章程》,第 167 页(此处页码有误,应为 155 页。——译者注)。

② 幸得秋水(《妇人与政治》,第 50 页)是一名与《天义报》关系密切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他鼓励读者们为收回自己天赋的权利而斗争。

③ 柳亚子,《哀女界》。

④ 比如,可参看忆琴,《论中国女子之前途》,第 143[761]页。

⑤ 林宗素,第 132[942]页。

⑥ 转引自谈社英,第 18 页。

⑦ 巾侠,第 14 页。

⑧ 忆琴,《论中国女子之前途》,第 143[761]页。

经济或历史的力量,他们认为正是前者塑造了后者。只有女杰的同道、男作家陈以益将女性受压迫描述为“奴隶时代”、“从属时代”、“和乐时代”、“独立时代”等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但他是在翻译达尔文主义的著作时才这样说的。^① 陈以益自己有关中国妇女的文章中历史观点含糊不清。例如,在一次对女子行为伦常的重要讨论中,他把古代的“三从”和明清时期的贞节崇拜一起加以否定,仿佛它们都是从属于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历史时刻。^②

女性当下主义者在勾勒妇女受压迫的历史时同样含糊不清。她们将这种压迫上溯至遥远的文化,而不是近期的社会或政治根源,因而一方面承认了这种压迫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她们面对男性权力时的犹豫。她们声称女性的从属地位来源于儒家学说及其产生前后的种种思想,这样她们既绕开了有争议的排满思想,又不至于疏远激进的男同胞。

燕斌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的同学篠隼声称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哲学中的“阴”“阳”观念。这一观念原本代表着黑暗与光明、黑夜和白天等对立双方,后来引申为女子和男子、妻子和丈夫等概念,最终形成了中国人有关家庭的特别具体的观念。篠隼认为基于阴阳的说法比不上西方的人际关系理论。她宣称,西方社会所有社团和国家组织都源自于个人而非家庭。^③ 许多作者认为孔子应为中国妇女地位低下负责。一些人指出,女性的从属地位根源于《论语》中的一句话(17章25段):“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位笔名叫“竞群”的作家在一首诗中感叹道,这些恶毒的话语使妇女自古以来就成了被憎恶的对象,在她看来,这句话也非常不孝,因为它使孔子“自己可怜的母亲”也成了他“不公指控的受害

① 陈以益,《女论》。陈以益没有给出他所翻译的英语文章的原文标题,他给文章起的中文标题是《妇人论》。因此我们不清楚原文究竟是西方语言还是日文。

② 陈以益,《驳女子无才是德之妄言》,《女报》第3期(未注明日期),第139页,转引自刘巨才,第503—504页。

③ 筱隼,第19页。

者”。^①一位自称“转坤”的作者也把妇女的从属地位与儒家经典文本联系起来,除了上面引述的《论语》之外,她还引用了据称是孔子编辑的《诗经》中一首题为“蓼莪”的诗:“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养之不能海之”。^②(此句出自《荀子·礼论》而非《诗经·蓼莪》,英文引用有误。——译者注)

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强烈谴责儒家学说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她在一篇旁征博引的论文中指出,儒家制造了一个复杂的话语网,将妇女绑定在劣势地位上。她在文中讲道,儒家早期的大师孟子就曾依据所谓的孔子之例扬言要与妻子离婚,理由是有一天他回家时她没有依照适当的礼节来迎接他。后来的儒家学者,如汉代《白虎通》的作者继续用歪曲的语言和牵强的解释来维护其自私的特权。他们宣称上天创造人类时就特别青睐男性,因此,任何与男性的“阳”相关的就是好的,任何与女性相关的“阴”就是坏的,这确保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使男子可以合法地拥有好几个妻子。儒家学者认识到,妇女可能不会接受这种安排,所以他们制造了一套要求服从的说教——所谓女人的责任就是一生服从丈夫,夫唱妇随。他们不给妇女任何抗议机会,只给妇女责任,不给她们权力,而且还禁止她们休夫、再婚或表示嫉妒。^③

另一些 20 世纪初的作家则为孔子开脱,她们认为中国妇女地位衰落的原因是后世的学者歪曲了大师的原义。在前文引用过的诗文中,保素争辩说孔子完成《诗经》的编辑之后,妇女的地位才有所下降。^④楚北英雄也为伟大的圣人辩护,她坚持孔子是承认妇女权利的,因为他曾以“匹夫匹妇”一词将女子和男子相提并论。她认为是汉代文人最先剥夺了妇女的权力。^⑤许多人同意这个看法,其中一位叫佩公的女作家说,古代社会“三纲”等概念被后来迂腐的学者曲解了,给中国性别关系带来了

① 竞群。

② 转坤,第 34 页。

③ 何震,《女子复仇论》,第 17—20 页。

④ 保素,第 131—132 页。

⑤ 楚北英雄。

毁灭性的结果。^①

无论女杰型作家指责的是孔子还是后世的思想家,但她们像古典现代派一样,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压迫中国女性的两种具体表现上:教育机会受限和缠足。她们将“无知”和“小脚”这两个曾被本质化的女性特征加以历史化,希望清除这些障碍,促进中国女性进步。

晚清女作家们认为,女子不识字如同女权的丧失一样,至少可追溯到一千年以前。有些人认为从中华文明起源以来,女子就没有受过教育。陈彦安写道,“女学之不振已四千余年”。^② 另一些人则认为先秦时期的女子是受教育的。留学生黄菱舫感叹说,中国女子“在过去的两千年”被剥夺了教育权。^③ 还有人附和古典现代派,声称女子的无知始于东汉。一位化名佛群的作者以伏生的女儿和班昭为例证明,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狭隘观点流行之前,中国妇女受到过充分的教育。^④ 有些作者承认近年来女子教育有所发展,但其方式仍以说教为主,乏善可陈。例如燕斌抱怨说,数千年来中国女子都只能接受“旧式的说教”。^⑤

女杰型作者也根据梁启超和其他古典现代派的观点,将女子教育和缠足相联系,又将缠足与国家的衰弱联系在一起。虽然在日本人以及更早的西方传教士眼里,从世界历史上来看这个时期并不是只有中国的女子缺乏教育,但是缠足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世界性的标志。^⑥ 王莲和陈彦安等新式女作家都决心查明缠足的历史根源,致力于揭露并消除这种屈辱。正如秋瑾所言,现在是女性审视自己的过去、最后清算这一为害已久的陋习的时候了。^⑦

① 佩公,《男女平等的真理》,第30页。

② 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第156[0586]页。

③ 黄菱舫,第133[943]页。

④ 佛群,《兴女学说》,第12页。

⑤ 燕斌,《发刊词》,第1页。

⑥ 关于西方传教士对缠足的批评,参见 Drucker; Pao Tao。

⑦ 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第134页。

一些 20 世纪初的作家声称缠足起源于远古或秦汉时期。有人认为《史记》中对邯郸女子步态的描述可能把这一习俗提早到东周时期。另一些人认为,这可以追溯到南朝皇帝齐东昏侯(499—501 年在位)的贵妃潘淑,^①秋瑾本人则将其归咎于南北朝时期(220—589)的陈朝末代君主陈后主(陈叔宝,533—604)。^②但绝大多数的新型女杰们都主张缠足既不是古代中国的习俗,也没有包括在古代经典对于妇容的定义中。^③这既符合她们恢复妇女权利的主张,又与已有的历史资料相吻合。

这些作者将这种习俗的起源上溯至五代时期(907—960)。根据这种观点,第一位缠足的女子是南唐末代皇帝李煜(937—978, 961—974 年在位)的嫔妃窅娘。^④《女学报》上的诗文描述了窅娘的金莲如何玷污了中国妇女的历史。有人说她病态的小脚是多年来折磨中国妇女的“病根”。^⑤还有人说,甚至连满清的顺治皇帝(1644—1662 年在位)也无力禁止这种始于窅娘的顽疾。^⑥

对“妇女”身份的接受和拒绝:秋瑾的案例

废除缠足和推动妇女教育是新女杰精神的核心。20 世纪初的女作家们拒绝认同过去(包括当下)那种无知、跛足的中国妇女身份,为的是接受文明进步、享有权利的新身份。这种对“妇女”身份又排斥又关注的张力在新型女杰们采取的各种行动中都很明显。她们试图通过书写中国妇女的压迫史来改变中国妇女,她们在把自己定位为“受过教育的女英雄”还是“英勇的教育者”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她们创建了各种由男性

① 这些较早时期的记录见于《戒缠足说》中的讨论。

② 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第 134 页。

③ 有关缠足的起源,参见 Ko, *Cinderella's*, 第 109—144 页。

④ 《戒缠足说》。反对缠足的官员也提到了窅娘。比如,可参见《鄂抚端午帅劝妇女勿再缠足说》;《顺天府通州绅民公议天足社启》。

⑤ 会稽金国书稿,第 52 页。

⑥ 《女界进步之前导》,第 522 页。顺治首先于 1645 年开始废除此一习俗。

议程推动的女性协会，她们还用文言和白话两种方式发表公开声明——从以上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这个根本性的矛盾，她们的文章和晚清妇女的个人传记更是突出地反映了这种张力。

在发表于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胡彬夏开始是轻蔑地拒绝，然后又充满希望地接受了“妇女”的身份。“吾所尤痛心者，乃二万万之女子也”，她写道。“不特人视之为玩物，即己亦自居于玩物而不辞，嗟乎！安怪人之呼为下等动物也！”尽管如此，胡彬夏接下来又将她嘲笑的女同胞比作中国未来的希望。“自今而后，凡我女子，苟人人以中国之患难为己之患难，中国之腐败为我之腐败……则中国之兴如反掌耳”。^①

在秋瑾的传奇生活中这种张力或许是最突出的(图45)。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评论家、演说家和妇女教育的热心推动者。她的著作和行动主义是女英雄主义思潮理论与实践的核心。^②

秋瑾离开丈夫和孩子到日本去学习并追求她的政治理想，此后不久，她便自觉地采用了英雄的身份。她在东京去掉了自己名字中间那个“闰”字，启用了英雄式的笔名，即“鉴湖女侠”和“竞雄”。^③她在革命计划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抱负：她加入了致力于推翻清政府的组织并接受了制造炸弹的训练。她开始担任妇女们原应回避的公众角色，利用自己善于演讲的专长，发表了一场又一场关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激情演说，唤起了许多群众。^④从日本返回中国后不久，她被牵连进暗杀安徽巡抚未遂的案件中，1907年被清政府处决。

① 胡彬夏，《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

② 关于秋瑾的中文、日文、英文文献浩如烟海。年代较近且比较经典的作品包括：孔菁慧，Lizhen Wang，第27—60页；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Rankin, *The Emergence*；武田泰淳。

③ Rankin, *The Emergence*, 52.

④ 秋瑾在革命运动的男女志士里面算得上是非常好的演说家。她也是演讲术理论家。参见秋瑾，《演说的好处》。有关这一时期的女性演说家，特别是秋瑾与唐群英的内容，可参见Strand。



图 45 秋瑾早年小像

资料来源:中华书局,未标明出版者



图 46 秋瑾身穿男式西服

资料来源:王灿芝,未标明出版者

秋瑾最大的抱负是震惊男同胞,超越“妇女”身份,并在民族历史留下自己的印记,从她女扮男装这一高度自觉的行为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1904年,她身穿男式西服在北京的公开场合露面,还拍下了照片(见图46)。^①当她于1906年回到中国时,又穿上中国的长袍马褂拍了照片,并写了一首名为“自题小照男装”的诗来描写自己男装的样子(见图47)。^②从1904年夏天到1906年春天秋瑾都住在东京,其间她没有着男装,而是穿日式和服,但她在和服上佩戴了一把短剑,成了她这个著

① 有关秋瑾身着西服的描述,参见服部繁子,《秋瑾女子の思い出》。

② 对于这首诗究竟写于何时人们意见不统一,也不清楚是为这张照片而作还是为秋瑾着西服的照片而作。有关这首诗是为秋瑾着中式男子服装的照片而作的说法可参见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第119页;郭延礼,《秋瑾诗文选》,第94—95页。

名造型中的最引人注目的焦点。这个形象她也留有照片(见图 48)。^①秋瑾用最后这张照片作为她在 1907 年初创办的《中国女报》第二期的卷首插图,题为“鉴湖女侠秋瑾女士照片”,强调了短剑的象征意味。



图 47 秋瑾身穿中式男装

资料来源:中华书局,未标明出版者



图 48 《鉴湖女侠秋瑾女士照》

资料来源:中国女报,1:1(1907年2月)

秋瑾的许多中日友人都评论说,尽管她曾采用过各种男式装扮(见图 49),但却掩盖不了她独特的女性气质。不过,没有任何人对她娴熟的

① 这著名的和服大概是秋瑾在实践女子学校的校服,这是所有学生都必须购买的。实践女子学校的监督坂寄美都子(《下田歌子三十七年回忌纪念讲演》,第 2、5 页)解释说和服上箭头状的矢絰碎花图案代表着学校“良妻贤母”的理念:要培育品行端正的儿子,母亲必须像图案里的箭一样正直。秋瑾在照片里佩剑的灵感似乎也来自于日本。有的说法(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称鲁迅给了秋瑾这把短剑,而另一位中国男留学生王时泽(第 227 页)则说秋瑾自己买了这把剑。秋瑾吟咏刀剑的诗歌很多,但其中的《日本铃木文学士宝刀歌》则提示我们,她对刀剑的喜爱最初可能来自于在北京教授她日语的铃木信太郎。中村忠行,第 247 页。

骑马、雄辩的演讲等各种典型的男性技能表示异议。^① 甚至她的死都公然违背了她的性别。当时女罪犯通常是被凌迟或绞死,但秋瑾是像男子一样被斩首的。^②



图 49 服部繁子所画的男装女容的秋瑾

资料来源:服部,秋瑾女子思の思い出,39

秋瑾将她的全部精力投入当代政治历史,并将她的英雄理想融入到了民族主义事业中。生活在北京的日本教育家服部繁子 1904 年曾陪秋瑾去过东京,帮她进入了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子学校,服部记录了秋瑾与她的一次谈话,秋瑾明确地表达了她的渴望。就在秋瑾告诉服部她决定去日本留学之前,秋瑾曾说过,她的人生抱负就是惊世骇俗。她拒绝“无

① 有关秋瑾的女性风采,参见服部繁子,《秋瑾女子の思い出》,第 39 页;平野日出雄,第 246 页。

② 夏晓虹,《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第 436 页。

精神的生活”，决心挑战自我极限，超越男子。然后秋瑾重复了一遍革命口号：“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蛮夷之中国，非狄虏之中国。”她认为她的个人奋斗只有通过民族斗争才能获得意义，她反问道，如果我们只为自己忧虑，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①

秋瑾在最后声明中表示，她主要的关心不是与男子平等，而是超越男子。从她采用的女侠形象以及她从（西方）男子到（日本）女子，再回到（中国）男子的服装变化可以看出，与其说她反对的是女性特质，不如说她反对所有既定的性别规范。这一点进一步体现在她的著名文章，新型女杰的宣言——《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之中。秋瑾在文中鼓励她的汉人姐妹不仅要超越对女性的期望，还要超越男性曾取得的成就。她宣称，正是妇女应该担当起中国未来的责任，并克服男性文明过去的错误。“诸位晓得国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么？”^②

因此，秋瑾个人女勇士式的抱负和她动员女同胞加入民族事业的承诺是并存的。她懂得中国妇女首先必须从父权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才能承担起自己新的历史角色。她和好友吴芝瑛在一起时曾说过“革命当自家庭始”。吴芝瑛记得秋瑾曾说道，“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③

秋瑾自己的一生就是“家庭革命”的写照。她是中国自己的娜拉，将束缚人的家庭生活砰然关在门后。^④ 她的大胆行为和亲身鼓励启发她的女同胞们也这样做。关于这一点有不少例子，有些例子是人所共知的。在日本秋瑾曾公开羞辱她的好友，《苏报》编辑陈范的女儿陈撷芬，要她

① 服部繁子，《秋瑾女子の思い出》，第48页。

② 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第134—135页。

③ 吴芝瑛。胡缨（*Writing*，第121页）暗示说吴芝瑛在本篇传记及其他发表于秋瑾死后不久的传记中强调了她的社会活动而非政治活动，目的就是为秋瑾脱罪。也可能秋瑾根据不同的时刻和不同的环境选择到底是以政治革命为主还是以社会革命为主。

④ 这里提到的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这个作品是1918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参见许慧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20s—1930s》。

拒绝按父亲的安排嫁给其好友为妾。^① 秋瑾还进一步说服了陈范的两个妾离开陈范，并号召其他浙江学生替这两位女子捐献学费，让她们能够上学。这两位女子中的陈湘芬后来还参加了辛亥革命。^② 秋瑾被处死前不久在浙江教书，当时她因拯救了多名被迫嫁给当地恶霸的女子而闻名乡里。^③ 还有一个不太有名的例子与一名年轻的日本女子有关。1904年夏天秋瑾在从天津到神户的轮船上遇到了这位日本女子，当时她因在中国经受了失恋的打击而感到泄气，秋瑾责备她不该意志消沉，并告诉她死亡都比心怀痛苦而生更有意义。第二天，这位日本女子就跳下了船舷。^④

秋瑾也采取了一些制度化的办法来改善妇女的生活。她创立了两个针对女性读者的白话文刊物：1904年8月至1905年在东京出版的月刊《白话》和1907年初在上海创刊的《中国女报》。^⑤ 无论在她发表于这两本杂志和其他刊物的文章中，还是在她的演说里，抑或是在她的日常生活中，秋瑾都在热心推动妇女教育和留学日本。1905年6月6日，她给湖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写了一封信，鼓励所有中国妇女都去日本学习。这封信后来还发表在《女子世界》上。^⑥

但是秋瑾投身教育的时候也遇到了女杰身上常见的个人与集体之间、政治理想和教育抱负之间的矛盾。虽然她真诚地相信女同胞们需要提高教育水平，但她也确实在用女子教育作为工具以推动自己的政治事业。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她留日期间的一次旅行中。1905年春天她从东京前往绍兴，这次旅行对她的革命生涯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她鼓动女

① 有关这个事件的简要描述参见 Beahan, 第 394 页。

② 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第 365 页。

③ 同上书,第 373 页。

④ 根据服部繁子(《秋瑾女子の思い出》,第 47 页)的介绍,秋瑾为自己的话可能造成了这位女子的自杀感到很悲痛。

⑤ 有关在日本刊行《白话》杂志的内容,参见徐双韵,第 209 页。

⑥ 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第 364 页。

子海外留学最为用力的时候。她在绍兴秘密参加了《光复会》，也初次会晤了后来的同盟者徐锡麟（卒于1907年），徐锡麟后来于1907年因密谋暗杀安徽巡抚恩铭与秋瑾一起牺牲。^①在途中秋瑾还公开动员妇女到日本，特别是到下田的女子实践学校去学习。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次旅行前后秋瑾在其他场合对下田的学校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那么她此时的积极宣传很有可能是在为自己参与光复会活动做掩护。

秋瑾在私底下和公开场合都曾批评实践女子学校，从宿舍、伙食的价格和质量到师资的知识和能力都是她批评的内容。^②但是在1905年她回访中国时，她在学校油印的《中国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管理章程》后面附上了自己热情洋溢的文章，在江苏和浙江到处散发。^③她的附文署名为“秋竞”，强调了教育和政治都是女杰精神的组成部分，她在文中宣称日本女子学校的课程“不仅对中国的女子而且对中国的未来有利”，她鼓励那些时间和金钱有限无法实现抱负的女子，“束轻便之行装，出幽密之闺户，乘快乐之汽船，吸自由之空气，络绎东渡，预备修业。”^④尽管秋瑾用了这么多自我解放的夸张修辞，但她对妇女个人获得国外经验相对不太关心，她最希望的是这些妇女最后能在中国开办学校，并通过这些学校为革命斗争做出贡献。^⑤

1905年12月，秋瑾最终因抗议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新法令

① 有关秋瑾这段时间在中国的活动，可参见孔菁慧，第124页；Rankin, *The Emergence*, 第52页。秋瑾是光复会成员，而光复会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仍作为一个独立的革命组织继续活动，据称这就是孙中山想起秋瑾就怀有敌意的原因。Gilmartin, 第204—205页。

② 秋瑾曾在1904年9月对服部繁子抱怨说实践女子学校的膳食又差又贵，11月中又抱怨说老师们既不博学也不能干。服部繁子同时也从学校的管理方那里了解到秋瑾给下田歌子写了一封信，一一指出了她的不满，并于1904年末离开了学校。秋瑾1905年8月重新回到实践女子学校，此后她的批评更加厉害。根据服部繁子收到的东京友人们的信件，秋瑾站在水道桥的路边公开对日本的女子教育、下田歌子和实践女子学校的老师们发表批评。她的这次大爆发引起了很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服部繁子，《秋瑾女子の思い出》，第48—49页。

③ 秋瑾，《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也请参看大里浩秋，第13页。

④ 秋瑾，《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

⑤ 大里浩秋，第13页。

回到了中国,同时开始从事女子教育和反清政治活动,而前者似乎再一次成了后者的掩护。1906年3月起秋瑾在浙江省北部的“浔溪女学”教授日文、卫生和科技课程,但5月校方强迫她离职,理由是她在学生中宣传革命。^①差不多一年后,从1907年2月起她在徐锡麟和陶成章(1878—1912)在绍兴办的培养革命人才的“大同学堂”担任校长和体育教师。^②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907年7月11日秋瑾就在这里被清政府的士兵逮捕了,她的传奇人生至此即将终结,而她一生所追寻的就是在民族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并将中国妇女带进历史。^③

秋瑾对于“妇女”身份既抗拒又接受,她参与男性主导的民族救亡的事业,同时又致力于以女性为中心的解放与教育事业,可以说她的理想十分复杂,充满张力,但在她去世后,特别是在她的名字变得与辛亥革命密不可分以后,其重要意义就只剩下一个方面了。她的故事首先属于壮丽的革命史,其次才属于探索性的女性史。她壮烈牺牲的一幕掩盖了女英雄内心的矛盾情绪,而在她的对话录和悲愤的诗歌中,在她投身女子事业的过程中都弥漫着这种心绪。^④但即使是与秋瑾同一时代的女作家在写这段复杂历史的时候也忽略了这种复杂性,只是强调了她献身于政治革命的一面。如本书第三部分开始时提到的,秋瑾被处决后不到一个月,笔名为“明夷女史”的作者就把她的名字列入了新的世界女杰英雄榜。^⑤吴芝瑛在1907年至1912年5月间为秋瑾写了5篇小传,在第一

① 孔菁慧,第125页。秋瑾被迫离开了南浔,和她一起离开南浔的有浔溪中学的校长徐自华及其胞妹、学校的学生徐蕴华。

② 同上书,第127页。据称秋瑾曾打算在这里建立一所体育学校(大同体育学堂),她还为此将自己的体育协会加入了大同学堂中。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第371—372页。在大同学堂期间,秋瑾也管理着明道女学。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第371页; Rankin, *The Emergence*, 第59页。

③ 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第353页。

④ 我将解读秋瑾诗歌的工作留给文学研究的专家们。参见 Wang Lingzhen, 第27—60页; 以及 Eileen J. Cheng, *The Menacing*。

⑤ 明夷女史。

篇中她关注秋瑾献身社会变革的一面,而在辛亥革命后写的小传里,秋瑾被描绘得更加果敢,一生的政治道路也更加明晰连贯。^①在大多数后来的历史传记中,秋瑾的原始女权主义(proto-feminist)被当作一种内在的冲动,从属于她的革命理想。

不过,从政治意义来看秋瑾的一生,可以说她的确取得了她自己以及其他的激进女性最渴望的成就。她不仅在女性史上树立了典范,还在男人的政治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她的鲜血如同罗兰夫人一样流进了现代世界的历史之中,但与此同时,像罗兰夫人和中国历史上的女英烈一样,秋瑾为人们所纪念也因为她的一生融入了主流的政治叙述。正如罗兰夫人代表了法国大革命,南宋女英烈象征了汉族抵抗蛮族的斗争,贞节的李闰神化了百日维新,秋瑾也成了晚清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偶像。只有忽略李闰和秋瑾为其他女性代言的一面,她们的故事才能成为晚清历史的一部分。女杰的豪情只能当作英雄气概来解读,新的女性时间也只有在与男性时间交汇时才能感觉得到。

对照:陈彦安的案例

陈彦安一生没有英勇悲壮的牺牲、振奋人心的演讲或令人震惊的男子装束,她被排除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因此关于她的记载有些支离破碎。^②尽管如此,有关的记载仍然与女杰精神形成了颇有启示意义的对照,并不是因为她与女杰们的经历有根本的不同,而是因为两者在历史的关节点上有紧密的联系。陈彦安早期拥护加入男性时间,而后来又支持新女杰们厌恶的循环往复的女性时间。她的生命轨迹可以被清楚地重构成一个线性的进程,从激进的古典现代派发展到温和的改良派,

^① Hu Ying, *Writing*, 124 - 138.

^② 尽管有关陈彦安的材料支离破碎且互相矛盾,但借此重构的陈彦安“传记”还是比大多数回国任教的留学生的生平更为完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和下田的长期友好关系以及实践女子学校图书馆档案管理员精心保存材料。

从极端的学生变成保守的好妻子、幼儿教师,终身追随下田歌子。陈彦安故事的这种连贯性虽然给人印象深刻,但它背后其实隐藏着许多矛盾之处,我们也可以借此来洞察晚清社会。

陈彦安来自江苏上元,是首批在日本学习中国女性之一,也是女子实践学校最早的毕业生之一。1902年6月,她在吴稚晖(1865—1953)的带领下和其他少数激进学生一起离开了中国,年轻的煽动家吴稚晖刚到东京就遭到明治政府驱逐。^① 实践女子学校的陈彦安很快就参加了激进的政治活动。1903年她作为“共爱会”的成员,参加了抗议俄罗斯企图霸占东北的活动,志愿作为护士开赴东北前线。^② 由于陈彦安在东京的这一系列政治活动,秋瑾1904年在实践女子学校初次见到她时便把她当作了志趣相投的战友。在秋瑾致陈彦安和另一位即将与陈一起回国的女学生孙多琨的一首词中,秋瑾慨叹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暂,并鼓励陈彦安和孙多琨回国后努力唤起被践踏的中国姐妹同胞。^③

但是,陈彦安最终选择了追随下田歌子而不是秋瑾。陈彦安的激进主义令秋瑾敬佩,但在与清政府关系密切的下田这里却受到了强烈的反对。下田在陈彦安的毕业典礼上发表的公开演讲可能就是针对陈彦安本人的。下田说,她不想让学生成为“激越的民权论者”或“乱臣贼子”,而是希望她们成为“良妻贤母”和敬业的小学教师。^④ 尽管陈彦安和下田早期的关系也许有点紧张,但是当陈彦安放弃追求“民权”、接受幼儿教师和贤妻的角色以后,下田就与她建立了长期而密切的关系。1918年3月23日,陈彦安给尊敬的下田老师寄去了一首诗,在落款时冠上了丈夫的姓氏。^⑤

陈彦安的婚姻对她的一生十分重要。与抛弃丈夫的秋瑾、婚后两年

^① 谢长法,第272页。吴稚晖因参与成女学校事件于1902年8月被日本政府驱逐。参见 Harrel, *Sowing*, 第14—20页。

^② 《留学记录》。

^③ 这首诗题目为《望海潮》,收录于秋瑾,《秋瑾集》,第107页。孙多琨来自于安徽省。

^④ 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纂所,第399—400页。

^⑤ 陈彦安,《驻日支那章公使妇人よりの来状》。

丧偶寡居的唐群英和选择伴侣式婚姻的张汉英等不同,陈彦安扮演了新式好妻子的角色。在日本期间,她与中国学生章宗祥(仲和,1877—1940)订了婚。章宗祥是浙江人,1895年考中秀才,1897年获公派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学位。^①作为中国最早的日本留学生之一,他在海外华人学生群体中有一定的威信,还写过一本很受欢迎的留学生指南。但是,章宗祥和未来的妻子有所不同,他与海外华人中渐渐抬头的民族主义保持着距离。他反对成立陈彦安等人积极支持的拒俄义勇队,认为这支“临时凑合”的军队只会与清政府敌对。^②



图 50 婚礼照片:章宗祥娶陈彦安(右),潘之西娶潘英(左)

资料来源:妇女时报,1(1911年5月13日)

尽管有这些差异,章宗祥与陈彦安两人在回到中国后不久还是结婚了。1904年陈彦安离开东京,此后不久章宗祥也回到了北京,他在东京

^① Harrel, *Sowing*, 62-63.

^② 同上书,第134页。

取得了法律学位,清廷也因此赐予他“进士”头衔,法律馆也给了他一份纂修官的职位。^① 大约在他们婚后几年,这对夫妇的婚纱照刊登在了1911年出版的《妇女时报》第一期上(见图50)。几乎每一期《妇女时报》都刊登婚纱照,而且往往将“老式”和“新式”(文明)婚姻的照片并列。^② 从婚纱照来看,陈彦安和章宗祥是一对新式夫妻。和老式婚姻不同,陈彦安头上既没有盖头,照片上也没有公婆出现。同时,她的海外经历也被突出出来。图片的标题介绍她是海外留学生,她自己身穿和服坐着,章宗祥站在她的座位后面。不过,她显得不像左图照片中的女人那么沉着,这幅照片里的养蚕专家潘英站在她的丈夫潘之西身边,都身着洋装(见图50)。看来即使同属于文明这一类,亲密的程度还是有明显的差异。

章宗祥在清朝和民国政府里的部长生涯颇为顺利,并与东京保持着密切联系:1916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公使。^③ 陈彦安陪同丈夫出使日本,因此得以与下田老师保持联系,对此章宗祥极为支持,他在民国初期曾撰文热情地赞扬了下田和她的学校,把下田和陈彦安之间的和解比拟为母亲与女儿之间的调和。他还写到了陈彦安在东京的人力车事故中意外伤脚后,下田如何悉心照顾她。他的结论是女老师和女学生的关系比男性的师生关系更为牢固。^④

但是从文献资料来看,陈彦安对日本女子教育的看法却很矛盾。1903年她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劝女子留学说》的宣言。本章前面曾引用过其中部分段落,其中她对比了中国女子缺少教育的可悲现状和日本女

① 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纂所,第432页;Harrel, *Sowing*, 第67页。

② 自从《妇女时报》1911年创刊直到其1917年停刊,婚姻,尤其是新式文明婚姻都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话题。

③ 章宗祥于1914年出任司法总长,大约同时还为访问日本的中国教育代表团担任翻译。1916年他出任农商总长,此后任驻日公使。

④ 故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纂所,第432—434页。章宗祥写作此文的日期是大正早期,在中国正是民国初年。

子的高识字率,鼓励女同胞出国留学,提升自己。她概括了去东京留学的优势:路途不算遥远、文字系统相类似,费用也相对便宜。^①

但是,在次年的一次海外学生与中国特使的见面会上,陈彦安又对日本女子教育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评估意见。这位特使名叫胡玉缙,是奉命来考查明治日本的教育状况的。^② 陈彦安在会议发言中批评了日本的女子教育水平,坚持认为在中国建立女子学校比派更多的学生来东京更好。胡玉缙曾看过一年前陈彦安发表在《江苏》上的文章,他的结论是,自该文章发表以来,陈彦安对日本又加深了理解。^③

不过,除此以外至少还有另外两种说法可以用来解释陈彦安对明治日本女子教育的矛盾看法。有可能她像秋瑾一样,私下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持保留意见,但感到不得不公开宣传当时中国女子最好的教育机会就是到日本留学。还有一个可能,她 1904 年对日本女子教育的批判主要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她可能会认为,如果清朝官员相信明治日本女子学校存在不足,他们就会被迫去发展中国的女子教育。遗憾的是,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民国时期陈彦安对日本或日本女子教育的看法有什么发展,当时她作为中国大使夫人住在东京。我们也不清楚在五四运动中,当章宗祥被视为亲日派卖国贼并被爱国抗议者殴打时陈彦安又作何感受。^④

陈彦安的教学生涯更是显得歧义重重。她从实践女子学校毕业时本打算回国结婚,并将在下田的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去从事幼儿教育或小学教育。^⑤ 有说法称陈彦安曾经希望开办一个女子幼儿园或女子小学,另一种说法称她是北京所有幼儿园的总负责人。^⑥ 有确切的

① 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

② 关于胡玉缙以及 20 世纪初年派往日本的诸多中国教育、公务、商务使团的情况,请参看 Harrel, *Sowing*, 第 40—59 页。与胡玉缙见面的这次会议是在东京牛込区的江苏同乡会举行的。

③ 胡玉缙,第 39 页。

④ 抗议者进入了曹汝霖的住宅后发现了章宗祥,章宗祥也遭到了痛打。参见 Fogel, *Nakae*, 第 39—41 页。

⑤ 放下田校长先生传记编纂所,第 399 页。

⑥ 佐伯惠,第 18 页。

证据表明她在1908年曾任“京师第一蒙养院”的负责人。^①该蒙养院在学部正式批准女子小学和师范教育之后一年建立起来,得到了清政府官员的支持。满洲贵族振贝子捐献了办学资金,并任命包括章宗祥在内的三名官员管理这所学校。张汉英、唐群英等女性办学是自己努力筹资,而陈彦安与她们不同,她能够参与政府倡导的教育项目,有丈夫的支持,还得到了清廷的资助。^②

最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期陈彦安在日本接受采访时没有提及她的教学生涯。^③在这次访谈的序言中谈到了陈彦安早年在实践女子学校当学生时的轶事,突出了她勤于家务的一面。其中谈到当学生和教师搬迁新居时,陈彦安是最后一个离开旧宿舍的。其他学生离开后很久后才发现她还在清洗滑动门的门栓。访谈的序言说这样的一丝不苟是“东亚女子美德”的标志。^④陈彦安在接受采访时也毫不排斥这种形象。她说自己最关心的是家庭事务,如果因为社会的需要她不得走出家门,她也是情非得已。离家一天就会使得她觉得自己一无所成,心情不快。^⑤

这最终导致了陈彦安生命历程中的悖论:她最初排斥,但最终接受了传统的东亚“妇女”的身份。陈彦安1903年在《江苏》上发表文章鼓励女同胞们参加民族斗争,要求她们更有世界意识、更加独立,专心学习,更直接地担当起中国的前途命运来。^⑥在实践女子学校的采访中完全听

①《记京师第一蒙养院》,第4页。

②同上书,在皇室里,贝子在所有王公贵族里面是第四等。其他的资助者包括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以及当时日本的刑法学权威冈田朝太郎(1868—1936),他作为清政府法律顾问协助起草了晚清的民法。《记京师第一蒙养院》,第3页。

③我们不清楚这次采访的日期。实践女子学校的材料归在了1943年,但实际上这个访谈时间应该是“在1908年到1916年之间”。有可能是章宗祥携陈彦安出使日本时她接受了这次访谈。《十三年振りに日本へ来て》。

④同上书,第1—2页。

⑤同上书,第3—4页。

⑥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

不到过去这些理想的回音。在回忆实践女子学校的学生时代时，陈彦安声称她最喜欢的课程是家政学。她没有提到她是“共爱会”成员或她参与的拒俄抗议活动。她认为在日本的学生时代得到的经验不是“睁眼看世界”（而这可以说是她参加海外民族主义社团必然的收获），她声称自从学生时代以来一直令她受益匪浅的是下田给她的教导：妇女“办理琐事”。她说，她很喜欢打扫房间和为家人做饭，她宁愿自己做家务，而不是耗费时间和口舌去给女仆布置任务，她还曾亲自照顾她的公公。^①

尽管陈彦安放弃了当时的女杰们所倡导的新女性身份，转而认同历史悠久的女性身份——尽职的媳妇、妻子和看护者，但她的生活也不是简单重复女性传统角色和儒家教条。她和章宗祥的婚姻按某种标准看来也是进步的。正如《妇女时报》的照片所强调的，他们夫妻俩都曾出国留学，陈彦安里里外外都是丈夫的得力助手，她还在丈夫管理的蒙养院当院长。她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但她的世界与她的上一辈有着天渊之别。陈彦安那一代和上一辈最大的区别在于，她们能接受学校教育，并有可能从事教育事业。

新式教育是 20 世纪初中国妇女最强大的变革力量之一，部分原因在于它调和了此一时期各种有关女性气质的说法，将女性自己的抱负、他人对女性的期望都包容了进来。永恒主义者和改良派认为女校应复兴女性有关礼仪的知识、再生产其家内的角色，以与破坏稳定的社会力量相抗衡。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则认为新式学校是关键的训练场，要把年轻妇女培养成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国民之母”或具有革命思想的新型爱国者。对女子教育的这些不同意见在民国时期也一直并存着。1930 年代，“贞德女子学校”在经历了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之后还是幸存了下来。^② 新式学校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一直有关联，秋瑾在大同学堂

① 《十三年振りに日本へ来て》，第 3—4 页。

② 有关贞德女子学校的内容，参见 Duara, *Sovereignty*, 第 136 页。蒋介石在 1934 年的新生活运动中重新强调了良妻贤母思想的重要性。

被捕就是一个例子,此后的几十年中它们的关联更紧密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内成立的。^①

女子学校也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便于女性时间向更为世俗化的未来转向。即使在永恒主义者和改良派的著作中,女德制度的语言也在逐渐消失,而“良妻贤母”、“贤母”、“国民之母”、“女勇士”等等将女子教育和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新用语日益流行了起来。日本和中国的女子学校教授阅读写作,也培训实用工艺技术,进行政治扫盲,将年轻女子培养成为教师。20世纪早期,教师成了最广受认同和从业人数最多的女性职业。^②

对陈彦安、秋瑾、唐群英和许多中国第一批女教师来说,教育不仅给了她们获取新知的机会,还让她们接触到了新的生活方式。作为学生,这些女子都很佩服她们的日本老师和西方教育家,不仅因为她们献身教育,还因为她们能自力更生。作为国内第一批学校教师,她们能不再依赖家庭而在社会上独立。虽然包括陈彦安在内的许多人的职业生涯仍然受到婚姻的约束,但教师职业可以把她们从一直以来依赖父亲和丈夫的生命历程中解脱出来。^③ 教育生涯还可以使妇女从“三从”的“夫死从子”中获得解放,因为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大都市,教育的地位已经获得了认可,女性可以不再按父权制和国家的去生育男性子嗣。^④ 教

① 这所女子学校位于上海法租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个夏天没有人在学校。Jerome Ch'en, 第515页; Meisner, 第34页。

② 此时包括养蚕、医药、出版等等很多职业都试着向女子开放,但是教育还是其中最重要的行业。参见 Wang Zheng, 第130页。

③ 这在民国初年变得越来越现实。年轻的女孩们受到第一批经济独立的女教师的教导和影响,有更多的机会从父权统治中独立出来。著名的五四作家庐隐(1895—1934)从一所北京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得以依靠自己在内地省份做老师的收入读完大学,而不用依赖家庭。同样地,陆礼华(1900—1997)靠五份教学工作攒够了钱来开办自己的学校,而陈永声终身未嫁,她在中国各地的城市乃至缅甸教书来养活自己。Wang Zheng, 第153—154页, 259—286页。

④ 尽管此时中国社会局部开始接受以教育而非做母亲为终身事业的女性,但是延续下来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变化,难以包容想要两者得兼的女性。有家庭的女性几乎不可能在照看孩子、做家务与承担教师职责之间找到平衡,即便是有家人的帮助,也很少能在25岁以后继续从教。有关这些困难,参见 Cong, 第87—94页。而像陈永声和陆礼华这样没有孩子的女性最有可能毕生从事教育事业。

师身份给予了女性社会自主权,随之还赋予了女性爱情和色欲的自由,她们可以有婚外情,可以离婚,也可以与女性发生同性恋。^①

与女子教育密切相关的新兴女性文化开创了一个新的女性时间,它不再是绑定在自然生命周期上的循环,也不完全与民族进步的线性观点一致,它仍然受制于女德制度的基本原则。而女教师们——从秋瑾那样的鼓动者到钟情于幼儿教育的陈彦安——则继续服务社会并教育下一代,不过“下一代”所指的不再只是男性而已。

^① 陈永声从来没感觉到被迫要结婚,而陆礼华则有过两段短暂的婚史,还有不少非正式的关系。尽管在社会监督之下陆礼华的感情生活不得不遭人议论,但她的教师生涯从来没有受到严重的干扰。Wang Zheng, 第 183—184 页。女性的同性恋在第二章有过讨论。

结 语

从 20 世纪初到 21 世纪初

今天,人们不断对中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行反思。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城市生活在很多方面是不变的,并不因大量街道改头换面而发生本质的改变。

——欧宁,“大栅栏计划:穿越城市腹地”,2006

生活于广州和北京的文献纪录片导演、平面设计师欧宁(生于 1969 年),考察了当代中国城市“重建”项目中“现代化与传统间的不平衡所引发的”冲突。他对这些巨大的拆迁建设项目背后隐藏的“缓慢无情的暗流”的社会意义进行了反思,他将 21 世纪初和 20 世纪初的都市生活对应起来加以描绘。他建立这种联系所依据的材料之一是 1909 年北京出版的《醒世画报》,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类似于同一年在上海印行的《图画日报》,也是本研究中使用的刊物之一。^①

欧宁的历史参照点是《图画日报》和《醒世画报》所记录的 20 世纪之

^① 欧宁, *An Evening*。

初,这是一个多元现代性的异彩纷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重新诠释过去以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他们援引中国或西方的偶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英雄谱。本书前面各章强调了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试图克服从前简单还原论的描述——要么痛斥晚清封建顽固,要么又把它捧上天,说它是1910年代末五四运动的先驱。为了便于理解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前文还勾画了中国的现代性展开的一系列过程:去儒教化和再儒教化,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内部强化,历史的当代史化和历史的凝固化等等。^①

欧宁也承认,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标准应该是这一特征显著的晚清时期,而不是被一再追溯的五四时期。^② 这两个跨世纪的时期都是在政治创伤之后。政府的干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改革的进程,但它减少并驱散了所谓代表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政府的批评者,并把“新”的民族主义更加牢固地控制在手中。1901年的新政最终导致了科举制废除,并启动了立宪改革,成了清王朝秩序灭亡的先兆。这些相关的改革由中国与历史、与西方的既定关系引发,也进一步引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和毛泽东思想对这些关系进行重新评价。这些改革一方面援引外国模式,一方面探究历史根源,古为今用,产生了无数的文化形态,并且比五四运动时代“传统—现代”截然对立的二分更加错综复杂。^③ 这些新的文化形态的中心是妇女问题,它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首次被提出,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被重新大声提了出来。

在这两个时期,妇女问题以及这些更宏观的文化形态的特点都是受外国思想影响,这一特点在后一时期更为明显。今天的翻译项目比清朝

① 超稳定性是中国重视统一的认识论传统的标志,根据包括《河殇》作者苏晓康等人在内的后毛泽东时期的批评家的意见,它还是中国高压统治不断朝代循环的恶果。参见 Jing Wang, 第175页,第54页。

② 在考察了包括苏小康(第52页)在内的很多作家和批评家之后,Jing Wang(第47—48页)也跟他们一样将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五四时期的辩论相比较。李泽厚等21世纪的批评家一般是把五四当作现代的起点。Barlow, *The Question*, 第271页。

③ 但五四时期的这种二分观点也应该受到挑战。

末年少,更多的是在个别领域系统介绍西方名著。^① 日本作为向中国介绍传播西方思想的主要角色已被电视和日益普及的互联网等新媒体所取代,这些新媒体将西方的影像、思想和生活方式展示给中国观众。^② 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但迅速、广泛地接受外国影响所引起的根本问题依然不会变:中国应如何界定其带有自身文化特性、而又不可避免地为世界所定义的现代性?

许定一曾强烈反对崇拜罗兰夫人,并决意在中国历史中探寻(西式)女杰之现代性的根源,21世纪初的作家们也努力通过新的“寻根”方式来抵制西方的文化逻辑和“无意识”的全球化。包括阿城(生于1949年)、莫言(生于1956年)和王安忆(生于1954年)等一些作家试图通过与历史的关联将中国的现代性从平庸中解救出来。^③ 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中国到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生于1940年)等新儒家思想的推动者也指出,儒家思想不是西方现代性的解药,而是中国现代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④

我在结语中主要关注21世纪初与紧密相关的历史和妇女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三个(组)人物,其中每一个都突出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方面——世俗化、全球化和时间化,每一个都分别反映了前面的章节中分析过的改良主义、古典现代主义和当下主义等时间类型。第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偶像刘慧芳,她是广受欢迎的电视剧《渴望》的女主角。刘慧芳认同女德制度的某些原则,这种改良主义的观念引起了历史共鸣,激发了关于女性自我牺牲与国家是何种关系的热烈辩论。第二个

① Jing Wang(50)介绍了一个系统翻译项目的例子。

② 1980年代末电视机的使用率达到了78%。Rofel,第703页。

③ 有关寻根运动,参见Jing Wang,第180—186页,她书中还有一些地方零星地提到过寻根运动。David Wang,*Fictional*,第299—300页;Dai Jinhua,第191页。

④ 关于国家试图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请参见Jing Wang,第49—50页;更广义的儒学复兴请参见第64—78页。关于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的内容,参见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大陆讲学、问难和讨论》。

是“中国妇女的世界代表”李小江(生于1951年),中国妇女研究运动的领头人。^① 李小江对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选择性引用,以及后来对中国妇女运动之独特性的论断,都建立在古典现代派文化融合的概念之上,但也对它提出了挑战。第三是21世纪初由吴伟禾和白崇民创作的,取自两千年的女子传记传统的艺术雕塑《国殇:广列女传》。艺术家们通过政治化的视角追溯历史,对传统的《列女传》进行了还原主义的重新诠释,令人想起20世纪初的摒弃儒家学说的当下主义者。

20世纪90年代电视里的妇女典范:刘慧芳

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渴望》上演了。它首先在地方电视台播出,然后1990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播放。^② 作为宣传传统价值观的现代道德故事,它讲述了工人刘家和知识分子王家从1969年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的戏剧性冲突。^③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节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估计有九亿观众收看了《渴望》,观众之多,超过了与之争夺黄金时段的外国连续剧。^④ 于是电视台将该连续剧的播出时间从每周播出3次调整为每晚播出3小时,最后在一个月內播完了全部50集。^⑤

共产党对这部电视剧的成功始料未及,连忙对其宣传“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表示支持。^⑥ 知识分子虽然也不无惊讶,但并没那么满意,开始在文艺刊物和知识论坛上辩论这一现象的意义。^⑦ 节目的主体观

① Tani Barlow(*International*, 1104)用这些字眼来描写李小江。

② Barmé, 第101页。Rofel(700)称这个电视剧是1991年冬天播出的;Wang Yi(224)则说是1990年末1991年初。

③ 这部电视剧的五位编剧中有两位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有关他们的创作意图请参见Barmé, 第104页;Rofel, 第704页。

④ Wang Yi, 第233页。

⑤ Rofel, 第700页。

⑥ Barmé, 第101、103页。

⑦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文艺刊物《上海文论》曾讨论过“《渴望》现象”,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的大报《文汇报》也曾组织过讨论《渴望》的论坛。同上书,第105页;话说《渴望》。

众——普通老百姓——则将此节目视为道德指南,在这个西式情景剧的情节中去寻求中国世纪问题的答案:用什么来取代儒家学说的精神和伦理价值?应如何界定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谁才能算得上民族英雄?^①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都在思索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焦点人物刘慧芳也成了克己和献身的道德典范。

刘慧芳是这种典范在 20 世纪末的版本。她维护自己婚后的自由,外出工作,并为收养女儿而不是儿子做出了极大牺牲。同时,她无私的行为也与以往的贞女相似。与清代贞女金氏一样,她倾尽全力去养育一个并非自己亲生的孩子,这个名叫小芳的小女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遗弃在了车站上。刘慧芳就像现代版的欧阳修之母一样,尽管生活拮据,但她努力培养小芳,为此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健康,疏远了不愿承认孩子的丈夫。而当小芳的生父生母出现后,刘慧芳又心甘情愿地将含辛茹苦养育了十多年的孩子交还给了他们。^②

如同 20 世纪初人们对贞节烈女的反应一样,人们对刘慧芳的反应各不相同。她就像晚清通俗画报中的贞女节妇一样成为了 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的偶像。她的形象被用于道德宣传(例如在官方杂志《瞭望》的封面上),也被用在推销奢侈品的广告上。^③ 当中国知识分子讨论中国人的认同时,她又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正如帝国晚期的文人称赞守贞寡妇是乱世中的精神灯塔一样,她的支持者赞扬其个人救赎的力量,赞美她在道德混乱时代体现了传统价值。她的批评者们发出的哀叹则与 20 世纪初的当下主义者形成了共鸣,他们认为刘慧芳的牺牲、屈从、忍耐和宽容会造成国家的严重瘫痪(刘慧芳在电视剧结尾时确实摔断了腿)。

那些步永恒主义者后尘、恪守常规的人公开赞扬刘慧芳是抵御侵蚀、防范不稳定的堤坝。他们对此剧的评论融合了儒家和共产主义的价

① 《话说〈渴望〉》,第 10—11 页;Rofel, 第 701 页。

② 这部电视剧的剧情梗概可参见 Rofel, 第 705—706 页。

③ Barmé, 第 104 页; Wang Yi, 第 237 页。

价值观,以形成中国承受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全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商品化挑战的真实基础。^①

批评刘慧芳的人则反对这一角色身上的中国妇女和中华民族的含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官方女发言人抱怨说《渴望》使中国的妇女解放倒退了十五年。^②认为自己没有性别的知识女性通常会同情刘慧芳,但坚决反对以她为典范。^③她们担心她的性格特点会抹杀她们和其他妇女为民族大众做出的牺牲。她们批判她是“良妻贤母”理想的化身,进一步引申来说,是男性幻想中的顺从女子^④(节目播出后,男性常说他们的愿望就是找一个刘慧芳那样的媳妇)。^⑤还有人将对刘慧芳的顺从的批评延伸到了民族,称她暴露了中国人的民族性里最不正常的一面。^⑥用一位知识女性的话讲,刘慧芳的形象表明了残留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儒家思想根源是多么顽固。^⑦

李小江:中国妇女的世界代表

电视人物刘慧芳引起的嘈杂反响让人想起 20 世纪初中国妇女典范也是引起了众说纷纭。与此相反,李小江把自己定位成学者、中国妇女研究运动的创始人,清晰地回答了 20 世纪初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在妇女问题的辩论中悬而未决的两个基本问题。

首先是困扰晚清时期新型女杰的两难问题:是接受还是拒绝“妇女”身份。李小江在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国家强行消灭性别差异以后,致力于研究女性的独特身份。她不畏所谓本质主义的指责,甚至

① Barmé, 第 106 页。

② Dai Jinhua, 第 197 页。

③ 《话说〈渴望〉》,第 12 页。

④ Rofel, 第 714 页。

⑤ 《话说〈渴望〉》,第 12 页。

⑥ 同上。

⑦ Barmé, 第 106 页。

因为担心女性问题的特殊性而拒绝“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这一概念。李小江从最具体的身体意义上接受女性身份。

古典现代派融合了中国和西方,将中国古代典范和西方女杰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比如称班昭是国家实用主义,玛格丽特·富勒·奥索利是优秀的儒者,西方社会改革者是慈母等等。李小江将这种模糊的中西杂糅拆分开来。尽管她自己致力于理解并传播西方女权主义的经典,但她认为无法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妇女运动。^①然而,当李小江试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中重新定位妇女运动时,她也不复往日的清晰,变得踌躇起来。

李小江不同于年龄差不多大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戴锦华(生于1959年),戴锦华认为女性的本质不应被定义,而李小江的目的是恢复女性的自然和独特。^②李小江的立场来源可以上溯到晚清,诸如龚圆常等晚清女性在著作也显示出原差异女权主义(proto-difference feminist)的思想。不过,20世纪初反对男性控制、呼吁两性平等的激进浪潮为龚圆常所抵制,但李小江却做出了积极回应。李小江揭露了官方宣称的全社会的性别、政治和法律上平等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中国职业妇女所面临的深刻不平等之间的断裂。^③她还揭示了政策和女性主体性之间的鸿沟,官方表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放了中国妇女,而中国妇女还未形成自主意识。^④最为深刻的是,她突出了抹杀女性身体的意识和有生殖力的身体之间的分裂,而抹杀女性身体的这种“非性化”的意识甚至在“文革”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中还在延续。^⑤

李小江比20世纪初的女作家更公开地关注女性的身体存在,她也较少受到女性身份和国民身份双重责任的困扰。她的事业是毫不含糊的女

① 有关李小江最近对西方女权主义的见解,参见李小江,《世纪末看“第二性”》。

② Barlow, *The Question*, 253, 306.

③ Li Xiaojiang, *My Path*, 114 - 118.

④ Li Xiaojiang, *With*, 第266—269页。有关国家的妇女政策,参看 Edwards, *Women*, 特别是第61页。

⑤ Li Xiaojiang, *With*, 269; Barlow, *The Question*, 300.

性事业。她一直从事女性教学和行动主义,但更倾向于脑力劳动。^① 尽管政治和学术上的障碍令人生畏,她还是于1985年在郑州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妇女的非政府机构,1987年发展成为了正式的妇女研究中心,作为全国妇联的重要补充。该中心通过举办公开讲座、组织会议以及编辑妇女研究丛书来推动国家关心学术性的妇女研究。^②

李小江像她的古典现代派前辈,而不像她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同龄人,她并不反对全球化。^③ 她相信全球商品经济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机会。^④ 她很乐意参与国际知识经济,她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用英文出版书籍,继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之后发起了中国的妇女研究。^⑤

尽管如此,李小江的工作还是体现了世界潮流和国家的当务之急之间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矛盾。虽然她认为妇女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普世的,但她也认为国家差异就像性别差异一样深刻。^⑥ 因此她细心地区分了中国和西方女权运动产生的历史政治背景,并在语言上谨慎地对待这些差异。例如,她指出,中文里对西方女权主义和中国女性主义有两个独立的用语。前者是“女权主义”,从字面上讲是妇女权利的学说,有深切的政治含义,后者是“女性主义”(feminology),更有学术意味。^⑦ 她还解释说,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致力于将妇女的主体性从国家管控之下解放出来,对她们来说西方女权主义的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十分讨

① Barlow, *The Question*, 第276页。有关李小江在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的活动,可参见 Li Xiaojiang, *Creating*, 第84—85页。

② Li Xiaojiang 与 Zhang Xiaodan, 第141—143页; Li Xiaojiang, *Creating*。

③ 比如说,戴锦华参与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活动。参见 Barlow, *The Question*, 第306页。

④ Li Xiaojiang, *From*, 第1276页。

⑤ Li Xiaojiang, *My Path*, 第118—122页; Li Xiaojiang & Zhang Xiaodan; Barlow, *International*, 第1104页。

⑥ 李小江基于共有的身体性认为妇女问题是有普适性的,她也认为女性都有从母权制到受奴役、再到解放的相同历史轨迹。参见 Barlow, *The Question*, 第272、283页;有关国家间的差异请参见第278页。

⑦ Li Xiaojiang, *The Development*, 第4—5页; Li Xiaojiang & Zhang Xiaodan, 第148页。

厌。她还说,共产党所说的中国妇女的“解放”一词不能翻译成英文单词“freedom”或“liberty”: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意味着缺乏自由。^① 1995年,在北京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代表们承认,李小江所强调的中国和西方经验的差异使西方女权主义的国际霸权地位面临挑战。^②

可以说比起那些随意引用甚至恣意诠释外国女杰故事的前辈们,李小江和21世纪初的其他女权主义者在面对西方时更加谨慎。同时,当面对中国的过去时她们与古典现代派一样立场不明,他们都拒绝“封建历史”,并试图把它改造成民族史。有时候李小江就像晚清的女杰一样,对过去和现在那些目不识丁、身体残缺的女同胞给予最辛辣的讽刺。她说中国妇女没有历史,对历史也毫无贡献,自母权制衰落以来,中国妇女一直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自然—历史角色无聊地生活了数千年。^③ 但是,如同20世纪初追溯妇女受压迫之源的女作家一样,她也承认“封建历史”是嵌入在国情中的“珍贵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力量。^④ 她承认,与这段历史失去联系就意味着失去我们自己。^⑤

《国殇:广列女传》

李小江坚决反对的那种完全否定过去的倾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通过批判帝国晚期的才女来否定近代历史的古典现代派,以及对过去全盘拒绝或彻底重新诠释的当下主义者。虽然许定一等当下主义者继续运用本土文化资源,但他们用西方意识形态的语言重新改写了这些中国女杰的故事。东晋李秀、北魏花木兰和隋朝洗夫人等女勇士身上原有的

① Li Xiaojiang, *With*, 275, 273.

② Esther Ngan-ling Chow, 191.

③ Barlow, *The Question*, 287.

④ Li Xiaojiang, *With*, 264; Barlow, *The Question*, 288.

⑤ Li Xiaojiang, *With*, 264.

历史意义被剥掉，成了西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典范。

这些时代潮流标志着戴锦华所说的中国从自己的文化中“自我放逐”的开端。^① 这种异化行为在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攻击之下（戴锦华认为以此为起点）得到了加强，而焚毁旧书、破坏历史文物，甚至迫害具有“封建思想”者的暴力行为使其达到了顶点。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寻根者、新儒家和其他人努力恢复自己心中的中国历史。然而，中华文化的想象中仍然常常出现“传统文化的断壁颓垣”这样的比喻之中。^② 最有力的一个例子是 2001 年的多媒体艺术作品《国殇：广列女传》。在本作品表现中国历史典范人物的雕塑部分，女艺术家吴伟禾和她的男性合作者白崇民将这些含义多重、层次丰富的人物简化为一个坚硬的形态（见图 51）。艺术家们赞美这种简约。他们说创作这些雕塑的“主要意图”在于“简化人物的姿态和形式，达到最本质的极点”。他们是“用女性身体来表达集体控制的效果”。覆盖着面纱的陶塑像象征着她们“在婚姻中的被动地位，没有明确的个人身份，处于茫然未醒的状态。”^③

吴伟禾和白崇民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了该作品的绘画部分。他们在《广列女传》的文字上涂上一层层新的材料，以表达破旧而非创新的意涵。他们解释说，“（传记中的）文本是复制的，上面有红色的句读标点，有烧焦的痕迹，有的文字被遮盖或污损，切成小片然后再缝合到一起”。艺术家也可能“直接用画画来毁坏文本”。^④

吴伟禾宣称《国殇》的主旨是高度个人化的。作为中国 21 世纪初的年轻未婚女子，她决心追寻阻碍她自由地“思想、行动或呼吸”的“荒唐道德”的根源。她与她的男伴白崇民一起开始审视和理解“过去的重现”，

① Dai Jinhua, 第 192 页。

② Dai Jinhua(191)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 1980 年代的男性文化生产。

③ Wu Weihe & Bai Chongmin, 51.

④ 同上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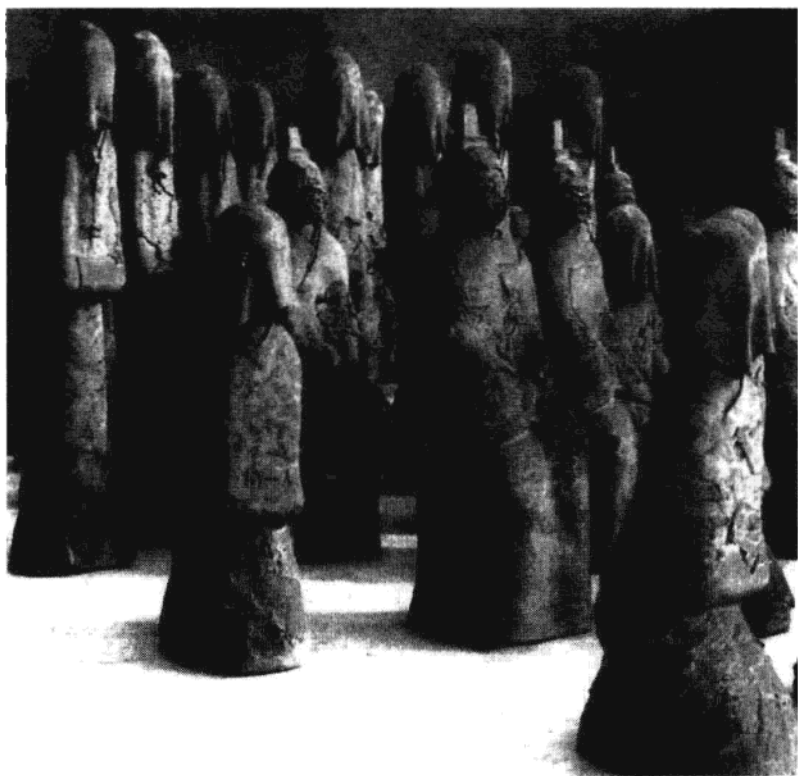


图 51 《国殇》表现女性模范的陶塑

资料来源:Wu Weihe & Bai Chongmin, 第 47 页,承蒙艺术家吴伟禾和白崇民提供图片

去揭示“一种‘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有意剪裁历史来使自己合法化,创造出有关女性的独特版本。”^①

尽管从当代女权主义艺术的角度来看,吴伟禾和白崇民对历史的“重新”回顾饶有趣味,但最终没能提供理解历史的新方式。他们表现传统女性传记的红陶静态雕塑违背了中国人保存历史的习惯,中国人并没有将历史看作静止不动、没有生命的物体,而认为它是在世代绵延中不断流动。^② 这两位艺术家认定的有关女性的惟一历史版本也与本书考查

① Wu Weihe & Bai Chongmin, 第 50 页。

② Pierre Ryckmans 发展了法国诗人、汉学家、考古学家维克多·谢阁兰 (Victor Segalen [1878—1919]) 的深刻观察,对中国人的这一习惯做了描述。谢阁兰写道,在中国较少见到古代的纪念碑,表明中国人相信永恒并不存在于建筑之中,而存在于建造者身上。

过的多种源头的多元、易变、能互相渗透的传记知识库不符。尽管艺术家们用《国殇》有效地表达了他们对当代的不公正的感受,但他们将中国的过去表现为“失败的空间”却抹杀了从前的主体性、历史的可能性以及我们认识自我的潜在资源。^①

如果不去反复重申“中国妇女”作为贞节烈女、良妻贤母或无私的民族主义者如何受压迫,而是对这些独特的个体如何承担、操控或超越了这些身份加以考察,那么这些主体性和可能性的碎片就可以被再度利用。从不同的行动者身上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的时代变迁以及中国妇女问题的复杂层次,从20世纪初的改良派传记作者、新型女杰,到21世纪初的寻根作者和电视剧观众,他们都在不断重新打造着宝贵的历史之筏,并在其上寻求庇护。

^① 讽刺的是,当中国人把自己的历史当作失败的空间来表现的时候,他们常常在意西方人的看法。2004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一个关于中国女性主义的会议上讨论了《国殇》,一位中国的女记者指责(未到场的)创作者是向西方有关“传统中国”的看法投降。

参考书目（中文部分）

书目索引

保素,《咏史诗》,《中国新女界杂志》3(1907年4月5日),131—132。

北京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北京百科全书:通州卷》。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2001。

《毕阮二公缔姻孔氏》,载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1:1,138—139。

彪蒙编译所,《女子分类尺牍范本》。北京:彪蒙书社,1908。

《博览汇报》,《浙江潮》2(1903年3月18日),133—135。

《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顺天时报》(1906年2月8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1449—1451。

蔡东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载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5,493—546。

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香港:中华书局,1991。

蔡元培,《闻方君英自尽志感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4,336—337。北京:中华书局,1984。

蔡允,《序言》,载乾姆爱兰西,《女子体操教科书》。上海:科学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1906。

《参观内城女学传习所记》,《顺天时报》(1907年5月17日)。

曹汝锦,《爱国及自爱》,《江苏》3,(1903年6月25日),158[0588]。

《柴绍/平阳公主》,载刘昉《旧唐书》,58:列传三:2314—2315。台北:红石出版

社,1977。

《倡立女学》,《顺天时报》(1905年9月10日)。

张寿安,《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的现代转化》,《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8(2000年6月),43—87。

陈宝泉、高步瀛,《国民必读》。上海:南洋古书局。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937年重印。

《陈丐女守贞》,《清稗类钞》23,《贞烈类》,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33—34。

《陈惠贞不愿为娼而死》,《清稗类钞》,85。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晋石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张文玲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

陈平原、夏晓虹,《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陈撷芬,《记务本女学堂》,《女报》4(1902);《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598—599。

陈撷芬(楚南女子),《世界十女杰演绎》,《女学报》4(1903年11月),55—58。

陈衍,《列女传集注凡例》,载萧道管《列女传集注》,1a—2a。1907年后出版。

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江苏》(1903年6月),155—156[0585—86]。

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女报》1:2(190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681—83。

陈以益,《女论》,《女报》增刊(1909年8月),1—29。

《程太夫人之耐贫》,《图画日报》20(1909年9月4日),3[1:231]。

《创设留学女子速成师范于东京》,《时报》(1905年2月26日)。

《创设万国红十字看护妇队者奈挺格尔夫人传》,《中国新女界杂志》1,2(1907年2月5日,3月5日),59—64,71—74。

楚北英雄,《支那女权愤言》,《湖北学生界》2(1903年2月27日),95—96[268—270]。

戴礼,《女小学》。北京:北京虎坊桥京华印书局,1908。

《道听途说》,《新民丛报》(1902年3月10日)。

《大同世界之男女》,《图画日报》66(1909年10月20日)。

丁初我,《女子世界颂词》,《女子世界》1(1904年1月)。

定宜庄,《清代妇女与两性关系》,载杜芳琴编,《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350—41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定宜庄,《贞节、个性与才干:清朝入关后满族妇女的变化和特点》,载张晓等编,《社会性别民族社区发展研究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董家遵,《历代节烈妇女的统计》(1937);《守节在家缠足及其他——中国古代妇女生活面面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10—116,1990。

董寿,《兴女学议》,《女报》5,(1902年9月2日),4—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570—572。

《东洋女权扩张》,《湖北学生界》2(1903年5月27日),99[273]。

- 杜成淑,《慈悲慈悲》。《女子世界》(1906年1月后),119—120。
- 《鄂抚端午帅劝妇女勿再缠足说》,《顺天时报》(1902年5月27日)。
- 《二奇女守一全贞》,《清稗类钞》,6。
- 方城,《详记外城女学传习所八大特色》,《顺天时报》(1906年12月25,26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1127—1130。
- 方汉奇,《近代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中国记者》6(1987),19—21。
- 方君笄,《兴女学以复女权说》,《江苏》3(1903年6月25日),157[587]。
- 方洵生,《女子国文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 《方太恭人率三女投江》,《清稗类钞》,68。
- 房兆楹编,《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名录初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冯自由,《女医士张竹君》,载《革命逸史》2;《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1375—1379。
- 佛群,《女学校》,《中国新女界杂志》3(1907年4月5日),137—140。
- 佛群,《兴女学说》,《中国新女界杂志》3(1907年4月5日),11—14。
- 傅熊湘编,《醴陵乡土志》。(重印)台北:正文出版社,1975。
- 《妇女投河》,《笑林报》(1907年7月2日)。
- 《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图画日报》104,7[3:43]。
- 《〈妇女杂志〉研究专号》,《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2(2004)。
- 高风谦、蔡元培、张元济,《最新修身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
- 高风谦、蔡元培、张元济,《最新修身教科书教授法》(第二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
- 《割肉医夫》,《北京女报》(1906年8月25日)。
- 龚圆常,《男女平权说》。《江苏》4(1903年7月25日),145[763]。
- 《共爱会同人劝留学启》,《江苏》6(1903年9月21日),159—161[1147—1149]。
- 《工部主事刘擢学物要端折》,《南洋官报》54(1906);《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587—588。
- 广展云、广翼云、陈与新,《最新妇女国文读本》,福州:教育普及社,1908。
- 《光绪三十三年分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649—650。
- 归庄,《书顾贞女传后》,载《归庄集》,1:30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闺范可风》,《顺天时报》(1904年8月15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150—151。
- 会稽金国书稿,《戒缠足诗》。《女学报》2:4(1903年11月),52—53。
- 郭延礼编,《秋瑾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 郭长海、李亚彬编,《秋瑾事迹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韩明华、徐玉珍,《女子白话报》,载《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4,333—340。
- 《韩世忠》,载脱脱编,《新校本宋史并附编三种》,364;列传 123;《中国学术类编》,11355—73。台北:鼎文书局,1990。
- 韩锡锋编,《知见存本蒙学书目》,见《中华蒙学集成》,2083—2098。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 《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士为兴女学殉身节略》,《时报》(1905年1月13日)。
- 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高岩译,载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166—192。
-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苏》4(1903年6月25日),144[762]。
- 何香凝,《我的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1:12—5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 何震[震述],《女子复仇论》,《天义》3(1907年7月10日),7—23。
- 何震,《〈秋瑾诗词〉后序》,载王芷馥,《秋瑾诗词》。东京,1907;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342—343。
- 《洪太夫人教子成名》,《图画日报》8(1909年8月23日),3[1:87]。
- 胡彬夏,《复杨君白民论美国女子职业书》,《教育杂志》1:6(1909年7月12日),19—34[487—502]。
- 胡彬夏,《胡女士彬夏演词于左》,《江苏》2(1903年5月27日),148—149[0380—0381]。
- 胡彬,《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江苏》3(1903年6月25日),156—157[0586—0587]。
- 胡发贵,《清代贞节观念述论》,载《清史研究集》,7:153—7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所,1990。
- 胡晓真,《文苑,多罗与华发——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的观念与实践》,《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2(2004年12月),169—193。
- 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5:1(1918年7月15日),5—14。
-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 胡玉缙,《甲辰东游日记》,实藤文库 no. 74,东京日比谷国立图书馆文献。
- 《花木兰第二》,《时报》(1910年1月4日)。
- 怀馨,《以身殉足》,《中国新女界杂志》5(1907年6月5日),125—129。
- 《淮徐海留沪学界公推调查员李堉报告书》,《申报》(1907年7月22日)。
- 黄第,《咏历代女将》,《顺天时报》(1911年5月5日)。
-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黄菱舫,《黄菱舫女士女界钟叙》,《江苏》(1903年8月23日),132—133[942—43]。

黄沫,《大陆》,《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2,115—144。

《话说〈渴望〉》,《上海文论》26(1991:2),2—15。

《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张镁绪、杨度译,载《湖南游学译编》1(1901年11月12日),9—1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37—41。

《湖北不缠足会附设第一幼女学堂章程》,《教育丛书》4:2(1904),1。

《绘图列女传》,知不足斋藏版,1779;台北:正中书局,1971。

《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申报》(1905年12月30日)。

《惠兴女士殉学记》,《东方杂志》3:5(1906年6月16日),103—104。

《湖南女学废闭之原因》,《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6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652—653。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世界十二女杰》,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

乾姆爱兰西(James, Alice R.),《女子体操教科书》,蔡允译,上海:科学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1906。

《记东京实践女学校中国女学生卒業式》,《时报》(1906年8月5日)。

《记京师第一蒙养院》,1—4。《顺天时报》(1908年1月13—16日)。

《纪留学女士之谈话》,《顺天时报》(1906年10月6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1269。

《记上海女中学堂开第一次女界保路会》,《时报》(1907年11月12日)。

《记山阴秋瑾女士》,《顺天时报》(1907年3月24日)。

江东,《记杭州放足会》,《浙江潮》2(1903年3月18日),173—178。

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载张静庐编《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6:138—45。

姜纬堂、刘宁元编,《北京妇女报刊考,1905—1949》,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蒋智由,《爱国女学校开校演说》,《女报》(1902年12月),1a—4b。

蒋智由,《五月花》,《新民丛报》12(1902年7月),8—10。

《江苏教育总会致江督端午帅书》,《申报》(1907年7月22日)。

《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1912年12月2日);《学制演变》,载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669—676。

《戒缠足说》,《湘报类纂》(无日期,大约1896—98年);《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500—501。

《节妇发》,《图画日报》261:6(1910年3月28日)[5:190]。

《节妇因逼醮自杀》,《时报》(1910年2月2日)。

《结婚新法》，《顺天时报》(1905年7月8日)。

陈正谏，《简介近代亚洲的“良妻贤母”思想——从回顾日本，韩国，中国的研究成果谈起》，《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0(2002年12月)，200—219。

晋石，《出版说明》，载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1—3。

金绶熙等，《咏历代女将》，《顺天时报》(1911年5月4—17日)。

金天翻，《女界钟》，陈雁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金天翻[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女子世界》1(1904年1月)，6—8。

巾侠，《女德论》，《中国新女界杂志》1(1907年2月5日)，7—17。

竞厂，《咏世界十二女杰》，《女子世界》3(1904年3月)，2—4[62—64]。

经元善，《劝女子读书说》，载《居易初集》(1899)，1：39—40；《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2，882。

经元善，《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载《居易初集》(1899)，1：19—20；《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2，881—882。

《旌表烈女》，《顺天时报》(1906年2月27日)。

《敬告女界意见书》，《时报》(1907年11月16日)。

竞群，《遗愤三首》，《中国新女界杂志》2(1907年3月5日)，107—108。

《巾帼须眉传》。上海：会文堂书局，190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

《巾帼之杰》，《顺天时报》(1904年12月16日)。

《雋不疑母》，《北京女报》(1908年6月20日)。

康同薇，《女学利弊说》，《知新报》52(1898年5月11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2，876—80。

《看护妇》，《北京女报》(1906年2月21,22)。

孔菁慧，《风雨自由魂·秋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孔雀东南飞》，载朱东润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1：1，877—8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幸得秋水，《妇人与政治》，《天义》3(1907年7月10日)，47—50。

幸得秋水，《幸得秋水来函》，《天义》3(1907年7月10日)，51—52。

匡珊吉，《女学报》，载《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3，75—78。

蓝鼎元，《女学》，大约1712年初版；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雷良波、陈阳风、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

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李俊岭，《留日女学会杂志》，《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3，682—688。

李潜之，《清画家诗史》，《清代传记丛刊·艺麟类》，075—077；12。台北：明文书局，1985。

《李闰自刭殉夫》，《清稗类钞》80。

《李太夫人之胎教》，《图画日报》22(1909年9月6日)，3[1：255]。

李小江,《世纪末看“第二性”》,《读书》12(1999),98—103。

李又宁,《辛亥革命先进方君瑛女士》,《传记文学》38:5(1981年5月),16—19。

李又宁,《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创刊及内涵:中国新女界杂志重刊序》,载李又宁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1:179—241。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

《李自成 张献忠》,载张廷玉编《新校本明史并附编六种》,359:列传 197(流贼);《中国学术类编》,7948—77。台北:鼎文书局,1990。

梁启超,《变法通议》,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1,1—92。

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1,119—20。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6:12,1—14。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1,100—103。

梁启超,《论女学》,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1,37—44;《中国近代学制史料》,869—875。

梁启超,《新民说》,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6:4,91—16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联军劫掠纪闻》,《清议报》62(1900年11月2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3952—3953]。

廖秀真,《清末女学在学制上的演进及女子小学教育的发展,1897—1911》,载李又宁、张玉法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2:203—255。台北:商务出版社,1992。

《烈妇含悲殉夫终七》,《图画日报》297,7[6:563]。

《烈妇殉节》,《时报》(1910年5月9日)。

林炳章,《癸卯东游日记》,《实藤文库》no. 67,东京日比谷国立图书馆文献。

林树明,《现代学者的三位女性文学史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2003),257—265。

林荫湘,《序》,载许定一(咀雪子),《祖国女界文豪谱》,2a—2b。北京:京华印书馆,1909。

林宗素,《林女士宗素女界钟叙》,《江苏》5(1903年8月23日),131—132[941—42]。

凌惕安编,《陈康祺》,载周骏富编《清代贵州明贤像传》,12—13卷。台北:明文书局,1985。

灵希,《美国大教育家黎痕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2(1907年3月5日),65—70。

灵希,《美国大新闻家阿索里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1(1907年2月5日),65—72。

《刘巧妇守贞抚子》,《清稗类钞》,31—33。

刘赓藻译,《无冠女帝维纳德》,《新译界》2(1906年12月16日);《近代中国女权

运动史料》1,341—346。

刘华庭,《记清末大型画报〈图画日报〉》,《出版史料》1(1988),95—96。

刘慧英,《20世纪初中国女权启蒙中的救国女子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2002),156—179。

刘纪华,《中国贞节观念的历史演变》(1937);载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4,101—30。

刘巨才,《女报》,《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3,501—510。

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5。

柳亚子[亚庐],《哀女界》,《女子世界》9(1904年9月),1—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577—581。

柳亚子[亚特],《论铸造国民母》,《女子世界》7(1904年7月),1—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573—577。

柳亚子[亚庐],《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女子世界》3(1904年3月),25—32[199—206]。

柳亚子[潘小璜],《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女子世界》7(1904年7月),19—24。

刘咏聪,《清初四朝女性才命观管窥》,载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3,121—162。

《留学记录》,《湖北学生界》4(1903年4月27日),125[0575]。

罗久蓉、吕妙芬编,《无声之声(III):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良妻贤母主义的论争》,《中国近代史》12(1995),15—21。

鲁迅,《鲁迅杂文全集》。北京:九州图书,1995。

鲁迅,《我之节烈观》,《新青年》5:2,(1918年8月15日),92—101。

陆费伯鸿,《论中国教科书史书》,载张静庐编,《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1:212—14。

《论家庭教育》,《汉声》6(1903年7月24日),43—47[797—801]。

《论刘阎和两妇》,《北京女报》(1908年5月13日)。

《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东方杂志》4:7(1907年7月),131—132。

《论女学宜注重德育》,《东方杂志》3:6(1906年7月),118—124。

《论上海女学生之装束》,《妇女时报》(1913年10月20日),12—13。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罗兰夫人》,《图画日报》115(1909年12月8日),3[3:171]。

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载《马君武集》,1—3。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冒充女学生之荒诞》，《图画日报》27(1909年9月11日)，[1,319]。
-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载狭间直树。
- 梅铸，《法国救亡女杰若安传》，《中国新女界杂志》3(1907年4月5日)，53—82。
- 缪荃孙，《续碑传记》，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卷91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 闵尔昌，《碑传记补》，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卷100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 《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时报》(1907年8月10日)。
- 木兰同乡，《恭贺新年》，《中国新女界杂志》2(1907年3月5日)，27—33。
- 中村忠行，《秋瑾杂俎》，高岩译，载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243—249。
- 成瀬仁藏，《女子教育论》，杨廷栋、周祖培译，上海：作新译书局。
- 《女学界之怪现状》，《时报》(1910年11月21日)。
- 《女学生上振贝子书》，《湖北学生界》5(1903年5月27日)，136—138[728—730]。
- 《女学生投缳》，《清稗类钞》，85—86。
- 《女学生应有准服制》，《时报》(1906年8月18日)。
- 《女学士》，《时报》(1910年8月18日)。
- 《女贞子传》，《采风报》(1898年7月13日)。
- 《女界保路会传单》，《时报》(1907年11月3日)。
- 《女界进步之前导》，《女学报》2:2(1903年4月12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521—523(重印时年代误作1907年)。
- 《女界新闻》，《北京女报》(1906年7月9日)。
- 《女士杜清池第四次演说稿》，《顺天时报》(1902年11月25日)。
- 《女士放足被逼毙命骇闻》，《申报》(1907年6月14日)。
- 《女学渐兴》，《时报》(1904年7月11日)。
- 《女中之杰》，《顺天时报》(1904年10月22日)。
- 《女子出洋：新班本》，《顺天时报》(1907年2月26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1271—72。
- 《女子为国民之母》，《顺天时报》(1905年7月19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606—08。
- 欧宁，《大栅栏计划：穿越城市腹地》，www.dazhalan-project.org/press-cn/pressoio.htm。
- 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载《中国妇女史论集》1,346—382。
- 鲍家麟，《宋恕的妇女思想》，载《中国妇女史论集》3,163—182。
- 佩公，《男女平等的必要》，《中国新女界杂志》2,35—44。

佩公,《男女平等的真理》,《中国新女界杂志》1(1907年2月5日),29—40。

彭玉麟、殷家雋,《湖南省衡阳县志三》(1872);《中国方志丛书华东地方第一—三三》。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钱大昕,《答问五》、《方节妇传》、《夏烈女传》。载《钱研堂文集》,8,93—106;40:633—34,634—35。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

钱南秀,《清季女作家薛绍徽及其〈外国列女传〉》,《文学评论丛刊》4:1(2001),102—26。

钱文彬,《咏历代女将》,《顺天时报》(1911年5月11日)。

钱塘主人(鉴塘,颜希源)编,《百美新咏图传》,前言记录日期为1787—1790;台北:广文书局,1970。

潜诸,《读世界十女杰》,《女子世界》10(无日期),77—78[933—934]。

《谯国夫人》,载魏征编《新校本隋书附索引》,80:列传45;《中国学术类编》,1800—3。台北:鼎文书局,1990。

《请定女学生制服》、《女界新闻》,《北京女报》(1906年8月9日)。

《请禁女学》,《笑林报》(1907年9月8日)。

清江徐珊,《木兰辞》,《妇女时报》2(1911年7月10日),74。

秋瑾,《敬告姐妹们》,《中国女报》1;秋瑾,《秋瑾先烈文集》,142—145。

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秋瑾,《秋瑾先烈文集》,133—135。

秋瑾(鉴湖女侠秋瑾),《看护学教程》,《中国女报》1(1907年1月14日),23—31;2(1907年3月4日),17—26。

秋瑾,《精卫石》,载秋瑾,《秋瑾集》,117—160。

秋瑾(鉴湖女侠),《勉女权》,《中国女报》2(1907年3月4日),47。

秋瑾,《秋瑾集》。香港:长风图书公司,1974。

秋瑾,《秋瑾先烈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

秋瑾,《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秋瑾,《秋瑾集》,9—10。

秋瑾,《演说的好处》,载秋瑾,《秋瑾先烈文集》,141—142。

秋柳,《模范之女学生》,《时报》(1910年12月13日)。

荣旃,《美国小说家爱里阿脱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4(1907年5月5日),51—55。

全汉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岭南学报》3:2(1935),57—102。

《日本大阪博览会中国福建出品移出台湾馆始末记》,《江苏》1(1903年4月27日),146—147[164—165]。

《日本东亚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章程》,《东方杂志》2:6(1905年7月27日),145—148。

《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章程》,《浙江潮》3(1903年4月17日),166—69;《江

苏》2(1903年5月27日),155—157[0387—0389]。

《日本女社会党记》,《民立报》(1910年11月20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305—306。

《日妇任教习》,《警钟日报》(1904年5月22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293—294。

荣庆、张百熙、张之洞,《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1904年1月13日;《学制演变》,393—396。

《阮夫人湛深经史》,《图画日报》2(1909年8月17日)[1:15]。

《三城女学传习所开学》,《顺天时报》(1909年9月3,4,5,7);《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1190—94。

三多,《记惠兴女杰为学殉身事》,《大公报》(1906年3月14日)。

实藤惠秀、谭汝谦、小川博,《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

桑兵,《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近代史研究》3(1996),259—275。

善哉,《妇女同性之爱情》,《妇女时报》7(1911年6月),36—38。

《上海妇女之新妆束》,《妇女时报》1(1911年5月13日),54。

《上海女学校长致江苏总学会函》,《时报》(1906年6月9日)。

《上海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开学记略》,《直隶教育杂志》12(1908),106;《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720—721。

《介绍批评》,《教育杂志》1.2(1909年3月16日),7[175]。

《设立贞节堂续闻》,《顺天时报》(1905年3月24日)。

《沈夫人佐守广信城》,《图画日报》4(1909年8月19日),[1:39]。

《沈将军勇夺父尸》,《图画日报》14(1909年8月29日),[1:159]。

《新学书目提要》,上海:通雅书局,1904—1905。

《沈仲礼观察上端午帅禀》,《申报》(1907年6月27日)。

《申论学界报界开会追悼惠兴女杰为调和满汉界限助动力》,《顺天时报》(1906年2月9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1451—1453。

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施淑仪,《对于烈妇殉夫之感言》,《妇女杂志》1:8(1915年8月),6。

《世界十女杰》,无日期,1903。

《世界十女杰》,《苏报》(1903年6月12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820。

《示禁女学》,《顺天时报》(1903年6月11日)。

下田歌子,《欧米诸国女子之体育》,《江苏》1(1903年4月27日),90—92 [1016—1018]。

白井规矩郎,《原序》,载乾姆爱兰西,1a—2b。

瘦鹃,《美国女教育家丽痕女士逸话》,《妇女时报》3(1911年5月13日),

47—49。

《守贞说》，《笑林报》(1903年1月2日)，1。

蜀郭必编，《妇女壮烈谈》，《醒狮》3，无日期；《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339。

《述教育中国妇女事》，《顺天时报》(1906年1月12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1270。

《书场与学堂之关系》，《图画日报》130(1909年12月23日)[3:358]。

《顺天府通州绅民公议天足社启》，《顺天时报》，1904年12月17日。

《四忠女传》，《东方杂志》6:8(1910)，49—51。

《四川女学堂学生中国妇人会书记杜成淑答译学馆学生屈疆密书》，《大公报》(1907年2月27日)。

宋恕，《变通篇·开化章第四》，《六斋卑议》18—1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2，865。

宋原放、孙颢，《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孙清如，《论女学》，《中国新女界杂志》2(1907年3月5日)，1—10。

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

太公，《东京杂事诗》，《浙江潮》2(1903年3月18日)，161—165。

《谭烈妇传》，《清议报》(转载自《天津国闻报》)4(1899年4月10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01—602]。

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1936)；《民国丛书》，2:18。上海：上海书店，1990。

谭训聪，《谭嗣同夫人事略：为先祖母李太恭人殉夫一事辨正》，《艺文志》30，(1968年3月)，21—22。

谭训聪，《先祖母(谭嗣同夫人)家传》，《湖南文献季刊》6—7(1972年10月)，122。

《天足会沈仲礼观察致宋敦甫观察书》，《申报》(1907年7月31日)。

桐乡徐雪华，《读木兰辞书后》，《妇女时报》1(1911年5月13日)，82。

《同邑杨女士序》，载金天翮，《女界钟》，6—7。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大陆讲学、问难和讨论》，台北：联经出版实业公司，1989。

娲魂，《补天石卷之一》，《中国新女界杂志》2(1907年3月5日)，149—156；3(1907年4月5日)，161—174。

王灿之，《秋瑾女侠遗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29。

王德威，《贾宝玉也是留学生——晚清的留学生小说》，载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国小说》，229—36。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3。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汪节母楼居守贞》，《图画日报》18(1909年9月2日)，3[1:207]。

王莲,《同乡会纪事:湖北之部》,《湖北学生界》2(1903年2月),113—116 [0287—0290]。

王莲,《杂感七首》,《湖北学生界》1(1903年1月29日),105—106 [0115—0116]。

王奇生,《从深闺走向世界的女子留学生》,《明报月刊》9(1993年9月),31—33。

王时泽,《回忆秋瑾》,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4:223—232。北京:中华书局,1982。

汪应焜,《咏历代女将》,《顺天时报》(1911年5月9日)。

王应麟,《三字经》,李牧华注,台北:大化出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无日期。

汪兆镛,《碑传集三编》,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卷730。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汪振迭,《前言》,载汪振迭编,魏息园《不用刑判决书故事选》,1—7。山西:群众出版社,1987。

畏公,《论女子劳动问题》,《天义》5(1907年8月10日),71—80。

魏息园,《不用刑判决书故事选》,汪振迭编,山西:群众出版社,1987。

《文明结婚》,《顺天时报》(1905年8月23日,9月10,13日)。

《武烈女以不愿改适自缢》,《清稗类钞》,86—87。

吴若安,载吴若安口述,夏世铎整理《吴若安回忆上海务本女塾》,1986;《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602—609。

吴士鉴等,《清宫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吴涛编,《女子师范修身学》,北京:北京第一书局,1907。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载张静庐编,《教科书之发刊概况》,6:149—160。

吴友如,《古今百美图》,载《吴友如画宝》,1908;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2:1,2。

吴芝瑛,《记秋瑾女侠遗事》;秋瑾,《秋瑾集》,185—186。

《务本女塾及幼稚舍运动会记》,《时报》(1905年11月13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590—594。

《务本女塾增设初等高等女子小学规则》,《直隶教育杂志》1:17,48—4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594—595。

《务本女学校第二次改良规则》,《直隶教育杂志》1:17,35—4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590—594。

《夏氏女惧辱投水》,《清稗类钞》,37。

夏晓虹,《古典新义:晚清人对经典的解说——以班昭与〈女戒〉为中心》,《中国学术》3(2000),82—103。

夏晓虹,《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载夏晓虹《晚清社会与文化》,武汉:湖北

教育出版社,2000。

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10:3(2006),17—45。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夏晓虹,《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载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223—25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夏晓虹,《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学人》10(1996年9月),429—469。

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夏晓虹,《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上海“中国女学堂”考述》,载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3—37。

《相国注重女学教科书》,《教育杂志》1.4(1909年7月12日),37[477]。

《香山女学校试办简章》,《女子世界》7(1904年7月),74。

萧道管,《列女传集注》,无日期,前言日期为1892年,出版于1907年后。

彼驪,《论女界医学之关系》,《中国新女界杂志》1(1907年2月5日),19—27。

《孝女殉母》,《顺天时报》(1906年6月9日)。

谢允燮,《初等小学女子修身教科书》,上海:中国教育改良会,1906。

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近代史研究》2:96(1995),272—279。

《新书介绍》,《东方杂志》1:2(1904年4月10日),3[223]。

熊月之,《大众文化云蒸霞蔚》,载熊月之编,《上海通史》第六卷,晚清文化,479—52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熊月之,《中国新女界》,载《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565—577。

徐白等,《河北省通县志要》,1941,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136;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徐楚影,《妇女时报》,载《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5,150—158。

徐楚影、陈新段,《妇女杂志》,载《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5,351—361。

许定一(咀雪子),《祖国女界文豪谱》,北京:京华印书馆,1909。

徐辉琪、刘巨才、徐玉珍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许家惺,《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上海:群学社,1996。

徐双韵,《记秋瑾》,载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205—222。

徐兴无,《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与梁端〈列女传校读本〉》,载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916—93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461—473。

徐玉珍,《女子世界》,载《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461—473。

徐自华,《徐自华诗文集》,郭延礼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

薛绍徽、陈寿彭,《外国列女传》,南京:金陵江楚编译总局,1906。

《学部审定孙女士呈书》，《教育杂志》1:10(1909年11月7日)，72—73 [852—853]。

《学部慎重女生游学》，《教育杂志》2.8(1910年9月13日)，64。

《学部奏遵拟女学服色章程折》，《时报》(1910年1月26日)。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载《大清光绪法令》13:35—40(1907年3月8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666—674。

《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载《大清光绪法令》13:40—47(1907年3月8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657—666。

《学生轻薄被革》，《顺天时报》(1907年2月26日)。

《荀崧小女灌》，载房玄龄编《新校本晋书并附编六种》，96:列传616；《中国学术类编》，2515。台北：鼎文书局，1990。

燕斌(炼石)，《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1(1907年2月5日)，41—50。

燕斌，《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2(1907年3月5日)，11—20；3(1907年4月5日)，15—20。

燕斌，《发刊词》，《中国新女界杂志》1(1907年2月5日)，1—3。

燕斌，《留日女学学界近事记》，《中国新女界杂志》2,(1907年3月5日)，83—86；3(1907年4月5日)，83—99。

燕斌，《罗瑛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5(1907年6月5日)，51—54。

燕斌，《日本妇人之政治运动》，《中国新女界杂志》2(1907年3月5日)，105—106。

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堂》，载《晚清文选》(1898)，695—69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2,880—881。

严复，《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颜太夫人发仓票赈饥》，《图画日报》6(1909年8月21日)，3[1:63]。

颜希源(鉴塘主人)编，王翮图，《百美新咏图传》，自序日期为1787,1790；北京：中国书店，1998。

《杨令酷刑烈女之惨毒》，《时报》(1910年4月3日)。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上海：文明书局，1905。

杨千里，《女子新读本导言》，《女子世界》8(1904年8月)，81—83[759—761]。

《演说扶兰志斯》，《北京女报》(1908年5月2,3日,12月12,13日)。

《演说王立才通信订婚法》，《顺天时报》(1906年2月21日)。

叶浩吾，《爱国女学校伦理教习叶浩吾君讲议》，《警钟日报》(1904年4月21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624—626。

叶中冷编，蒋维乔辑，《女子新唱歌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忆琴，《论中国女子之前途》，《江苏》4(1903年7月25日)，141—143[759—

761]。

忆琴,《论中国女子之前途续》,《江苏》5(1903年8月23日),129—131 [939—941]。

易宗夔,《新世说》,1918;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乾慧译,智度记,《女学报》2:4(1903年11月),37—41。

勇立,《兴女学议》,《东方杂志》3:13(1907年2月7日),241—244。

奥谢野晶子,《贞操论》,周作人译,《新青年》(1918年5月18日),386—394。

吉村寅太郎,《日本现时教育》,罗振常译,《教育丛书》3(1903),1—22。

《育贤女工艺学堂改名迁地》,《时报》(1905年1月2日)。

俞正燮,《节妇说》,载《癸巳类稿》,13:493—494,494—495。台北:世界书局,1966。

《冤乎烈女大老爷未免狠心》,《图画日报》216(1910年3月31日)[5:227]。

袁骥孙,《咏历代女将》,《顺天时报》(1911年5月6日)。

《载记》,载房玄龄《新校本晋书并附编六种》,110.;《中国学术类编》,2846。台北:鼎文书局,1990。

《在日中国留学生其一》,《顺天时报》(1905年7月21,22,23);《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1254—1257。

曾福谦,《咏历代女将》,《顺天时报》(1911年5月13日)。

曾启球,《先驱唐群英的晚年生活》,《纵横》8(1998),27—28。

曾懿,《女学篇》,长沙:无出版商,1907。

张百熙,《序》,载曾懿,2a—3a。

张汉英(汉英)《题赠湖南留学生监督陈公小照四首》,《中国新女界杂志》1,90。

张敬注译,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变身委员会编《列女传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

张静庐,《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载张静庐编《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1:219—253。

张静庐编,《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章授,《翰林院检封章授谨呈为代进女小学四卷恭请》,载代理,1a—2a。

张文玲,《前言》,载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1—2。

章学诚,《妇学》,载张潮编《昭代丛书》,63:1—10。无出版地。世楷堂刊本,1876。

章义和、陈春雷,《贞节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张之洞,《札学务处办敬节育婴学堂》,载《张文襄公全集》,公牍,卷25。北京:楚学精庐,1937。

张竹君,《张竹君在爱国女学校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5月2—3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620—622。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 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台北:稻香出版社,1993。
- 《贞妇手》,《图画日报》216(1910年3月28日)[5:191]。
- 郑云山、龚延明、林正秋,《杭州与西湖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贞节可风》,《顺天时报》(1903年3月5日,1903年3月6日重印),4。
- 志达,《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5(1907年8月10日),95—97。
- 《致南洋劝业会研究会书》,《时报》(1910年8月5日)。
- 《直隶创办天足会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4(1907年5月5日),29—40。
- 《直隶女学堂罢学始末记》,《女报》3(1909):12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2,717—718。
- 《支那女子之爱国心》,《湖北学生界》3(1903年3月29日),65—67[0383—0385]。
-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目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84。
- 《中国留东女学生》,《顺天时报》(1905年8月4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1266—1268。
- 《中国留学女生毕业》,《顺天时报》(1907年4月11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2,1272—1273。
- 《中国女留学生之调查》,《时报》(1905年7月31日)。
- 《中国女杰大义勇家淳于缙縈小传》,《顺天时报》(1907年4月18日)。
-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列强侵略》,台北:中华民国开过五十年文献编撰委员会,1965。
-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秋瑾史迹》,北京:中华书局,1958。
- 《中外新列女传》,《图画日报》2,4,6,8,12,14,16,18,20,22,25(1909年4月17,19,21,23,27,29,31日,9月2,4,6,9日)。
- 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台北:中华文化大学出版社,1982。
- 周春英,《漆室女忧鲁说》,《女报》2(1909)。
- 周动,《感木兰从军》,《妇女时报》21(1917年3月),99。
- 周汉光,《清末的女子教育》,《中国历史学会集刊》18(1986),241—269。
- 周婉窈,《清代桐城学者与妇女的极端道德行为》,载《中国妇女史论集》4,185—251。
- 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历史研究》202(1989,6),49—64。
- 朱点衣,《咏历代女将》,《顺天时报》(1911年5月7日)。
- 《祝共爱会之前途》,《江苏》6(1903年9月21日),162—63[1150—1151]。
- 朱惠贞,《漆室女》,《妇女时报》2(1911年7月10日)。
- 《朱烈妇杀寇而死》,《清稗类钞》,68。
- 朱绶,《东游纪程》,1899。实藤文库 no. 35,东京日比谷国立图书馆文献。
- 《朱秀姑以死报未婚夫》,《清稗类钞》,67—68。

转坤,《世界古今妇人待遇论“续第二期”》,《中国新女界杂志》3(1907年4月5日),31—38。

子毅,《女杰郭耳纒》,《国民日日报汇编》3;《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337—338。

《咨查女学唱歌》,《顺天时报》(1907年4月28日)。

《子发之母》,《北京女报》(1907年5月2日)。

《奏请旌表惠兴女士》,《大公报》(1906年7月13日)。

《奏为皖省节烈妇女人祠折》,《顺天时报》(1907年2月21日)。



参考书目 (外文部分)

Abe Hiroshi 阿部洋. *Chūgoku no kindai kyōiku to Meiji Nihon* 中國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and Meiji Japan). Tokyo: Fukumura shuppan kabushiki gaisha, 1990.

——. ed. *Nit-Chū kyōiku bunka kōryū to masatsu: Senzen Nihon no zai-Ka kyōiku jigyo* 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 戦前日本の在華教育事業 (Sino-Japanes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nflict: Japanes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prewar China). Tokyo: Daiichi shobō, 1983.

Allen, Joseph R. "Dressing and Undressing the Chinese Woman Warrior."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4:2 (Fall 1996), 343 - 79.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83.

Asakura Kaseki 朝倉禾積, ed. *Fukkoku joketsu Joan jitsuden: Jiyū no shinka* 仏國女傑如安実伝—自由の新花 (A true biography of the French heroine Joan: A new flower of freedom). Tokyo: Chōbōdō, 1886.

Bailey, Paul. *Reform the People: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Popular Educat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0.

——. "Unharnessed Fillies': Discourse on the 'Modern' Female Stud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 Lo Jiu-jiung and Lu Miaow-fen, 327 - 57.

Barlow, Tani E. "International Feminism of the Future. : Signs 25:4 (Summer 2000), 1099 - 1105.

——.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Barmé,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Beahan, Charlotte L.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 1902 - 1911." *Modern China* 1:4(Oct. 1975), 379 - 416.

Bender, John, and David E. Wellbery. "Introduction." In *Chronotypes: The Construction of Time*, ed. John Bender and David E. Wellbery, 1 - 1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Benjamin, Walter,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4, 1938 - 1940*, trans. Edmund Jephcott et al., ed.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 Jennings, 389 - 400.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ed. Peter Demetz, 146 - 62.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6.

Benveniste, Emil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Mary Elizabeth Meek.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Birrel, Anne, trans. "A Peacock Southeast Flew." In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ed. Victor Mair, 462 - 7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Boorman, Howard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4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70.

Booth, Marilyn. "The Egyptian Lives of Jeanne d'Arc." In *Remaking Women: Feminis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ed. Lila Abu-Lughod, 171 - 21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ay Her Likes Be Multiplied: Biography and Gender Politics in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May Her Likes Be Multiplied: 'Famous Women' Biography and Gendered Prescription in Egypt, 1892 - 1935." *Signs* 22:4(1997), 827 - 90.

Bossler, Beverly. "Final Instructions by Yang Jisheng." In *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 ed. Susan Mann and Yu-yin Cheng, 119 - 3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Bourdieu, Pierre.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rans.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ed.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sculine Domination*. Trans. Richard N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Eng.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Bray, Francesca.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Buck, David 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sinan, 1899 - 1937." In *Th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ed. Mark Elvin and G. W. Skinner, 171 - 21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Buck-Morss, Susan.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Burton, Antoinette. *Burdens of History: British Feminists, Indian Women, and Imperial Culture, 1865 - 191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Bynum, Carolyn. "Women's Stories, Women's Symbols: A Critique of Victor Turner's Theory of Liminality." In *Fragmentation and Redemption: Essays on Gender and the Human Body in Medieval Religion*, 27 - 51. New York: Zone Books, 1992.

Cahill, James. "Passages of Felt Life: A Genre Shift in Ming-Qing Figure Painting." Unpublished paper.

Calhoun, Craig. *Nationalism*. Buckingham, Eng. :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rlitz, Katherine. "The Daughter, the Singing-Girl, and the Seduction of Suicide." In Ropp, Zamperini, and Zurndorfer, 22 - 46.

——. "Desire and Writing in the Late Ming Play 'Parrot Island.'" In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100 - 13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ixed Messages in Late Ming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Exemplary Women in Texts and Contexts: The Lienü Tradition from Yuan to Late Qing,"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a Colloquium,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CLA, Feb. 2001.

——. "Shrines, Governing-Class Identity and the Cult of Widow Fidelity in Mid-Ming Jiangn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3 (Aug. 1997), 612 - 40.

——. "The Social Uses of Female Virtue in Late Ming Editions of the Lienü zhuan." *Late Imperial China* 12:2 (Dec. 1991), 117 - 52.

Chakrabarty, Dipesh. *Habitations of Modernity: Essays in the Wake of Subaltern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Chang, Kang-i Sun. "A Guide to Ming-Ch'ing Anthologies of Female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Gest Library Journal* 5:2 (1992), 119 - 60.

———. "Ming 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Talent' and 'Morality.'" In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Critiques*, ed. Theodore Hut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236 - 5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Women's Poetic Witnessing: Examples from the Late Ming and Late Qing." Unpublished paper.

Chang, Kang-i Sun and Haun Saussy,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ng So-an. "Murder, Suicide, and Ritual Orthodoxy: Evidential Studies in the 19th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 C. , Apr. 2002.

Chartier, Rog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Trans. Lydia G. Cochr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tterjee, Partha.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en Chi-yun. "Immanent Human Beings in Transcendent Tim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Pristine Chines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Huang Chun-Chieh and Henderson, 45 - 73.

Ch'en, Jero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ed. John King Fairbank, 505 - 2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en Shi-hsiang. "An Innovation in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Far Eastern Quarterly* 13 (Nov. 1953), 49 - 62.

Chen Yan'an 陳彥安. "Chū-Nichi Shina shō kōshi fujin yori no rajō" 駐日支那章公使婦人よりの來狀 (Letter from the wife of Chinese minister Zhang, resident in Japan). Jissen joshi daigaku toshokan, Shimoda Utako kankei shiryō, file no. 743 (1918).

Cheng, Eileen J. "Gendered Spectacles: Lu Xun on Gazing at Women and Other Pleas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6:1 (June 2004), 1 - 35.

———. "The Menacing Public Body: Qiu Jin's Troubling Gen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New York,

Mar. 2003.

Cheng Weikun. "The Challenge of the Actress: Female Performers and the Cultural Alternativ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 and Tianjin." *Modern China* 22:2 (Apr. 1996), 197 - 233.

——. "Going Public through Education: Female Reformers and Girls' Schools in Late Qing Beijing." *Late Imperial China* 21:1 (June 2000), 107 - 44.

Cheng, Yu-yin, trans. "Selected Writings by Luo Rufang (1515 - 1588)." In *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 ed. Susan Mann and Yu-yin Cheng, 102 - 1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Chow, Esther Ngan-ling. "Making Waves, Moving Mountains: Reflections on Beijing 95' and Beyond." *Signs* 22:1 (Autumn 1996), 185 - 92.

Chow, Kai-wing.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ow, Rey.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Cohen, Paul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Cong, Xiaoping. *Teachers' School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 1897 - 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Crossley, Pamela Kyle.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Dai, Jinhua. "Rewriting Chinese Women: Gender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Space in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 In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ed. Mayfair Mei-hui Yang, 191 - 20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Despeux, Catherine. "Bien débuter dans la vie: De l' education prénatale en Chine." In *Éducation et Instruction en Chine*, ed. Catherine Despeux and Christine Nguyen-Tri, vol. 1, 61 - 98. Paris: Peters, 2003.

Dikötter, Frank. *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Dillon, E. J. "The Chinese Wolf and the European Lamb." *Contemporary Review* 79 (Jan. -June 1901), 1 - 31.

Dooling, Amy D., and Kristina Torgeson, eds. *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Drucker, Alison 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Women on the Anti-Footbinding Movement, 1840 - 1911." In *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ed. Richard W. Guisso and Stanley Johannesen, 179 - 99. Youngstown, NY: Philo Press, 1981.

Du, Fangqin, and Susan Mann. "Competing Claims on Womanly Virtu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Women and Confucian Cultures in Premodern China, Korea, and Japan*, ed. Dorothy Ko, Jahyun Kim Haboush, and Joan R. Piggot, 219 - 4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Duara, Prasenjit.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Unger, 31 - 55.

———. "The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 and Pan-Asianis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2 (2001), 99 - 130.

———.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37:3 (1998), 287 - 308.

———.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Durrant, Stephen W.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Ebrey, Patricia Buckley, trans.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for Women Attributed to a Women Née Zheng (ca. 730)." In *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 ed. Susan Mann and Yu-yin Cheng, 47 - 6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dgren, Sören. "The *Ching-ying Hsiao-sheng* and Traditional Illustrated Biographies of Women." *Gest Library Journal: Special Issue, East Asian Women: Materials and Library Research* 5:2 (Winter 1992), 161 - 74.

Edwards, Louise P. *Men and Women in Qing China: Gender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 "Wom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Challenges to the Gender Narrative." In *Women in Asia: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ed. Louise Edwards and Mina Roces, 59 - 8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Elliott, Mark C. "Manchu Widows and Ethnicity in Qing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1:1 (Jan. 1999), 33 - 71.

Elman, 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soph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sia Center, 1990.

Elman, Benjamin A. , and Alexander Woodside. "Introduction."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 - 1900*, ed.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1 - 1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Elvin, Mark. "Female Virtue and the State in China." In Mark Elvin, *Another History: 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 302 - 51. Canberra: Wild Peony, 1996.

"An Evening with Ou Ning." www.moma.org/exhibitions/film_media/2006/MediaScope_2006.html.

Felski, Rita. *The Gender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Fogel, Joshua A. *Nakae Ushikichi in China: The Mourning of Spirit*.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

Fogel, Joshua A. , and Peter Zarrow, eds. *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 - 1920*.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Fong, Grace S.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or a Classical Woman of Modern China: The Challenging Trajectory of Lü Bicheng's (1883 - 1943) Life and Song Lyrics." In Fong, Qian, and Zurndorfer, 12 - 59.

———.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5:1 (June 2004), 1 - 58.

———. "Signifying Bodi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uicide Writings by Women in Ming-Qing China." In Ropp, Zamperini, and Zurndorfer, 105 - 42.

Fong, Grace S. , Nanxiu Qian, and Harriet Zurndorfer, eds. *Beyon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Gender, Genre, and Cosmopolitanism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4.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9.

——.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Vintage, 1988.

——.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 by H. Martin, Huck Gutman, and Patrick H. Hutt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Furth, Charlotte. "Concepts of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1 (1987), 7 - 35.

——.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 - 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The Patriarch's Legacy: Household Instruc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Orthodox Values." In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Kwang-Ching Liu, 187 - 2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Rethinking van Gulik: Sexuality and Reprodu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 Christina K. Gilmartin et al., 125 - 4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enetet, Gérard.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Trans. Channa Newman and Claude Doubinsk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ilmartin, Christina. "Gend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Women's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4 - 27."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 Christina K. Gilmartin et al., 195 - 22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oodman, Bryna, and Wendy Larson. "Introduction, Axes of Gender: Divisions of Labor and Spatial Separation." In *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ed. Bryna Goodman and Wendy Larson, 1 - 25.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Goodrich, L. Carrington,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 - 1644*.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Goossaert, Vincent. "1898: The Beginning or the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2 (May 2006), 307 - 35.

Gray, J. "Historic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otes on Its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In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ed.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186 - 21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Gross, David. *The Past in Ruins: Tradi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2.

Hall, Catherine, Jane Lewis, Keith McClelland, and Jane Rendall, eds. *Special Issue on Gender, Nationalism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Gender and History* 5:2 (Summer 1993).

Hanan, Patrick.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2 (Dec. 2000), 413 - 43.

Handlin, Joanna. "Lü Kun's New Audience: The Influence of Women's Literacy on Sixteenth-Century Thought." 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ed.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13 - 3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Harrel, Paula. *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 Chinese Students, Japanese Teachers, 1895 - 190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The Meiji 'New Woman' and China." In *Late 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ed. Joshua A. Fogel, 109 - 50. Norwalk, CT: EastBridge, 2004.

Hattori Shigeo 服部繁子. "Huiyi Qiu Jin nüshi" 回憶秋瑾女士 (Reminiscences of Qiu Jin). Trans. Gao Yan 高岩. In Guo Yanli, *Qiu Jin yanjiu ziliao*, 166 - 92.

———. "Shū Kin joshi no omoide" 秋瑾女子の思い出 (Reminiscences of Qiu Jin). *Tōzai kōshō 東西交渉* 1:1 (1982), 38 - 51.

HeXiangning. "When I Learned How to Cook." In *Chinese Women Through Chinese Eyes*, ed. Li Yu-ning, 133 - 43.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Henderson, John B.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sm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Hesse, Carla. *The Other Enlightenment: How French Women Became Moder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Hightower, James Robert. *Han Shih Wai Zhuan: Han Ying's Illustrations of the Didactic Applic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So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Hirano Hideo 平野日出雄. *Matsumoto Kamejirō den: Nit-Chū kyōiku no kakehashi* 松本龜二郎伝: 日中教育のかけ橋 (A biography of Matsumoto Kamejirō, a bridge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education). Tokyo: Nagata bunkadō, 1982.

Howland, Douglas R. *Translating the West: Language and Political Reas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Hsiung, Ping-chen.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Constructed Emotions: The Bond between Mothers and S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5:1 (1994), 87 - 117.

Hu Ying. "Naming the First 'New Woman'." In *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 ed. Rebecca E. Karl and Peter Zarrow, 180 - 2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8 - 191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Writing Qiu Jin's Life: Wu Zhiying and Her Family Learning." *Late Imperial China* 25:2 (Dec. 2004), 119 - 60.

Huang Chun-chieh. "'Time' and 'Super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In Huang Chun-chieh and Henderson, 19 - 41.

Huang Chun-chieh and John B. Henderson, eds. *Notions of 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Huang Fu-ch'ing.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rans. Katherine P. K. Whitaker. Tokyo: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82.

Huang, Pjilip C. C. *Code, Cumtom, and Legal Practice in China: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Compar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 - 1912)*. Rpt.,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Hunt, Lynn.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Huters, Theodore. *Br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Idema, Wilt, and Beata Grant, eds.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Iigura Shōhei 飯倉照平. "Pekin shūhō to Junten jihō" 北京週報と順天時報 (*Peking Weekly and Shuntian shibao*). In *Kindai Nihon to Chūgoku* 近代日本と中國 (Modern Japan and China), ed. Takeuchi Yoshimi 竹内好 and Hashikawa Bunzō 橋川文治, 1:341 - 58. Tokyo: Asahi shinbunsha, 1974.

Ishii Yōko 石井洋子. "Shingai kakumei ki no ryū-Nichi joshi gakusei" 辛亥革命期の留日女子學生 (Female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era of the 1911 Revolution). *Shiron* 史論 36(1983), 31 - 54.

Iwasaki Sodō 岩崎徂堂, and Mikami Kifū 三上寄風. *Sekai jūni joketsu* 世界十二女傑 (Twelve world heroines). Tokyo: Kōbundō shoten, 1902.

James, Edward T., ed. *Notable American Women 1607 - 1905: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3 vol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Jissen joshi daigaku toshokan 実践女子大學図書館 (Jissen Women's University

Library). Shimoda Utako kankei shiryō 下田歌子關係資料 (Materials related to Shimoda Utako). Filed by number.

——. *Shimoda Utako kankei shiryō sōmokuroku* 下田歌子關係資料總目錄 (Catalog of materials related to Shimoda Utako). Tokyo: Jissen joshi daigaku toshokan, 1980.

Jissen joshi gakuen hachijū nenshi hensan iinkai 實踐女子學園八十年史編纂委員會 (Editorial committee on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eighty-year history of the Jissen Women's School), ed. *Jissen joshi gakuen hachi jū nen shi* 實踐女子學園八十年史 (The eighty-year history of the Jissen Women's School). Tokyo: Jissen joshi gakuen, 1981.

Jones, Susan Mann, "Hung-Liang-chi (1746 - 1809): The Percep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Political Problems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Ph. 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2.

Judge, Joan, "Between Nei and Wai: Chinese Femal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ed. Bryna Goodman and Wendy Larson, 121 - 43.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 "Beyond Nationalism: Gender and the Chinese Student Experience in Jap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Lo Chui-jung and Lu Miaw-fen, 359 - 93.

——. "Blended Wish Images: Chinese and Western Exemplary Women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pecial Issue of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ed. Susan Mann, 6:1 (2004), 102 - 35. Rpt. In Fong, Qian, and Zurndorfer, 102 - 35.

——. "Citizens or Mothers of Citizens? Gender and the Meaning of Modern Chinese Citizenship." In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ed. Elizabeth Perry and Merle Goldman, 23 - 43. Cambridge, MA: 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Exemplary Time and Secular Times: Wei Xiyuan's *Illustrated Biographies* and the Late Qing Moment." Unpublished paper.

——. "The Ideology of 'Good Wives and Wise Mothers': Meiji Japan and Feminine Modernity in Late-Qing China." In *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ed. Joshua A. Fogel, 218 - 48. Armonk, NY: EastBridge, 2001.

——. "The Power of Print? Print Capitalism and News Media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1 (June 2006), 233 - 54.

——.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Re-forming the Feminine: Female Literacy and the Legacy of 1898.” In *The Historical Legacies of the 1898 Reforms in China*, ed. Rebecca Karl and Peter Zarrow, 158 - 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 “Talent, Virtue, and the Nation: Chinese Nationalisms and Female Subjectiv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3 (June 2001), 765 - 803.

“Jūsan nen buri ni Nihon e kite” 十三年振りに日本へ来て (Return to Japan after thirteen years). Jissen joshi daigaku toshokan, Shimoda Utako kankei shiryō, file no. 752(1943).

Kandiyoti, Deniz. “Afterword: Some Awkward Questions on Women and Modernity in Turkey.” In *Remaking Women: Feminis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ed. Lila Abu-Lughod, 270 - 8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Gender and Society* 2 (1988), 274 - 90.

——. “Identity and Its Discontents: Women and the Nation.” In *Colonial Discourses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363 - 9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Karlgren, Bernhard, trans. *The Book of Odes*.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0.

Katayama Seiichi 片山清一. “Meiji shoki no joshi kyōiku ron” 明治初期の女子教育論 (On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Mejiro gakuen joshi tanki daigaku kenkyū kiyō* 目白学園女子短期大學研究紀要 4 (Dec. 1967), 79 - 94.

——. “Meiji youjū nendai no joshi kyōiku ron 1” 明治 40 年代の女子教育論 1 (On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Meiji 40s, part 1). *Mejiro gakuen joshi tanki daigaku kenkyū kiyō* 目白学園女子短期大學研究紀要 12 (Dec. 1975), 1 - 12.

——. “Meiji zenki no shōgakkō shūshinsho ni miru joshi dōtoku no henshen” 明治前期の小學校修身書にみる女子道德の變遷 (Changes in female ethics as seen through early Meiji elementary ethics texts). *Mejiro gakuen joshi tanki daigaku kenkyū kiyō* 目白学園女子短期大學研究紀要 2 (Nov, 1965), 33 - 46.

Katō Minryū 加藤眠柳. *Joshi risshi hen* 女子立志編 (Compilation of [biographies of] accomplished women). Tokyo: Naigai shuppan kyōkai, 1903.

Kelleher, Theresa. “Women’s Education.” In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rev. ed., ed. Wm. T. de Bary and Irene Bloom, 1:819 - 4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Kerber, Linda. “The Paradox of Women’s Citizenship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e Case of Martin vs. Massachusetts, 1805." In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omen: Essays by Linda Kerber*, 261 - 30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 "The Republican Mother: 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An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omen: Essays by Linda Kerber*, 41 - 6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Ko, Dorothy. "The Body as Attire: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8: 4 (Winter 1997): 8 - 27.

——. *Cinderella; 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Pursuing Talent and Virtue: Education and Women's Culture in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June 1992), 9 - 39.

——. *Teacher of The Inner Chamber: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The Written Word and the Bound Foot: A History of the Courtesan's Aura." In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74 - 10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Ko Shimoda kōchō sensei denki hensanjo 故下田校長先生傳記編纂所 (Biographical Editorial Office on school principal Shimoda Utako). ed. Shimoda Utako sensei den 下田歌子先生傳 (Biography of Shimoda Utako). Tokyo: Ko Shimoda kōchō sensei denki hensanjo, 1943.

Kokuritsu kokkai toshokan 國立國會図書館 (National Diet Library). *Fujin mondai bunken mokuroku. Toshō no bu* 婦人問題文獻目錄、図書館の部 (Catalog of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women's question, books). 3 vols. Tokyo: Kokuritsu kokkai toshokan, 1980 - 96.

Kristeva, Julia. "Women's Time." In Julia Kristeva,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187 - 2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Larson, Wendy.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Lefebvre, Henri.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2,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1991.

Legge, James, trans. *Confucius: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Rpt., New York: Dover, 1971.

——. Trans. *Li Chi Book of Rites: An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Ceremonial*

Usages, Religious Creed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ed. Ch'u Chai and Winberg Chai. 2 vols. Rpt.,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1967.

——, trans. "The Nei Tse: The Pattern of the Family." In *Li Chi Book of Rites*, trans. Legge, vol. 2, 449 - 79.

——, trans. *The Works of Mencius*. Rpt., New York: Dover, 1970.

Leung, Angela Ki Che. "To Chaste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widow Homes in the Qing, 1773 - 1911." *Late Imperial China* 14:2 (Dec. 1993), 1 - 32.

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Li Xiaojiang. "Creating a Public Sphere: A Self-Portrait in the Women's Studies Movement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 (1996), 70 - 112.

——.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A Comparison of Perspectives o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and the West." *Copenhagen Discussion Papers* 20 (Apr. 1993).

——. "From 'Moder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Where Are Chinese Women?" *Signs* 26:4 (Summer 2001), 1274 - 78.

——. "My Path to Womanhood." In *Changing Lives: Life Stories of Asian Pioneers in Women's Studies*, ed. Committee on Women's Studies in Asia, 108 - 22.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With What Discourses Do We Reflect on Chinese Women? Thoughts on Transnational Feminism in China." In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ed. Mayfair Mei-hui Yang, 261 - 7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Li Xiaojiang, and Zhang Xiaodan. "Creating a Space for Women: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1980s." *Signs* 20:1 (Autumn, 1994), 137 - 51.

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Link, Perr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Liu Jung-en, trans. "The Injustice Done to Tou Ngo." In *Six Yüan Plays*, 117 - 58. Middlesex, Eng.: Penguin, 1972.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 - 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Liu Mei Ching. "Forerunners of Chinese Feminism in Japan: Students Fighting for Freedom in Japan."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Leiden, 1988.

Lu, Weijing. "True to Thei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China, 1650 - 1850."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2001.

——. *True to Thei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China, 1650 - 18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Lu Xun. "My Views on Chastity." In *Women in Republican China: A Sourcebook*, ed. Hua R. Lan and Vanessa L. Fong.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Maeyama Kanako 前山加奈子. "Chūgoku no josei muke teiki kankōbutsu ni tsuite—sono naiyō to tokuchō" 中國の女性向け定期刊行物について—その内容と特徴 ("Chinese Periodicals for Women from 1898 to 1949—Their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Rpt. from *Surugadai daigaku ronsō* 駿河臺大學論叢 10(1995), 115 - 45.

——. "Fu 3, Chūgoku ni okeru josei muke shinbun zasshi ichiran, 1898 - 1937" 附3 中國における女性向け新聞、雑誌一覽 1898年—1937年(A ppendix 3, A look at Chinese women'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1898 - 1937), supplement to "Fujo enchi to sono 'entei' tachi: 1930 nendai Chūgoku no feminizumu ron" 「婦女園地」とその「園丁」たち—— 1930年代中國のフミニズム論(The women's garden and its gardeners: Chinese feminism in the 1930s). *Surugadai daigaku ronsō* 駿河臺大學論叢 7(1993), 149 - 61.

Mann, Susa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in the Mid-Ch'ing Period."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 - 1900*, ed.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19 - 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Fuxue' (Women's Learning) by Zhang Xuechang (1738 - 1801): China's First History of Women's Cul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June 1992), 40 - 56.

——. "Learned Wom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 Christina K. Gilmartin et al., 27 - 4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recious Record: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residential Address: Myths of Asian Womanhoo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4 (Nov. 2000), 835 - 62.

——. "Widows in the Kinship, Clas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Q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1 (Feb. 1987), 37 - 51.

——. "Womanly Sentiments and Political Crises: Zhang Qieying's Poetic Voice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n *Wusheng zhi shengL Jindai Zhongguo de funü yu*

guojia 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Voice Amid Silence [I]: Women and the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1600 - 1950]”), ed. Lu Fangshang 呂芳上, 199 - 222.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3.

———. “Women’s Biographies as Family Romance.” Keynote address presented at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Nanjing, May 2001.

———. “Women’s Poems as Inscriptions on the Body Politic.” Unpublished paper.

Martin-Liao, Tianchi. “Traditional Handbook of Women’s Education.” In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ed. Anna Gerstlachere et al., 165 - 89. Bochum: Brockmeyer, 1985.

Masini, Federic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 189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McClintock, Anne. “No Longer in Future Heaven’: Gender, Race and Nationalism.” In *Dangerous Liaisons: Gender, 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ed. Anne McClintock et al., 89 - 11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McElroy, Sarah Coles. “Forging a New Role for Women: Zhili First Women’s Normal School and the Growth of Women’s Education in China, 1901 - 1921.”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ed. Glen Peterson et al., 348 - 7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Meisner, Maurice.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Mittler, Barbara.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 - 191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Mou, Sherry J. *Gentlemen’s Prescriptions for Women’s Lives: A Thousand Years of Biographies of Chinese Wome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Murata Yūjirō 村田雄二郎, ed. “Fujo zasshi” kara miru kindai Chūgoku josei 「婦女雜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國女性(Modern Chinese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dies’ Journal*). Tokyo: Kanbun shuppan, 2005.

Murray, Julia K. “Didactic Art for Women: The Ladies’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In *Flowering in the Shadows: Wome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Painting*, ed. Marsha Weidner, 27 - 53.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Nagayama Moriyoshi 永山盛良. *Taisei meifu den* 泰西名婦伝 (Famous Western women). Tokyo: Seiyōdō shobō, 1901.

Naruse Jinzō 成瀬仁藏. *Joshi kyōiku* 女子教育 (On women's education). In *Naruse Jinzō chosakushū* 成瀬仁藏著作集 (Naruse Jinzō's works), 2: 33 - 155. Tokyo: Nihon joshi daigaku, 1974.

(一) Nemoto Shō [Tadashi] 根本正, trans. *O-Bei joshi risshin den* 歐米女子立身伝 ("Famous Women" [Biographies of successful European and American women]).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1906.

Nivard, Jacqueline. "Bibliographie de la presse féminine chinoise, 1898 - 1949." *Études Chinoises* 5:1 - 2 (Spring—Autumn 1986), 185 - 236.

———.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Republican China* 10:1 (Nov. 1984), 37 - 55.

Nivison, David S.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iograph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4 (Aug. 1962), 457 - 63.

Nolte, Sharon H., and Sally Ann Hastings. "The Meiji State's Policy toward Women." In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 1600 - 1945*, ed. Gail Lee Bernstein, 151 - 7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O'Hara, Albert Richard. *The Position of Woman in Early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ieh Nü Chuan*, "The Biographies of Chinese Women." Taipei: Meiya Publications, 1971.

Ono Kazuko.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Trans. and ed. Joshua A. Foge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Ōsato Hiroaki 大里浩秋. "Nihonjin no mita Shū Kin; Shū Kin shijitsu no jakkan no saikentō" 日本人の見た秋瑾—秋瑾史実の若干の再検討 (Japanese views of Qiu Jin; A reexamination of a number of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Qiu Jin). *Chūgoku kenkyū geppō* 中國研究月報 453 (Nov. 1985), 1 - 20.

Osborne, Peter. *Th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and Avant-Garde*. London: Verso, 1995.

Ozouf, Mona. *Women's Words: Essays on French Singular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ao Tao Chia-lin. "The Anti-Footbinding Movement in Late Ch'ing China: Indigenous Development and Western Influence." *Jindai Zhongguo funü shi yanjiu*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2 (1994), 141 - 78.

Parker, Andrew, Mary Russo, Doris Sommer, and Patricia Yaeger. "Introduction." In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ed. Andrew Parker, et al., 1 - 18.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ernoud, Regine. *Joan of Arc by Herself and Her Witnesses*. Trans. Edward Hyams. Lanham, MD: Scarborough House, 1994.

Peterson, Barbara Bennett, ed. *Notable Women of China: Shang Dynast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0.

Pocock, J. G. A. "Modes of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Tim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91 - 102. Cambridge, Eng.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ong, David. *Shen Pao-chê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Eng.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oovey, Mary. "Curing the 'Social Body' in 1832: James Phillips Kay and the Irish in Manchester." In Special Issue on Gender, Nationalism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Gender and History* 5:2 (Summer 1993), 196 - 211.

Qian, Nanxiu. "Milk and Scent: Works about Women in the *Shishuo xinyu* Genre."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1:2 (Oct. 1999), 187 - 236.

———. "The Mother *Nü Xuebao* versus the Daughter *Nü Xuebao* :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1898 and 1902 Women Reformers." In Nanxiu Qian, Fong, and Smith.

———. "Revitalizing the Xianyuan (Worthy Ladies) Tradition: Women in the 1898 Reforms." *Modern China* 29:4 (Oct. 2003), 399 - 454.

Qian, Nanxiu,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 forthcoming.

Ranciére, Jacques. "The Archaeomodern Trun." In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Demands of History*, ed. Michael P. Steinberg, 24 - 4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Rankin, Mary Backus.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 - 1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The Emergence of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Ch'ing: The Case of Ch'iu Chin." 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ed.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39 - 6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Raphals, Lisa. "Arguments by Women in Early Chinese Text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3:2 (2001), 157 - 95.

———. *Sharing the Ligh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Virtu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Rawski, Evelyn.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Reed, Christopher R.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67 - 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Reynolds, Douglas R. *China, 1898 - 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Rhoads, Edward J. M.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 - 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Riley, Denise. "Does a Sex Have a History?"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ed. Joan Wallach Scott, 17 - 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fel, Lisa B. "Yearnings': Televisual Love and Melodramat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21:4 (Nov. 1994), 700 - 22.

Ropp, Paul S., Paola Zamperini, and Harriet Zurndorfer, eds. Special Theme Issue "Passionate Women: Female Su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3:1 (2001).

Rowe, William T.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Mid-Qing Social Thought: The Case of Chen Hongmou." *Late Imperial China* 13 (Dec. 1992), 1 - 41.

Rüsen, Jörn. "Making Sense of Time: Towards a Universal Typology of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Huang Chun-chieh and Henderson, 3 - 18.

Ryckmans, Pierre.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t." *The Forty-seventh George Ernest Mor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Canberra: The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1986.

Saeki Megumi 佐伯惠. "Meiji ki no Chūgokujin joshi ryūgakusei—Jissen jogakkō o chūshin ni" 明治期の中国人女子留學生—実践女學校を中心に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Meiji period: The Jissen Women's School). M. A. thesis, Kyoritsu Women's University, 1994.

Sakaki Mitsuko 坂寄美都子. "Sakaki Mitsuko shi dan" 坂寄美都子氏談 (A conversation with Ms. Sakaki Mitsuko). In *Jissen joshi daigaku toshokan*, Shimoda Utako kankei shiryō, file no. 3001 - 1 (Aug. 26, 1968).

———. "Shimoda Utako sanjūshichi nen kaiki kinen kōen" 下田歌子三十七年回忌記念講演 (Memorial lecture thirty-seven years after Shimoda Utako's death). *Jissen*

joshi daigaku toshokan, Shimoda Utako kankei shiryō, file no. 3001 - 4 (Nov. 8, 1972).

Sanetō Keishū 實藤惠秀. *Chūgokujin Nihon ryūgaku shi zōho* 中國人日本留學史增補 (A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enlarged edition). Tokyo: Kuroshio shuppan, 1970.

Sang, Tze-lan.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Sangari, Kumku, and Sudesh Vaid. "Recasting Women: An Introduction." In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Indian Colonial History*, ed.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 2 - 26.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Savage-Landor, A. Henry. *China and the Allies*. 2 vol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1.

Schaberg, David.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Schama, Simon.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Schulz Zinda, Yvonne. "Propagating New 'Virtues': 'Patriotism' in Late Qing Textbooks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of Primary Students." In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ed.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677 - 702. Leiden: Brill, 2004.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The Limits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as Categories of Explan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Daedalus* 101 (Spring 1972), 71 - 88.

Scott, Joan Wallach, ed. *Feminism an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Only Paradoxes to Offer: French Feminists and the Rights of 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echiyama Kaku 瀬地山角 and Kihara Yōko 木原葉子. "Higashi Ajia ni okeru ryōsai kenbo shugi"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良妻賢母主義 ("An Ideology of Female Education in Modern East Asia: A Project to Shape a Modern Society"). *Chūgoku shakai to bunka* 中國社會と文化 4 (June 1989), 277 - 93.

Shang Wei. *Rulin waishi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hiina Noritaka 椎名仙卓. *Meiji hakubutsukan kotohajime* 明治博物館事始め

(Primer on Meiji museums). Kyoto: Shibunkaku shuppan, 1989.

Shimoda Utako 下田歌子. *Shina ryūgakusei no tame no shūshin kōwa* 支那留學生のための修身講話(Lectures on ethics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Jissen joshi daigaku toshokan, Shimoda Utako kankei shiryō, file no. 181.

Shimomi Takao 下見隆雄. “Ryū Kō Retsujo den yori miru Jukyō shakai to bosei genri” 劉向「列女伝」より見る儒教社會と母性原理(Confucian society and maternal principles in Liu Xiang's *Lienü zhuan*). *Hiroshima daigaku bungakubu kiyō* 広島大學文學部紀要 50(Mar. 1991), 1 - 21.

Sievers, Sharon L. *Flowers in Salt: The Beginning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Jap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von Silvers, Gabriele. “Die mythische Figur Nügua in der anarchistischen Zeitschrift *Naturgemäße Rechtlichkeit* (*Tian Yi* 天義), 1907 - 1908.” In *Zwischen Tradition und Revolution: Lebensentwürfe und Lebensvollzüge chinesischer Frauen an de Schwelle zur Moderne*, ed. Monika Übelhör, 105 - 30. Marborg: Marborg University Press, 2001.

Sivin, Nathan. “State, Cosmos, and Body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 C.”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5:1 (June 1995), 5 - 37.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8.

Sōgō Masaki 物郷正明. *Meiji no kotoba jiten* 明治のことは辞典(Dictionary of Meiji terms). Tokyo: Tōkyōdō shuppan, 1986.

Sommer, Matthew H.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trand, David. “Citizens in the Audience: Politics as the Podiu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ed. Elizabeth Perry and Merle Goldman, 44 - 69. Cambridge, MA: 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truve, Lynn A. “Introduction.” In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ed. Lynn A. Struve, 3 - 27. Honolulu: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Swann, Nancy Lee. *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 Russel and Russell, 1968. Rpt., Ann Arbor: Michigan Classics in Chinese Studi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Taga Akigorō 多賀秋伍郎, comp. *Kindai Chūgoku kyōiku shi shiryō*, *Shinmatsu hen* 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the late Qing). Tokyo: Nihon gakujutsu shinkō kai, 1972.

Takamura Itsue 高群逸枝. *Josei no rekishi* 女性の歴史 (The history of women). 2 vols. Tokyo: Rironsha, 1966.

Takano Hiromu 高野弘. "Ji jiefu Ma shi shi" 紀節婦馬氏事 (The virtuous Lady Ma). In Takano Hiromu, *Qisu lu* 泣訴録 (Record of grievances). Tokyo, 1905. Sanetō bunko 実藤文庫 (Sanetō Collection) no. 996 Tokyo Hibiya Library Archives.

Takeda Taijun 武田泰淳. *Shūfū shū hito o shūsatsu su* 秋風秋雨人を愁殺す (The tragic execution of the [author] of autumn wind and autumn rain). Tokyo: Chikuma shobō, 1968.

Tan, Christine C. Y. "Prints, Seriality, and Baimeitu ("Pictures of One Hundred Beaut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Tang, Xiaobi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aylor, Charles.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eiss, Janet. *Disgraceful Matters: The Politics of Chas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From Model Subjects to Model Victims: Chastity Awards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Q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2001.

—. "Managing Martyrdom: Female Suicide and Statecraft in Mid-Qing China." In Ropp, Zamperini, and Zurndorfer, 47 - 76.

T'ien Ju-k'ang [Tian Rukang]. *Male Anxiety and Female Chast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thical Values in Ming-Ch'ing Times*. Leiden: E. J. Brill, 1988.

Tsuboya Zenshirō 坪谷善四郎. *Hoku Shin kansen ki* 北清觀戰記 (Observation of the battles in northern China). Tokyo: Bunbudō, 1901.

Tuckey, Janet. *Kaiten iseki Fukkoku bidan* 回天偉迹仏國美談 (The French tale of an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Trans. Awaya Kan'ichi 粟屋關一. Tokyo: Dōmei shobō, 1886.

Twitchett, Denis. "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ed.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Dennis Twitchett, 24 - 3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Uenuma Hachirō 上沼八郎. "Shimoda Utako to Chūgoku joshi ryūgakusei: Jissen jogakkō 'Chūgoku ryūgakuseibu' to chūshin to shite" 下田歌子と中國女子留學生—実践女學校「中國留學生部」を中心として (Shimoda Utako and the Chinese

female overseas students, with a focus on the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 Department of the Jissen Women's School). *Jissen Joshi daigaku bungakubu kiyō* 實踐女子大學文學部紀要 25 (Mar. 1983), 61 - 89.

Unger, Jonathan,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Uno, Kathleen S. "The Origins of 'Good Wife, Wise Mother' in Modern Japan." In *Japanische Frauengeschichte* (n), ed. Erich Pauer and Regine Mathias, 31 - 46. Marburg: Förderverein Marburger Japan-Reihe, 1995.

Vissière, A. "Biographie de Jouân Yuân, Homme d'état, lettré et mathematician (1764 - 1849)." *T'oung Pao* (1904), 561 - 96.

Waley, Aruthur, trans. *Chinese Poem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2.

Waltner, Ann. "On Not Becoming a Heroine: Lin Dai-yu and Cui Ying-ying."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5:1 (1989), 61 - 78.

Wang, C. H. "Towards Defining a Chinese Hero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5:1 (Jan. -Mar. , 1974), 25 - 35.

Wang, Daid Der-wei.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Wang Hui. *China's New World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 Theodore Hut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Wang, Ji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Wang, Lingzhen. *Personal Matters: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Wang Yi. "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Television in China: Expectations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2 (1999), 222 - 45.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Warner, Marina. *Joan of Arc: The Image of Female Hero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Widmer, Ellen.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 “Honglou meng ying and Three ‘Women’s Novels’ of Late Qing.” In Lo Jiu-jiung and Lu Miaw-fen, 301 - 26.

——. “Inflecting Gender: Zhan Kai/Siqi Zhai’s ‘New Novels’ and Courtesan Sketches.” In Fong, Qian, and Zurndorfer, 136 - 68.

——. “The Rhetoric of Retrospection: May Fourth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Ming-Qing Woman Writer.”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 Milena.

Dolželová-Velingerová et al., 193 - 22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 trans. “Selected Short Works by Wang Duanshu (1621-after 1702).” In *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 ed. Susan Mann and Yu-yin Cheng, 178 - 9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Wright, Arthur F. “Values, Roles, and Personalities.”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ed.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3 - 2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Wright, Mary Clabaugh. “Introduction.” I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ed. Mary Clabaugh Wright, 1 - 63.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Wu Pei-yi. “Yang Miaozen: A Woman Warrior in Thirteenth Century China.”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4:2 (2002), 137 - 69.

Wu Weihe, and Bai Chongmin. “Casting the Mold of Female Body and Identity: Reinterpreting Guang Lienü Zhuan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trans. Sasha S. Welland. In *Cruel/Loving Bodies* (Ku/ai shenti 酷/愛身體), 48 - 51. Catalog of exhibit held at Shanghai Duolun Museum of Modern Art (多倫現代美術館), June 2004, n. p. Rpt. in *Yishu: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2: 3 (2003), 15 - 19.

Xia Xiaohong. “Ms. Picha and Mrs. Stowe.” In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 - 1918*, ed. David Pollard, 241 - 5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Xiong Yuezhe. “Degrees of Familiarity with the West in Late Qing Society.” In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 - 1918*, ed. David Pollard, 25 - 3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Yamazaki Jun'ichi 山崎純一. *Kyōiku kara mita Chūgoku joseishi shiryō no kenkyū: “Onna shisho” to “Shin fufu” sanbu sho* 教育から見た中國女性史資料の研究:「女四書」と「新婦譜」三部書(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women’s history

a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The Four Books for Women* and three editions of the *Standard Guide for the New Wife*.) Tokyo: Meiji shoin, 1966.

Yamazumi Masami 山住正己. “Kyōkasho” 教科書 (Textbooks). In *Nihon shi daijiten* 日本史大事典 (Encyclopedia of Japanese history), 3: 780 - 83. Tokyo: Heibonsha, 1993.

Yan Ansheng 嚴安生. *Nihon ryūgaku seishin shi: kindai Chūgoku chishikijin no kiseki* 日本留學精神史: 近代中國知識人の軌迹 (A history of the spirit of overseas study in Japan: Traces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kyo: Iwanami shoten, 1994.

Ye, Weili.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 - 2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Yeh, Catherine Vance. “Creating the Urban Beauty: The Shanghai Courtesan in Late Qing Illustrations.”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 Judith T. Zeitlin and Lydia H. Liu with Ellen Widmer, 397 - 44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 *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 - 1910*.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Yeh, Michelle. “Revolutionizing Chinese Poetry: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Poet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Yoshimura Toratarō 吉村寅太郎. *Nihon genji kyōiku* 日本現時教育 (Contemporary Japanese education). Tokyo: Kinkōdō, 1898.

Zarrow, Peter. “He Zhen [Ho Chen] and Anarcho-Feminism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4 (1988), 796 - 813.

———. “Introduction: Citizenship in China and the West.” In *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 - 920*, ed. Joshua A. Fogel and Peter G. Zarrow, 3 - 38.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Zhang Xuecheng. “Fuxue.” Trans. Susan Mann. In Kang-i Sun Chang and Saussy, 784 - 99.

Zhou Yichuan 周一川. *Chūgokujin josei Nihon ryūgaku shi kenkyū* 中國人女性日本留學史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female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Tokyo: Kokusho kankōkai, 2001.

———. “Shinmatsu-Minkoku shonen ni okeru Nihon ryūgaku Chūgokujin joshi gakusei zō no henshen” 清末民國初年における日本留學中國人女子學生像の變遷 (Changes in the image of Chinese female overseas study in Japan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Qchanomizu joshi daigaku ningen bunka kenkyū nenpō* お茶の水女

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年報 19(1995), 65 - 71.

ZhouYiqun. "Virtue and Talent: Women and Fushi in Early China."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5:1 (2003), 1 - 42.

Zurndorfer, Harriet. "The 'Constant World' of Wang Chao-yüan: Women, Education, and Orthodoxy in 18th Century China—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 *Family Process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 581 - 619.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1992.



凤凰文库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 《走进马克思》 孙伯鍈 张一兵 主编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张一兵 著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 任平 著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 张一兵 著
《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 胡大平 著
《国外毛泽东学研究》 尚庆飞 著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段忠桥 著
《资本主义理解史》(6卷) 张一兵 主编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张亮 著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 谢永康 著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景源 主编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李景源 吴元梁 主编
《科学发展观:现代性与哲学视域》 姜建成 著
《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周穗明 王玫 等著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 张文喜 著
《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 孙伟平 著
《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阐释》 唐正东 著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哲学阐释》 欧阳英 著
《正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 王广 著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英]斯图亚特·西姆 著 吕增奎 陈红 译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 [英]保罗·鲍曼 著 黄晓武 译
《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 王浩斌 著

二、政治学前沿系列

-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 孔繁斌 著
《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 王海洲 著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 [英]斯蒂芬·卢克斯 著 彭斌 译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译
《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毛兴贵 等译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意]诺贝托·博比奥 著 陈高华 译
《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 [美]布鲁斯·阿克曼 等著 应奇 编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英]T. H. 马歇尔 等著 郭忠华 刘训练 编
《当代社会契约论》 [美]约翰·罗尔斯 等著 包利民 编
《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 [英]G. A. 柯亨 等著 吕增奎 编
《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 [英]欧若拉·奥尼尔 等著 徐向东 编
《宪政与民主》 [英]约瑟夫·拉兹 等著 佟德志 编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苏宝俊 译



- 《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 [美]赫尔曼·M.施瓦茨著 徐佳译
- 《税收政治学:一种比较的视角》 [美]盖伊·彼得斯著 郭为桂 黄宁莺译
- 《控制国家:从古希腊至今的宪政史》 [美]斯科特·戈登著 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译
- 《社会正义原则》 [英]戴维·米勒著 应奇译
-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澳大利亚]安德鲁·文森特著 袁久红译
- 《新社会主义》 [加]艾伦·伍德著 尚庆飞译
- 《政治的回归》 [英]尚塔尔·墨菲著 王恒 臧佩洪译
- 《自由多元主义》 [美]威廉·盖尔斯敦著 佟德志 庞金友译
- 《政治哲学导论》 [英]亚当·斯威夫特著 余江涛译
-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 [英]理查德·贝拉米著 王萍 傅广生 周春鹏译
-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英]约翰·格雷著 顾爱彬 李瑞华译
- 《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 [英]乔治·克劳德著 应奇译
-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美]迈克尔·哈特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 杨建国 范一亭译
- 《反对自由主义》 [美]约翰·凯克斯著 应奇译
- 《政治思想导读》 [英]彼得·斯特克 大卫·韦戈尔著 舒小昀 李霞 赵勇译
- 《现代欧洲: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 [英]桑德拉·哈尔珀琳著 唐皇凤 武小凯译
- 《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约翰·西蒙斯著 郭为桂 李艳丽译
- 《政治经济学理论》 [美]詹姆斯·卡波拉索 戴维·莱文著 刘骥等译
- 《民主国家的自主性》 [英]埃里克·A.诺德林格著 孙荣飞等译
-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英]乔·米格德尔著 张长东译
-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 [美]彼得·霍尔著 刘骥 刘娟凤 叶静译
- 《社会契约论》 [英]迈克尔·莱斯诺夫著 刘训练等译
-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 [澳]菲利普·佩蒂特著 刘训练译
-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 冯克利译
- 《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 张国清译
- 《社会正义论》 [英]布莱恩·巴利著 曹海军译
-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美]汉娜·阿伦特著 孙传钊译
- 《作为公道的正义》 [英]布莱恩·巴利著 曹海军 允春喜译
- 《古今自由主义》 [美]列奥·施特劳斯著 马志娟译
- 《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乔治·格劳斯科著 毛兴贵译
-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 [美]罗伯特·A.达尔著 范春辉等译
- 《论伦理精神》 张康之著
- 《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 [英]科斯塔斯·杜兹纳著 辛亨复译
- 《阐释和社会批判》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 任辉献 段鸣玉译
-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郭忠华编
- 《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 应奇主编
-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 [美]安娜·M.史密斯著 付琼译
-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编
-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英]迈克尔·肯尼著 李永新 陈剑译

三、纯粹哲学系列

- 《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叶秀山西方哲学论集(1998—2002)》 叶秀山著
- 《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 黄裕生著

《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 谢地坤 著
《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尚杰 著
《海德格尔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引论》 宋继杰 著
《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 赵广明 著
《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黄裕生 著
《理念与神: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及其神学意义》 赵广明 著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 王恒 著
《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 黄文前 著
《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 SEIN》 李文堂 著
《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 尚杰 著
《胡塞尔直观概念的起源:以意向性为线索的早期文本研究》 陈志远 著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 方向红 著
《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罗蒂哲学研究》 陈亚军 著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 刘永谋 著
《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 叶秀山 著
《学与思的轮回:叶秀山2003—2007年最新论文集》 叶秀山 著
《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 户晓辉 著
《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 倪梁康 著
《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 王齐 著

四、宗教研究系列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研究》(上下卷) 杜继文 著
《中国佛教通史》(15卷) 赖永海 主编
《中国禅宗通史》 杜继文 魏道儒 著
《佛教史》 杜继文 主编
《道教史》 卿希泰 唐大潮 著
《基督教史》 王美秀 段琦 等著
《伊斯兰教史》 金宜久 主编
《中国律宗通史》 王建光 著
《中国唯识宗通史》 杨维中 著
《中国净土宗通史》 陈扬炯 著
《中国天台宗通史》 潘桂明 吴忠伟 著
《中国三论宗通史》 董群 著
《中国华严宗通史》 魏道儒 著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3卷) 潘桂明 著
《禅与老庄》 徐小跃 著
《中国佛性论》 赖永海 著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 著
《基督教思想史》 [美]胡斯都·L.冈察雷斯 著 陈泽民 孙汉书 司徒桐 莫如喜 陆俊杰 译

五、人文与社会系列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美]威廉·贝纳特 彼得·科茨 著 包茂红 译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刘北成 刘小鸥 译

-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等译
《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 [美]A. 麦金太尔 著 宋继杰 译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美]R. M. 昂格尔 著 吴玉章 周汉华 译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英]约翰·凯里 著 吴庆宏 译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韩震 等译
《社会行动的结构》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 著 张明德 夏遇南 彭刚 译
《文化的解释》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1)》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霍伟岸 叶颖 译
《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陈周旺 译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 [美]理查德·塔克 著
罗炯 等译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 [英]基思·托马斯 著 宋丽丽 译
《男性气概》 [美]哈维·C. 曼斯菲尔德 著 刘玮 译
《黑格尔》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张国清 朱进东 译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美]罗伯特·K. 默顿 著 唐少杰 齐心 等译
《个体的社会》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翟三江 陆兴华 译
《象征交换与死亡》 [法]让·波德里亚 著 车槿山 译
《实践感》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蒋梓骅 译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 [美]利奥·施特劳斯 著 申彤 译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褚松燕 译
《传统的发明》 [英]E. 霍布斯鲍姆 T. 兰格 著 顾杭 庞冠群 译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美]海登·怀特 著 陈新 译
《卢梭问题》 [德]恩斯特·卡西勒 著 王春华 译
《自足语义学:为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辩护》 [挪威]赫爾曼·开普兰
[美]厄尼·利珀尔 著 周允程 译
《历史主义的兴起》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陆月宏 译
《权威的概念》 [法]亚历山大·科耶夫 著 姜志辉 译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英]王斯福 著 赵旭东 译
《王弼〈老子注〉研究》 [德]瓦格纳 著 杨立华 译
《章学诚思想与生平研究》 [美]倪德卫 著 杨立华 译
《中国与达尔文》 [美]詹姆斯·里夫 著 钟永强 译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美]韩书瑞 著 陈仲丹 译
《中华帝国后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黄卫总 著 张蕴爽 译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词中的园林与玩好》 [美]王晓山 著 文韬 译
《六朝精神史研究》 [日]吉川忠夫 著 王启发 译
《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 著 黄建华 黄迅余 译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彭慕兰 著 史建云 译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日]佐藤慎一 著 刘岳兵 译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美]王国斌 著 李伯重 连玲玲 译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日]岛田虔次 著 甘万萍 译
《为权力祈祷》 [加]卜正民 著 张华 译

-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 译
- 《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斯·韦伯 著 洪天富 译
-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美]德里克 著 翁贺凯 译
- 《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D. 布朗 等著 朱勇 译
- 《文化、权力与国家》 [美]杜赞奇 著 王福明 译
-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 著 唐晓峰 译
-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美]史华兹 著 程钢 译 刘东 校
-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 [日]滨下武志 著 高淑娟 孙彬 译
- 《中国美学问题》 [美]苏源熙 著 卞东坡 译 张强强 朱霞欢 校
- 《翻译的传说：构建中国新女性形象》 胡纛 著 龙瑜成 彭珊珊 译
- 《〈诗经〉原意研究》 [日]家井真 著 陆越 译
-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美]高彦颐 著 苗延威 译
-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美]杜赞奇 著 王宪明 高继美 李海燕 李点 译
-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美]芮乐伟·韩森 著 鲁西奇 译
- 《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 [荷]安国风 著 纪志刚 郑诚 郑方磊 译
- 《毁灭的种子：二战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 [美]易劳逸 著 王建朗 王贤知 贾维 译
-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美]李丹 著 张天虹 张胜波 译
- 《18世纪的中国社会》 [美]韩书瑞 罗有枝 著 陈仲丹 译
- 《开放的帝国：1600年的中国历史》 [美]韩森 著 梁侃 邹劲风 译
- 《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鲍吾刚 著 严蓓雯 韩雪临 伍德祖 译
-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日]中岛乐章 著 郭万平 高飞 译
- 《朱熹的思维世界》 [美]田浩 著
-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建构》 杨美慧 著 赵旭东 孙珉 译 张跃宏 校
- 《美国的形象：1931—1949》 [美]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著 姜芹芹 译
- 《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 [日]松浦章 著 董科 译
- 《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 [日]顾琳 著 王玉茹 张玮 李进霞 译
- 《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 [日]松浦章 著 郑洁西 译
-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科大卫 著 卜永坚 译
- 《中国善书研究》 [日]酒井忠夫 著 刘岳兵 何莺莺 孙雪梅 译
-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 [日]城山智子 著 孟凡礼 尚国敏 译
- 《虎、米、丝、泥：晚期中华帝国南部的环境与经济》 [美]马立博 著 王玉茹 译
-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形象》 [美]卢苇菁 著 秦立彦 译
-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 [美]韩书瑞 著 刘平 唐雁超 译

七、历史研究系列

- 《世界现代化历程》(6卷) 钱乘旦 主编
- 《中国近代通史》(10卷) 张海鹏 主编
- 《极端的年代》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凡 等译
- 《漫长的20世纪》 [意]杰奥瓦尼·阿瑞基 著 姚乃强 译
-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钱乘旦 陈晓律 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历史宝筏 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作者=(美)季家珍著;杨可译

页数=325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11

SS号=12926760

DX号=000008212634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212634&d=4CA7A4E30CF1AF70683B80FE30A46982&fenlei=04071006&

sw=%C0%FA%CA%B7%B1%A6%B7%A4